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敏感期的调查与启示*

章飞¹ 赵倩¹ 魏洁²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1200;
2.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研修发展部,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对400多名骨干教师的调查表明:专业知识、职业技能、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发展敏感期都在教师发展的职前阶段;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其职后阶段;职后教师专业发展确实存在平台期,当然,对优秀教师同时也是突破期。为此,可以以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敏感期为指引,开展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建议:职前阶段,应注重教师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养成,并注意以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为载体,发展教师专业能力;职初阶段,应加强教师教学管理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等专业基础能力的研修;职后成熟阶段,特别是职后突破阶段,应注意激发教师的专业情感、提升专业理念、注重教学研究能力等高阶能力的研修。

[关键词] 教师专业素养; 发展敏感期; 教师教育; 教师培训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01-07

一、问题提出

教师专业素养,存在不同的结构^[1-4]。正如儿童的品德、素养等发展具有关键期、敏感期一样^[5-6],教师各方面专业素养的发展,也会呈现阶段性差异,具有不同的敏感期。因此,在相应专业素养的发展敏感期加强该素养的发展,相对而言,更为恰当,为此,需要了解教师专业素养及其各具体成分发展的敏感期。基于这个想法,以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中建构的教师专业素养框架^[7]为基础,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敏感期,以基础教育阶段的专家型教师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以下调查研究。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1. 问卷的编制

(1) 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划分

其一,关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文献述评。

在调查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敏感期之前,我们首先对教师专业发展阶段进行了文献研究。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国内外研究颇为丰富,呈现出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学前、小学、中学等多学段或是不同学科的特点,其内容从人类生命发展、教师专业技能、教师执教关注点等维度展开,集中在职后教师发展的阶段分类,有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等。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伯顿把教师专业发展分为三阶段论:生存阶段、调整阶段和成熟阶段^[8];我国学者郑彩国则采用了四阶段论,分为新手阶段、胜任阶段、熟练阶段和专家阶段^[9];钟祖荣将教师发展阶段划分为5个阶段,包括适应期、熟练期、探索期、成熟期、专家期^[10];王铁军则将教师职后发展的五阶段分为:入职适应期、成熟胜任期、高原平台期、成功创造期、退职回归期^[11]。实际上,在不同的阶段论

*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的立体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SJZDI174)。

[收稿日期] 2020-12-21

[作者简介] 章飞,男,江苏南通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赵倩,女,江苏溧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魏洁,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研修发展部主任,特级教师。

中,除了退休回归期外,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了适应期、熟练期和专家期,只是表述方式有所差异而已。

其二,关于本调查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确立。基于后期对教师专业发展方式和途径的研究目的,我们从教师职业发展的维度对教师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在与一线教师交流中发现,教师在熟练进行教学实践之前的职初阶段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入职前三年,是适应教学的阶段,因此,将职初阶段分成两个阶段更具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后续调查问卷中,采用职后发展的四阶段论,外加职前阶段,确定了这样5个阶段:师资养成时期(主要指入职前在师范院校进行教师培养的阶段),职初适应阶段(指入职初逐步适应一线教学的阶段,一般指入职的前3年),职初胜任阶段(指入职后已经逐步胜任教学任务,能较好完成教学任务的阶段,一般指入职后的3~5年),职后成熟阶段(指入职后已经完全熟练地开展教学活动、完全胜任教学任务的阶段,一般指入职后的5~10年),职后突破阶段(作为成熟教师,入职10年左右后,往往进入一个平台期,多数教师可能基本定型,部分优秀教师会有一个再次提升,成长为专家型教师,一些文献称之为专家教师阶段,该阶段一般指入职10年以后)。另外,为了让调查对象能较为全面地理解并认识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我们在问卷前面的引导语中,对这5个阶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2)关于调查指标与内容的设计

其一,关于调查指标的设计。本研究拟调查各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敏感期,关于各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容,主要参考课题组已有研究的“四方面三支持系统”。关于教师专业素养,课题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从“能从教”“愿从教”“方向正确”“品德高尚”4个方面,构建了涵盖专业能力、专业情感、专业理念、专业品德的专业素养结构体系(如图1所示)^[7]。同时,我们认为,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又需要以相应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以及通用能力为支撑。例如,教师专业素养之专业能力中的教学实施能力,既需要有关教育教学的专业知识支撑,同时也离不开教师较好的口语表达、板书表达、信息技术呈现等技能,还需要具有较好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通用的能力。因此,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是教师相关专业知识、职业技能

和通用能力协同作用的结果,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三者构成了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支持系统(如图2所示)^[7]。因此,本次调查,将教师专业知识、职业技能、通用能力的发展敏感期也纳为调查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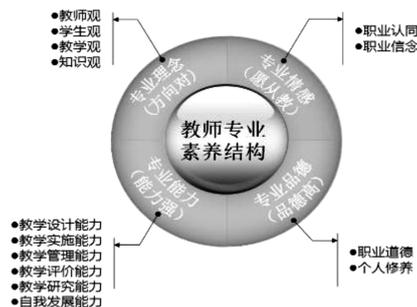


图1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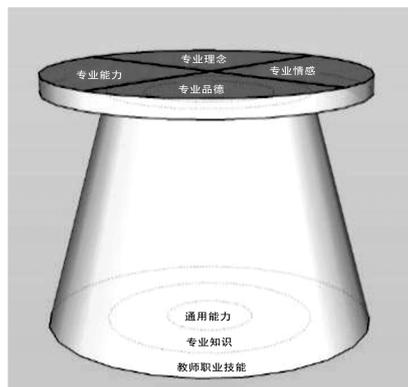


图2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支持系统

其二,关于调查详细内容的确定。为了更为细致地刻画教师专业素养,又对教师专业能力、专业情感、专业理念、专业品德4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划分。如将教师专业能力划分为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自我发展能力6个方面,形成6个二级指标。对于每一个二级指标,又根据具体情况细分为若干三级指标,如教学设计能力,根据教学设计的环节,细分了目标确定、流程设计、素材选取、方法匹配、评价促进、班队活动设计等6个三级指标。这样专业素养及发展支持系统被细分为99个三级指标。考虑到部分指标的分界不是那么清晰,在有限的调查时间内,特别是在没有现场交流的情况下,被调查者未必能准确地加以区分;另外课题组讨论中也发现部分三级指标的发展敏感期相近。基于上述思考,课题组对部分三级指标进行了适度合并,得到了60个三级指标。当然,为了便于后续研究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策略,我们对每一个三级指标增加了“职前培养阶段

应达到的目标程度”“为达成职前培养阶段的发展目标建议采取的发展方式”这两个选项,因此,本问卷计有 180(60×3)个选项。

当然,不同学段、不同学科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敏感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本次调查中也收集了被调查者所教学段、学科、职称、教龄等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既便于课题组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广泛性、代表性,也为后续研究中对具体学科、学段进行数据处理提供了方便,便于课题组了解相关数据是否确实存在学段、学科的差异等。

2. 调查的实施

(1) 关于调查实施的可行性、有效性

了解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敏感期,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已经成长为教育教学专家的专家型教师。另外,如前所述,本问卷信息量大,对于每一个选项都需要被调查者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调查拟采用现场会议调查的形式进行。但会议调查,其调查对象相对单一,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较难组织较大规模的现场调查,因此,最终课题组采用了网络调查的方式。由于本次调查对象是专家型教师,因此,课题组委托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对参加江苏省首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培训的教师(这部分教师都是各市遴选出来、拟成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的骨干教师)定点投放调查问卷,保证所有参加调查的教师都是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型教师。同时,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向这部分教师反复强调,“本次网络调查,需要 30 分钟以上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不要勉强,如果填写务必认真”,以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

(2) 关于调查问卷的呈现形式

由于信息量大,手机端阅读不便,而且也难形成全局感,因此,全部采用 PC 端网页版调查问卷。同时考虑到同一个指标的“发展敏感期”“职前阶段的目标要求”“达成目标的发展方式”这 3 个选项一并作答,便于被调查者整体考虑,为此,将同一个指标的这 3 个选项横向排列,通过滚动条进行下一个指标的作答。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432 份,为了提高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将调查用时小于 30 分钟的问卷剔除,共得到有效答卷 41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6.5%。这 417 个被调查者的学段、学科分布见表 1。

表 1 被调查对象学段、学科分布表

学段、学科	人数(人)
幼儿园	39
其他	1
幼儿园	37
中小学语文	1
小学	238
小学科学	22
小学思想与品德	18
幼儿园	1
中小学美术	25
中小学数学	84
中小学英语	4
中小学语文	83
中学物理	1
初中	48
中小学语文	21
中学物理	27
高中	92
中小学美术	1
中小学数学	12
中小学信息技术	11
中小学英语	4
中小学语文	7
中学地理	1
中学化学	4
中学历史	6
中学生物	21
中学物理	4
中学政治	21
总计	417

问卷回收后,数据采用 Excel 录入、管理,并结合 SPSS24.0 进行分析。数据处理时,首先分别统计了各三级指标对应敏感期各项的百分比,然后归聚得到相应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对应敏感期的百分比,见表 2、表 3、表 4(在计算二级指标中各个阶段比例时,我们将各三级指标同等对待,赋予相同的权重;同理,合并一级指标对应各阶段百分比时,各一级指标所涵盖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同)。

表 2 教师专业素养各子成分发展敏感期

发展敏感期	专业能力						专业理念				专业情感		专业品德	
	教学设计能力	教学实施能力	教学管理能力	教学评价能力	教学研究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	教师观	学生观	教学观	知识观	职业认同	职业信念	职业道德	个人修养
A 师资养成时期	10.35%	10.55%	10.98%	8.93%	8.15%	18.71%	31.18%	32.37%	33.33%	32.37%	42.21%	38.37%	51.32%	46.52%
B 职初适应阶段	21.14%	21.15%	25.61%	19.24%	14.57%	15.35%	13.67%	13.19%	12.95%	11.51%	12.71%	15.11%	12.71%	15.83%
C 职初胜任阶段	23.34%	23.21%	24.56%	21.76%	19.12%	14.63%	11.99%	15.83%	12.95%	12.71%	10.55%	11.75%	8.87%	8.87%
D 职后熟练阶段	21.18%	21.97%	18.37%	24.82%	29.86%	19.90%	15.35%	15.35%	16.31%	16.07%	12.71%	11.27%	7.19%	10.31%
E 职后突破阶段	23.98%	23.12%	20.48%	25.24%	28.30%	31.41%	27.82%	23.26%	24.46%	27.34%	21.82%	23.50%	19.90%	18.47%

表 3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各子成分发展敏感期

发展敏感期	专业知识					职业技能					通用能力			
	人文与科学素养知识	教育教学知识	学科知识	学科教学知识	学生发展知识	自我发展知识	口语技能	书写技能	信息技术技能	学习能力	表达能力	合作能力	思维能力	
A 师资养成时期	39.57%	34.19%	29.02%	27.22%	23.26%	28.06%	48.08%	52.76%	41.61%	36.45%	44.52%	38.37%	30.94%	
B 职初适应阶段	12.47%	21.07%	19.42%	25.30%	23.50%	21.34%	17.03%	14.39%	19.42%	15.59%	18.78%	21.10%	15.83%	
C 职初胜任阶段	10.07%	11.44%	14.39%	13.91%	16.55%	13.43%	7.43%	6.83%	9.95%	13.67%	8.79%	10.31%	12.23%	
D 职后熟练阶段	15.83%	13.94%	16.55%	14.63%	17.51%	15.59%	8.87%	7.79%	12.35%	14.39%	9.91%	11.27%	16.07%	
E 职后突破阶段	22.06%	19.36%	20.62%	18.94%	19.18%	21.58%	18.59%	18.23%	16.67%	19.90%	17.99%	18.94%	24.94%	

表 4 教师专业素养及发展体系各一级指标发展敏感期

发展敏感期	专业能力	专业理念	专业情感	专业品德	专业知识	职业技能	通用能力
A 师资养成时期	11.28%	32.31%	40.29%	48.92%	30.22%	47.48%	37.57%
B 职初适应阶段	19.51%	12.83%	13.91%	14.27%	20.52%	16.95%	17.83%
C 职初胜任阶段	21.10%	13.37%	11.15%	8.87%	13.30%	8.07%	11.25%
D 职后熟练阶段	22.68%	15.77%	11.99%	8.75%	15.67%	9.67%	12.91%
E 职后突破阶段	25.42%	25.72%	22.66%	19.18%	20.29%	17.83%	20.44%

从表2、表3、表4中不难发现:

1. 教师专业知识、职业技能、通用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前师资养成阶段

由表4可以看出,教师专业知识、职业技能、通用能力的发展敏感期选项中,排在第一位的均为职前师资养成阶段,分别有30.22%、47.48%、37.5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职前师资养成阶段,特别是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选择该阶段的被调查者人数远远超出其他阶段。具体到人文与科学素养知识、教育教学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生发展知识、自我发展知识、口语技能、书写技能、信息技术技能、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等二级指标,除了学生发展知识外,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相应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前师资养成阶段;对于学生发展知识这一指标,选择职初适应阶段的最多,占23.50%,同时有23.2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职前师资养成阶段,两者相差无几。这些都再次说明,职前师资养成阶段是发展学生相关知识、职业技能以及通用能力的好机会。

2. 教师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前师资养成阶段

由表4可以看出,教师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发展敏感期选项中,排在第一位的均为职前师资养成阶段,分别有32.31%、40.29%、48.9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职前师资养成阶段,特别是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选择该阶段的被调查者数远远超出其他阶段。具体到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知识观、职业认同、职业信念、职业道德、个人修养等二级指标,具有同样的规律。这说明,职前师资养成阶段是发展教师专业理念、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的关键时期。

3. 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分散于职后各阶段

由表4可以看出,关于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分别有25.42%、22.68%、21.10%、19.5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职后突破阶段、职后熟练阶段、职初胜任阶段、职初适应阶段,仅有11.2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师资养成阶段,这说明,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后。具体到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二级指标,具有同样的规律,各个二级指标中,发展敏感期选项最高的都在职后阶段。如,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评价能力、自

我发展能力,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敏感期在职后突破阶段;教学研究能力,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敏感期在职后成熟阶段,其次是职后突破阶段;教学管理能力,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敏感期是职初适应阶段。

4. 职后突破阶段确是职后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关键期

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是职后突破阶段;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职业技能、通用能力这5个一级指标的发展敏感期选项中,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都仅低于职前师资养成阶段,排在第二位;而对于专业知识的发展敏感期,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虽然排在第三位,但占比达20.29%,与选择职初适应阶段的占比20.52%相差无几。具体到二级指标,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各二级指标,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都仅低于职前师资养成阶段,排在第二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的13个二级指标中,其中8个二级指标的发展敏感期,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排在第二位,另外5个指标的发展敏感期,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虽然排在第三位,与第二位的占比十分相近;专业能力的各个二级指标中,最多的被调查者认为,自我发展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后突破阶段,教学研究能力、教学实施能力的发展敏感期,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排在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相差无几,如教学研究能力的发展敏感期,选择职后突破阶段的教师数占比28.30%,选择职后成熟阶段的教师数最多,占比29.8%。这些数据表明,职后突破阶段确实是职后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重要阶段。

四、结论与启示

1. 对教师职前培养的启示

(1)以专业知识、职业技能、通用能力的发展为抓手,促进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教师专业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教育教学活动的最终实现,除了要求教师具有较好的通用能力外,还要求教师具有教师这一职业特有的职业技能。因此,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构成教师专业素养(特别是专业能力)发展的支撑系统。本次调查进一步表明,职前师资养成阶段是发展学生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的最好时机,因此,职前

教育阶段务必抓住这一时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关知识的传授、相关职业技能的训练和通用能力的发展。当然,职业技能与通用能力的发展,绝非纸上谈兵,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活动。因此,应注重设计综合性活动,锻炼学生在活动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协同发展学生的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从而以此支撑其教学能力的提升,为其职后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2) 注重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协同发展

调查表明,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发展的敏感期在职前师资养成阶段。这与我们对于教学一线的观察是一致的。在与一线教师以及学校管理人员的交流中可以发现,教师入职初期由于面临大量繁杂的教学实践事务和管理事务,职初阶段教师常常疲于应付,满足于尽快完成任务,并不注重先进教学理念的实践运用;很多教师由于职初阶段的惯性,甚至进入职后成熟阶段后,自认为已经能应对日常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习惯了,因而不能自觉地进行教学反思与提升,不再深层次地思考教育教学的本质,甚至表现出对原来所学习的先进教学理念的不屑,专业理念存在一个回落的现象;工作十年左右时,部分教师产生惰性心理,自身专业发展迟滞,而另一部分教师在熟练应对教学事务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自身专业发展进行反思,并带着困惑与反思,再次走上学习提升之路,实现自身专业素养的新突破,这就是所谓教师专业素养的职后突破阶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方面也有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说,从入职初期到职后成熟阶段,教师“无暇”关注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提升,因而,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方面提升相对较慢。当然,职后突破阶段是其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发展的第二个敏感期,但寄希望于在该阶段发展,为时已晚。因此,在教师的职前师资养成阶段,应注重对教师进行相关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培养,在未来教师身上种下终身乐教的基因,使其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和高尚的师德修养。

总之,在师范教育阶段,学校课程与教学的重心应专注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职业技能的形成、通用能力的发展以及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养成,力图使未来的教师既能适应职初的教育教学工作,又为其后期的专业发展奠定基

础。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师范生希望通过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等协同发展,形成适度的专业能力,但并不应指望师范生能形成很好的专业能力。一方面,毕竟四年的本科学业时间有限,希冀师范生各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并不现实;另一方面,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后阶段,职后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更便于其积累相关活动经验,更快捷地提升其相关专业能力,也就是说,职后阶段发展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提升更为经济、高效。很多中小学校长希望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即具有很好的专业能力,能完全胜任教育教学工作,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2. 对职后培训的启示

(1) 职初阶段应注重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设计能力与教学实施能力的发展

5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教学管理能力的发展敏感期在职初阶段。这符合一线教师的实际状况。职初阶段,教师们虽然在师范院校已经习得有关教学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形成一定的专业能力,但毕竟缺乏实践经验,而教育教学实践面对的是千差万别而又生动活泼的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仍然存在大量管理问题,而这样的管理经验是师范生这一学生角色极为欠缺的,因此,入职初期,既是对教师教学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也是教师教学管理能力提升的极好时机。类似地,教学设计、教学实施能力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因此,职初阶段的教师专业发展,应以教师教学管理能力、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的研修为主,其目的在于让新教师尽快胜任教育教学任务、“站稳课堂”。

(2) 职后突破阶段应注重专业情感、专业理念和教学研究等高阶能力的发展

调查表明,职后突破阶段成为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第二个敏感期,为此,应加大对处于这一阶段的教师的研修活动,以帮助更多的教师突破自己专业发展的“瓶颈”,进入第二个快速发展期。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职后突破阶段几乎成为教师专业素养各个方面发展的敏感期,而作为职后教师,其研修时间是有限的,为此,需要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活动撬动该阶段教师的专业素养的全面提升。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专业情感。很多教师在工作十年左右进入职业平台期,后期能否快速发展并成长为专家

型教师,关键因素是其自身对教师这一专业的情感。只要具有良好的专业情感,对教师专业产生较高的职业认同和职业信念,热爱教师这个岗位,自然会形成较好的专业品德,也会产生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心向,从而不断提升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自身专业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次,影响教师专业再次突破的因素还有教师的专业理念,也就是对于教育教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只有具有良好的学生观,才能更好地兼顾全体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知识观,才能实施更便于促进学生学力提升的教学。总之,只有理念正确,才能保证正确的教与学的方向。再次,这个阶段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以教学评价、教学研究等“高阶”能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在前面十年左右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已经具有了较好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管理能力,可以胜任教学任务,但进入职业的平台期后,常规教学中不易显现的教学评价、教学研究等高阶能力,成为影响这个阶段教师专业成长十分关键的因素。一方面,这个阶段,教师将面临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而晋升高级职称在多数地区还需要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这对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具有较好的教学研究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的教师,将再次感受到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从教学评价、教学研究等专业性活动中更易于感受到自身的成功,从而激发其更好的专业情感。为此,这个阶段的教师研修活动,应重点关注教师专业情感、专业理念和教学研究等高阶能力的发展,力图激发他们对教师这一职业持久的热情,永葆正确的专业理念,并发展其以研究为基本特征的专业能力,使其在研究中感受成功,形成更为持久的专业情感。

综上,基于调查结果,应在教师专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以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敏感期为指引,开展

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一般而言,职前阶段,应注重教师专业理念、专业情感、专业品德的养成,并注意以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通用能力为载体,发展教师专业能力;职初阶段,应加强教师教学管理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设计能力等教师专业基础能力的研修;职后成熟阶段开始,特别是职后突破阶段,应注意激发教师的专业情感、提升其专业理念、注重其教学研究能力等高阶能力的研修。

[参 考 文 献]

- [1] 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1):41-46+72.
- [2] 朱旭东.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模型建构[J].教育研究,2014(6):81-90.
- [3] 杨志成.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建构研究[J].教师发展研究,2017(1):44-49.
- [4] 王光明,张楠,李健,等.教师核心素养和能力的结构体系及发展建议[J].中国教育学刊,2019(3):81-88.
- [5] 邵景进,刘浩强.我国小学生品德发展关键期研究的述评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5(2):412-415.
- [6] 周国海,季浏,尹小俭.儿童青少年体能发展敏感期相关热点问题[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6):114-120.
- [7] 宋雅,章飞.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2):21-26.
- [8] 罗晓杰.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述评[J].教育科学研究,2006(7):53-56.
- [9] 郑彩国.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及其知识转型[J].教育探索,2007(11):74-75.
- [10] 钟祖荣,张莉娜.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调查研究及其对职后教师教育的启示[J].教师教育研究,2012(6):21-25+40.
- [11] 王铁军,方健华.名师成功:教师专业发展的多维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05(12):70-7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 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

郭文斌^{1,2} 吕 芮¹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2.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伊宁 835000)

[摘要] 为了解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关系,采用大学生生涯自我效能感问卷和职业价值观问卷对随机整群选取的240名特殊教育师范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为3.01;职业价值观总均分为2.51;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信心程度、克服困难、结果预期均进入回归方程,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职业价值观处于中下水平;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越高,职业价值观也随之提升;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受到信心程度、克服困难和结果预期因子的共同影响。

[关键词] 特殊教育师范生; 职业自我效能感; 职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5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08-07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稳步发展,师资规模扩大,师资结构得以合理调整,教师素质不断提升,但师资短缺和专业能力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特殊教育的水平,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中明确提到要提高特殊教育质量^[2],并在高校招生规模、教师培训方面全力支持,以促进特教教师的发展。特殊教育师范生作为特教教师的后备军,其正确的职业认识和行为选择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对职业的信念和态度^[3],是个体追求职业状态的一种价值取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价值观逐渐受到关注,有关研究

在国外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如职业生涯发展理论、职业自我概念理论、职业选择理论等。职业价值观被一般价值所渗透,可分为多个维度^[4]。凌文铨将职业价值观分为声望、保健、发展因素3个方面。声望因素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保健因素是对工作福利待遇及其环境的追求,发展因素是对个人职场发展的追求。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自我效能感具有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影响个体职业活动的心理因素^[5]²⁴,后者是与职业发展紧密联系的心理健康因素^[6]。已有研究发现,职业价值观受到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7],职业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职业态度的发展^[8]。职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胜任职业任务所具有的信念^[9],起初由 Hackett 和 Betz 运用班杜拉自我效能感理论来研究职业方面的问题,其水平会在一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残疾人职业教育支持保障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BJA170099)。

[收稿日期] 2020-10-18

[作者简介] 郭文斌,男,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吕 芮,女,山东济南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对职业的判断与选择。李亚真将职业自我效能感分为信心程度、难度知觉、克服阻碍和结果预期4个因素^{[10]25}。信心程度主要指个体完成职业选择和职业规划的自信程度,难度知觉是指个体对职业生涯中困难程度的感知能力,克服阻碍是指职业生涯中能够克服来自周围及自身压力的能力,结果预期是指个体为未来职业做计划并对职业选择结果做出的推断与预设。在现阶段需要高质量特教教师队伍的时期,提高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帮助其树立成熟、稳定的职业价值观是对高校工作者的一个重大挑战。目前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态度的研究多集中在专业认同、择业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困难等层面,较少从职业价值观和职业自我效能感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深入了解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观现状及其关系,对提升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信、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改进高校教学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随机整群抽取山东省A高校和B高校的280名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62份,回收率93.57%,剔除无效问卷22份,获得有效问卷240份,回收有效率为91.60%。

2. 研究工具

(1)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采用闫师欧修订的已有大学生生涯自我效能感问卷^{[11]59-60}。该问卷共13个项目,包含4个维度:信心程度(5题)、克服困难(4题)、难度知觉(2

题)和结果预期(2题)。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太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基本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研究对象的职业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2) 职业价值观问卷

采用凌文铨等人编制的职业价值观问卷^[12]。该问卷共22个项目,包含3个维度:声望因素(9题)、发展因素(8题)、保健因素(5题)。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不太符合,3代表不确定,4代表基本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研究对象越具有职业价值观。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3. 研究过程

首先,随机抽样确定两所高校;其次,确定整群抽取两所学校的280名特殊教育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最后,与系主任沟通,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经系主任同意后请其联系特殊教育师范生加入问卷QQ群。随后由调查者自我介绍,向学生说明研究目的及问卷填写要求,并发放问卷链接,要求学生10分钟内按作答要求提交答案。

4. 数据处理

将问卷结果进行量化赋值后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 25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数据处理方法为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逐步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1.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现状

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各因子均分和总均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整体现状一览表($n=240$)

因子	Mean	SD	Min	Max	Range
信心程度	3.58	0.31	2.20	4.40	2.20
难度知觉	2.89	0.47	1.50	4.00	2.50
克服困难	2.54	0.50	1.75	3.50	1.75
结果预期	3.02	0.63	1.50	4.00	2.50
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	3.01	0.27	2.35	3.43	1.08

由表1可知,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为3.01($M=3.01>3$),接近中等水平。第二,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信心程度($M=3.58$)、结果预期($M=3.02$)、难度知觉($M=2.89$)、克服困

难($M=2.54$)。第三,克服困难均分差距最小($R=1.75$),小于其他3个因子间得分差距。

2.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现状

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各因子均分和总均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整体现状一览表 (n = 240)

因子	Mean	SD	Min	Max	Range
声望因素	2.73	0.50	1.44	3.78	2.33
保健因素	2.14	0.42	1.00	3.00	2.00
发展因素	2.66	0.27	1.63	2.88	1.25
职业价值观总均分	2.51	0.31	1.36	3.02	1.66

由表2可知,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总均分为2.51($M = 2.51 < 3$),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第二,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声望因素($M = 2.73$)、发展因素($M = 2.66$)、保健因素($M = 2.14$)。第三,发展因素均分差距最小($R = 1.25$),小于其他两个因子得分差距。

3.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

(1) 3种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特殊教育师范生

表3 不同水平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差异比较一览表 ($M \pm SD$)

	低自我效能感	中自我效能感	高自我效能感	F	LSD
声望因素	2.40±0.29	2.83±0.51	2.87±0.49	22.66***	3>2, 3>1*, 2>1*
保健因素	1.91±0.42	2.21±0.39	2.24±0.39	13.96***	3>2, 3>1*, 2>1*
发展因素	2.41±0.25	2.76±0.24	2.73±0.18	54.48***	3>2, 3>1*, 2>1*
职业价值观总均分	2.24±0.27	2.60±0.27	2.61±0.24	46.31***	3>2, 3>1*, 2>1*

注: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01$, 下同。

由表3可知,高、中、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价值观总均分及其各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均 < 0.0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高、中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价值观总均分及其各因子上均显著高于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组的特殊教育师范生(p 均 < 0.05)。

表4 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及其各维度相关分析一览表

	声望因素	保健因素	发展因素	职业价值观
信心程度	0.18**	0.15*	0.05	0.18**
难度知觉	0.11	-0.02	0.07	0.07
克服困难	0.05	0.48**	0.48**	0.39**
结果预期	0.43**	0.04	0.40**	0.37**
职业自我效能感	0.38**	0.29**	0.51**	0.49**

由表4可知,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与职业价值观总均分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第二,从各维度分析,信心程度与声望($p < 0.01$)因素、保健($p < 0.05$)因素存

的职业价值观差异比较

按照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由低到高排序,选择总人数上下27%人数对应的分数(2.86和3.15)作为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组($n = 65$)和高职业自我效能感组($n = 65$),其余人数为中职业自我效能感组($n = 110$)。分别将低、中、高职业自我效能感赋值1、2和3,以职业自我效能感分组水平为自变量,职业价值观总均分及其因子为因变量,对各组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2)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职业价值观的相关分析

对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及其各维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

在显著正相关;克服困难与保健因素、发展因素存在显著正相关(p 均 < 0.01);结果预期与声望因素、发展因素存在显著正相关(p 均 < 0.01)。第三,信心程度、克服困难和结果预期3个因子与职

业价值观总均分存在显著正相关(p 均 <0.01)。

(3)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对职业价值观的预测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

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以职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为自变量,以职业价值观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影响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的因素分析一览表

影响因素	<i>B</i>	<i>SE.B</i>	<i>Bate</i>	<i>t</i>	<i>p</i>
信心程度	0.23	0.06	0.22	4.14	0.00
克服困难	0.31	0.03	0.50	9.46	0.00
结果预期	0.19	0.03	0.39	7.39	0.00
constant	0.35	0.23		1.49	0.14

注:回归方程模型的 $R=0.62$, $R^2=0.38$, $\Delta R^2=0.37$, $F=48.51$, $p<0.001$ 。

由表5可知,回归方程模型达到显著性水平($F=48.51$, $p=0.00<0.01$)。职业价值观受到信心程度、克服困难、结果预期3个因子的共同影响。3个因子预测职业价值观的回归方程为: $0.35+0.23\times$ 信心程度 $+0.31\times$ 克服困难 $+0.19\times$ 结果预期。

四、分析与讨论

1.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分析

由表1可知,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为3.01($M=3.01>3$),接近中等水平,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信心程度、结果预期、难度知觉、克服困难。出现上述结果有4点原因。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一般。职业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未来职业任务的判断,它与学生的学习倦怠相互作用^[13]。有研究发现特殊教育师范生的学习倦怠呈中等水平^[14],学习倦怠反映学生的学习心理状态,影响学生专业能力和自信的发展,进而影响学生对自己未来择业与就业能力的判断。第二,特殊教育师范生具有较高的信心程度和结果预期能力。我国特殊教育发展中仍面临着特教教师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15]。特教学校的一些教师是由普教教师转岗而来^[16],相比转岗教师,特殊教育师范生是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习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具备初步的特殊教育能力,容易提高对未来职业选择与发展的信心,进而能提早对未来职业生涯做好计划与准备。第三,特殊教育师范生的难度知觉低,对困难程度的感知能力差,这会影响到其自我效能感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其专业能力的学习。同时,未来职业生涯中会有未知的问题发生,学生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接触实践中面临的困难,难免对未来职业中出现的困难认识不足。第

四,特殊教育师范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习在学生专业能力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17],实习经验的欠缺是导致学生就业能力欠缺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殊教育师范生教学经验的缺乏使其难以准确判断是否真的达成教学目标^[18],遇到教学问题时难以运用教学机智。特殊教育师范生实习时间都是在大三或大四,且有研究发现目前绝大部分特殊教育师范生的专业实习仅有8周,而这极易造成理论与实践素养之间的失衡^[16],使特殊教育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缺乏,难以适应未来工作岗位。

2.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分析

由表2可知,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总均分为2.51($M=2.51<3$),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各因子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声望因素、发展因素、保健因素。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有4点。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成就感不高。个体工作成就感可以保持其对工作的热情。教师获得成就感的主要来源是学生的成长与进步,若学生长期没有进步或者经常遗忘所学内容,教师容易自我否定,对职业的意义做出消极的评价,产生较低的职业价值观^[19]。此次调查发现大多数特殊教育师范生毕业后愿意从事特殊教育,特殊教育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熟练的实践操作能力,特殊教育师范生虽经历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但是真正实践操作时他们还是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考虑到未来教育对象大多数学习能力较弱,学习效果与教师期望严重不符,教师易产生自我期望与现实结果的冲突^[15],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挫败感。第二,特殊教育师范生更加注重职业声望,这其中不乏受中国面子观的影响。受我国传统文化

及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爱面子,反映在职场上就是追求工作的经济效应、社会地位,大多数学生还是会看重自己未来职业的声望。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追求与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状态有关。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社会认可度低、职业声望不高^[20],所以特殊教育师范生更希望自己的专业能够得到大众认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第三,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发展意识一般。职业发展是指个人在职业生涯中的自我成长。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家长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低,更加希望孩子在生活能力上有所提升,这使得从事或即将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减少了学生成绩压力,容易形成松懈的心理。另外,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发展意识与未来面对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有密切联系。特殊儿童异质性强,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工作量增加使特教教师经常处于疲劳状态^[21],进而对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发展意识产生影响。第四,特殊教育师范生忽视对职业保障因素的追求。职业价值观的保障因素是指个体对工作环境和待遇保障的追求。《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中明确提到要健全经费投入机制^[2],进一步加大特殊教育财政支持与保障力度^[22]。特殊教育学校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软硬件设施逐渐完善,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一直以来,教师是许多追求稳定的人中意的职业,缘于他们受教师的工资、医疗待遇和退休金的吸引。特教教师同时享有特殊教育津贴,且随着二期提升计划的落实,津贴发放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因此,特殊教育的环境资源建设及工资、待遇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在职业选择时相对忽视对保障因素的追求。

3. 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均分将其分为高、中、低分组,再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不同分组下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发现,高、中、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组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价值观总均分及其各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均 <0.01);高、中职业自我效能感组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价值观总均分及其各因子上均显著高于低职业自我效能感组的特殊教育师范生(p 均 <0.05)。出现上述结果的原

因,首先,因为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对职业目标的选择越明确。已有研究发现职业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职业认同感的发展,职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对职业认同度就越高^[8]。高职业认同度的学生对未来职业具有较强的兴趣,就业动机也会逐渐增强。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特殊教育师范生越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节奏,根据就业动机做好职业目标和规划,进而树立明确的职业价值观。其次,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信心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具有更强的学习动力。职业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习倦怠紧密相关,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的学习倦怠越低^[13]。大学阶段是学生做出职业决策、培养其职业适应能力的重要时期^[23],学习倦怠会严重影响学生能力的发展。职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学生越容易将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心转化成学习动力,进而逐渐减少学习倦怠,主动构建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为职业目标的选择打下基础。再次,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职业选择时面临的困难少。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选择时会面对选择继续深造与工作的冲突、自己意愿与父母意愿的冲突、自我期望与现实的冲突等诸多矛盾,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代表着个体对自己职业选择和发展能力的觉知,职业自我效能感会形成个体探索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动力,高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特殊教育师范生在职业选择面临困难时可凭内在的努力克服困难,进而较少产生职业决策上的困难^[24],易明确自己的职业价值取向。最后,影响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价值观不是职业自我效能感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信心程度、克服困难、结果预期均对职业价值观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特殊教育师范生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自信程度、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对自己行为的结果预测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特殊教育师范生对成功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念,也能提升其对职业目标的选择。

五、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第一,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特殊教育师范生的信心程度最高,对克服困难的觉知最低;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价值观处于中下水平,更加关注职业声望因素,对职业保健因素的追求最低。

第二,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存在显著正相关,职业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容易树立明确的职业价值观。

第三,特殊教育师范生的信心程度、克服困难、结果预期3个因子均对职业价值观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2. 建议

第一,降低学生学习倦怠,提高学习动力。特殊教育师范生学习倦怠影响其专业认同、学习自信的发展,进一步影响其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发展。为提高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做好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防止产生学习倦怠;同时,多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通过组内团结合作、互帮互助,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促进其学习动力的发展。

第二,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积极应对困难。特殊教育师范生的难度知觉低,对困难的感知能力差,影响其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因此,应多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尝试接触社会,体验现实中存在的困难,并引导学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第三,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殊教育师范生实习时间短,教学经验不足,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影响其职业自我效能感的发展。学校应合理设置课程,加大实践教学培养力度,通过增加教育见习与实习课时,加强见习与实习过程的指导工作,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评价学生见习与实习效果等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第四,提高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有效性,树立科学的职业价值观。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是各大高校引导学生了解职业兴趣、形成职业态度、树立职业价值观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为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价值观,首先,教师应该明确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开展丰富的活动引导学生形成职业概念,挖掘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明确职业目标;其次,加强思想教育,通过讲好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故事、组织户外实践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不同职业的价值,帮助学生摆脱爱面子观念的束缚,树立科学的职业价值观。

第五,充分认识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通过提高学生的职业信心程度、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对行为结果的判断能力,促进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并为未来职业

生涯确定合理的目标。

六、研究反思

研究主要以特殊教育师范生为对象探究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发展现状及其二者的关系,同时为如何提高特殊教育师范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提出了一些建议,但研究仍具有不足之处。首先,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仅探究了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不够全面,今后研究应探索性别、生源地、年级等因素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弥补研究不足。其次,研究采用的职业自我效能感问卷是在前人修正大学生生涯自我效能感问卷的基础上得来的,虽然问卷的信效度良好,但并没有针对特殊教育师范生职业自我效能感设计的相关问卷,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及性,今后研究应该编制更有针对性的量表,增加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参 考 文 献]

- [1] 冯元,张金福.近三十年我国特殊教育政策发展进程的理论阐释——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7(11):15-2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EB/OL].(2017-07-17)[2020-10-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31/201707/t20170720_309687.html.
- [3] 张文龙,叶一舵.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职业价值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9-77.
- [4] Tomažević N, SELJAK J, ARISTOVNIK 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ccupational values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an authorit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J].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2018(1): 1-2.
- [5] 李庆英.高中生职业兴趣和职业价值观的调查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
- [6] 郑海燕,胡维芳.大五人格与新入职高职生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关系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3):34-36.
- [7] 何晓岩.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谈高职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8(22):90-93.

(下转第70页)

回归教师质量:21世纪美国教育战略解析及启示*

王晓芳

(伊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伊宁 835000)

[摘要] 教师质量建设是当前世界各国推动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教育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持久关注的议题。21世纪以来,美国共实施了“公平优先”“科技引领”“全面卓越”三大教育战略,并相应地提出“高质量”“STEM”“卓越”教师需求。美国教育中介组织与大学、政府、市场所形成的“三角四块”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教育战略实施中存在的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市场竞争压力过大、大学自身培养教师能力不足等问题,还保障了各类型教师的培养与供给。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并结合我国教师质量提升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选择地借鉴。

[关键词] 教师质量; 教育战略; “三角四块”模式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14-05

21世纪以来,提高教师质量作为改进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优先事项和关键因素已得到社会广泛支持。有学者指出,教师质量是提升学生学业成绩的“最重要的与学校相关性的因素”^[1]。事实上,美国为应对安全竞争与金融危机、解决民众科技和文化素养不足等问题已开展了一系列提高教师质量的探索。从乔治·布什政府提出的“使美国能够持续领导世界”到奥巴马政府极为推崇的“追求卓越”再到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式的“美国主义”的近二十年间,美国共实施了“公平优先”“科技引领”“全面卓越”三大教育战略。对以上教育战略进行分析后发现,由大学、政府、市场及教育中介组织共同组成的“三角四块”教育管理模式不仅推进了各项教育战略的顺利实施,还有效解决了三大教育战略共同关注的教师质量问题。

一、美国三大教育战略的基本内容与教师需求

美国三大教育战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公

平优先”是教育的起点,“科技引领”是教育的发展阶段,“全面卓越”则是教育的最终目标。三大教育战略对教师提出的标准及挑战虽各有不同,却都以提升教师质量为共同诉求。

1.“公平优先”战略下的“高质量教师”

公平优先教育战略主要体现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战略中。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2年签署了美国教育史上第一项综合教育改革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简称NCLB),力求“为所有美国儿童提供优质教育”,为处于劣势和受到歧视的群体提供平等教育机会。该法案要求美国公立学校不分种族、不分地区、不论家庭背景,全面培养学生的心智、品格、历史使命与责任,缩小学生群体之间的差距,力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同时,NCLB从基础教育层面出发,首次提出高质量教师(highly qualified teachers)概念,认为高质量教师是激发每个孩子全部潜能的基础保证。高质量教师的能力水平必须达到美国各州规定的标准。具体而言,

* [基金项目] 伊犁师范大学2020年度科研项目“教育实习参与对我院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20YSYB037)。

[收稿日期] 2020-10-14

[作者简介] 王晓芳,女,陕西镇安人,伊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一是教师需获得学士学位及州教师资格认证;二是教师必须通过所在州的国家测试以证明自己在阅读与写作等基础性学科中拥有必备的知识和教育技能——即所任教科目的胜任能力。

2.“科技引领”战略下的“STEM 教师”

科技教育引领战略主要体现在 STEM 教育战略中。美国将 STEM 教育视为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2006 年公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中明确提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 STEM 素养的人才,并通过加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来提高美国的创新力。时至 2018 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 STEM 教育委员会发布的被誉为美国未来 STEM 教育的“北极星计划”——《制定成功路线:美国的 STEM 教育战略》(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重申了“所有美国人都将终身获得高质量的 STEM 教育,美国将成为 STEM 素养、创新和就业的全球领导者”^[2]这一目标。因此,培养 STEM 领域的优秀教师成为联邦政府关注的重心,对 STEM 教师的准入门槛也有了更高的限制,具体要求包括在源头上严格选聘 STEM 专业人才进入教育领域、建立严格的问责评估体系、对新入职教师的各项能力进行评估、参加相关高级培训以提高 STEM 教师的教学策略等^[3]。

3.“全面卓越”战略下的“卓越教师”

全面卓越战略是指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推进教育卓越。2014 年启动的《全民拥有优秀教育者计划》(Excellent Educators for All Initiative)体现出美国从关注“卓越下的公平”到关注“公平上的卓越”这一教育理念的转变^[4]。该教育战略由“全体卓越”“全方位卓越”“全面保障卓越”三个部分组成。“全体卓越”主要是指全体学生的卓越;“全方位卓越”不仅指要使学生在科技、数学等领域达到卓越水平,还指要使学生在品格、公民素养等方面表现优秀;“全面保障卓越”则主要是指从物质、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为达成教育战略的总目标建立高质量的保障体系^{[5]267}。这些理念将教师发展、学生成长与学校升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卓越教师不仅要具备高水平教学能力、激发学生创新热情的能力,还要具备与社区和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因此,美国的全国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简称 NBPTS)于 2015 年

升级了卓越教师资格标准,涵盖了对教师教育基本理论知识、实施差异教学的能力、教学实践与学习环境、教学的有效性、教学反思过程等方面的考核。教师只有通过了 NBPTS 的资格评定,才能获得其颁发的国家高级教师资格证书,成为美国认可的教师。

二、美国教育战略中政府、市场与大学的作用

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大学自身发展均有各自的一套逻辑,三者共同推进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一方面政府要求大学肩负起培养“高质量”“STEM”“卓越”教师的责任,但财政支持力度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学虽积极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却又存在自身培养教师能力不足及来自市场竞争的挑战和压力。

1. 政府在教育战略中的角色

教育部作为监督各个层面教师质量状况的联邦机构,其作用在三大教育战略中得以凸显。美国联邦政府的力量也随之加强。二者主要通过政策约束与财政支持两方面进行问责介入。

其一,政策约束。教育分权使得美国联邦政府无权直接干涉各州教育,但会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引导各州的教育改革。在“公平优先”战略下,美国联邦教育部根据 NCLB 法案的规定,要求各州和学区严格界定并考核“高质量教师”。同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平等计划,确保贫困儿童或少数族裔学生不由无经验、不合格或“外行教师”任教;在“科技引领”战略下,美国联邦教育部出台了用以加强对 STEM 创新教师的培养的系列政策,如《STEM 教育五年战略规划》(2013)、《STEM2026:STEM 教育创新愿景》(2016)等;在“全面卓越”战略下,美国联邦政府则向各州提出界定“优秀教师”和“卓越校长”及制定相应标准,敦促加快建立均衡配置关键教育资源的数据系统等要求,并在《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2011)中明确提出了“卓越教师培养项目”的计划,旨在加强对各类教师培养项目的问责。

其二,财政支持。在推进三大教育战略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开通多种渠道给予高校财政支持。在“公平优先”战略中,NCLB 将学生的成绩和联邦拨款挂钩,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学校都必须达到“充足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

gress), 否则公立学校则可能被撤销、接管或转为特许学校^[6]。为提高教师质量, 美国联邦政府还将大量财政预算用于各项教育培训投入。如“提高教师质量州基金”“新教师奖励基金”“退伍军人进入教职计划”“向教学过渡计划”等^[7]。在“科技引领”战略中, 财政拨款更加倾向于紧缺的学科领域。美国联邦政府多年来投入巨资扶持 STEM 领域的教育发展, 并通过立法形式持续地予以推进。如在《总统备忘录》中规定每年至少投资 2 亿美元用于 STEM 教育项目; 在“全面卓越”战略中, 美国联邦政府继续为各州和学区增发“公式拨款”, 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对自身使命的关注, 扩增高需求学校优秀教师和领导的数量。总体而言, 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各战略下教师质量的提升均予以了一定的财政支持。

2. 市场在教育战略中的角色

市场在教育战略背景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与市场竞争力的引入。

其一, 市场机制。新公共管理模式下, 市场机制及其实践方式, 如契约、激励、质量保证、绩效指标等被引入高等教育。事实上, 21 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幅缩减, 大学不得不通过提高学费、向学生提供贷款、向资本市场租赁资本等方式获取资金, 保证各项教学的正常有效运转。教育战略下提倡的绩效问责制及教师绩效工资制使得大学市场化特征凸显, 对优秀教师进行奖励, 对不合格的教师进行惩罚或解聘。这种做法虽然提高了部分教师的教学热情, 却对教师的职业安全感造成了威胁, 导致教师流失现象严重。

其二, 市场竞争力。引入市场竞争力来解决教育危机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奥巴马政府 2009 年公布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 计划与 2015 年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均强调了竞争对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特朗普 2017 年上任后则促使美国“学校选择运动”(School Choice Movement) 进入了新的阶段, 更加强调用市场化力量来促进教育发展。市场竞争为教师培养带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 私立教育的优势逐渐凸显, 弥补了公立教育的教育力量不足与管理方法滞后等缺点, 促使公立教育在竞争中寻求创新, 保障其教师培养的质量; 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使教师待遇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为例, 在

2014—2015 学年中有 13% 的毕业生拿到了 STEM 学位, 当时美国 STEM 相关职业的平均年薪约为 90 000 美元, 而 STEM 教师的平均年薪仅为 58 000 美元^[8]。巨大报酬差距不仅迫使毕业生流向了社会其他相关行业, 也成为 STEM 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2015 年美国物理学会组织的 STEM 教育领域教师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增加工资是最受教师欢迎的激励政策^[9]。因此, 确保学生能够接受高素质 STEM 教师提供的优质教学, 确保最有潜力的 STEM 教师不流失, 来自市场的竞争使政府、大学更加关注 STEM 教师的工资待遇需求, 这也促使大学积极争取多方合作以寻求稳定的资助。

3. 大学在教育战略中的两难境地

进入 21 世纪, 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逐渐被强化。面对教育战略对教师的高需求, 教育学院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始得到关注。2006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阿瑟·莱文领衔展开了一项针对全美 1206 所教育学院的调查, 在名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的调查报告中对全美教育学院所存在的诸如课程混乱、教职员远离课堂、提供的教育未能“跟上人口、技术以及全球竞争的变化步伐, 无法应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压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剖析。美国校董与校友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简称 ACTA) 公布的 2017—2018 年高校核心需求调查中严肃指出, 有 20% 已完成四年制学位的大学生无法准确地计算“订购办公用品的总成本”, 其原因在于仅有 58% 的高校开设了大学水平的数学课, 而相当数量的学院和大学则开设低于大学水平的数学课程, 或根本不开设相关课程^[10]。这造成了中小学或企业在招聘时面临着“很少或根本没有合格人选”的尴尬局面。这些调查报告反映出教育学院若想要保持其教师教育的核心地位, 就必须具备比市场培训机构更强的能力, 更能培养出有效的教师。

三、“三角四块”模式的协调作用

在三大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 政府、市场及大学之间虽构成了难以剥离的关系, 却极易因各方力量不均而导致彼此关系的失衡。这种情况下, 美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出现有效地平衡了三方力量, 形成了荷兰学者弗里斯·范富格特所提出的新型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三角四块”模式 (如图 1 所示)^[11]。中介组织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高等

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于1983年提出,又称为“中介团体”“缓冲组织”或“减压阀”。教育中介组织则是指通过教育审议、咨询、评价和鉴定等手段参与政府与学校教育管理过程的非政府公益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权性和中介性的特点^[12]。下面以美国著名的教育中介组织——全国教育协会及美国大学联合会为例,简要阐述在三大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教育中介组织是如何在“三角四块”模式下,通过开展学术研究及政府对话、发布政策咨询报告、搭建合作平台等方式发挥“服务器”这一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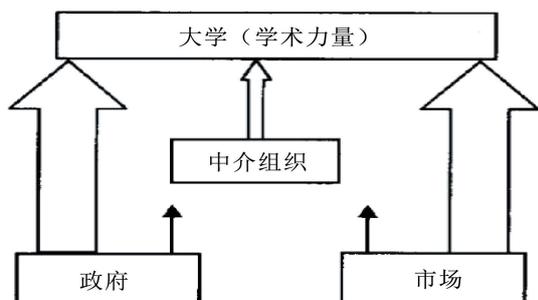


图1 范富格特的“三角四块”模式

1. 全国教育协会——参与教育决策,关注教师质量

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简称NEA)是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教师组织,也是目前为止美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教育社团,其推进教育战略的举措主要包括:规范教学专业标准、争取教师经济条件的改善,保障教师权益、制定教师专业伦理规范、采取多样化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等。例如,NEA在NCLB法案颁布实施后就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研讨,提出增加“确保标准化考试不干扰师生的教与学”这一条款,减少法案中过于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标准对教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全面卓越”战略下,提出了《认识教育成功、专业卓越和协作教学的蓝图》(2013),并依托该蓝图构建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实践团体,极大地提升了卓越教师的合作能力和领导组织能力。

2. 美国大学联合会——关注院校治理,搭建合作平台

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AAU)自成立100多年来职能不断扩大,是联系高校、政府、市场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在教育战略实施中所突出的核心职能有二:一是为院校治理提出改革意见,进而为教师队伍建

提供有效支持。2001年AAU发布的《对成员大学非终身教职教师的调查》不仅肯定了非终身教职教师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还从院校治理角度提出重新考量有关非终身教职教师的管理政策的適切性;二是搭建教育平台,促进多方利益共生。在科技引领战略实施中,积极搭建由政府、大学、社会企业等组织共同建立的著名教育平台——STEM教育中心,满足了中小学和社会发展对教师的需求,成为发展STEM教育的中坚力量。

四、结论与思考

中美教育战略的共同目标均反映在对教师质量的追求上。教师准入资格、教师职后能力提升以及学生学业成绩不仅是教育战略关注的焦点,也是考量教师质量的三大指标。在美国教育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由大学、政府、市场及教育中介组织构成的“三角四块”教育管理运行模式为提升教师质量提供了保障与支持,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与评价作用(如图2所示)。近些年我国连续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同样指向了教师质量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可从教师资格准入标准、教师职后培养内容、学生学业数据库、“三角四块”模式应用等四方面展开思考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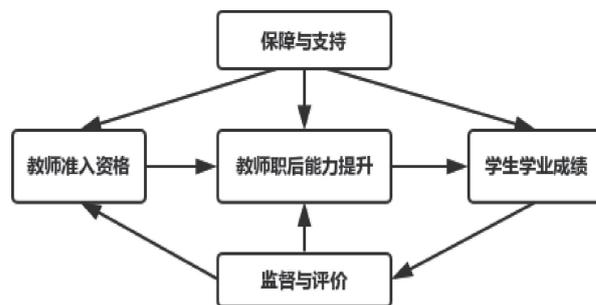


图2 美国教育战略实施中“三角四块”模式与教师质量关系图

1. 完善教师资格准入标准

美国教育战略对教师资格准入标准提出了一定要求。一方面,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入学标准,严格选拔优秀学生。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专门针对教育学院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测试的“普瑞克西斯考试系列”,主要通过评估学生在写作、阅读、数学等方面的基本技能来判断学生是否有资格接受师范教育。另一方面,提高职前教师学历水平与实践能力,延长教师教育时间。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需再次进入经专业组织和各州认

证的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文理学院的教育系,接受相关教育学科课程与教育实习,合格后方可获得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是以师范院校为主、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体系。为了完善教师资格准入标准与健全教师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我国已陆续实施了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支持三省四校开展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等措施。

2. 丰富教师职后培训内容

教师职后培训质量是教师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保障。美国在实施教育战略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教师的职后培训。例如,在“公平优先”战略下的“高质量教师”培训中,美国教育部对各类培训项目提出了重视知识领域的扩展和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收集与分析培训项目数据、撰写自评报告等要求;为提高教师阅读能力,美国联邦政府专项拨款60亿对教师的阅读能力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近几年来我国同样加大了教师培训投入力度,积极开展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鼓励优秀特岗教师攻读教育硕士;科学改进教师培训内容与方式,紧密结合教育教学一线实际,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机融合。

3. 建立学生学业数据库

学生的学业成绩是教师质量的直接体现。为直观反映学生学业情况及特殊需求,建立学生学业数据库已成为美国教育战略采用的普遍手段。美国联邦政府也正是依据数据库中各项信息结果进行教学监管,进而展开教师质量问责。但正如前文所述,问责制所导致的教师流失、教师坚守职业信念丧失现象严重。我国在建立学生学业数据库时,需要明确问责并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动态数据精准定位哪些教师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学能力,进而发挥各类教师培训作用才是建立学业数据库的真正意义所在。

4. 合理应用“三角四块”模式

“三角四块”模式平衡了美国教育战略实施中的利益主体力量。各方为教师质量提升提供了保障与支持,通过及时有效的监督与反馈促进了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我国教师质量建设应结合我国教育实情批判性地理解和应用该模式,对发展欠缺的主体给予关注。例如,教育中介仍然存在专业化程度不高、认可度低、缺乏内部约束机制、

外部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如何优化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尚待深入实践与探索。

[参考文献]

- [1] DARLING - HAMMOND, L.. 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 Review of State Policy Evidence [J].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s, 1999(1):1-44.
- [2] 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EB/OL].(2018-12-04)[2019-02-1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2/STEM-Education-Strategic-Plan-2018.pdf>.
- [3] 曲铁华,杨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联邦教师教育政策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9(10):31-44.
- [4] 吴路珂.从公平走向卓越——美国《全民拥有优秀教育者计划》介评[J].比较教育研究,2015(4):78-82.
- [5] 张燕军.美国教育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
- [6] 姚继军.美国“应试教育”现状与反思[J].江苏教育,2017(6):74-76.
- [7] 于江.简析 NCLB 法案对美国教师质量的政策影响[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3):121-122.
- [8] The 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 The 2016 - 17 Budget Proposition 98 Education Analysis [R/OL]. (2016-02-18)[2019-01-20]. <https://lao.ca.gov/Publications/Report/3355>.
- [9] 邓建芳,韩晋芳.美国 STEM 专业学生从教意愿调查及政策概述[J].科协论坛,2018(9):43-45.
- [10] 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What Will They Learn? 2017-18 A Survey of Core Requirements at Our Nation's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R/OL]. (2017-10-17)[2019-02-15]. <https://www.goacta.org/publications/reports>.
- [11] 史静寰.构建解释高等教育变迁的整体框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3):19-25.
- [12] 周光礼.论中国政府与教育中介组织的互动关系:一个法学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140-154+192.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见(教师[2013]6号)[EB/OL].(2013-05-06)[2019-07-10].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34/201305/151910.html>.

(责任编辑 晨 晓)

家长对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 态度认识及教育建议*

程 英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科所, 福建福州 350025)

[摘要] 通过对福建省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实践基地园1529位家长进行调查,发现家长们普遍认为孩子比较喜欢民间音乐,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具有培养幼儿家乡情怀、养成良好品行、陶冶情操、增长见识、发展语言、增进与祖辈的情感、增加生活情趣等多元教育价值。研究表明,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生态环境,得到家长的高度认同,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在增强祖辈的教育自信、促进三代人良性互动“家教共同体”的构建方面具有独到的作用。

[关键词] 民间音乐文化; 启蒙教育; 家长态度; 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19-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小做起,要在教育中增加中华文化的元素,特别是让当地教育能够传承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乡土知识”^[2]。的确,伴随幼儿生活与成长的乡土文化是幼儿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心灵家园,而“感受民族、民间、现实生活中的艺术也是我国教育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向。我国幼儿园教育的实践表明,对幼儿进行民间艺术的熏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3]。在整个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乡土文化保护思潮的背景下,福建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先后在福建省9个设区市31所课题基地园开展了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实践研究。作为幼儿园最重要的教育伙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学习有着较大

的影响。课题研究之初,家长们对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存在诸多疑虑,担心孩子缺乏方言环境、民间音乐文化的题材过时等会导致儿童缺乏兴趣。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后,家长们对当地方言及民间音乐文化是否感兴趣,他们对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活动认同度怎样,他们认为民间音乐文化启蒙能够给孩子带来什么,还有哪些意见与建议,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拟通过对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实践的幼儿家长进行调查,了解家长们的真实想法与相关认识,分析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实践成效,为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的深入开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个别访问相结合的方式,于2020年3月至7月,分两个阶段展开调研。第一阶段为问卷调查阶段,自制问卷,通过整群抽

*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教育部规划课题“童心本位视域下福建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研究”(项目编号:FHB180606)。

[收稿日期] 2020-10-31

[作者简介] 程英,女,福建古田人,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科所所长,福建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样的方法,以问卷星的方式,面向福州、泉州、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等地 12 所课题基地幼儿园中有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 32 个班级的家长发放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1 529 份,区域涉及福建省闽西、闽南、闽东、闽北、闽中、客家等几大方言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第一阶段调查回收的 1 529 份有效问卷中,问卷回答者的职业类型多样,有自由职业者(30.61%)、企事业单位员工(23.15%)、机关干部(12.04%)、教育工作者(10.40%)、文艺工作者(0.39%),其他职业(23.41%)。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中使用方言的情况及幼儿对方言的兴趣,家长对本土民间音乐的接触情况、情感及接触途径,家长对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的价值、必要性及幼儿的兴趣的认识,家长对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的意见与建议等。为进一步了解家庭方言使用情况与孩子对方言的兴趣、孩子对方言的兴趣与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家长对民间音乐的态度与孩子对民间音乐的态度等选项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还运

用 SPSS 17.0 软件对部分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针对第一阶段调查统计中发现的一些典型问题,采取面谈、电话采访、微信视频等方式,对其中 53 位家长进行了深入访谈,请他们谈谈孩子最喜欢的或者自己参与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活动,以及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活动对孩子的影响等,以进一步了解家长们的具体想法及家庭与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相关的具体细节,丰富研究信息。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家庭中方言使用状况

方言是民间音乐的重要载体,民间音乐与方言水乳交融,民间歌谣及其他形式的民间音乐大多数是用本土方言演唱与表达的。福建是个多方言地区,家长及幼儿对方言的兴趣与听说能力直接影响着他们对民间音乐的态度。为此,我们对当前家庭的方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家长们对“您或您的家人是否会讲当地方言”的问题回答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家长方言使用水平一览表(单选)(n=1 529)

项目	非常会讲	比较会讲	一般	不太会讲	完全不会讲
人数(人)	422	524	419	102	62
百分比(%)	27.60	34.27	27.41	6.67	4.05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次参与调查的家庭中,会讲方言的家长占了较大的比例。其中,比较会讲与非常会讲方言的占了 61.87%,不太会讲和完全不会讲的占比为 10.72%,这些数据远远高出我们的预想。本次调查样本主要采集自福州地区的连江县和闽侯县、宁德地区的福鼎市、三明地区的尤

溪县、南平地区的延平区与武夷山市、龙岩地区的龙岩市以及闽南地区的泉州市,说明福建方言地区家长对方言的使用频度还是比较高的。

为了验证上一结果,我们设计的另一个问题是“您本人是否听得懂方言”,调查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家长方言听话水平一览表(单选)(n=1 529)

项目	完全能听懂	比较能听懂	一般	听不太懂	完全听不懂
人数(人)	680	506	211	73	59
百分比(%)	44.47	33.09	13.80	4.78	3.86

表 2 结果表明,参与者的回答完全印证了上述结果。完全能听懂与比较能听懂的占到了 77.56%,听不太懂与完全听不懂的仅占 8.64%。

那么,当前家庭中除了老人外,年轻的父母们是否也会用方言交流呢?调查结果详见表 3。

表 3 幼儿家庭中使用方言的主要人群一览表(多选)(n=1 529)

选项	爸爸	妈妈	爷爷	奶奶	外公	外婆	亲戚
人数(人)	706	620	1 039	1 191	763	830	646
百分比(%)	46.17	40.55	67.95	77.89	49.90	54.28	42.25

从表3可以看出,所调查的家庭中使用方言的人群比较多元,大多数祖辈在家庭中使用方言交流,超过40%的父母与亲戚在家庭中也使用方言进行交流。

在家庭中,父母们会用方言和孩子们沟通吗?调查结果表明,有时使用方言和经常使用方言与孩子沟通的家庭与很少或基本不讲方言的家庭各占一半左右。

综上所述,当前家庭中,绝大多数祖辈会讲本地方言,并习惯在家庭中使用方言进行交流;父母辈的成员绝大多数能听、说方言,并较常在家庭中使用方言交流;不会听、说方言的仅占10%左右。上述数据表明,大多数幼儿具备听、说方言的家庭环境。

统计结果表明,家庭方言使用情况与孩子对方言的兴趣显著相关,详见表4。

表4 家庭方言使用情况与孩子方言兴趣的相关分析一览表

	家长用方言和孩子沟通	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
家长用方言和孩子沟通	1.00	
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	0.369***	1.0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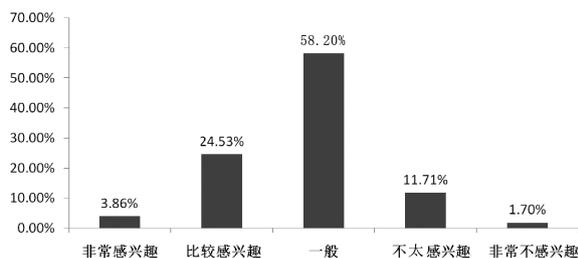


图1 幼儿对方言的兴趣状况图(单选)

(二) 幼儿对方言的兴趣状况

从图1可见,占比58.20%的家长认为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一般,占比28.39%的家长认为孩子对听、说方言比较感兴趣甚至非常感兴趣,占比13.41%的家长认为孩子不太感兴趣。整个情况呈明显的正态分布趋势,感兴趣的孩子明显高于不感兴趣的孩子。

统计结果表明,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与对民间音乐兴趣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详见表5。

表5 孩子对方言与民间音乐兴趣的相关分析一览表

	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	孩子对民间音乐的兴趣
孩子对听、说方言的兴趣	1.00	
孩子对民间音乐的兴趣	0.289***	1.00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三) 家长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接触与喜好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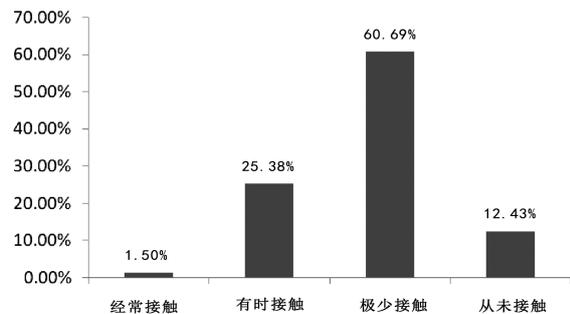


图2 家长对民间音乐的接触情况图(单选)

图2结果显示,有时接触民间音乐的家长仅占四分之一左右,经常接触民间音乐的家长仅占1.50%。占比60.69%的家长较少接触民间音乐,

占比12.43%的家长甚至从未接触过民间音乐。

家长们接触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为网络媒体(58.47%)与社区活动(43.17%),此外,除了借助家人、各类剧院以及书籍接触民间音乐文化,还有家长通过民俗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其他途径接触民间音乐文化,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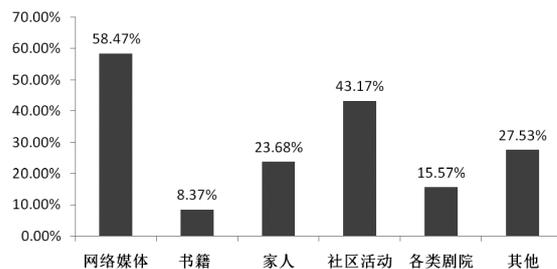


图3 家长接触民间音乐文化的主要途径图(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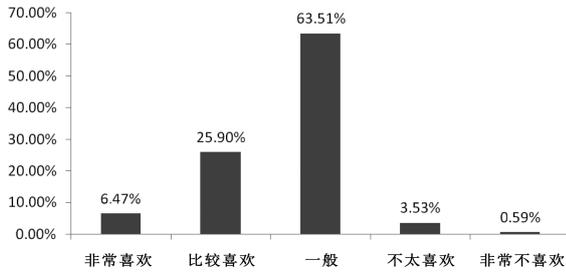


图4 家长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喜爱情况图(单选)

表6 家长与孩子对民间音乐文化态度的相关分析一览表

	家长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态度	孩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态度
家长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态度	1.00	
孩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态度	0.425***	1.00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四) 家长对孩子参与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兴趣的认识

本土民间音乐的许多题材反映的都是较为古老的民间故事或者早期的生活内容,如山野放牛、郑成功收复台湾、田间挖泥鳅、用谷糠养鸭等,与当代生活及孩子们的经验、兴趣存在一定距离。作为孩子最熟悉、最亲近的人,家长经常询问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学习内容以及具体的感受,孩子也常常与家长分享自己在幼儿园的见闻与喜好。应该说,家长比较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与生活。在开展民间音乐启蒙教育实践前的调查中,不少受访家长对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心存疑虑,担心孩子对这些内容会不感兴趣。那么,在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活动之后,家长们对孩子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兴趣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调查结果详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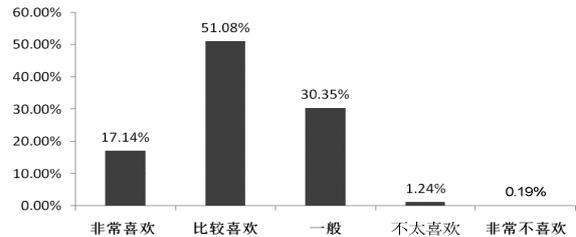


图5 家长对幼儿园参与民间音乐文化的兴趣认识情况图(单选)

从图5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家长认为,孩子会比较喜欢幼儿园将民间音乐文化运用到教育活动中,占比17.14%的家长认为孩子非常喜欢幼儿园开展的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活动,认为孩子不太喜欢与非常不喜欢幼儿园开展的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活动的家长仅占1.43%。上述数据表明,家长普遍认为孩子比较喜欢幼儿园开展的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活动。

(五) 家长对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价值及必要性的认识(详见表7)

表7 家长对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价值的认识一览表(多选)($n=1529$)

选项	培养家乡情怀	增长孩子见识	增进祖孙感情	增加生活情趣	养成良好德行	发展语言能力	陶冶情操	其他
人数(人)	1345	1135	982	908	1283	1058	1067	151
%	87.97	74.23	64.22	59.39	83.91	69.20	69.78	9.88

从表7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家长认为,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能够培养孩子的家乡情怀(87.97%),有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习惯(83.91%),增长孩子见识(74.23%),陶冶孩子的情操(69.78%),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69.20%),增进与祖辈的感情(64.22%),增加生活情趣

(59.39%)。

访谈中,许多家长谈到与邻居、同事的孩子相比,自己的孩子更加关注乡土文化,常常会为家乡感到自豪,经常会在家里演唱民间童谣让家里人猜意思;看到社区有战胜鼓、拍胸舞、木偶、评话、板凳龙表演时,会主动要求家长带他们去观看;见

到长辈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认真听大人说话,会为老人捶背;遇到困难时,有的孩子说“我是闽南人,爱拼才会赢”。家长们讲到这些时,都十分感慨而激动,认为孩子的这些成长和进步与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息息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占比 64.22%的家长认为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具有增进与祖辈情感的独特价值。在访谈中,很多家长都谈到,原来老人在家里更多是做家务、照顾儿孙的生活,现在老人们会说好听的方言,会朗诵韵味十足的方言童谣,会唱好听的闽剧、芗剧,会讲与民间音乐文化相关的生活故事……孩子们经常向祖辈学习方言童谣,了解民间习俗,爷爷奶奶不再只是孩子生活的照料者,父母会带着孩子“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事情”,家庭氛围也变得更加融洽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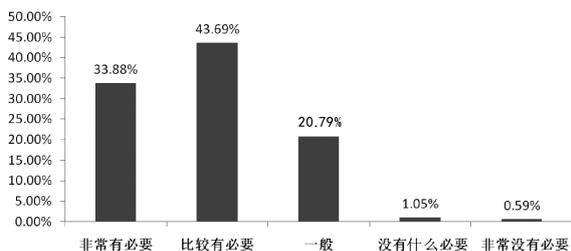


图6 家长对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图

孩子们对民间音乐的喜欢,打消了家长们早期的疑虑。从图6可以看出,近78%的家长认为幼儿园有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认为没什么必要开展的家长仅占1.64%左右。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获得家长的广泛认可。

四、研究结论

(一) 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具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生态环境

首先,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具有良好的家庭方言环境。调查结果显示,福建各地大多数家长听得懂、也比较会说方言,家庭成员经常用方言进行交流。统计数据表明,家庭方言使用情况与孩子对方言的兴趣显著相关,而孩子对方言的兴趣也与对民间音乐的兴趣显著相关,这为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提供了良好的方言生态环境。

其次,年轻家长们对民间音乐文化没有排斥感。近三分之一的家长比较喜欢或非常喜欢民间音乐文化,不太喜欢或非常不喜欢的极少,说明年轻家长们并不排斥民间音乐文化。统计数据表明,家长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态度显著影响孩子,这就为幼儿接受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情感生态。

再次,占比四分之一左右的家长对民间音乐已有所接触,其接触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为网络媒体与社区活动,可见网络媒体与社区生活对年轻父母的影响之深。近年来,媒体、社区民间音乐与民俗文化活动较多,父母与子女在耳濡目染中得到民间音乐文化的熏陶。

(二) 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得到家长的高度认同

首先,家长普遍认为孩子比较喜欢民间音乐文化。本次调查中,认为幼儿园将民间音乐文化运用到教育活动时孩子会比较喜欢甚至非常喜欢的家长占到68.22%,认为孩子不太喜欢民间音乐文化的家长仅占1.43%。不少家长在访谈中介绍孩子回家后会常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分享在幼儿园听到的民间童谣、故事,还会说起看到的高甲戏中男女丑奇怪的装束,演唱畲族歌谣给大人听,教爸爸妈妈跳竹竿舞等。

其次,家长认为幼儿园很有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也正是基于孩子们的喜欢,家长们打消了早期的疑虑,近78%的家长认为幼儿园有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认为没什么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家长仅占1.64%,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获得家长的广泛认可。

再次,家长认为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对幼儿成长具有多元教育价值。家长们普遍认为,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具有培养孩子的家乡情怀,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习惯、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发展语言能力、增进与祖辈的感情、增加生活情趣等多元教育价值。孩子们多方面的成长与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息息相关。

(三) 民间音乐文化启蒙助推三代人良性互动“家教共同体”的构建

由于生活年代与知识经验的差异,祖辈们常处于与时代脱节的角色,基本负责家庭中孩子的保育工作,难以真正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本次调查中,家长普遍反映幼儿园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有效增进了孩子与祖辈的感情,很多父母与孩子逐步了解了祖辈的生活阅历。对于民间流传的方言童谣、音乐背后的文化习俗等,祖辈比起年轻的父母有着更多的理解,幼儿园也经常邀请有相关经验的老人到幼儿园当助教。老人们通过与孩子们的交流互动,展现了他们独有的教育魅力,孩子们不再认为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无知与过时了。老人们的知识系统开始派上用

场,他们的教育自信显著增强,开始积极参与孩子们的教育成长,祖辈的亲职教育效能得到有效发挥,他们在儿孙心目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明显增多,祖孙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拉近。有了共同话题,三代人的家庭关系融洽和睦,家庭生活也变得更加其乐融融。“三代人的互动才是完整的家庭教育”^[4],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对增强祖辈的教育自信、促进三代人良性互动“家教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五、研究启示

(一) 加强家园共育,积极打造以优秀民间文化为“母语”的家园生态环境

家庭方言使用情况、家长对民间音乐的态度等对幼儿的影响十分显著。因此,幼儿园应主动加强家园合作,邀请并组织父母、祖辈积极参与民间童谣收集与表演活动,邀请幼儿父母与祖辈共同参与幼儿园民间故事会、民俗体验馆、民间游戏、民间曲艺表演等各种民间文化共享活动,积极打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优秀文化为“母语”的、大中小“课堂”有机结合的音乐教育生态环境^[5]。

(二) 运用现代技术,在场景化、时尚化的创意活动中增强家长传播、弘扬民间文化的自觉性

在全球创意产业发展热潮中,文创街区作为地方空间的重要组成单元,在重塑地方形象、激活地方经济活力方面有着越来越突出的产业优势^[6]。本次调查表明,网络媒体与社区是年轻父母们接触家乡文化及民间音乐的主要途径。为大力传承与弘扬优秀民间文化,政府应积极探索,加强文创街区的规划与建设,通过新媒体技术,将当地的民间音乐、历史文化资源与城乡社区建设有机结合,打造富有浓郁民间音乐文化特色的文创街区,让百姓在置身于充满文化内涵与创意活力的“场景化”街区中,感受优秀民间音乐及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还可以将传统民间音乐插上新媒体的翅膀进行精彩蜕变,把传统传播成年轻人喜欢的时尚网红^[7],使传承与弘扬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成为年轻人的自觉行为。

(三) 坚守童心本位,引导幼儿在享受民间音乐文化的审美游戏中萌发文化认同

调查中,家长们反复谈到兴趣的重要性,认为幼儿园很有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家长,也是反复描述了孩子们回家后对民乐音乐及

其文化津津乐道的场景,他们认为这源于教师的教学内容很有趣,教学形式游戏性强。认为幼儿园没有必要开展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的家长批评班级开展的民间音乐活动有的材料不够有趣,教育方式游戏性不足。因此,幼儿园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必须坚持童心本位,基于幼儿的年龄特点与思维方式,将民间音乐文化以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幼儿充分体验民间音乐文化的有趣与好玩;通过视听感受、模仿、幻想、直觉体验、知觉通感、灵感、顿悟等多种方式,满足儿童好奇、好问、好玩、好探究以及爱美的天性,促进其感受、探究民间音乐文化。在此过程中,儿童不仅是民间音乐学习的参与者,更是其所学内容的“创新者”。

(四) 注重以美启德,挖掘民间音乐文化中向善向美的教育元素,健全幼儿人格

儿童爱欲的提升,是以美为支点,以爱为动力,爱与美结合的民间音乐文化启蒙教育是适合儿童的教育,儿童时期良好人格的养成是指引儿童向善向美的过程^[8]。民间音乐文化蕴含综合教育价值,以美启德的民间音乐开启了儿童探索他人与生活世界的生命通道,成为儿童积极走向他人与生活世界的精神起点。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EB/OL]. (2014-10-24) [2019-12-06].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164113-25845591.html>.
- [2] 顾明远. 弘扬传统文化需要走出一些误区[J]. 中国教育学刊, 2010(1): 42.
- [3] 虞永平. 文化、民间艺术与幼儿园课程[J]. 学前教育研究, 2004(1): 31-32.
- [4] 孙云晓. 父母失职可能导致三代人的悲剧[N]. 中国教育报, 2018-09-20(家教周刊09版).
- [5] 王耀华.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与展望[J]. 音乐研究, 1994(3): 8-12.
- [6] 刘桂茹. 场景的“再场景化”: 新媒介时代文创街区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2): 65-73.
- [7] 树红霞. 闽剧“网红”, 把传统传播成时尚[N]. 福建日报, 2020-06-18(文体08版).
- [8] 李京玉, 邓洁隽. 儿童教育的旨趣: 呵护生命自由生长[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7): 61-63.

(责任编辑 师 语)

保育机构开展儿童发展指导和家长指导的岗位要求与原则*

孙 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的岗位要求如下:第一,遵守职业道德;第二,掌握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第三,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第四,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时,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权利公约》。保育机构教养人要善于发现家长在儿童发展指导中的盲点,并给予家长指导性的建议;重视家长提出的有关儿童发展指导的问题,并给予家长积极的解答;发现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异常,并给予家长及时反馈;指导家长开展个别化发展指导。保育机构开展儿童发展指导与家长指导时,应遵循游戏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环境性原则、反复性原则。

[关键词] 保育机构; 岗位要求; 发展指导; 家长指导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25-06

为加强托育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的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10月组织制定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地方层面,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也结合各自城市的特点与需求,制定了保育机构的管理规定。以上管理规定多从备案管理、保育管理、安全管理、人员配置等方面对保育机构提出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化要求。然而,在保育机构硬件达标的同时,婴幼儿保育机构的教养人如何开展婴幼儿发展指导与家长指导,这些方面的标准与规定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范性的要求。

“指导”(Guidance)是教育的职能之一。杜威认为,“指导”是“把被引导人的主动趋势引导到某一连续的道路上,而不是无目的地分散注意力”^[1]。“指导”表达了一种基本的功能,这种功能的一个极端是方向性的帮助,另一个极端是调节或支配。

可见,“指导”指的是为被引导者确立正当的行为方向和使其向着正当方向调节自己的行为提供帮助的过程。所以,保育机构从事0—3岁儿童的发展指导指的是保育机构对该年龄阶段儿童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亲子互动等各方面提供指导与服务的一系列综合性活动。总的来说,保育机构的教养人一方面要从事儿童发展指导,即引导儿童积极、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保育机构的教养人还需要开展家长指导,提升家长科学育儿的能力。

一、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的岗位要求

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和家长指导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些具体的岗位要求:

1. 遵守职业道德。为确保儿童指导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强化保育机构教养人遵守职业道德的意识。具体而言,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需要遵守的职业道德主要包括几点。第一,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热爱儿童是保育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村地区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养育风险预警与干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YJC880055)。

[收稿日期] 2020-07-07

[作者简介] 孙 卉,女,江苏宜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博士。

机构教养人顺利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前提,只有热爱儿童,教养人才能对儿童有爱心和耐心,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去。尊重儿童是保育机构教养人顺利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关键,只有尊重儿童,教养人才能把儿童真正地看成是“人”而不是“物”,才能站在儿童的角度去考虑儿童的感受与需要,从而真正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第二,对儿童及其家庭的资料进行保密,保护儿童隐私。保育机构及其员工应当妥善保管在儿童发展指导过程中获得的有关儿童及其家庭的资料,不经儿童及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将资料泄露给其他人或机构。此外,对于儿童的隐私,包括儿童的基本信息、其所在家庭的信息和情况、是否存在发展异常等,应当严格保密。第三,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及其家庭。儿童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所在的家庭也各不相同。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儿童,在儿童发展指导实践中杜绝歧视与偏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并不是说对所有的孩子都要采用完全相同的指导方法,而是对每个孩子都应该富有爱心,在发展指导的实践中仍需要针对每个孩子特点选择合适的指导方法,做到因材施教。

2.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善于学习,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儿童发展指导工作。第一,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助于保育机构教养人进行科学指导,避免在儿童发展指导实践中出现违背儿童发展规律的行为。例如,过早训练儿童走路,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不利于其腿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第二,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助于保育机构教养人与儿童开展沟通交流。只有掌握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才能理解儿童的所思所想和行为特点,才能在此基础上与儿童顺畅地沟通,进而保证儿童发展指导的准确性。第三,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助于保育机构教养人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例如新生儿的无条件反射动作是与生俱来的,通过观察婴儿是否存在特定的无条件反射行为,可以判断其神经发育状况,若发现其缺少特定的无条件反射行为,应当及时告知家长,带孩子到医疗机构诊断治疗。

3.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需要保育机构教养人善于学习,不

断充实有关儿童发展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将儿童发展的相关知识和理论运用于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避免脱离实践纸上谈兵。同时,在将儿童发展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儿童发展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需要保育机构教养人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儿童发展的实际情况、儿童所在家庭的实际情况、保育机构的实际情况等),在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具体的指导方法,避免死扣理论知识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4.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一方面,保育机构教养人在掌握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理解儿童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必行为,从而与儿童进行有效的沟通;另一方面,保育机构教养人还必须具备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做好对家长的指导,以使儿童在保育机构获得的指导能够延续到家庭教育中,促进儿童的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保育机构教养人与家长沟通和对家长指导时,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恰当的态度。保育行业本质上属于服务行业,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以热情的态度为儿童和家长做好服务。同时,保育机构教养人的儿童发展专业知识较普通家长而言更加丰富,因此也需要以专业的态度面对家长,对家长做好科学的指导。第二,规范的操作。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只有通过规范的操作,保育机构教养人才能和家长建立起信任关系,使后续对家长的指导得以顺利开展。同时,操作时的讲解与示范也是对家长指导的重要手段,保育机构教养人的正确操作,保证了家长操作的规范性。第三,耐心的解答。当家长遇到儿童发展的问题时,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给予耐心解答。若对家长所提问题不甚了解,应及时求助其他专业人士,切勿随意解答,这是对儿童和家长负责,也是对保育机构及教养人自己的负责。第四,及时的反馈。在进行儿童发展指导的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儿童的各方面状况,并做好记录,待指导结束后及时向家长反馈,沟通交流。

二、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是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掌握法律法规知识是保育机构教养人的从业前提。保育机构教养人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法纪意识,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规范自己的从业行为。同时,保育机构教养人也应以法律法规为工具,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除了有关保育机构的硬件标准、人员配置、食品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以下几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是为了保障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根据宪法而制定的一部法律。尽管本法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医疗保健机构的,但对保育机构及其员工从事儿童发展指导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母婴保健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母婴保健领域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推广先进、实用的母婴保健技术,普及母婴保健科学知识”。保育机构教养人在进行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可以尝试将儿童发展指导实践与母婴保健领域的教育、科学研究相结合,不断开发和完善母婴保健与儿童发展指导的技术,并向家长与社会做好母婴保健与儿童发展科学知识的宣传。

其次,《母婴保健法》第十四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妇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母婴保健指导、孕产妇保健、胎儿保健和新生儿保健”。这一规定也提示保育机构在做好家长指导的过程中,不仅要指导家长如何开展儿童发展指导,也要适当兼顾家长的身心健康,正如本条法规中所言,要关注母婴保健指导和孕产妇保健,为儿童家长,尤其是新生儿家长提供卫生、营养、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因为家长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是在家庭环境下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重要前提。

再次,《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为当事人保守秘密”。无论是在医疗保健机构还是在保育机构,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为当事人保守秘密,都是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循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因此,在儿童发展指导中,保育机构和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严守职业道德,保护儿童及其家庭的隐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

称“《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因此,保育机构开展0—3岁儿童的发展指导,必须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具体而言,本法与保育机构教养人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相关的条款有以下几条:

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保育机构教养人在从事儿童发展指导的过程中,不得侵犯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并在指导的过程中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给予儿童特殊、优先保护。

其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这一条款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保育机构教养人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方向,即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为导向,在儿童发展指导中融入积极思想,避免腐朽思想对儿童的腐蚀。

再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二)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这3条原则也应当贯穿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实践中应当关心儿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人格尊严;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开展科学指导;坚持指导与保护相结合。

最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第三、第四章详细规定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未成年人保护中所负有的责任。这也提示保育机构在保育机构环境中做好儿童发展指导的基础上,还应当将儿童发展指导外化到其他环境中去,做好家长指导、学校交流、社会宣传,使儿童在其他环境中依然能够得到积极的发展。

3.《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以下简称“《公约》”)于1989年11月20日由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是

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公约》第一条就指出,儿童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可见,保育机构和保育机构教养人所从事的 0—3 岁儿童发展指导也应符合《公约》的相关规定。

第一,《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遵守本公约所载列的权利,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每一名儿童均享受此种权利,不因儿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得到保护,不受基于儿童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或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或惩罚”。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过程中,要首先做好对儿童的保护,尊重个体和家庭的差异,不因儿童或其父母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社会出身、财产、伤残等对儿童及其家庭产生歧视或偏见。

第二,《公约》第三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从事儿童发展指导必须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尤其是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切勿因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在儿童发展指导中对儿童利益的关注。例如,保育机构不能为迎合家长的错误需求,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对儿童进行超前训练。

第三,《公约》第十二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第十三条也规定,“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这两个条款提示保育机构在开发儿童发展指导的相关培训课程以及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应当给予儿童表达主观想法的权利,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认真聆听儿童的心声,充分考虑儿童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观需要,在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满足儿童合理的需要。同时,由于儿童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体差异,儿童的主观需要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儿童发展指导的实践中,也要考虑不同儿童的不同需求,切勿教条地使用一套固定的方法指导所有的儿童。

第四,《公约》第十六条规定,“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本条款所涉及内容,前文已多次提及,儿童及其家庭的所有信息,保育机构和保育机构教养人应当予以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儿童及其家庭的任何隐私。

第五,《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本条款强调了儿童权利保护中父母的责任,这也提示保育机构和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时要做好父母指导,让父母掌握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同时,要让他们意识到父母才是儿童发展的首要责任人。

第六,《公约》第二十三条规定,“缔约国确认身心有残疾的儿童应能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本条款关注到身心有残疾的儿童,这也提示保育机构和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时若遇到身心残疾的儿童,一要尊重其人格,确保其尊严,无偏见,不歧视;二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特殊儿童的发展指导,减轻身心残疾对他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促进其融入社会。

第七,《公约》第二十九条规定,“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儿童基本的身心发展,也要帮助儿童初步理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对文化的认同、对价值观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好的精神、社会责任感、对自然的尊重等观念。

第八,《公约》第三十一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教养人开展儿

童发展指导的形式应符合儿童的需求,尤其关注以游戏和娱乐的形式开展儿童发展指导,寓教于乐,避免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和机械式的简单重复操作。

第九,《公约》第三十七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儿童发展指导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儿童的人格,不得出现辱骂、体罚、变相体罚、限制自由等有辱儿童人格或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行为。

第十,《公约》第四十二条规定,“缔约国承担以适当的积极手段,使成人和儿童都能普遍知晓本公约的原则和规定”。这一条款提示保育机构教养人要善于总结儿童发展指导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并利用积极的方式开展社会宣传,从而形成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三、保育机构对家长的指导

家庭是儿童发展的原生环境,家长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家长行为对儿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掌握儿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开展家长指导,帮助家长科学地开展儿童发展指导亦是保育机构的工作内容之一。

1. 保育机构开展家长指导的内容

总体而言,婴幼儿保育机构教养人开展家长指导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

(1) 发现家长在儿童发展指导中的盲点,并给予家长指导性的建议

相比保育机构教养人,普通家长很难全面掌握儿童发展的系统理论和科学指导的方法。因此,保育机构教养人在开展家长指导与培训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家长在儿童发展指导的理念和方法上的盲点或不科学之处,并能够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出发,给予家长指导性的建议。

家长在儿童发展指导的理念和方法上,常见的盲点或不科学之处包括:“重身轻心”“观念陈旧”“错误解释”等。“重身轻心”指的是家长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视儿童的身体发育,但容易忽视儿童的心理需求,认为“小孩子吃饱喝足就好了”。“观念陈旧”指的是家长的育儿观念较为陈旧,甚至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观念和方法指导

儿童的发展。“错误解释”指的是家长没有正确理解儿童的行为,错误地理解儿童的行为,例如婴儿吮吸手指是正常的行为,也是婴儿探索世界的方式之一,有些家长却错误地认为,婴儿吮吸手指是缺少某些微量元素的表现,或者是缺少父母关爱的表现。

(2) 聆听家长提出的有关儿童发展指导的问题,并给予家长积极的解答

如果说发现盲点并给予建议是保育机构教养人主动给予家长指导的话,那么,家长发现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则是家长主动寻求指导的过程。对于家长提出的有关儿童发展的问题,保育机构教养人在认真聆听的基础上,应当给予家长积极的解答。具体而言,解答包含两个要求:一是科学,二是通俗。

所谓科学,指的是给予家长的解答必须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保育机构教养人首先要学习并熟练掌握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科学指导的方法。所谓通俗,指的是给予家长的解答必须保证家长能够理解,换句话说,保育机构教养人需要用家长听得懂的表达给予家长指导和解答,切勿以权威自居,向家长传递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

(3) 发现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异常,并给予家长及时的反馈

一方面,发现儿童发展异常时,保育机构应当及时向家长反馈,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家长科学的建议;另一方面,在对家长指导时,也应当向家长普及儿童发展的科学规律,以便家长在与儿童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儿童发展的异常,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 保育机构开展家长指导的方法

总的来说,保育机构教养人开展家长指导的主要方法有几种。第一,家长会。家长会主要采用的是“一对多”或“少对多”的形式,即一名或少数几名保育机构教养人与多名家长开展交流与指导。这种形式适用于一般儿童发展知识的普及,以及儿童发展中共性问题的解答。第二,个别交流。个别交流主要采用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即一名保育机构教养人与一名家长开展面对面的交流与指导。这种形式适用于针对儿童的个别问题或较为特殊的问题而开展的家长指导。第三,家访。保育机构教养人深入儿童家庭,与家长进行

交流并开展家长指导。这种形式有利于保育机构教养人全面掌握儿童的家庭环境、家庭成员关系、生活习惯等,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家长指导。第四,建立联系簿。保育机构教养人将指导过程中儿童的各方面情况详细记录在联系簿上,并及时将记录内容向家长反馈,同时在联系簿上向家长提出支持和配合的具体要求和建议。

3. 指导家长开展个别化发展指导

指导家长开展个别化发展指导是保育机构开展家长指导的重要内容。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对儿童进行评估,了解其现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可以从动作发展、认知能力发展、语言能力发展、社会性发展等领域加以评估。第二步,针对评估结果,对儿童进行评价。评价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当儿童评估结果不佳时,不能因为考虑家长的情绪而夸大或隐瞒评估结果,需要引起家长重视,但也要注意用词委婉,强调儿童发展的潜能和可塑性。第三步,根据评估结果和儿童的特点,制订教育训练的计划。通过对儿童的评估和评价,一方面能够确定儿童发展的实际水平,进而确定教育训练的目标;另一方面,能够以评估和评价结果为依据,制订教育训练计划。

四、保育机构开展儿童发展指导与家长指导的原则

对保育机构而言,无论是开展儿童指导,还是开展家长指导,一些指导的原则是必须把握的。

一是游戏性原则。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游戏对儿童动作、语言、认知、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游戏也是儿童认知世界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设计儿童发展指导或家长指导的计划时,都应该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从游戏的角度切入,将教育训练的内容以游戏的形式呈现,以便儿童更好地接受教育训练。

二是整体性原则。该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标的整体性,即设计个别化发展指导计划时,需要综合考虑儿童的身心发展需求,从身体发育、动作发展、感知觉发展、情绪发展、语言发展、社会性发展等多个方面出发,全面关注儿童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手段的整体性,即以游戏为

主要教育训练手段的同时,也应当兼顾其他多种手段,整体考虑个别化发展指导的具体方法。

三是差异性原则。儿童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体差异,即使是同一名儿童,其不同领域的发展程度也有所差异,例如有的儿童动作发展较慢,但语言发展较快。因此,在设计个别化发展指导时,在坚持整体性原则的基础上,也要关注个体差异,针对儿童的发展特点,对不同领域的指导要有所侧重,突出“个别化”的特点。

四是环境性原则。儿童的积极发展离不开积极的环境,丰富的活动与环境刺激对儿童大脑与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众多研究结论的支持^[2]。因此,在设计个别化发展指导时,也要关注积极环境的创设。这里的积极环境既包括积极的物质环境,例如丰富的游戏道具、宽敞的动作训练空间等,也包括积极的精神环境,例如父母的积极关注、和睦的家庭氛围等,正如有研究指出,在积极的家庭环境中,幼儿出现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对更少^[3]。

五是反复性原则。儿童的很多感知经验都是在反复体验中获得的,对于0—3岁的婴幼儿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设计个别化发展指导时,要注意很多活动的开展需要结合儿童的兴趣和发展需要,加入合理的重复,以便儿童反复体验这些知识和技能。例如在个别化指导中开展亲子阅读,有些故事在家长看来已经读过了,甚至读过不止一次了,但对儿童而言,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体验,都能有新的收获。

[参考文献]

- [1]束晓霞.从观念到行动: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TRENTACOSTA C J, HYDE L W, SHAW D S, et al. The relations among cumulative risk, parenting, and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early childhood[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2008 (11): 1211-1219.
- [3]周加仙.美国的早期儿童教育运动:脑与认知科学的分析视角[J]. *全球教育展望*, 2009(7): 13-17.

(责任编辑 师 语)

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的现状审视与对策研究

赵艳 路佳颖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博物馆是开展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儿童教育可充分利用博物馆的优势,开展符合儿童需求的场馆教育活动,以促进儿童的发展。本研究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以“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开展的活动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研究方法,掌握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的真实现状,发现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存在文化资源选择困顿、活动开展方式单一、活动随意性较大等问题。开展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应依托博物馆特色,关注儿童需求;丰富活动的形式,注重启发探究;明确活动目标,合理评价。

[关键词] 场馆教育; 儿童发展;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31-05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类场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坚持将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1]。博物馆以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2]37-38}。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传承和终身教育的倡导,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日渐突显。据有效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国内现有各类博物馆3410个,学校组织儿童前往各类博物馆场馆参观学习的频率在逐年增加,但目前场馆针对儿童开展的教育活动仍然不够普遍。因此,研究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对进一步丰富儿童校外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文化传承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案例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观察法和访谈法是质性研究的主要资料收集方法。观察法分类众多,其中实地观察可进一步划分为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的主要目的从人类生活的有关事实中发掘实践性

真理和理论性真理。参与式观察情境相对自然,观察者既能够对文化现象内部得到较为具体的感性认识,又能够深入被观察者的文化内部,探究其行为的意义。参与式的观察具有开放和灵活的特点,它允许研究者结合研究问题和情境需要调整观察目标、观察内容等,但研究者也需要在观察过程中排除自己的“前设”,以获得客观和真实的结果^{[3]228-229}。访谈法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交谈、访问等口头谈话收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访谈法按其结构可划分为封闭型访谈、开放型访谈和半开放型访谈。开放型访谈没有设置固定的问题,鼓励被研究者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目的是了解被研究者看待问题的重点、看待问题的角度、对问题意义的解释等。访谈时,访谈者以辅助的身份存在,不限制受访者的思路,访谈的形式也可以依据情况随机变化^{[3]171}。

本研究采用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以“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中的儿童教育活动为例,从空间设置、活动规划、实施过程和访谈补充4个方面对活动进行参与式的观察和分析,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收稿日期] 2020-10-30

[作者简介] 赵艳,女,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路佳颖,女,甘肃靖远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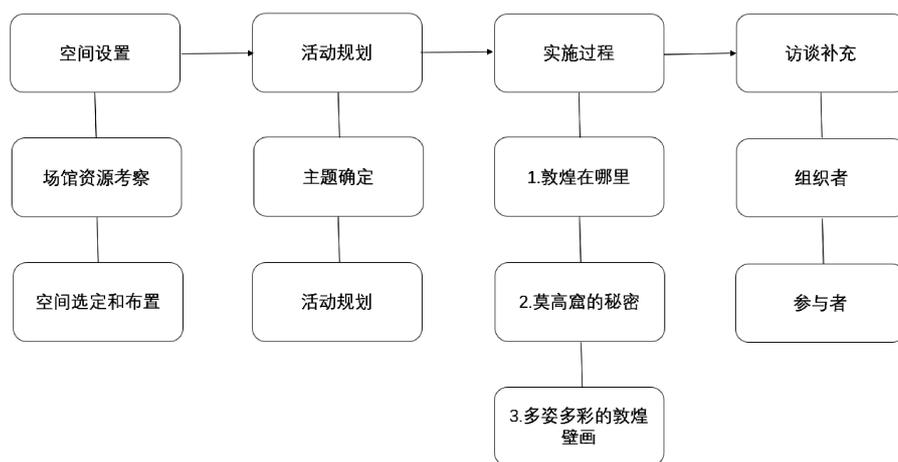


图1 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参与式观察流程图

(二) 研究过程

1. 活动空间设置

利用博物馆空间和资源配置开展活动,组织者首先要了解博物馆的巡展特色、主题、参观路线等,发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以此确定活动空间,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此次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基于“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该巡展由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和X大学共同举办,地点在S大学美术馆内,时长一个月,展品有莫高窟高保真复制壁画40余幅,1:1复制的莫高窟285(西魏)洞窟一座,展出内容包括石窟壁画介绍、石窟保护历程以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等。

博物馆三维空间的实物学习方式有利于引导儿童在情境中探索学习,帮助儿童形成主动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因当日是周六,场馆内人员较多,有近10位讲解员进行不间断讲解,除正常参观的游客外,还有陕西省书画院组织的参观写生活活动,故而馆内较为嘈杂。活动中负责人利用博物馆已有条件,将儿童教育活动区域选定在场馆的东北角,该处人流相对较少,较为安静,其北面陈设活动展板,东面墙壁皆有展出的壁画,并提供了投影仪、泡沫垫等基础设备,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 活动规划设计

明确的主题和科学的设计是活动开展的基础。在主题设定过程中,活动设计者必须对博物馆资源、受众年龄等进行梳理和分析,确定活动主题和活动开展的方式。基于前期的考察和空间设置,活动组织者拟定主题围绕“敦煌莫高窟”展开,

引导儿童掌握莫高窟的地理位置,了解莫高窟的相关知识,由“敦煌在哪里”“莫高窟的秘密”和“多姿多彩的敦煌壁画”3个环节组成,活动时长两小时,两位讲解员讲解,发放学习单,儿童在家长帮助下完成。引导儿童从了解、认识、掌握,到欣赏、探究和发现,层层递进、不断地学习。

3. 活动实施过程

当日15时活动开始,参加活动的儿童共20余名,年龄最小者仅5岁,最大者12岁,皆由家长陪同。活动设计者即活动实施者,为便于区分,将两人分别称为Y讲解员和G讲解员。

首先,Y讲解员借助电子屏幕向儿童介绍了敦煌的地理位置和著名景点。如他讲到“这是阳关旁边的沙漠、戈壁,古人做买卖要走很远的路(做出走路的样子)才能到达有人和有水的地方,不然就会渴死,所以,这个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讲解员经验丰富,语言表达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儿童十分专注,无交头接耳的行为。讲解用时20分钟,讲解结束后,讲解员发放了学习单,要求儿童一刻钟内在中国地图上标出北京、陕西和甘肃的位置,在甘肃地图上标出敦煌的位置。

之后,G讲解员为儿童讲解了敦煌莫高窟的历史、窟形以及壁画题材。在该环节,尽管讲解员用PPT展示了相关图片并进行了详细讲解,但大部分年龄较小的儿童因缺乏前期经验积累,对“覆斗顶窟”“涅槃”“本生故事画”等大量专业词汇还是无法理解,部分儿童开始玩弄手中的文具,或交头接耳,或四处打量。讲解用时一刻钟,结束后,讲解员发放了“莫高窟知识填空”的学习单,要求儿童在10分钟内在家长协助下完成。

最后是场馆壁画讲解环节,两位讲解员一人负责讲解,一人负责维持秩序。讲解内容依据儿童认知能力进行选择。如,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是讲解的内容之一,该壁画是莫高窟内面积最大的,展现了山西五台山方圆八百里的山川城池。G讲解员首先向儿童介绍了这幅壁画的所在洞窟、建造年代、描绘内容等,接着,通过壁画内容,为儿童讲解了当时的建筑、交通等,并与儿童互动,让儿童在壁画上寻找当时人们出行的画面,调动了儿童的视觉和感知觉,儿童兴致勃勃,参与度较高。该部分讲解用时20分钟。最后,讲解员发放了“给‘飞天’填色”和“帮壁画找到‘家’”的学习单,要求儿童在10分钟内完成,帮助其巩固所学知识。活动结束前,Y讲解员让孩子们谈自己的感受,儿童踊跃发言,描述词有“多姿多彩”“特别多”“漂亮”“千姿百态”等。

(三) 研究结果

通过上述参与式观察和开放型访谈,可以发现此次教育活动有以下特点:

首先,活动主题新颖,儿童参与积极性较高。本研究的场馆儿童教育活动主题围绕“敦煌文化”展开,相较于当地历史文化,儿童了解敦煌文化的途径较少,对敦煌文化的内容缺乏全面、系统地学习的机会。在开放型访谈时,孩子们表示此次场馆教育活动很有趣,喜欢参与这种活动,年龄较小的孩子对“给‘飞天’填色”活动更感兴趣,年龄较大的孩子认为他们“学到了课堂中学习不到的知识”。

其次,活动流程相对完整,活动井然有序。通过上述参与式的观察可以发现,本研究的场馆儿童教育活动从敦煌的地理位置、莫高窟的历史到莫高窟壁画内容讲解,层层递进,活动开展方式以“讲解+学习单”为主,使儿童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敦煌文化。活动组织者充分利用空间和亲子互动的优势,使整个活动井然有序。

最后,活动立足场馆资源,弘扬传统文化。本研究的场馆儿童教育活动立足场馆资源,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儿童了解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儿童的文化自信。

此次活动虽收效较好,但也存在不足。

第一,场馆资源利用得不充分。首先,博物馆拥有大量资源,学习方式相对自由,对博物馆空间的合理利用有助于调动儿童的感官,使其全身心投入学习中。此次活动虽有情境设置和活动主

题,但给予儿童自主探索的空间相对较少。其次,笔者对活动组织者开放型访谈时发现,因敦煌莫高窟壁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艺术等多个领域,活动虽明确了主题,但讲解者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讲解仍有一定的困难。如何利用场馆资源选择符合儿童需求的知识,设计符合儿童兴趣的活动,需要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

第二,活动组织者未能完全做到以儿童为中心。杜威曾言“我们教育中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一切教育措施围绕儿童转动,儿童是中心”^{[4]11}。本次活动的学习方式是“讲解+学习单”,以讲解员讲解为主儿童完成学习单为辅,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和需求,忽视了儿童探索、合作、独立学习的需求,活动组织者在受访时也提及“活动过程中儿童较多,且年龄分段差距较大,认知发展水平不相同,难以满足每个孩子的学习需求”。

第三,参与活动的家长和孩子学习目标不明确,活动效果不明显。访谈时,家长们表示:“主要是想让孩子来了解一些敦煌的知识,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参与活动前也未做功课,我们刚好周六下午有空就带孩子来了。”尽管评价学习单的完成情况可以作为对儿童学习效果的一种评价方式,但孩子是在家长协助下完成的,评价的客观性需要考量。

二、基于文化传承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现状审视

(一) 开展博物馆教育活动时资源选择困难

美国博物馆学家乔治·布朗·古德(1851—1896)认为“博物馆收集并保存了最能体现和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及人类发展历史文化的物品,并应将其用于增加公众知识和协助启蒙教育”^{[5]46}。场馆内藏品种类覆盖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为博物馆教育和文化传承提供了载体,但同时也会引起选择上的困难。

上述研究中活动设计和组织者谈到如何选择和讲解壁画内容是最难的,在讲解敦煌莫高窟窟形以及壁画题材时,讲解员尽管用PPT展示了相关的图片,但儿童还是很难理解专业词汇,出现注意力分散等情况。过简或过难的知识皆可能影响

到儿童的学习兴趣。博物馆文化资源选择的困难主要源于个人主观性、儿童前期经验及社会需求考量的影响^[6]。文化资源选择与社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文化资源选择需要充分考虑社会需求,而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鉴于这种双向性影响,进行文化资源选择尤为重要,它不仅影响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更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博物馆文化资源选择需要考虑教育需求,选择本就是人自主性的体现,文化资源选择时很难避免人内在主观性影响,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诉求和目的各不相同,这给教育活动设计的文化资源选择增加了难度。

(二) 博物馆教育活动形式单一

杜威曾言,“唯一的真正教育是通过儿童能力的刺激而来的,这种刺激是儿童自己感觉到所在的社会情境的各种要求引起的”^{[7]5}。博物馆的情境设置和展品特色等为儿童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但上述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中,3个环节皆以“讲解+学习单”的形式开展,缺乏对儿童能力的理解,缺乏刺激儿童探索和学习新知识的教育方式,给予儿童自我探索的时间和空间较少,儿童虽受到了实物和情境刺激,但基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以被动接受教学为主,缺少主动参与探究,故而影响儿童从自身感知到经验刺激的效果。

当前,博物馆儿童教育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许多学校同博物馆合作开展教育活动,但大多趋于形式。参观讲解是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形式之一,讲解员虽向儿童科普了相关知识,但互动不够,致使部分儿童将场馆学习视为一种放松。长期固定的博物馆教育模式让有些儿童觉得乏味,甚至开始厌倦博物馆学习。

(三) 博物馆教育活动随意性较大

博物馆教育活动虽以“自由”为特点,但应对“自由”和“随意”进行区分。此次博物馆教育活动的随意性体现在活动组织的随意性和参与者的随意性两个方面。活动组织的随意性体现在:第一,无明确的活动知识目标、情感目标和技能目标;第二,活动规则不够具体;第三,学习评价缺失。

参与者的随意性主要体现在家长博物馆教育观念偏颇,多数家长将博物馆儿童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或是开阔儿童视野的一种非正式教育,也有家长和儿童将博物馆教育视为一种放松,未进行活动前的知识和经验准备,忽视了儿童成

长过程中认知发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需求。

三、基于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设计策略

通过参与式的观察、对问题的分析反思和文献的梳理,笔者尝试对博物馆教育活动提出相关设计策略。

(一) 依托博物馆特色,关注儿童需求

博物馆内的馆藏物品记录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历程,极具学习价值,依托博物馆特色确定活动主题,注重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体验性、实物性等特点。活动中应考虑儿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方式,对博物馆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挖掘,寻找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需求的文化资源。

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要充分考虑儿童的认知、情感和技能需求。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学习方式和认知理解能力各不相同,学习的需求也丰富多样。4—7岁幼儿初步接触和认识世界,正处于亲社会、亲自然、好动好问的时期,应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注意力、观察能力和探究能力为主。8—12岁儿童集中注意力时间相对较长,要注重培养科学素养,为其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比如敦煌莫高窟壁画活动中,大多数儿童表示对壁画故事更有兴趣,若能围绕主题选择和转化儿童难以理解的专业词汇,以儿童的视角和语汇进行讲解,将有助于儿童增加学习经验,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

(二) 丰富活动形式,注重启发探究

杜威的“经验主义”、蒙台梭利的“蒙氏教育”、卢梭的“自然教育法”等,都提倡尊重儿童,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让儿童自主探索。早在1899年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创立之时,便明确了“以儿童为中心,鼓励儿童动手触摸”的新理念。引导儿童参与其中,是激发儿童主动探究兴趣的基础。荷兰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曾说“参与”将是2000年前后博物馆行业的第三次革命。2010年,妮娜·西蒙(Nina Simon)在《参与式博物馆》一书中提出了“参与式博物馆”的概念,其核心是创造、分享、互动、交流^{[8]7-9}。区别于学校教育,博物馆教育具有空间开放、资源丰富、实物教学等特点,利用博物馆资源,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体,通过参与式的自主探究和学习,可有效激发儿童博物馆学习的兴趣。

博物馆教育手段的非强制性可以满足不同儿童的需求,当前场馆教学模式可划分为“参观+任务单”“引导+体验”“探究+发现”3种模式^[9],对儿童采用后两种场馆学习方式更为有效。可以设计一些能够鼓励儿童自主学习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引导儿童通过观察产生兴趣,通过实践探索与展品产生关系,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和交流,收获新的经验,最终对人类文化产生新的认识。

(三)明确活动目标,合理教学评价

学习目标对活动开展具有导向作用。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即使是就同一事物,其学习目标也各不相同。在活动开展前,活动设计者应对参与者加以充分了解和了解,对儿童进行年龄划分,设定不同的学习目标,依据学习目标的不同,合理调配场馆资源,以便帮助儿童达到学习目的。

学习评价的目标在于优化学习过程,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和进步,它包含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学习评价应直接指向活动所存在的问题,并反映出活动目标是否达成。通过学习评价,能够帮助活动设计者完善活动过程,更加注重过程中对儿童的启发和引导,同时也能积极引导儿童开展持续性的学习。博物馆教育活动主题、形式不同,其活动评价的方式和指标也各不相同。早在2000年,英国“场馆研究中心”联合“兰斯特大学”场馆委员会,共同研发了“一般学习理论”(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 简称 GLO)^[10]⁷⁹,该理论涵盖了场馆学习的各个方面,可概括为5个维度:知识与理解,技能,态度与价值观,娱乐、启发和创新,活动行为与成长,从而实现博物馆学习活动的科学结果评价。Stephen Bitgood 提出“观众测量和专业评估为判断展示是否成功的标准”,观众测量包含观众行为、知识获得、情感测量3个维度,专业评估则是从观众观点、美学观点、内容观点3个维度进行评估。我国针对场馆教学活动的的评价仍处于探索状态,优化场馆教育活动的评价体系能够吸引更多的儿童走进场馆,进行持续性学习。

开展公众教育是博物馆的责任之一。当前儿童场馆教育活动必须充分地、科学地利用场馆的

文化资源,创设适宜的学习情境,在了解展品特色、明确主题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分众设计,确立教学目标,并引导家长在活动开展前协助儿童做一些学习准备。活动开展过程中,给予儿童探索和尝试的空间,选择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学习方式。活动结束后需要进行学习评价,不论是学习过程中的评价或是最终学习结果的评价,其目的都是以评促教,优化博物馆学习活动,让儿童能持续性地参与博物馆学习。在人们愈发重视儿童教育的今天,博物馆应提供更多科学的学习和活动方式,满足儿童和家庭的学习需求,实现文化传承和儿童校外教育的双赢。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01-25)[2020-09-08].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 [2]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4]周婧景.博物馆儿童教育儿童展览与教育项目的双重视角[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5]赵冠群.故宫博物院中的皇家文化与博物馆文化[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
- [6]李宏复.试论文化选择与博物馆教育[J].中国博物馆,1992(4):64-65+70.
- [7]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M].王承绪,赵祥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8]柏安茹,王楠,马婷婷,等.我国博物馆教育课程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7(4):86-93.
- [9]妮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M].喻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10]王乐.馆校合作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责任编辑 师 语)

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内涵、价值与目标*

朱家珑

(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09)

[摘要] 阅读素养是“学会学习”核心素养中的重要元素,也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关键要素。新时代指向素养养成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变革必然会对语文教学与指导提出新挑战。聚焦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建构是应对语文教学变革新挑战的有效选择,需要从内涵层面引导学生明晰阅读素养养成的边界,从价值层面培养学生形成阅读素养提升的理念,从目标层面引领学生把握阅读素养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素养养成; 学生语文阅读; 指导支持系统建构

[中图分类号] G62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36-05

当下,指向素养养成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变革必然会对语文教学与指导提出新挑战。无论是个人发展还是民族进步,都与每个人的阅读素养有着紧密联系。正如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IRLS)认为,“阅读素养是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能力”^[1]。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主要渠道,是学生精神发育和素养养成的必然选择。为此,我国自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把全民阅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然而,理性反思当今常态阅读状态下存在的功利化、被动化、无序化、低效化、碎片化,甚至庸俗化、浅层化等现实问题,正视少儿阅读存在的问题与困难,都呼唤着既要通过创编适合少儿阅读的优质作品提高少儿阅读的整体水平,又要通过建构符合少儿特点和阅读规律的指导支持系统,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与素养。本文拟从内涵、价值、目标三个维度阐述体现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的建构,以就教于各方同仁。

一、内涵要义:引导学生明晰阅读素养养成的边界

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建构

研究,需要在厘清相关核心概念与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与把握其中的关键内涵要义,是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者形成自觉实践行为的重要前提。为此,需要重点厘清以下三个关键词的边界:

1. 素养养成

这里主要是指语文阅读素养的养成,反映中小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学识、能力、技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语文阅读素养的核心要素,具体体现在以“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为核心,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能力、学习习惯、语感体悟以及思想观念、思维能力、审美情趣、文化品位等有机整合的语文修养上^[2]。倡导在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身心、学习特点及语文阅读课程教学属性的基础上,重视对其习惯、方法、积累、体悟、应用等语文阅读素养渐进的、沉浸的、滋润的养成型学习方式。

2. 学生语文阅读

这里是指中小学生学习主体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学生阅读的要求,既包括“课标”的规定

* [基金项目]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二期重点课题“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7JK12-ZB39)。

[收稿日期] 2020-09-16

[作者简介] 朱家珑,男,江苏扬州人,国标本苏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主编,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性阅读,也包括自主的拓展性阅读。它是学生读者对读物的认知、理解、吸收和应用的复杂的心智过程,是学生依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文本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创造信息的自主建构过程,是学生的知识经验、思想观念、情感体验、意志品质的学习过程。阅读的本质是学生根据文本中的语言符号理解其精神内核,即以作品为媒介,借此体验、感悟和理解作家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和思想。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是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语文阅读是学生语文学习的主体与重心,对于发展学生智力、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指导支持系统的建构

这里是指学生阅读的指导支持系统的建构。紧紧围绕语文阅读课程教学目标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个包含目标体系、操作体系和保障体系等基本要素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的整体。

(1) 目标体系是指通过研制《中小学生语文阅读层级发展纲要》,指导学生进行优质、高效阅读所应分别达到的基础性、发展性和创新性的层级目标。

(2) 操作体系是指为达到目标而体现在指导支持学生进行生态阅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具体包括阅读观念、动机、兴趣、习惯、规划、策略、范式、体验、鉴赏、探究、素养提高等方面的指导支持。

(3) 保障体系是指为了使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有效、可持续运行所采取的关于导师优化、资源开发、互动平台和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以有利于提高学生语文阅读的质量和素养,使学生成为真正“愿读、乐读、会读、善读”的学习者。

二、价值认同:引发学生形成阅读素养提升的理念

基于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建构的前提,是在弄清楚“学生阅读指导支持什么”“如何进行学生阅读指导支持”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晰“为什么指导支持学生阅读”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此,亟待语文教师高度认同以下三个方面价值:

1. 凸显阅读指导支持旨向落地语文课程标准价值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学生应“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和“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同时强调:“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应加强对阅读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应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3]很显然,《语文课程标准》对于指导支持不同差异学生有目的、有方法、有个性、有效益地进行语文阅读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建构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无论是宏观理念层面还是微观操作视角,对于全面落实《语文课程标准》,适应核心素养时代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的挑战,丰富和发展我国语文阅读课程、阅读教学和学生阅读指导的理论和实践,引导学生学会阅读方法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2. 凸显阅读指导支持促进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价值

建构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的终极目的是发展学生的阅读素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观点:“阅读素养是指学生为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增长知识、发挥潜力以及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运用和反思书面材料的能力。”^[4]可见,发展学生的阅读素养直接关系每个学生的现实学习与未来成长,尤其是学生精神力量的获得和培育。虽然学生阅读素养的养成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但是它一旦形成便会慢慢积淀,伴随学生一生,并发挥其独特的促进学生持续发展的功能。为此,本课题组通过开展教师阅读指导支持与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相关因素的调研测试,发现教师较多的策略指导支持包括:字词释义、整合信息、主题提炼、梳理结构、灵活语用、习惯读法等,较少对学生

进行如:反思体悟、创意联想、个性理解、审美评鉴等指导。交叉分析表明:将常常接受教师阅读指导支持与不常接受阅读指导的学生的阅读能力测试得分相比较,前者远远高于后者。这充分说明,强化教师对学生阅读的指导支持对学生阅读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只有语文教师注重在学生课内外阅读活动中加强阅读指导支持,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阅读观念、行为、方式和风格,使其掌握适合自己的阅读策略与方法,才能不断提升不同层次学生的阅读素养。

3. 凸显阅读指导支持变革学生语文阅读方式的价值

通过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建构的实践研究,有利于在新一轮落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语文阅读课程教学变革中突出语文阅读领域的实践方式变革。从学生语文阅读与指导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理性反思阅读教学中方法过于单一,机械地为学生布置阅读任务,过于注重阅读教学与教材的进度,忽视学生阅读的兴趣;一味注意学生阅读的统一性,忽视学生阅读的个性;过于强调指令性,忽视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对学生阅读干预得太多,常以教师自己的分析、讲解直接告知、灌输,代替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等倾向。因此,积极探寻应对具体阅读与指导问题的实践操作策略与方法,着力构建体现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的、具有校本个性的实践操作方式,是每一位学生阅读指导支持者的责任。它有利于充分发挥语文教师的核心指导作用,使教师通过个体阅读修炼,不断提升教师对学生语文阅读规划设计、阅读资源选用、阅读体验策略、阅读探究意识、阅读个性评鉴等方面的指导力,进而创生体现个体阅读指导特质、优势和风格的实践方式;更有利于教师具体关注学生阅读兴趣、规划、习惯、方式、积累、建构、体验、鉴赏、转化、应用等方面指导支持的实践操作形态,如:尝试低年级学生趣味性阅读指导、中年级学生累积性阅读指导和高年级学生赏析性阅读指导方式的实践探索,有效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

三、目标建构:引领学生阅读素养分级发展的方向

指向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的整体建构需要高度重视目标系统的准确定位。

它是指导支持学生语文阅读的灵魂和方向标,也是有效引领学生语文阅读素养分级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类目标:

1. 学年段学生语文阅读分级目标建构

有效引领学生语文阅读素养的养成与发展需要明晰不同学年段学生语文阅读分级目标的具体定位和要求,力求在目标层面给予不同学段学生的语文阅读以针对性的指导支持。为此,本课题组通过研制《小学生语文阅读层级发展纲要》,旨在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心智发展、阅读兴趣、习惯、能力等特点,拟定“分级阅读目标(标准)”给学生“读什么、读多少、怎么读”的健康指导。

(1) 第一学段学生语文阅读目标的设定。这需要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心智发展特征确定语文阅读能力层级发展的要求。如:依据这一学段学生“语言能力迅速提高,词汇量增加。与幼儿时期相比,开始主动借助学习过的词汇进行阅读,对图片的依赖逐渐减少,能够结合文字阅读获得信息”的心智特点,要求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体现“逐字逐句阅读,能适当断句,能结合图画阅读儿童读物,能根据上下文了解关键的词语和句子的意思”。“知道文本大意,明了文本的感情基调。在阅读过程中能进行情节的简单推断,能分辨真实与想象的世界”等目标。这就可以选择符合儿童心智特点和生活经验的读物,读物中的生字和生词率,控制在25%以内。如选择词串识字读本、字谜读本;选择图画优美、故事性强、文字较少的图画书或非连续文本,加注拼音的童话、寓言、故事,如《学做小蜜蜂》《迟到的哈哈猪》等。

(2) 第二学段学生语文阅读目标的设定。这需要根据小学中年级学生的心智发展特征确定立语文阅读能力层级发展的要求。如:这一学段的学生“语言发展由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词汇量增加很快,对词义的理解更加准确,能够做出超越字面意思的语义推断”。这就要求在学生阅读能力发展上设定“能自然、流畅地阅读文本,对语言信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能通过跳读、回看等阅读方法,获得对文本的大致理解;能有选择地回顾文本,记忆关键内容;有初步的归纳能力,能够通过联想和想象补充文本留白”等目标。据此目标可以选择优秀儿童诗和古诗文,使学生领悟诗文大意,如罗青的《写生》、雨兰的《脚印》,李白的《古朗月行》、白居易的《暮江吟》;浅显的哲理故事、中外寓言故事,引导其分辨善恶美丑,如《毛遂

自荐》《高山流水》等;情节丰富、形象生动、语言优美的童话、民间故事和儿童小说,如《小狐狸的花(信念)》《幸福鸟》《郑板桥》等。

(3)第三学段学生语文阅读目标的设定。这需要根据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智发展特征确立语文阅读能力层级发展的要求。如:遵循学生“能进一步扩展自己的词汇量,句子由无修饰到有简单修饰语,再到有复杂修饰语”“表达更有条理,能以适当的语气、强调表达自己的情感,开始对语言文字形成自己的审美判断”等心智特点,确立学生阅读能力发展的“能学习运用多种不同的阅读策略,阅读篇幅更长、更复杂的文本”“阅读叙事类作品,能更多地注意故事结构和文学形象,能结合作者和作品的背影诠释文本主旨。能联系生活经验与文本对话,获取独特的阅读体验。能辨别语言的感情色彩,品味文字的表现力”等目标,并可以选择具有生动场景、人物、细节的中、长篇小说,如《中国神话故事》《三国演义》《世界为谁存在》等;奇幻历险、侦探推理类读物,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分析推断能力,如叶永烈的《科学家故事 100 个》、安东尼的《小王子》等;有关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读物,如《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故事》、史雷的《将军胡同》等。

2.指向素养养成的语文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

在《小学生语文阅读层级发展纲要》的指导下建构不同学段学生语文阅读的分级目标,是指向素养养成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支持系统整体建构的基础。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指导支持中积极寻找语文素养落地的力量是每位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也是建构阅读教学指导目标的核心取向。这就需要基于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在核心素养引领下突出语文阅读教学具体指导目标的建构,并着重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1)基于素养的各类文本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学生语文阅读素养是一种通过各类文本阅读来获得知识、积累语言、体验语感、养成习惯的修炼,是一种体现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阅读书面文本材料,有效识别、理解、阐释、创建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指导支持就是需要依据国标本小学语文统编教材范文体系,精选写人、记事、咏物、绘景、说明、寓言、散文等文本,引导不同学段的学生在阅读实践中,从目标到方法等层

面将语文阅读素养有效落地,而探究指向素养的不同文本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就显得十分重要,直接指向不同学段学生阅读不同文本所应达成的目标层次。

正像本课题组的相关成员在探索景物类文本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时,注重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分别“从激发兴趣、朗读想象、整体感知、品析词句、体会情感、学习表达等方面展开,并且每个学段的教学侧重点不同,第一学段以兴趣激发、朗读想象和词语积累为主要目标,第二学段以整体感知和理解词句为主要目标,第三学段以赏析词句、体会情感和学习表达为主要目标”^[5]。如在设计低年级《夕阳真美》阅读教学指导目标时,重点关注:引导学生善于发现文章写的是傍晚太阳的西斜、下沉、落山;学会在关键词句品析中理清夕阳变化的顺序;能够联系爷爷的话体会观察夕阳的感情等阅读目标。力求突出学段的特点,使阅读教学的重点更加突出,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发挥其朗读想象,学会累积词语与方法,发展学生自主阅读的能力和素养。

(2)基于素养的群文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核心目标指向是要求学生基于多元文本所提供的主题情境,通过阅读理解、梳理加工、表达交流和综合运用等学习过程,对文本意义进行解读、评判和阐释,创造性表达个人观点、情感和态度,形成语用能力;感知和理解文本意义,获得积极的价值观;学会处理和加工信息,发展思维能力。群文阅读是依据国家语文统编教材的特点,通过聚焦不同的阅读主题,实现由单篇走向多篇阅读、由课内联通课外阅读,使其成为一种体现选择性、整合性、探究性特征,努力建构统整式语文阅读生态,丰富学生语文阅读实践体验,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阅读教学新方式。为此,建构群文阅读指导目标需要坚持以国家语文课程为核心,通过将现有语文教材实施的目标、内容和要求整合与拓展延伸,引导学生经过多元文本的链接阅读,有效整合阅读情境、内容、方法和资源,学会拓展联系、比较差异,并关注不同文本的语言风格、意义建构、结构特点及写作方法,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阅读素养。

因而,这种阅读教学方式中的群文组合并非随便选择或简单累加,而是紧紧围绕阅读主题,贴近教材的范本,符合学生的学情,体现积极意义的彼此关联的群文。如有教师在围绕“二战”题材

《半截蜡烛》进行群文阅读教学时,指导学生集中阅读的选文有《鸟儿街上的岛屿》《汉娜的手提箱》《数星星》《铁丝网上小花》《凯奇的包裹》《弹子袋》《安娜的新大衣》《1937 少年夏之秋》《小王子》等。同时,确立的阅读指导目标为:①运用浏览的方式了解故事梗概,简要说明分别写的什么事情;②比较阅读这些作品,理清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相似之处;③把你最感兴趣的一部作品推荐给其他同学,并写出推荐理由^[6]。教师分别从丰富阅读内容、拓宽阅读视野、优化阅读品质、学会阅读方法、提升阅读素养等方面整体建构群文阅读指导目标。

(3)基于素养的整本书阅读教学指导目标建构。随着国家语文统编教材的全面使用,整本书阅读的要求已由原先的学校课外阅读纳入常态的语文阅读教学系统之列。整本书阅读既是国家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的现实要求,也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教师坚持在大语文观倡导的整本书阅读理念引领下,通过构建不同学段学生整本书阅读目标系统,有效引导学生从有限的语文课内阅读走向更为广阔的课外空间,从零碎的单篇短章阅读走向群文、走向整本书的主题化的系统阅读,从而使学生产生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更为持续的阅读兴趣、更为自主的阅读习惯。整本书阅读作为学生扩展课外阅读的一种有效方式,迫切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的目标、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悉心指导,着重体现在帮助学生突出阅读重心,启迪学生读思结合,引发学生深度体验,从而避免学生陷于为了完成任务而读的茫然状态。

因此,在建构整本书阅读指导目标时,力求既要遵循课程标准,关注学生特点、兴趣和能力,分学段和层次设定目标,如:低年段,学会观察,乐于表达,会讲故事;中年段,学会积累,乐于分享,会做小报;高年段,学会运用,乐于讨论,会编剧本;更要有明晰的“发展语言、锻炼思维、丰富体验”素养引领取向。如:有教师在进行六年级《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整本书阅读指导目标建构时分别凸显

了三类目标:一是语言发展目标,即了解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特点;了解真实背景下虚构小说的特点;用阅读日志记录阅读时对人物、情节的想法和对新的或有趣字词的理解。二是思维发展目标,即通过互联网,略读有关二战的真实的历史信息;有依据地推测人物的心理,比较自己与他人的想法和意见;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能根据问题提取信息,分析和评价人物及相关事件。三是文化体验目标,即了解二战期间德国的人民和军队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了解犹太人在二战时受到的迫害;了解纳粹集中营的一些事情,初步了解种族主义,并与真实生活建立联系^[7]。这样的目标导向体现在:语言方面通过认知作品中的字词、句子、结构、语法和修辞等,吸纳自己喜欢的语言,并在习作、日记中尝试运用;思维方面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整合、比较,提升提取信息和评价、综合、鉴赏、创造等方面的能力;体验方面通过体味作品的语言情境,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加深学生的生活、文化和情感体验。

[参 考 文 献]

- [1]温红博,辛涛.阅读素养:孩子面向未来的基础能力[N].中国教育报,2011-03-17(8).
- [2]朱家珑.“语文素养养成”:语文教科书深度开发的核心视点[J].江苏教育研究(A),2017(5):46-51.
- [3]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4]文军庆.中小学阅读素养的真实水平及提升路径——基于5695名北京市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及相关因素的调研[J].中小学管理,2018(10):49-52.
- [5]张军.景物类文的学段目标重构与教学策略优化[J].教学与管理,2019(4):39-41.
- [6]曹文兵.“学习任务群”背景下的小学群文阅读实践[J].人民教育,2018(23):65-68.
- [7]彭秀兰.整本书阅读指导应关注目标、过程和评价[J].小学教学参考,2019(1):25-26.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书院传统的价值意蕴、育人内涵与现实影响*

王冬美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编辑室, 江苏南京 210036)

[摘要]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机构和教育组织形式,融教育、教学及研究于一体,并由此发展为独特的书院传统文化。将书院传统置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教育改革等视域中,探寻其价值意蕴,深入梳理其育人内涵,找寻书院传统与当代学校文化改革的契合点,实现对当下教育改革的意义指导。

[关键词] 书院传统; 价值意蕴; 育人内涵

[中图分类号] G62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41-04

书院始于唐初,终于清末,共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知名学者钱穆先生曾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集教育、教学及研究于一身,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传承与创新,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书院文化,并由此发展为传统教育的优秀典范。近几年,书院传统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再度兴起。书院传统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哪里,书院传统的本质是什么,当代学校如果借鉴书院传统,可以从哪些视角加以继承和发扬,本文拟就此做些探讨。

一、视域:书院传统的价值意蕴

书院传统再度兴起,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必然选择。当我们把书院传统置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教育改革等视域中加以审视,其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就会逐渐凸显。

1. 书院传统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大批量生产、效益至上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带给教育的影响之一是出现了班级授课制。班级授课制的优点表现在大规模的教学上,这种方式扩大了单

位教学能量,促使全体学生共同前进;缺点是忽视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有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求知仅是发展一个完整的“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非学生学校生活的全部任务。当今社会,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强势输入,使得少部分人的民族自信力下降;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以班级为单位,将应试作为主要目的,工具性日益突出,导致出现教育目标功利化、课程设计狭窄化、教学过程简单化、学习方式僵化、师生感情日益淡化等问题^{[1]234}。人们力图从传统教育中发掘资源、汲取智慧,以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这一视角来看,书院传统蕴含深远的社会意义,研究书院传统,对理解当代教育,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书院传统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在教育目标上,书院传统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注重内在品质的完善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以期达到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正是有了这一目标的指引,书院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比如,尊师重教,培养融洽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统,崇仰先贤先圣的人格;扬弃门派,倡导学术自由;重视道德,强调修身明理,等等^[2]。在长期的发展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书院文化对新时代江苏中小学特色办学的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D/2020/02/82)。

[收稿日期] 2019-10-19

[作者简介] 王冬美,女,江苏海门人,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江苏教育》教育管理编辑室主任。

中,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魅力与价值与日俱增,尤其凸显儒学文化的传承,强调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可以说,书院作为儒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在传承儒学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才培养、传承文化、教化人生和繁荣学术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书院传统在教育改革中的影响

书院传统赓续儒家的价值追求,强调学习的目的旨在晓喻道理、修习身心。《礼记·大学》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儒家把“修身”视为人生的发展起点。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写道:“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务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书院传统强调“修学”与“修身”的统一,这与当今“主张知识的习得与核心素养的培育”的教育改革导向相一致。纵观近年来国家颁布的有关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文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系统推进育人方式等工作成了重中之重。如果将书院传统置于教育改革的视域中,就会发现其中的教育元素与当下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有一定的契合。显然,研究书院文化中蕴含的教育价值能给当今教育改革和学校发展带来积极的启示。

二、本质:书院传统的育人内涵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书院传统的育人内涵进行了界定。归纳起来,大致形成以下四个视角。一是德育观。这种观点认为德育是儒家的核心。书院传统蕴含丰富的德育内涵,具体表现包括人伦、孝悌、诚信、立志、义节等方面的教育。研究者邱小云、黄海珍认为,各书院均把“明人伦”放在德育首位,人伦是道德教育的根基,孝道是立德的根本,诚信是道德个体的道德规范及为人处世的原则。而立志教育是培养志存高远、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关键,义节教育则是个人修身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标志。二是导师制。这是当下研究书院传统的学者极为看重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看来,导师的素养就是极好的课程资源。学者钱穆在《新亚学规》中强调,“课程学分是死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学生不仅要注意课程,还要重视每一个师长。”之所以推崇导师制首先在于每一位导师都有为学之法、治学心得。导师的治学心得源于毕生的教育实践,对具体、复杂的学习情境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价值。比如,朱熹在《白鹿洞揭

示》中明确提出修学“四要”:修身之要、接物之要、处世之要、为学之要。身为导师,要提炼形成自身的治学之道,更要“以身垂范”。这里的“垂范”不仅指导师要“传道、授业、解惑”,还强调导师要在治学精神、为人处世等方面为生徒树立榜样。梅贻琦先生对师生之间的关系发表过观点,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美好的“从游关系”将会给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三是自我习得观。该观点强调的是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感悟与提升。《论语》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宋朝朱熹指出,“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3]95}。这些论断的背后都蕴含着学与思相结合的哲理。书院传统尤为注重自我习得,要求学生从独立思考到群居切磋,再到自我反省。学生只有敢于质疑,才能习得“正解”,获得真知。在修学实践中,书院传统强调学生要把“自治自律,自省自悟”作为自我提升的准绳。四是场域观。该观点认为教育可以借助物型文化的塑造,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书院传统借助物质形态呈现陶冶和熏陶功能,具体表现在注重自然环境的选址、规划布局的设计、内外设施的陈设等方面。书院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教育因素,对生徒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感染生徒的思想道德、行为方式和伦理观念。人置身于寓教于游息的氛围中,定能存心养性。因此,书院在选址上注重山水环绕、清秀宁静,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强调多种院落天然组合。这样,书院虽然封闭,但其整体环境开敞,二者结合,更能反映书院教育的特点^[4]。

综合来看,学者们强调的书院传统育人内涵主要指向两个基本特质:深度理解和实践创新。深度理解指向当代教育对书院文化传统中的教育元素的理解;实践创新指向书院传统给予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促进当代学生的德育发展与创新,加强教师的自我修养,营造适合学生成长的校园环境等方面。

书院传统再度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焦点是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即致力于解决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当下学校教育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师生交往

目的单一,关系疏离;二是教师忽视学生个体发展,个别交流不足;三是学校环境布局逼仄,开放度不够。就第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言,学校教育空间逼仄又会引发诸多问题。首先是结构相对封闭,导致变通性降低。室外,“长外廊串联普通教室”的空间结构使得实体界面分隔,导致学生的社会性活动局限在一些固定的小空间里;室内,长期保持固定的形态和“样板式”的结构模式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影响了师生产生奇思妙想的可能。其次是空间的复合型功能创设不足。学校的教育空间一般按功能进行划分,也就是所谓的“一室一能”,这就导致各功能室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失去了空间主体的时序动态变化性,“一室”不能“多能”的状态让学生的学习活动不能即时发生。再次是过度强调空间规训,限制了自由平等的张力。在学校教育空间中,规训化的教育措施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强化了教育规训权力的存在^[5]。

我们可以分别从德育、场域、实践等三个维度来把握书院传统的育人内涵。

一是在“修德”行为中涵育德性。长期以来,传统书院被视为儒家传道授业之地,德育始终摆在了书院教育的首位。朱熹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书院教育对道德品质的重视。自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将德行的修养置于重要地位。书院传统旨在传承、复兴儒家文化,以修己至诚之道履行读书人的职责。

二是在“修学”实践中提升自我。在学术研究中,书院倡导的是自由与创新,常以讲会、以友辅仁等方式来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就治学而言,明朝王守仁指出:“学问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学习主体在自身的学习过程中要注重自我感悟与提升。其中,阅读是形成思辨力的重要方式。学习主体在与文本的对话中,形成阅读的态度和质疑的勇气,树立探寻的勇气和求是的精神,从而在“修学”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高素养。

三是在“修身”场域中营造育人氛围。在当下的教育界,“以物化人,以人化物”已然成了共识。学校教育将教育空间视为“凝固的文化”,关注置身其间的学生素养能力的提升,借助物理环境和空间的合理设计建立起具有教育意义的空间秩序,将知识与见识的物态造型作为载体加以呈现,

使其具有育人价值。比如,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甚至是题满标语的走廊、步道、墙角等都是场域里的课程资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发展。学校在空间环境的打造中,要充分借鉴书院模式,发挥环境的育人作用。

三、实践:书院传统的现实影响

书院传统中有哪些教育模式可供当代学校借鉴?无疑,答案的呈现是多元的,而其中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和谐笃厚的师生关系、自由创新的学术氛围、自然优美的校园环境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更偏重于书院的建筑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等方面。当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正在推行,书院传统中的诸多教育元素以及文化优势都值得当代学校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有选择性地传承发扬。

1. 树立德才兼备的人才观

古代书院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还格外看重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并以书院精神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强调养成深厚的道德关怀与道德修养。这些优良的教育传统能启迪当代学生的德育。“以文化人”“转识成智”促使学习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推进育人方式。自此,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得到高度重视。在德育课程内容设置上,立德树人、以德为先成了课程设置的依据。新时代,学校教育应把培育学生的道德品质、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操作为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道德目标。

2. 形成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从古至今,尊师重教一直都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古代书院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倡导“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追求“为己之学”。书院导师制在实施的过程中,倡导力行亲密晤谈的方式,强调个别指导的策略,尤为推行亦师亦友的交往关系。师者,先为“修学”导师。他们不仅拥有为“学”之法,修学心得,还贵能“垂范”治学之道。从这个视角来看,导师不但履行了传统意义上教师的职责,如“传道、授业、解惑”,更能给予学生以治学精神、为人处世方面的示范。在当代学校教育的多重关系中,师生交往是其中最基本的教育关系。师者,继而为友。尊重差异,彼此关

怀;以友辅仁,相互砥砺。个性化的沟通更易于导师找到学生的学习动力点及最近发展区,定制个体预案。

3. 营造自由创新的学习氛围

书院教育倡导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应将学生置于轻松自由的氛围中,师生进行亲切的晤谈。教师在潜移默化中施行个别化的导学;学生自主学习,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并逐渐发展成融讲学、自修、精研紧密结合的教育方式。书院学术的自由创新氛围充分体现在讲学的自主权和学术的交流上,允许各学派相互争辩、探讨学派之间的不同主张、发扬本学派的学旨,进而兼取各派所长,相互促进。讲会制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书院经常举办讲会活动,邀请或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共同探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现当代学术研讨会的主旨精神极为相似。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学术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当代学校在推进教育改革、促进以德育人的同时,更要倡导人文关怀,积极营造学习氛围,引导学生经历一种幸福完整的学习生活。

4. 构建隐性育人的校园环境

环境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能感染人,还能使人心情愉悦,萌生与自然互动的愿望,提升人的道德素养。从空间视角来看,书院教学空间与生活空间具有同一性。师生长时间共同生活,随时切磋学问,这样的方式既能使师生感情相融,又能使其精神相契,真正实现教学相长。因此,校园环境的打造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充满“润泽”的公共空间,还是一门“空间诗学”、一门隐性课程。在充满人文素养的校园环境里,学生的能力素养发展成为目标,知识与见

识的物态造型成为载体,人与物的在场互动成为教学形态的综合课程。物型环境成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回归认知原点、实施立德树人、建设美丽校园的时代创新和教育表达。

学校环境力图让置身其中的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具体包括物型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物型环境指的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有形的物态环境。其中的建筑造型和空间布局不仅折射出校园内的人际和谐度,还体现出学校的办学思想和价值追求。文化环境是学校工作的载体,凝练学校的人文底蕴,培育学校的精神特质,促使学校形成自身的办学理念。制度环境指的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管理制度及规范体系。制度环境的建设要体现学校管理的人性化,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邓洪波,赵子龙.中国书院的历史与传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于凌珊,朱秀民.中国传统书院文化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与启示[J].黑河学刊,2020(2):136-138.
-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4] 孙双影.从古代书院建筑看未来学校建筑设计趋势[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62-163.
- [5] 辛晓玲,付强.学校教育空间研究的现状与趋势[J].当代教育科学,2019(4):39-44.

(责任编辑 秋 阳)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整体性建构

刘素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办好新时代思政课、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的迫切任务。构建深度融合的“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实现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等多种实践方式优势互补,能有效破解当前思政课多重实践互不兼容、学生敷衍应对的困境,有效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 高校; 思政课; 实践教学; 三维融合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45-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大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1]。这一重要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运用,也为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以学生的亲自参与和深度体验为核心,对课堂教学内容真理性进行验证,对教材知识体系价值性进行还原的实践指向性和教学意向性活动。思政课实践教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实践教学基于场所的不同,从教学场域上与课堂教学相区分,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实践教学;广义的实践教学基于功能的不同,是指除了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与实践相关的教学方式,可以是课堂内,也可以是课堂外^[2]。本文研究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属于广义的实践教学。

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渠道,肩负着理论武装、价值引领、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3]。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提出,思政课要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下提升思政课实效性的现实选择。

1.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性质决定了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其目标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输,更在于塑造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承担着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高校思政课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需要关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尤其要通过强化实践教学,使思政课教学由知识传授、理论教育真正转化为大学生的能力提升、价值认同和信仰坚定,实现其“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

* [基金项目] 2017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新时期师范院校师范生师德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7JSJG264)。

[收稿日期] 2020-09-15

[作者简介] 刘素梅,女,江苏建湖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

在思政课“立德树人”过程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犹如车之双轮,必须一体推进。理论教学的主要任务是阐释知识的真理性,解释真理“是什么”;而实践教学重在弘扬真理的价值性,揭示真理“怎么样”。思政课理论教学为实践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学的有效延伸和有益补充,二者有机结合,对于促进大学生的思想认同、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改革创新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升思政课实效性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与针对性是思政课教学的努力目标和工作难点。而思政课实践教学因其在提升教学实效性方面的突出表现,已经成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重点。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

(1) 思政课实践教学缺乏制度保障。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在宏观制度建设及经费支持等方面已经有了系统全面的保障。然而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推进过程中,由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学校或学院层面还缺乏较为完善具体的制度保障,尤其在实践教学的指导、评价、考核等方面缺乏具体的规定,不能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有效开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依据。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具有其特殊性。专业课实践性课程通常包括实验、实习等内容,作为独立课程通常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保障,涵盖培养方案、教学进度、指导教师、经费支持等方面。而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嵌入思政课程的一部分,自身缺乏相对独立性和系统的规章制度。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思政课实践教学覆盖全体学生,具有规模庞大、专业复杂、形式多样、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相对专业课的实践教学而言,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实施过程中更需要加强监督与管理,需要强大的制度支撑与保障。

(2)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形式比较单一。高校思政课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哲学、法律、历史等各个领域,相应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形式也应多种多样。然而,由于组织难度大、安全风险系数高等客观原因限制,目前思政课课外实践教学往往以参观、调研等较为分散的校外实践活

动为主,或者把一些实践教学内容与校园活动简单结合,要求学生在活动结束后提供一份实践报告作为评价依据,形式单一。

(3) 思政课社会实践教学不能覆盖全体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覆盖全体学生。然而,由于受出行安全、基地接待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高校很难保证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全体学生走出校门进行社会实践。对此,需要改变以课堂实践为主的传统模式,不断拓展实践教学的空间场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化的参与形式,从而解决学生参与程度较低的问题,提高实践教学的参与度。

(4)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效果难以呈现与评估。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的呈现和评估一直是思政课教学管理中的难题。一些思政课教师囿于客观原因,布置完实践教学任务后,不能给学生具体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导致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教师“教”和学生“学”之间存在脱节现象。如果说课堂实践总体上较容易呈现和考评的话,课堂之外的校园实践和社会实践则面临着实践教学效果难以呈现与评估的困境。在传统的实践教学,教师一般会为学生提供实践主题指南以及实践报告格式要求,至于学生是否真正进行调研、如何具体开展调研、调研效果怎样以及调研成果是否在研究报告中有效呈现等,都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和考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

总之,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面临的困境制约了其实效性的提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创新完善,使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内容上更加具体鲜活,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样,使思政课实践教学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方便学生参与,使其真正成为思政课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主渠道的作用。

三、“三维融合”: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办好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必须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基于“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三维立体”实践教学模式,能够实现多种实践方式优势互补,使各类实践教学活动有各自不同、大致稳定的呈现方式,对实践教学成果可以进行总体客观的评估与界定。

1. 构建“三维融合”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思政课实践教学必须与课堂理论教学有机融合,与校园生活无缝对接,与社会大课堂紧密联系,才能做到不拘泥于理论,不拘泥于教材,才能在最广阔的空间与新时代紧密联系,在多重实践中完成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达到思政育人润物无声的最佳境界。

(1)课堂实践。思政课课堂实践是指利用课堂主阵地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增强课堂教学的叙事性和实践性,将课堂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形式有机融合,通过教师讲授和师生互动实现课外或校外实践教学同等效果的一种实践教学形式^[2]。课堂实践具有场域便利、贴近教材、对话快捷等优势,是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模式。

思政课课堂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包括课堂情景剧、辩论赛、微电影、叙事式演讲、社会调研成果展示等。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课堂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形式开展实践。以红色文化进课堂为主题的叙事式实践教学为例,该形式将党史、革命史等理论知识通过红色文化中一个个“故事”生动地传达给学生,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的政治情怀。很多高校所处地区有丰富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学校和教师应对其深入挖掘、充分运用,可以尝试将一系列学生关注、敬仰并触及心灵的红色故事引入课堂,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把枯燥的理论讲深讲透,引发大学生的共鸣,从而有效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与此同时,还可以聘请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担任思政课特聘教师,用身边典型的先进事迹和亲身经历感染学生,不断增强课堂教学的叙事性和实践性,这也是践行思政课建设“请进来,走出去”策略的重要内容。

(2)校园实践。校园实践是将思政课实践内容与校园文化活动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其基本思路是依托校园各类社团组织,将思政课教育内容融入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让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内容上更生活化,在形式上更具感染力,从而有效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存在着“两张皮”现象。突破这一瓶颈,有效整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发挥好思政教

师队伍与辅导员队伍的合力,既是“全员育人”的要求,也是提高思政课实效性的迫切需要。

高校思政课与校园文化活动在本质上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二者可以有机结合的内在依据。思政课实践教学在二者之间搭建了桥梁,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思政课的教学形式,赋予思政课实践教学生机与活力,又优化了校园活动的内容,强化了校园活动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以校园实践引领下的社团建设为例,以社团为载体弘扬、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既可以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讲授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精神的直接宣传,也可以通过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学生进行教育宣传;既可以通过网络、声音、文字、图像等媒介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演讲、征文、辩论赛等方式对学生进行身临其境的感染和引导。通过丰富多彩的日常校园活动可以让学生对思政课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更好地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重任,促进思政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社会实践。“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501}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实践是将抽象理论具体化的重要途径。社会实践是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中与社会联系最紧密、实践空间最广阔、实践对象最广泛,同时也是管理难度最大、推广难度最大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方式。作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形式之一,社会实践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在最广泛最深入的程度上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无缝对接,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加深学生对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但受主客观条件限制,社会实践也是推进难度最大的实践教学形式,需要在深化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2. 构建科学化、系统化的思政课实践主题

科学系统规划思政课实践主题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核心内容,实践主题的确定是否科学合理不仅决定着实践教学的成效,更决定着思政课立德树人目标能否实现。实践教学主题的确定应考

虑以下因素:

(1)以课程为单位,系统规划思政课实践教学主题。思政课实践教学设计要以课程为单位,与教学中的重难点有机结合,在体现课程差异的基础上形成课程之间的有机统一。任课教师应将课程教学内容分为若干专题,特别是列出教学的重点、难点,进而精心设计适合学生实践的系列主题。基于课程差异,各门课程的实践主题应有所侧重、突出重心,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聚焦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不屈不挠的斗争史,让革命文化入脑入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则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设计实践主题,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立足课程差异,凸显不同课程的实践教学重点,构建立体化的实践教学主题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否取得实效的决定性因素。

(2)结合学校办学定位,立足共性的同时彰显个性。思政课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指引下,思政课教学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民族性等共性特点和要求,回应时代关切。与此同时,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对象是当代大学生,是历史的、具体的个人,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因而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也应结合学校定位、专业分布的实际,突出个性,增强针对性,以不断提升实践教学的实效性。以师范院校为例,思政课实践教学应立足师范院校定位,彰显师范特色,注重师德养成。师德教育与实践覆盖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等不同场域,将思政课的共性抽象内容在实践中转化为个性具体要求,共性融于个性,个性彰显共性,有效提升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3. 积极建设立体化的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立体化的实践教学基地,实现各类教学资源的有效融通,是“三维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成功推广的必要条件。

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流于形式、效果不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缺乏充足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高校应充分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积极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搭建实践平台。

从校内看,在整合现有各类实践平台并列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基础上,学校可量力而行,新建系列主题教育体验场馆,为开展实践教学提供参观、体验等活动场所,以满足思政课部分实践教学任务。

从校外看,高校应利用周边地区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建设一批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主动与附近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接,积极与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区等展开合作,挂牌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这是目前高校拓展校外思政课实践资源最常见的途径。各高校应主动挖掘省内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教学资源,积极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让学生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切身体验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奠定立德树人的鲜明底色。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形成深刻的价值认同,还可以通过宣讲、演讲、讨论、实践成果出版成册等方式将自己的体会、省悟传递给每一位同学。通过深度体验,可以加深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同,其学好思政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将得到明显提升。

总而言之,“三维融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了实践教学在课堂、校园、社会三个层面融会贯通的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通过精选优化实践主题、深挖整合实践教学资源等途径实现思政课实践教学在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生活等层面的紧密联系、相互渗透,有效提升高校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1).
- [2] 马福运,侯艳娜.深度融合:“四位一体”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河南社会科学,2020(5): 118-124.
- [3] 李永生,刘孝林.行走在实践路上的思政课[J].教育家,2019(48):50-5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研究*

刘方涛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苏州 215031)

[摘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校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需要进行积极的思想引导。本文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心理契约的组成维度进行研究,分析心理契约对行为和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心理契约可以划分为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与幸福感和态度行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对幸福感和态度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判断,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心理契约; 思想政治教育; 态度行为; 幸福感; 交易维度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49-04

一、引言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需要进行积极的思想引导”。同时,总书记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关键标准:政治强、情怀深、思想新、视野广、严自律、人格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技术和创新能力的竞争。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重要基地,在新时代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1]。早在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队伍建设方案》,指出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注重顶层设计,突出协同推进和重视教学质量。在国家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环境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为了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态度和行为进行研究显得非常有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高校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人们开始关注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心理契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发展,正确看待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研究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影响机制,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者就开始对心理契约进行研究,直到1985年,大多数学者才认为心理契约包含了雇员和雇主的心理期望。郑华(2019)认为心理契约是员工和组织之间的一种隐形的契约关系,既包含了组织对员工的期望,又包含了员工对组织的期望,心理契约属于典型的双向过程^[2]。李艳(2019)认为心理契约是影响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心理契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员工的不

* [基金项目] 苏州大学2020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38304152)。

[收稿日期] 2020-08-20

[作者简介] 刘方涛,男,江苏连云港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安全感,对员工的行为产生了约束,调节了组织和员工之间的行为,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组织绩效水平^[3]。常虎强(2019)指出心理契约和员工自尊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个体自身的特征会对心理契约产生影响,个体在过往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会对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产生影响,从而促成了心理契约的形成^[4]。肖韬(2019)论证了组织环境、个体特质和心理契约会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知识型工作者的心理契约程度会对自身的工作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5]。寸晓红(2019)认为我国高校教师不同类型的心理契约会对教师行为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同时,个体在心理契约上也存在着典型的差异,不同维度的心理契约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6]。当下关于心理契约的研究还处于多视角的发展阶段,尚未完全发展成熟。本文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契约的组成维度进行研究,分析心理契约对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期望对高校的人力资源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契约模型构建

1. 心理契约的维度构成

关于心理契约的维度构成,学术界目前有二维说、三维说、四维说等。在个体心理契约的构成上,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结构。本文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心理契约时,主要参考学术界关于心理契约的相关研究。赵雪(2019)认为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维度由关系型、心理型和理念型组成^[7]。张培福(2020)认为心理契约由发展型、关系型和交易型组成^[8]。本文在梳理学术界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教师责任感和学校责任的基础上,假设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心理契约为四维结构,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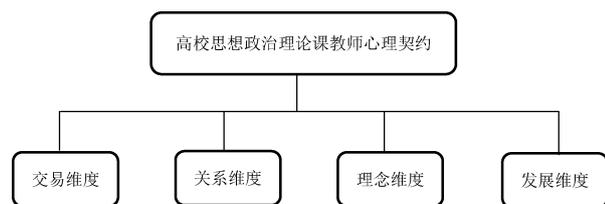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契约

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契约模型构建

通过对心理契约和心理契约相关研究进行分

析,面对教师所处组织环境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是教师心理契约的外在表现。结合教师心理契约的外在表现,假设教师的心理契约程度能够正向影响教师的幸福感。根据社会互惠理论,可以进一步假设心理契约会对行为和态度产生正向影响。在学术界的已有研究中,大多都证实了这种猜想。根据心理契约与行为、态度、幸福感的相互关系可以构建如下模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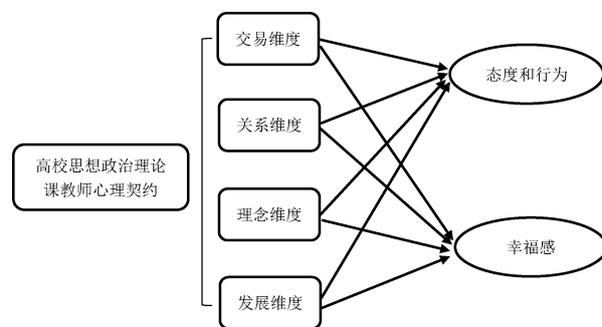


图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契约模型构建

四、实证研究与分析

1. 问卷设计与发放

在心理契约的测量中,从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开发了心理契约的测量量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校责任应包括“经济责任、生活责任、硬件责任、稳定责任、人文责任”五个部分,教师责任包括“教学责任、科研责任、社会责任、辅导责任、道德责任”五个部分,以此为依据编制心理契约的测量量表。高校思想政治教师行为和态度的问卷编制,是通过多个内容的整合而来。个体态度的测量量表包含“组织承诺、组织认同和个体满意度”三个部分,个体行为的测量则包含“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幸福感直接影响到其工作绩效,同时幸福感来源于教师自身对工作内容和工作绩效的认可程度,与心理契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幸福感量表主要包含“工作业绩、科研业绩、收入水平、职业发展”。

将上述量表的组成内容进行汇总,增加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称作为问卷的第一部分。问卷的第二部分则包含心理契约量表、态度和行为量表、幸福感量表,最终形成本文的正式测量问卷。在问卷完成后,将问卷发放至心理学专家寻求专业的修改意见,对问卷进行反复论证修订,再进行正式调研。本文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线上通过问卷

星发放调查问卷,线上调查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弊端。通过委托形式在线下发问卷,保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性。本文调查最终发放问卷 5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76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5%。

2.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似程度,信度系数一般用来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本文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反映问卷的可靠

程度。在统计学上,Cronbach's Alpha 系数大于0.7即可认为信度尚可,适合进行实证分析。对调查问卷进行效度分析,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816,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9]。在效度分析中,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KMO 值为 0.954,近似卡方值为 1 415.814,自由度为 315,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综上,调查问卷通过信效度检验。

表 1 信效度分析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54	Cronbach's Alpha 系数	
	近似卡方	1415.814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315	0.816	
	显著性	0.000		

3.相关分析

将心理契约的四个维度和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交易维度与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604,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交易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488,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判断交易维度与态度和行为、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关系维度与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490,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关系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470,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可以判断关系维度与态度和行为、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理念维度与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437,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理念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547,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判断理念维度与态度和行为、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维度与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为 0.460,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发展维度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403,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判断发展维度与态度和行为、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2 相关分析

变量	皮尔逊相关性	态度和行为	幸福感	交易维度	关系维度	理念维度	发展维度
态度和行为	皮尔逊相关性	1					
幸福感	皮尔逊相关性	0.497	1				
交易维度	皮尔逊相关性	0.604**	0.488**	1			
关系维度	皮尔逊相关性	0.490**	0.470**	0.515	1		
理念维度	皮尔逊相关性	0.437**	0.547**	0.449	0.481*	1	
发展维度	皮尔逊相关性	0.460**	0.403***	0.493*	0.546	0.397	1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回归分析

在证实心理契约与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态度和行为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模型 1 中,R²值为 0.537,在模型 2 中,R²值为 0.557,说明模型 1 和模型 2 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在模型 1 中,交易维度和态度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112,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交易维度对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关系维度和态度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223,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关系维度对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理念维度和

态度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098,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理念维度对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发展维度和态度与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0.109,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发展维度对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模型 2 中,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与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对幸福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可以判断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3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态度和行为	模型 2:幸福感
交易维度	0.112 **	0.109 ***
关系维度	0.223 ***	0.119 **
理念维度	0.098 ***	0.103 **
发展维度	0.109 **	0.112 ***
F	12.382 ***	9.038 ***
R ²	0.537	0.557
△R ²	0.508	0.512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研究结论和发展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心理契约的组成维度进行研究,分析心理契约对行为和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与态度行为及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正且显著,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与态度行为及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回归模型中,模型的拟合优化较好,表明研究结论较为可靠。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与幸福感和态度行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交易维度、关系维度、理念维度和发展维度对幸福感和态度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判断,心理契约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态度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2. 发展建议

经过实证论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心理契约会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发展建议:第一,确保工作任务的公平。工作任务的公平性,比较合适的方式是对工作任务进行适当量化,在较大程度上能实现公平管理,增加教师的心理满足感。第二,关注并督促教师责任的履行。从本质上来看,教师和学校是一种相互交换的关系,高校应该关注教师责任的履行,促进良好交换循环的形成。第三,加强对教师的工作激励。设置合理的激励目标,在教师完成工作任务后给予适当的奖励,提升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李小玲,王建新.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0(4):98-102.
- [2] 郑华.学科交叉视阈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索——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 30 年的研究》[J].高教探索,2019(12):145.
- [3] 李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基于罗洛·梅存在思想的启示[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22):142-145.
- [4] 常虎强.浅谈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教育融合——评《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2019(10):138.
- [5] 肖韬.探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 30 年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9(18):2.
- [6] 寸晓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心理力量”——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2.
- [7] 赵雪.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一体化的内涵与发展——评《思想政治教育人性走向: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一体化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9(5):110.
- [8] 张培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研究——评《其精甚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1):2.
- [9] 张宾州.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0(1):88.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体育类学生 职业素养培养的意义和路径*

刘 彬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安徽合肥 230051)

[摘要] “立德树人”视域下,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培养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性,为“教好书、育好人”,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所需的实用性专技人才,建议可采取的培养路径为: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制定明晰的培养目标;构建科学的职业素养培养体系;革新教学模式与方法,突出实践教学的作用。

[关键词] 职业素养; 立德树人; 体育类学生; 高职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53-0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2017年10月18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9月10日,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贯穿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1]。

总书记把握时代大势,高瞻远瞩、言简意赅地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树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其含义丰富,影响深远。一方面,教师不仅要教书,更要“立德树人”。在以德为先的前提之下,从“育人”的层面上升到“树人”的高度,也就是说要重德强能,力争把学生都培养成为国之栋梁、社会实用性专技人才。另一方面,在“立德树人”的具体实施环节,要围绕“职业素养”为核心内容来进行,凸显“德高技强、全面发展”的职业特色教育,将学生培养成社会急需的高素质专技人才。

一、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意义

1. 有利于促进高职体育类学生的健康成长

职业素养是一个人必须具有的政治觉悟与伦理道德素养,必须掌握基本专业知识、技能等,也涵盖个人未来步入职场、适应职业发展的主动性以及在本专业领域的拓展能力与创新能力等。“立德树人”视域下,以职业素养为核心内容,有利于高职生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因为保障和实现青年学子身心健康水平是当前高职教育的重要使命。首先通过政治觉悟与伦理道德素养的渗透,引导高职体育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跟党走,能够勇敢地克服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挫折,积极进取、开拓人生新境界,践履“奋斗的人生最美丽!”其次,通过规范人才的培养过程,教育高职体育类学生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这是他们未来步入职场,胜任本职工作、实现个人未来职业理想的重要支撑。再次,通过在读期间校

* [基金项目] 安徽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9szjy128)。

[收稿日期] 2020-10-18

[作者简介] 刘 彬,女,安徽霍山人,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

方系统的素质培养,高职体育类学生在本专业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拓展能力与创新能力,这是他们未来主动适应就业岗位的“催化剂”,也是未来稳妥处理职业关系、和谐进行职业交往的“润滑剂”。综上所述,“立德树人”视域下培养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有利于促进高职体育类学生的健康成长。

2.有利于高职体育类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

民生乃国之根本,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职业素养的高与低,不仅是高职体育类学生个人的一张名片,也是推动他们顺利就业的“通行证”。众所周知,相比之下,职业素养高的专技人才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方能脱颖而出,倍受用人单位的青睐与社会的好评。尤其是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就业压力剧增,高职教育、特别是针对高职体育类学生的教育与培养工作,更要运用未来眼光,彰显“道德良好、素质过硬、技术发展”的体育职业特色,体现职业精神,认真把高职体育类学生培养成才。此举不仅是对总书记讲话精神的领悟与贯彻落实,也是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之需要,同时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高素质、强技能劳动者的最佳路径选择。

3.有利于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创新开展工作

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努力开创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的一系列讲话内容,为高职院校广大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通过系统的学习与领悟之后,广大教育工作者心中就拥有了明晰的目标——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核心。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要按照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部署,把立德树人这种责任贯穿整个教育工作的始终,并体现在日常平凡、细微的教学与管理之中。同时,要敢为人先,不必为当前职业教育中所面临困难问题所拘囿、所困惑,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地去开展工作,为培养学生形成职业素养,努力去教好书、育好人、还必须育成才。从此层面可以看出“立德树人”视域下培养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有利于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创新开展工作。

4.有利于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职业素养”为核心内容,确立以本专业为中心,全面发展

为终极旨归。同时深化产教结合,规范育人过程,教育学生遵守职业道德,帮助学生树立职业精神,组织学生学习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入校之后就做好个人职业规划,并付诸实践,为实现职业理想而奋斗。不难看出,我们所培养出的高职生,特别是体育专技人才,他们应该政治思想坚定、技术过硬、全面发展。毕业生步入职场就应形成一种品牌效应,不仅会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也为母校赢得社会声望。毕业生的优秀等同于提升了母校在人才市场的知名度,同时也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

5.有利于健康中国的顺利推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其不仅需要大批“爱体育之人”来发挥带头作用与辐射效应,更需要大批“懂体育之人”来进行有效的组织,发挥应有的组织与管理作用。高职体育专业所培养的体育人才也是我国体育人才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高职院校以教书育人为目标,以职业素养教育为核心内容,加强对体育类专业素养的教育,将学生培养成为以德为首、专业过硬、综合素质全面的体育通才,有利于健康中国的顺利推进,也有利于高职体育类学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

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培养路径

1.职业素养培育工作要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强,总书记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教职成〔2019〕13号文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与特色,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2]。众人皆知,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培德。为此,高职体育类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工作要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结合当前政策与形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职业素质教育全过程,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注重立德树人的成效,狠抓落实,真正做到以德育人、以技强人。在专业素养教育与培养方面,要充分发挥“立德树人”双重功效,教育与引导学生以德为首、坚守思想底线,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立足现实,工学结合、德技兼修,全面发展,要不断强化个人职业素养的稳步提高与专业技术的累积,学用相长,为社会的需要而时刻准备着、准备好^[3]。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教师是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保育员与领航者。在读期间学生接触教师的机会最多,关系也最为亲密,教师的一言一行在学生面前都会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为教好书与育好人,教师首先要做到德高为师,学深为范,古训云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为师者自身所具有的坚定的政治思想操守、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渊博的学识、熟练的操作技能,对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正面教育,对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会起到无声的浸润作用。学生在高素质老师的德高强技影响之下,就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且受益终身。为提高为师者的综合素养,一是可组织在职教师参加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的师德与专技水平;二是推行教师进高校进修制度,通过定期轮训来为在职教师补输“新鲜血液”;三是可依托校方的“校企合作”等平台,例如体育营销专业可从企业或实习单位聘请既有实践经验又能胜任教学任务的资深专业技术人才为兼职教师,到高职对体育类学生进行全程教学指导或进行专技训练等^{[4]47-48}。

3. 制定明晰的培养目标

目标就是想要达到的境界或目的,制定明晰的培养目标就类似轮船选择了远航的方向。为培养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而制定出明晰的培养目标非常重要。高职院校应组织全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与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发展方面所出台的相关文件,认真领悟之后,克服困难与阻力,依据相关规定在落实环节上下功夫。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体育职业素养”为核心内容,结合本校办学规模、层次和办学思想理念,科学合理地为不同的专业进行精准的定位,制定明晰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目标制定方面,一要切合实际,短期目标要与长期目标相结合,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让学生明确就业岗位对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要求,然后注重学生的现实基础,多措并举,有的放矢、阔步前行与稳步提高,提高“立德树人”方法与措施的达成度,保证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二是针对体育类学生

还必须突出高职体育专业不同于普通专业的特色,除了培养高职学生应具有的专业素质之外,还必须突出一种职业本位素质,例如培养忠诚当担、不屈不挠、顽强蓬勃进取、善于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等等,并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将体育类专业培养成为“龙头专业”,并在社会上形成“品牌效应”,提高专技人才的竞争力,进而也能推动本校实现内涵式发展。

4. 构建科学的职业素养培养体系

职业素养培养体系是培养专技人才的有效载体。用“立德树人”来引领高职院校职业素养体系的建构,全面提升体育类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意义重大。高职体育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首先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制订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中的三个目标(人格、知识、技能),认真落实现在职业教育中的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针对体育类学生,围绕体育职业素养内涵,从政治思想、专业知识与技能、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专业适应能力与职业创新精神等方面确立 10—12 门核心主干课程与若干选修课程,引导学生学专、学深。其次,为突出体育职业特色,强化对体育类学生职业本位素质的培养体系,例如可有效延长实训期、可请体育界成功人士到校做专题报告、可组织学生参加创新人才培训会、可多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繁华商业区去捕捉创业灵感、可开展体育拓展训练进课堂等等。再次,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各学科呈深度融合发展的态势。建议培养体系的构建首应以满足学生的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为原则,整合校内外教学资源,建构与学生知识、能力、兴趣及个人职业发展相匹配的职业素质课程体系,并在邻近专业拓展延伸,实现一专多能,全面发展。例如高职体育专业的学生不仅要胜任体育教师岗位,还要胜任社区体育指导员、大众健身教练员等多个岗位等等。也就是说科学的职业素养培养体系所培养出的学生职业适应能力与可持续发展力都非常强,能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迅速适应不同性质的工作^[5]。

5. 改进教学模式与方法,突出实践教学的作用

教学模式与方法传授教学内容所采用的一种具体形式。实践证明,教学模式与方法运用科

学,不仅能提升高职生的职业素质,同时也有利于为为师者提高教学效率。对高职体育专业而言,依据教学内容灵活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也非常必要。建议多采用一体化教学、异步教学与合作探究等方法。此外,体育学科是一个实践性、应用性和综合性都很强的学科。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大抵都拥有友好合作的实习单位或实习部门。实践已证实,高职体育类学生通过校方组织的见习与实习,有利于帮助自己进行职业规划。再者,高职体育类学生所参加的认知见习与顶岗实习等实践活动,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次历练活动,同时也是职业素养提升的一次宝贵时机。一方面,他们在见习与实习的实践环节中学习到了一些课堂上不曾经历的社会学知识,以此增补个人社会阅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可以洞悉个人目前的职业素养与未来岗位要求之间的落差值域,然后努力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我调整与提升^{[6]30-3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此,高职体育类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工作要在“立德树人”目标引领下,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出明晰的

培养目标、构建科学的职业素养培养体系。为提高实效性,同时还要改进教学模式与方法,突出实践教学的作用,以此凸显职业特色教育,将体育类学生培养成社会急需的高素质专技人才。

[参考文献]

- [1]立德树人,习近平这样阐释教育的根本任务[EB/OL].(2019-03-18)[2020-08-18].[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1/2019/0318/c1001 - 30981617.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18/c1001-30981617.html).
- [2]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17-12-07)[2020-09-20].[https://wenku. baidu. com/view/ f27661f586c24028915f804d2b160b4e777f8192.html](https://wenku.baidu.com/view/f27661f586c24028915f804d2b160b4e777f8192.html).
- [3]季小燕.基于立德树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4):89-91.
- [4]温志红.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8.
- [5]彭森.高职体育专业“素质本位”人才培养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J].体育时空,2020(10):34-35.
- [6]杨宏.基于就业导向的高职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责任编辑 光 翟)

王国维《题友人三十小像》本事与庚子变局之考辨

——兼为其“笺注”纠谬正误

陈鸿祥

(江苏省党史工办《世纪风采》杂志社,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王国维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中,诗词是极为珍贵的组成部分,包括他题赠亲友之作,务求注而有当,笺必有据,切戒妄测臆断。他的《题友人三十小像》二律所指“友人”究竟为谁?其诗作于何时,因何而题?笔者据第一手史料,考定王氏诗中“友人”,即为三十岁离淮安家乡,赴沪创设农报馆、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以确凿的史实,举证诗中“千金三致岂前期”“宵深爱诵剑南诗”等,皆为有事实可指的“纪实”;尤其是从1900年庚子大变局中,辨明王氏题此“三十小像”诗之时间、动因,并对第二律所咏“昆池劫灰”“沧海楼台”做了翔实的考证,指出王国维经罗氏帮助,于庚辛之交赴日留学,借“中山酒”以抒情怀的隽永回味,有理有据地警示国人:重读一百二十年前王氏题诗,莫忘帝国主义列强借端入侵北京,强权“索赔”,国家罹难,民族蒙耻,王氏父子为之“愤怒”的那个悲怆年代。

[关键词] 王国维; 友人; 罗振玉; 庚子之变; 东渡留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57-08

引语:罗继祖挥汗指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误

在王国维留给我们的丰厚学术遗产中,诗词是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然而,岁月流逝,时代更易,如何准确地解读其诗其词,殆非容易,尤其是关涉他若干题赠之作的本事,包括人物与史迹,更须“注”而有当,“笺”求其真,借用孔子的话,叫作“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亦即应切诫以意为之,妄测臆断。例如,笔者手头就有一封罗继祖评述萧艾的《王国维诗词笺校》的旧信,谨录如下:

鸿祥同志:

萧艾的《王国维诗词笺校》寄来,其中谬误累累,已不客气地为指出。此君于诗词并无造诣,好事如此,足见其不知量。(下略)

继祖挥汗书 八月五日^①

继祖先生时任吉林大学史学教授。此信写于1984年,紧接于萧君《笺校》出版之时(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萧《笺》”)。作为罗振玉长孙,并亲炙观堂风貌的知名学者,继祖先生是该书《前记》结尾列名致谢的“幸得前辈学者及有关专家指导”之第一人,套用现在的捧场话,即“首席”专家、学者。然则,他何故如此“不领情”,要“挥汗”写信,向笔者这样的晚学后辈通报其指出萧《笺》之误的“不客气”批评?据笔者看,纯然出于对前辈敬重,对学术负责。所以,他嗣后又来信转告,“萧也有信来,说对他帮助很大”,并且随信“将萧艾的王诗《笺校》上所举错误写出”寄来,指出“萧之所谓‘笺’,在每首诗词后以己意加以论列。因为萧不是诗人,诗的方面谈得不多,他颇注意于诗的本事。不过,就是本事上也出现些错误”,并举《题友

[收稿日期] 2020-06-12

[作者简介] 陈鸿祥,男,上海嘉定人,江苏省党史工办《世纪风采》杂志社原执行主编,编审。

^① 罗继祖1984年8月5日致笔者函。

人三十小像》，作为萧《笺》谬误的突出之例^①。

考辨之一：王国维几位“少年友人”之状况及彼此交集

王国维《题友人三十小像》是二首七律，兹先录原诗：

[其一]

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阴隙里驰。
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岂前期。
论才君自轻侪辈，学道余犹半黠痴。
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

[其二]

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台。
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
翁埠潮回千顷月，超山雪尽万株梅。
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

很明显，这是借题照以咏其事，赞其人，当然也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情怀。然则，诗中“友人”究竟指何人？这是准确解读其诗之前提。对此，继祖先生在附寄笔者的《读》文中，如是写道：

《题友人三十小像》，一般认为这个友人是指罗○○（按，即罗振玉），因为罗三十岁从家乡淮安只身来到上海创办农报馆，办东文学社，所以诗里的“四海一身”“千金三致”，皆有事实可指，而不是空谈。罗三十以前因响慕陆游，自号“陆庵”，所以第一首的结语有“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之句，萧却把友人归之于王氏早年乡友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人。他的意思，三人中陈的可能性大。实际这三人名不出里闾，一无表现，是完全错误的。

笔者的看法，上述“一般认为”是对的。因为这确系王国维早年写赠罗振玉的题照诗。所谓“归之于王氏早年乡友”，则是萧君在其《笺校》中提出的。其“笺”曰：

题中友人为谁？未详。但必系海宁同乡窗友无疑。翁埠、超山，皆地名，在海宁境内。据王国维一九三五年所作《海宁王静安先生遗集·序》称：先兄“年十六，入州学，好《史》《汉》《三国》。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

君，上下议论，称‘海宁四子十八丁’”。又，据陈守谦《祭王静安先生文》云：“予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十五耳……”云云，陈守谦长王氏七八岁，亦好宋诗。或其人耶？

以上所“笺”，是否“完全错误”？这就得考稽史实，以辨明真伪。萧《笺》所引《遗集·序》，殆即王国维《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其文为（先兄）“年十六，入州学，好《史》《汉》《三国》，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上下议论，称‘海宁四子’；十八，丁中日之战”。盖“丁”者，遭逢之谓也，“笺”为“十八丁”，则因王《序》原文无标点，乃是萧君读破句，将“丁”误作成年男子，连读成“十八丁”，遂使王、褚、叶、陈四位少年才子，无一例外地被抓了“壮丁”。岂非学界笑话？！

至于“四子”，即“四才子”。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以下简称“赵《谱》”）转录《海宁州采芹录》称：“光绪十八年壬辰岁试（中略），第二十一名王国维（静庵）。”时为1892年，王国维十六岁（实龄十五）考中了秀才，并与褚、叶、陈三位一道，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但能否据以认定，数年后王国维为之题照的“友人”，“必系”“海宁同乡”，并断之为“无疑”？殊属无凭无据的“固”“必”之谈；不过，继祖先生《读》文称以上三位皆“名不出里闾”，“一无表现”，亦未免落入偏颇。所谓“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据笔者查考，王国维交集的少年诸子，实亦非泛泛等闲之辈。让我们先看为首的褚嘉猷，就是上了海宁“名人榜”的历史人物，略谓：

褚嘉猷（1873—1919），字椿培，号植卿，后更名植清，盐官镇人，著名律师。早年从教并秘密参加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曾多次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是秋瑾烈士的老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瑾起义失败，褚氏携全家逃亡上海，再次东渡日本。曾受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汉学教授。民国成立后，专事律师，推行法治，为我国法律史上推行律师制度的先驱者之一^{[1]269}。

^① 罗继祖1984年11月10日致笔者函，附寄《读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谦称“这只是素材，未加文字上的修饰”云云，以下引录，简称“《读》文”，不另出注。

必须指出的是,这位曾是秋瑾的老师、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乃与王国维交往最密的“少年乡友”之一,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庚子之变”等几个历史大变动的年头。例如,王乃誉戊戌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日记,即记有“发三号静信,附举人植卿信”^{[2]1857}。这是因为,王国维戊戌正月离海宁入上海《时务报》馆,褚嘉猷尚未知情,故仍寄信其家中,于是在乃誉公寄发的“静信”,即致长子王国维(静安)的信中,附上了褚嘉猷来信。从王乃誉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或书信,或过访,所记褚君与王氏父子交往不下十数次;饶有意味的是,壬寅九月廿四日(1902年10月25日),乃誉公记其与褚君一席谈:“晤植卿,谓静名震中外,欣喜至不可言”^{[3]1695}。

据以查对王国维的学术历程,这正是他自述“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丑)壬(寅)之间”(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亦即从日本留学归国,决意攻究哲学,开始进入撰写其“哲学上及文学上之著述”的“独学之时代”;而在前此的乃誉公日记中,他曾以不无欣喜的笔触记述了“静”所作的诗文著译。例如,庚子四月朔(1900年4月29日),记有“接静禀,附达衢(按,王乃誉长婿,姓陈)信,并《咏史二十首》,亦以洋史咏中史”^{[3]1204};同年七月初六日,记有“阅静译《势力不灭论》(德·海尔模壑尔兹著,英·额金逊译本)”^{[3]1477};而在壬寅六月十九日(1902年7月23日)日记中,还记有对“静译《心理学》”之评议,云:

辰(按,即辰时)观静译《心理学》,弥见东人心思之细,推勘愈微。特译出仍与中书未能谐洽贯通如一耳^①。

准此,我们不可不注意以下诸端:第一,直到王国维去世翌年(1928年)才公开发表的《咏史二十首》,揭出其要旨在“以洋史咏中史”,亦即备受钱锺书推赏的“博极群书”的“静安少作”中之“西学义谛”^{[4]24},于此《咏史》中初露端倪,而乃誉公实为其最初的赏读者;第二,钦仰王国维才学,推崇王国维的学术造诣,以“名震中外”来表述王国维

乃“在20世纪初登上近代中国的文化学术舞台的”(陈鸿祥,《独上高楼:王国维传·新版题记》),褚嘉猷要算是“慧眼识荆”之第一人;第三,褚君发“名震”之谈,绝非漫言夸口,而是基于王国维已刊行的包括物理、农学、教育、伦理、心理、哲学、法学等“系列著译”^②。

再看王国维少年所交“三君”中之另一“子”陈守谦。萧《笈》引述陈守谦《祭王静安先生文》(以下简称“《祭文》”),乃做了删节“加工”,兹将其原文移录如下:

忆余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十五耳,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一^{[5]3}。

陈守谦,未见于海宁史志。据以上祭文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考定其生于1872年,字(或号)吉卿,是王乃誉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王国维另一位“少年乡友”。乃誉公甲午午(五)月初四日(1894年6月7日)记云:

看《墨子刊误》……可补俞氏《诸子平议》之缺。此本静从陈吉卿(守谦)处借得,惜伊不耐手钞为憾事^{[6]357}。

陈君《祭文》述其与王国维“朝夕过从,商量旧学”,由此不是颇可以窥其“过从”情状吗?

还可注意的是乙未十月初九日(1895年11月25日)记云:

吉卿赴沪,承其代我求曲园联,可感^{[6]571}。

上述“俞氏”“曲园”,皆指俞樾。此老是王乃誉敬重的学术前辈,并在日记中记有“钞《群经平议》”^{[6]346};而乃誉公发现王国维独自躲在书房里撰文“驳俞氏《群经平议》”,就严厉批评此乃“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应)痛戒此习”^{[6]344}殆非偶然。相比于“静”(王国维)之年少气盛,由“代求曲园联”,显现了年长数岁的陈守谦多么老成练达;又由陈君《祭文》中忆述“癸巳(1893年)大比,虽相偕入闱,(王国维)不终场而归”,当可推

① 《王乃誉日记》第三册,第1652页。按,《心理学》,日本元良勇次郎著,编入《王国维全集》第十卷,编者于卷首引王乃誉日记“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九日载”,误阴历为阳历,引文脱漏“特译出”以下一段评语,特予注明。

② 上述著译,初刊于《农学丛书》《教育丛书》《哲学丛书》《科学丛书》;现编入《王国维全集》第十六卷、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知陈君在此次王氏“交白卷”的乡试中考上了举人；所谓“戊戌之岁，余橐笔北游”，而乃誉公壬寅五月十一日（1902年6月16日）日记则记云：

访桐君于家。知陈吉卿就盛京卿奏折之聘（系何道所荐）^{[3]1631}。

这表明，陈守谦于戊戌（1898年）北上四年之后，受聘进入了当时刚就任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幕中。值得一提的是，乃誉公“访桐君于家”的这位“桐君”，或记作“桐兄”；而在丙申八月初八日（1896年9月14日）日记中，曾有如是记载：

（入桐家）与绿成父子抗论为今世觅处世之方。余与桐同，绿与静同。然则，伊等之无阅历，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绿有悻然意^{[2]696}。

用俗常的话来讲，“悻然意”就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这实际上也是老人家不嫌于其与静（安）少不更事却偏要“上下议论”的批评之词。趁此，我们还可略辨“绿成父子”之身份。王乃誉日记中曾记及“壬辰岁试”，他第二次前往海宁州衙前观看张榜公布的百名以内“录取名单”，并于二月十六日（1892年3月14日）特笔记下“新人者叶逢春”。谨按：日记中之“逢”，疑为“宜”字之讹，盖以“随手作记”所致笔误耳。果然如此，则乃誉公所记随时出入“桐家”（或“桐店”）议事，遇见“二内兄”“三内兄”，而这位“余与桐同”的“桐兄”（或“桐君”），当为其续配叶氏夫人（即陈君《祭文》所记“主中馈”的王国维继母）之长兄，被乃誉公批为名“高”“实”“懒”的绿成，应该就是叶宜春之字（或号），年岁与王国维大致相仿，且系同榜入“州学”的表兄弟；而到了王国维“五十之年”投湖“自沉”的1927年，前来致祭的陈守谦，则可能成了当年“上下议论”的“海宁四子”中的唯一健在者，不亦悲夫！

令人惊讶的是，陈守谦《祭文》中明明白白写着光绪“辛卯岁”（1891年）与王“订交”，“君年才十五耳，余长君五岁”；若以年龄为考定“友人”的“硬杠子”，当王国维题“三十小像”诗时，“吉”“植”二“卿”皆未及“而立”，大致在二十七八岁（“绿”约当二十二三岁）。萧《笺》为“曲成其说”，

坐实王诗“友人”必为其“海宁同乡”，且“意”在“窗友”陈君，于是将“君年才十五耳”以下一段文字悉予删除，而代之以省略号，并自拟了“陈守谦长王氏七八岁，亦好宋诗”的“笺”文，亦即将仅比“植卿”褚嘉猷长一岁的“吉卿”陈守谦年龄凭空“拔长”了二三岁，以使之达到王氏为之题“三十小像”的年龄，如此任意妄断，实属超出了文学创作之大忌的“胡编乱造”的底线。

然而，“三十光阴隙里驰”。差不多三十年后面世，以萧《笺》为蓝本的《王国维诗词笺注》，于《题友人三十小像》（二首），“笺”曰：

题中的友人，当为静安的少年同学。《萧笺》云：“据陈守谦《祭王静安先生文》云：‘予与君之订交也，在清光绪辛卯岁，君年才十五耳……’云云，陈守谦长王氏七八岁，亦好宋诗。或其人耶？”诗中回忆旧时交谊，感慨世情变化，深刻沉着，不类青年手笔^①。

这段“笺”文，除未重复“十八丁”之类的笑话，竟然将萧《笺》的妄断之词，一字不漏，“照单全收”，实属匪夷所思。

至此，我们可以说，罗振玉胞弟、王国维东文学社同窗好友罗振常写的题注“此题雪堂小像”，应为无可置疑的亲历者证言；并可以正面回应罗继祖指误的萧“笺”《题友人三十小像》之“友人”，确非王氏“早年乡友”，而所谓陈守谦“亦好宋诗”云云，更是纯出臆断的无稽之谈。

考辨之二：“陆庵”罗振玉之小像、才学及业绩

实际上，王国维《题友人三十小像》，亦可简称之曰“题照二律”。我们考其史迹，以辨其所题，第一律是“为谁而题”，第二律是“因何而题”，二律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现在，让我们先辨第一律。一曰：小像。苏轼有诗云：“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影答形》）而王国维题诗则以“劝君惜取镜中姿”破题，盖“镜中姿”者，照相之谓。像为“镜中姿”，姿为“镜中像”，殆以友人“镜中”原型，现其“不灭”的三十岁真身。这里，不妨再追述继祖先生为落实诗中“友人”是谁，曾为拙著《王国维与文学》引述此题照诗

① 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以下简称“《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补作考证,云:

此小像乃先人(按,即罗振玉)三十岁摄于淮安,手持兰花一枝,以前有之,现早佚失^①。

然则,诗云“劝君惜取”,可知此“三十小像”殆非王国维题诗当年所摄;所谓“白驹过隙”,此乃罗氏业已“驰”去的三十岁旧照;参以罗振玉自述,“以丙申春至上海设农报馆”(罗振玉《集蓼编》,出自《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丙申即1896年,恰当罗氏三十“而立”,自淮安来上海创业之年;那么,王诗所题“三十小像”,是否即罗继祖所说“手持兰花”之罗氏佚照已无从验证。我们现在所能见者,则是王国维接手主编《教育世界》,于甲辰(1904年)正月上旬第一期所刊《本报发起人罗振玉氏》照片,并且从这一期开始,每期《教育世界》卷首均刊有“肖像”,包括丙午六月上旬(1906年7月)所刊标有《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照片。以上两照,罗约当三十岁^②,王二十六七岁,可能是现存仅有的罗、王青年时代之“标准像”。

二曰:才学。应当明确指出,王诗第一律,绝非“回忆旧时友谊”,而是“在场实录”,亦即罗、王在上海农报馆相识相交,彼此倾慕,互赏才学。诗云“论才君自轻侪辈”,当此之时,二“卿”中之吉卿陈守谦“北游”谋官,“推君为第一”的王国维焉得无端题赞其“才”?而植卿褚嘉猷则对王赞叹尤加,是仰视(而非“平视”或“俯视”)其才学超卓;然则,王国维题诗“论”其“才”足以“轻侪辈”者,舍刘鹗赞叹“真人杰哉”(刘鹗《乙巳日记》二月二十二日(1905年3月27日))的罗振玉,谁堪当之?!

还有王诗所咏“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盖“癖”者,嗜好也。宋人注苏轼“世间有癖念谁无”诗句,尝录举杜预有“《左传》癖”,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陆羽有“茶癖”,云云(《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注),蒲松龄且以“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赞李贺;然则,“诵剑南诗”成“癖”,则是极言对陆游诗(陆游(1125—

1210),字务观,号放翁,号称“诗万首”,编为《剑南诗稿》)浸染之深。罗振玉十六岁考中秀才,自言曾集陆游诗句“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写成楹联,作为策励学业之座右铭,并且自号“陆庵”^③。再看王国维。其父乃誉公日记中屡记“读剑南诗”“录放翁诗”“看陆诗”;当王国维从上海农报馆返海宁度假时,乃誉公特从其随身携带的书籍中,见“静有放翁集,取阅五古至夜分”,并且连续数日,或“早起看剑南诗”,或“门前闲步讽陆游诗”^{[3]1635}。由是,可窥王氏父子共赏“剑南诗”,确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尤不可不提者,王乃誉日记中对罗振玉直书“罗陆庵”^{[7]1908},并记有“看罗叔蕴陆庵所著书,考金石碑版,阅古有识,佳士也”^{[2]1050}等赞言。看来,除了“夜分”(即“宵深”)“诵剑南诗”之外,“金石碑版”亦王氏父子与罗氏所同嗜焉。实则,“才”与“学”原系正比关系,罗氏之所以能“才轻侪辈”,不正是基于其“佳士也”的深厚学养吗?

三曰:业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王国维题罗氏“三十小像”,核心端在第一律颌联“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岂前期”。盖诗中“偶寄”,典出《文选》魏文帝(曹丕)《乐府二首》之二《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李善注引“尸子曰:《老莱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也’。据许地山先生查考,道家典籍《老莱子》十五篇今不传,现在仅见于李善《文选注》所引《尸子》底佚文一句”^{[8]17-18}。由此“人生天地”之“寄”的“佚文一句”,不是颇可佐证王诗用语之警辟,绝非凡常可比吗?于是,由“镜中姿”而及于“偶寄”之“身”,继祖先生以为“皆有事实可指,而不是空谈”,并且列举罗氏三十岁从淮安家乡“只身来到上海”,创办《农学报》,筹办东文学社等业绩,这都确实有据。不过,须加说明者,第一,“只身”不等于“单打独斗”,“偶寄”更非道家之“清静无为”。罗氏能在“十里夷场”的上海创业,乃以变法维新的重镇《时务报》为依托,相继得到了该报“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能上达天听的状元

① 罗继祖1988年11月7日致笔者函。按,拙著《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我的祖父罗振玉》书中刊有此照,误标为“王国维摄于上世纪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按,此书署罗继祖著,实系王庆祥代编。

③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按,罗自号“陆庵”,当取意于陆游《老学庵笔记》之书名。

实业家张謇,以及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等名士援手支持。这表明,王诗以“原偶寄”衬托“皆兄弟”之本旨。第二,王诗“论才”赞友,除推崇罗氏学养之外,尤在其“白手起家”、善于创业非侪辈能及的“经世”之才。罗氏来沪译编农学书报、创办学社,招纳造就王国维等人才;其本人则由《农会题名录》自署“秀才”的淮安乡塾之“罗三先生”,登顶为端方奏折中之学界“精英”,刘坤一札飭中之“农会绅士”,张之洞聘以“厘定新政”之名士干才,仅四五年时间,就实现了如此“华丽转身”。试想:王国维早年在海宁所交“乡友”中,有谁能臻于如此造就?!第三,是所谓“千金三致”。太史公称赞范蠡“富好行其德”,“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范蠡传》)。《笺注》乃引以入“注”,“笺”之为“写友人善商贾致富”,可谓望文生义,妄测谬赞。实则,诗云“岂前期”,“期”就是企盼,就是指望。对罗振玉而言,他抵沪编书办报、立学育才,从未“向上伸手”、企求官助;孰料,“戊戌政变”,“朝旨禁学会,封报馆”,而罗办农报馆非但未被告封,两江总督刘坤一且“令上海道拨款二千元维持”。这不正是罗继祖所说“千金三致”,亦非“空谈”吗?也可以说此乃罗氏遭逢“世变”,收受“官助”的“千金”一致;这之后,尚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应允拨付印费二千五百元以供编印《农学丛书》,但罗氏既非“前期”,故对此“二致”未予收受^①。更可注意的是第三致:刘坤一札飭宝山县令会同“罗绅”,拟由官方资助,将东文学社“拓为江南农务学堂”,而罗振玉则以“农会绅士”名义上书刘坤一,力荐王国维等“学问贯通,志气奋发”的东文学社“高才生”派赴日本留学,称:

该生等矢志农学,恳请大帅遣出洋留学农事,每年学费不过一千五六百金,三年以后成效坐收,费省效宏,莫兹为甚^②。

刘批:“上书不为未见”,允以“核议办理”^③。无奈,“庚子之变”爆发,对王国维而言,这个“岂前期”的官派“千金三致”的留学之议,未克达成。

准此,再观王诗第一律颌联“四海一身原偶

寄,千金三致岂前期”,接转以颈联“论才君自轻侪辈,学道余犹半黠痴”,就尤为意味深长。谨查辞书“黠痴”,引录《晋书·顾恺之传》:“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参见《王力古汉语字典》“黠”字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笺注》引申为王国维“诗中以东晋人物自况”,误且谬矣。实则,此系王国维对罗氏上书荐举赴日留学的自谦之词,更是他此时此际苦攻日、英文字,究心东西方学术之自状;而以“学道”言“黠痴”,则是他对“因欲学文而学道”的“退之(韩愈)却是倒学”的调侃(宋儒谓“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钱锺书亟赞“倒学”二字殊妙。参见《谈艺录》(补订本)第8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实乃由“幽默”中显大智,盖语出韩愈“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的“送穷”之文(韩愈以智、学、文、命、交五者俱穷为“五鬼”,撰文驱而送之。参见《送穷文》,《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七),并借以抒发他对罗氏由“识为伟器”而“为瞻其家”,以至“资送出洋”的倾力帮扶的朋俦感念之情。

考辨之三:“庚子之变”与东渡留学

现在,让我们来辨其第二律:因何而题?罗继祖出于对罗、王两位老辈的敬重,故仅限于关注第一律“友人”,指证其人是他的祖父罗振玉,而只字未及触发王氏题诗之时局以及罗、王之遭际。为此,就有必要考订王氏题诗的时间,这是准确解读其诗的关键节点。

我们的回答是,这个时间节点是庚子,而非己亥。

这里,应当明确指出,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以下简称“赵《谱》”)将王氏自标己亥(1899年)的《嘉兴道中》,以迄于壬寅(1902年)《书古书中故纸》,四年内所作六题、十首近体诗,统列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三岁《编年诗》,乃出诸未尝研读原诗的浑统误编,错了。萧《笺》:“此诗作于一八九九年”;《笺注》:“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皆系承袭赵《谱》的以讹传讹。究其致误之因,则缘于不知罗、王斯时履迹行踪,故无从参悟王诗第二律起句“几看昆池累劫灰,俄惊沧海又楼

^① 罗振玉《集蓼编》,按,罗氏原文为“文襄问:《丛书》百部,得价可几许?曰:约五千元。问:印费几许?曰:半之。”张允以出资,罗未接受。

^② 《农会绅士上南洋大臣刘请派学生至日本留学农务禀》,原刊《农学报》第九十册,光绪二十五年乙亥十一月下旬(1899年12月)。

台”，殆非一般的“感慨世情变化”，而是纯出伤时感怀的“时事”：几致“亡国灭种”的1900年“庚子之变”。

何以见之？不妨先录罗振玉自题作于庚子八月的《白门感事》四绝句，其第一绝破题第一句就是“潇潇风雨石城秋，逆作诗人万缕愁”；而尤为沉痛者，则是第三绝：

北地虫沙成浩劫，淮南鸡犬不能仙。

野人但祝休兵早，铸戟长耕陇上田^①。

盖“白门”系南京别称。按照王国维自述，“庚子之变，学社解散”，他就自购了“第四第五（英文）读本归里（海宁）自习之”^②，而罗振玉则应张之洞电邀，自沪赴鄂就任湖北农务局总理暨武昌农务学堂监督（校长），途经“东南互保”中的南京，恰当“两宫蒙尘，北方糜烂”（罗振玉《集蓼编》）。按，所谓“两宫蒙尘”，即指慈禧挟光绪帝西逃长安。故诗中借用周穆王南征传说，而以“北地虫沙”（《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喻“八国联军”入侵京津，烧杀劫掠，死尸遍野；所谓“淮南鸡犬”，则是以淮南王刘安意欲成仙，“鸡犬升天”（《神仙传·刘安》，据吴曾祺编《旧小说》，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比拟“推究变端，实为祸首”的端郡王载漪，怂恿其于“己亥废立”中被慈禧立为“大阿哥”的儿子溥隲，欲借助义和团“灭洋”的战乱，以逞其自立为帝的图谋。准此，以观王诗，“昆池劫灰”，不正对应着罗诗“北地虫沙成浩劫”吗？《笺注》引王国维“汉凿昆池始见煤”（《咏史二十首》之九）以注“昆池劫灰”，盖误。实则，此“昆池”非指汉武帝为操练水军而开凿之长安昆明池，而是《颐和园词》所咏“昆明万寿佳山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以供其颐养天年的颐和园昆明湖。“几看”者，特指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

园”，而此次“变端”中再遭劫难的颐和园，其“前身”原是已成劫灰的“皇园”之子遗“清漪园”嘛^{[9]226}！然则，“劫灰”就不是“洪荒劫后灰”，也不是“西域道人”口里之“劫火时灰”^③，而是列强逞其强权的“洋枪洋炮”，是号称“人道”却视人命为“虫沙”，借端挑起“灭我中国”的战火。值得一提的是，《笺注》引《神仙传·麻姑》，释王诗“俄惊沧海又楼台”是“写沧海桑田之感”，可谓“望文”而不晓其义，“感”得太过离谱的硬伤了。实则，此句落脚于“楼台”，典出《史记》“海旁蜃气象楼台”（《史记·天官书》），俗谓“海市蜃楼”耳。而“俄惊”者，则指慈禧悍然下旨对各国宣战，早已虎视眈眈的列强施展群狼战术，拼凑联军打上门来，国都既沦陷^④，载漪父子欲于“灭洋”中得以升天，当然也顷刻化为泡影了。

这样，颌联“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则是取佛家“种种世法皆由心”，“三界所有，唯是一心”；既然万物皆出于“心”^{[10]351}，为何偏不能解脱尘世之烦恼？“触”者，梵语萨婆罗奢，意为不净、污秽，亦佛家用语^{[10]461}，所谓“悲欢触绪”，实乃对应着罗氏庚子“感事”第一绝“逆作诗人万缕愁”；那么，王国维缘何发“无奈悲欢”的感慨？试观王乃誉庚子九月初十日（1900年11月1日）日记：

日暮，绿成来，谓伊父相请……既抵桐宅，（略）留夜饭。饭间，静（王国维）来，所议无奈，窒碍殊多，且搁，因杂云：“和议”似有成意，……赔费四百兆……^⑤总以皇上回京后西兵撤退。如是，中国岂成为国！闻之，愤怒填膺。桐出王夔石尚书家信稿，……哀哉，今上罹此劫凶……岂忍言哉！岂忍言哉！^⑥

于是，颈联“翁埠潮回千顷月，超山雪尽万株梅”，亦成关涉时事的纪实。“翁埠”“超山”，原是海宁境内的两大景点。王乃誉日记曾记他亲书翁

① 罗振玉《白门感事》五绝句，《贞松老人外集》卷四，据原刊本。

② 王国维《三十自序》之一，《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按，王氏自述，就读东文学社“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

③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第61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按“劫灰”条引《释门正统》四曰：“汉武掘昆明池始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摩腾且住，或以问之，曰：“劫灰也。”

④ 史载，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下达“宣战谕旨”，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8月15日，慈禧挟光绪帝仓皇出逃长安，北京陷落。参见《庚子之变图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列强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迫令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条赔款4亿5千万两。

⑥ 《王乃誉日记》第三册，第1302页，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本。按，所记“王夔石尚书家信稿”，即王文韶（1830-1908）以“家书”形式记述其随慈禧西逃途中之种种遭遇及见闻。

埠“城隍庙”三大字；林纾自编《畏庐文集》，就有《记超山梅花》的游记之作。庚子八月十八观潮日（1900年9月11日），乃誉公记下钱江大潮之壮观，云：

午后……（余）独出西门望海，见潮边已在十里外，白练如铺，水声渐起，沿塘至南门，人渐密，待潮过，拥挤殊甚……^{[3]1277}

这时，乃誉公既感“时势亟亟，如此可慨可痛”，更“怵静不应与不识时者力辩，被目为‘外奸’”^{[3]1275}；而王国维则与青年伙伴步行至盐官镇西门外二三十里的翁埠观潮，并于夜间赏月以稍纾“朝旨反复”、国势危急的忧虑心绪，亦应在情理之中。

秋去冬来，超山雪尽、万梅怒放之际，恰当“梅雪争春未肯降”（宋·卢梅坡《雪梅》（之一）诗云：“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庚子岁末，乃誉公偕同长婿陈达衢为王国维东渡留学送行之时^{[3]1349}。转入该诗尾联：“卜邻莫忘他年约，同醉中山酒一杯。”这两句诗，亦非泛泛空谈，而是寄寓了作者此时此际的诚挚情怀，且均有确切可指的出典。盖“卜邻”原系古成语，所谓“唯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苏轼取以赋诗曰：“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绂我休官。”（《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苏公以不无调侃的笔触，抒“我休官”，当将道家修道炼丹之深山（华阳洞），作为卜居之地。显然，王国维化用苏诗“他日卜邻”，更于“莫忘”中赋予“先有约”以新意：“卜邻”者，留学之谓。前往异国他乡学成归来，能有所作为以不负亲友厚望。乃誉公于送行后记云：

静此行能于明年变法，鄂督举荐人才，征召回来，或有事可做。吾愿如此^{[3]1353}。

“鄂督”即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于“明年”（1901年）春夏间，联名拟定了史称“辛丑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三折》^①；而王国维则是经罗振玉在鄂督幕中周旋，于庚辛

之交派赴留日以应“新政”之需的首行者。据乃誉公所记，王国维东渡行程为：庚子十二月廿一日（1901年2月8日）乘日本博爱丸自沪启行，岁稍抵东京，并于辛丑正月初十日（1901年2月28日）前往东京物理学校。然则，诗以“同醉中山酒一杯”收尾，实乃取意于宋诗“安得中山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时”^②。王国维借酒抒怀，期盼着庚子乱局结束之后能有一个太平景象；这与罗振玉在前述庚子变乱中赋诗“但祝休兵”“铸戟长耕”，确是同出一“醉”，表明他是在东渡留学前夕作此题照诗，既与罗氏告别，又与罗氏相约；在乃誉公所“愿”的“明年变法”，实施“辛丑新政”之际，能“征召”归国效力。值此庚子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尤感王氏题诗“中山酒一杯”的隽永历史回味。国家罹难，民族蒙耻，我勤劳纯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竟然要以“每人一两白银”去给打上国门的强盗“赔偿”，如此奇耻大辱的历史，我们难道还能允许其重演吗？

[参考文献]

- [1] 虞坤林. 海宁历史人物名录[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 [2] 王乃誉日记(第二册)[M]. 中华书局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 王乃誉日记(第三册)[M]. 中华书局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4]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5] 陈守谦. 祭王忠愍公文[M]//陈平原, 王风. 追忆王国维(增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6] 王乃誉日记(第一册)[M]. 中华书局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7] 王乃誉日记(第四册)[M]. 中华书局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8] 许地山. 道教史[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 [9] 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10]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① 《江楚会奏三折》，由刘坤一领衔，经张之洞改定，分别于辛丑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五日在南京奏出，其第一折论育才兴学，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条，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条。

② 宋·王中《干戈》，诗云：“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鹤鸽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酩酊直到太平时。”按“中山千日酒”，典出干宝《搜神记》，略谓：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

清代江苏地方文总集叙录

蔡德龙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清代江苏地方文总集有较明显的方志化倾向,编纂者往往也是地方志的编者。以人存文、以事存文是地方文总集较为常见的编纂主旨,但也兼顾文辞。潘怪章《松陵文献》、许乔林《海州文献录》、陈文述《秣陵集》三种文献被后人视为地方文总集,但潘书实为自撰的人物传记,属于史部传记类,许、陈二书则为方志著述,三者皆非地方文总集。

[关键词] 清代;江苏;地方文;总集

[中图分类号] I2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65-06

随着近世地方文学意识的逐渐兴起,地方文学总集也随之增多,至清代而臻其极。根据总集所录诗、文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地方诗总集(包括地方词总集)、地方文总集两大类。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十九《总集类》下,设“地方文之属”“地方诗之属”,已将二者并列。江苏人文渊薮,其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在清代诸省中颇为突出。当前学界对地方诗总集关注较多,本文则对清代江苏地方文总集(含诗文并录之总集)择要做一叙录。

《南邦黎献集》十六卷,鄂尔泰编

鄂尔泰(1677—1745),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清中期名臣,为雍正帝心腹。谥号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后坐胡中藻狱,被撤出贤良祠。著有《西林遗稿》等。

雍正元年(1723)五月,鄂尔泰被提升为江苏布政使,“听政之暇,常集南邦人士与之论文赋诗”(《南邦黎献集》自序)。雍正三年(1725),在被提拔为广西巡抚后,鄂尔泰“遂取其文,别为古文、时文二帙,统名之曰《南邦黎献集》”。是集主要选录江苏生员作品,因江苏布政使司驻苏州,集中尤以苏州地区士子作品为多,最著者为沈德潜。鄂尔泰本人作品选录亦复不少,如卷十五录咏怀诗三

十四首、咏物诗十九首,其中鄂尔泰咏怀诗便有十八首,咏物诗则有十二首,所占过半。

是集按文体分类,卷一、卷二为赋,卷一主要是颂圣类赋作,卷二为经学系列赋作,选孙达和《经赋》、顾我錡《周易赋》、许其恕《周易先天图赋》、伍起《尚书赋》等十三篇赋作。卷三为颂。卷四为诏、诰、箴、铭。卷五为序。卷六为记、论、策。卷七为传、赞。卷八为议、文、状、书、启。卷九为笺、考、辩、驳、说、跋、碑。卷十为拟七体、卷十一为拟骚体、卷十二为拟连珠、卷十三为拟乐府、卷十四为纪恩诗,卷十五为咏怀诗、咏物诗。卷十六为拟古诗、怀古诗。

是集的编纂出于“颂圣”的用心,目的在于得览是集者“以知南邦人士其得沐浴于圣天子教育之中”,这在集前鄂尔泰自序中有明确的说明。序后为《下车观风示文》《延访真才示文》《刻期会课示文》《春风亭会课示文》《春风亭面课示文》《奖励人才示文》《慎时哉轩会约》,亦与其作为地方官员采风、宣教的职责有关。集中作品多为点缀升平、颂扬圣德之作,如卷一以鄂尔泰、姚培衷、盛元光、倪承茂、周日藻等十人同题共作的《日月联璧五星连珠赋》开篇,颂雍正即位之初“日月联璧,五星连珠”之“祥瑞”,其后则是胡鸣玉、倪承茂等四

[收稿日期] 2020-12-25

[作者简介] 蔡德龙,男,安徽霍邱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人的《重华协于帝赋》等。再如卷三,录有叶长扬、宋照、姚培衷、周日藻四人同题共作的《蠲免苏松两郡浮粮颂》,顾我畴、沈德潜等五人的《圣主得贤臣赋》。不过,作为地方总集,书中也不乏与江苏尤其是苏州风物、民俗等有关的作品,如倪承茂《范文正公以居宅为学宫赋》、刘俊《吴郡赋》、李邺《紫阳书院记》、邢钺《吴中八表赞》、伍起《吴中六绝赞》、姚培衷《闾阖门考》等。

是书有雍正三年(1725)刻本。

《七十二峰足征集》一百零四卷,吴定璋编

吴定璋(1679—1752),字友篁,江苏吴县人(今属苏州),室名依绿园,著有《太湖渔风》《端居集》《聊寄集》《太湖用兵纪略》等。

是书为太湖区域诗文集,前有沈德潜、秦蕙田序。《凡例》指出太湖地域总集的编纂始自明代,“太湖诗文有选,肇自前明吴隐君思政之《洞庭清气集》,肆之者为孔参军道行之《续清气集》……其后,予从祖不官暨秦存古两先生选《两山风雅》”,其后又有《太湖诗选》《洞庭明诗选》《东山诗纪》《湖山灵秀集》等。吴定璋此选意在上续太湖诗文集传统:“征文以诗为主,次以赋、以词,至于散体之文,名家具有专集,美不胜收,止采其有关湖山风物足备稽考者录焉。”“是集七十二峰诗人之诗七十三卷,闺秀三卷,寓公四卷,方外五卷,仙鬼仆伎一卷,赋三卷,词二卷,文十三卷”,在编纂体例上,“不以时代为编次,而以氏族作类叙者,窃取《世家》《世本》之意,著其来历,以见家学渊源相承有自,而门第之甲乙,箕裘之隆替,亦可考世次而得之。”然所录实不限于太湖地区,如叶芳嘉《钟山绝顶作》《登长干寺塔》《茅山》《晓行茅山道中》等已扩展至金陵等地。

是书有乾隆十年(1745)刻本。

《重编锡山文集》二十卷《姓名总目》一卷,王史直、王史鉴编,李兆洛、华湛恩等整理

王史直(1679—1718),字子擎,号慎斋,江苏无锡人,诸生,著有《六经日笺》《宋史义例》等。王史鉴,王史直仲弟,字子任,诸生,著有《醉经堂经说杂著》《醉经堂文集》《宋诗类选》等。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

人,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编著有《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养一斋集》《旧言集》《骈体文钞》《凤台县志》等。

华湛恩(1788—1853),字孟超,号紫屏,无锡人,著有《春秋年月日考》《纲目志疑》《后汉三公年表》《锡山志稿》《锡山艺文志》等。

王氏兄弟所编原稿分“文集”与“献集”二编,献集“记人物之事实”,文集“录古今之诗文”,书稿久藏于家。道光二十年(1840),华湛恩因修志事访其书,发现原稿“献集”已“朽蠹略尽”,“文集”则残缺失次,遂邮致李兆洛,乞为缮完。经李兆洛、华湛恩等人整理,“文集”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刻出版。

书前有出版者邀请梁章钜、董用威、侯桐、李兆洛所撰之序及华湛恩序目,又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王史直原序、乾隆四年(1739)任兰枝序。值得一提的是,李兆洛《重修锡山文集序》作于“道光辛丑夏五月”,距其逝世(此年农历六月初八)只有月余时间,是其人生最后的数篇文字之一。

卷一为赋,卷二为制诏、册文、策问,卷三至卷六为奏疏,卷七为颂、箴、铭、赞、启,卷八为疏,卷九、卷十为序,卷十一为题跋,卷十二、十三为记,卷十四为疏、引、论、杂著,卷十五为传,卷十六为书事、碑,卷十七为行状,卷十八、十九为墓志,卷二十为墓表、祭文、哀辞。录文“皆邑先贤学问、经济之文”,已载于县志者,不复重录。

《昭阳述旧编》三卷,李福祚编

李福祚,字学山,江苏兴化人。是集分《桑梓述》《蟠根述》《苔岑述》三编,作者解释云:“曰桑梓述者,录乡先正之作也;曰蟠根述者,录敝族先人之作也;曰苔岑述者,录四方名公赠答之作也。”是编主要选录历史上与兴化人唱和之作、编者本族作品等,以诗为主,录文为辅。有咸丰七年(1857)刻本。

《虞邑遗文录》十卷《补集》六卷,陈揆编

陈揆(1780—1825),字子准,江苏常熟人,诸生,清代藏书家、文献学家。常熟在明清时期藏书家辈出,陈揆与同邑藏书家张金吾为至交,张金吾称:“吾邑藏书,自汲古毛氏、述古钱氏后百六十年来,无继起者,至君与金吾而此风复振。”^①陈揆据已私藏编有《稽瑞楼书目》,另撰有《琴川志注草》

^① 张金吾:《陈子准别传》,见张金吾著、郑永晓整理:《爱日金庐文稿》,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稽瑞楼文章》等,辑有《稽瑞楼杂钞》等。陈揆非常重视常熟文献的搜采,地方文献是其藏书的一大特色,“凡邑中著述,自宋元迄今搜罗殆遍,度诸破山寺之救虎阁,不下四百余种”^①。陈揆去世后,藏书多为同邑藏书家翁心存、铁琴铜剑楼瞿氏购得。

《虞邑遗文录》十卷、《补集》六卷是陈揆编纂的常熟文学总集,孙原湘在《陈君子准传》中记此事云:“又蒐辑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佗文集之有关吾邑者为《虞邑遗文录》十卷、《补集》五卷。”^②常熟人士对本地诗文的辑录,明代已展开,《四库全书》便收录有明代杨仪《古虞文录》二卷、《文章表录》一卷、张应遴《海虞文苑》二十四卷等。杨仪《古虞文录》《文章表录》为常熟通代文选,张应遴《海虞文苑》则专收明代常熟人作品。陈揆《虞邑遗文录》《补集》在篇幅上较杨选为大,在选文时代上较张选为广,录唐宋元三代常熟作品,诗、文并录,其中《虞邑遗文录》前六卷录文,后四卷录诗,《补集》前三卷录文,后三卷录诗。

陈揆稿本后为常熟翁心存所得,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847—1848),翁氏命人过录副本,并亲自校勘,是为翁氏陔华吟馆抄本。抄本书末有翁心存跋,其云:“《虞邑遗文录》十卷、《补录》六卷,亡友陈子准集。道光丁未戊申间,命仆杨春录其副,凡得三册,置诸行篋,未遑是正也。己酉十一月初吉,休沐之暇,始以子准手稿初校一过。子准目短视,作字细如蝇头,非予拾莫能辨识。然读之殊非目力,每终一卷,昏炫良久。恐鲁鱼亥豕,尚未及细讎,俟它日当覆勘之。九日壬寅冬至,日躔星纪之次,遂庵识于澄怀直庐之矩室。”

今陈氏稿本尚存九卷,即《虞邑遗文录》存第五至第十卷,《补集》存第二至第四卷;钱氏抄本为足本,前无序,天头处有翁心存校记,《补集》卷末有翁氏跋语。稿本、抄本俱藏于国家图书馆。

《海陵文征》二十卷,夏荃编

夏荃(1793—1842),字文若,号退庵,江苏泰州人,著有《退庵文钞》《退庵笔记》等。

夏荃在编成《海陵诗征》后,又编《海陵文征》,分录海陵(今江苏泰州)诗、文。《文征》书前有李璋煜、陈金诏、王广业序,末有邓清麟跋。是书意在以人存文、以事存文,不专以辞章之美为标准,

《凡例》云:“是辑专为桑梓文献起见,诸家撰著安得一一精能?然其事果有关系,文即不工,例得采入。若必律以先秦两汉、唐宋八家之文,吹毛索瘢,则非仆所敢知。”选文上自李唐,下迄清代,以时代、作家排序,如卷一录张怀瓘十一首、陈觉一首,卷二录史原一首、曹辅一首、周麟之二十六首。同一作家之文,又以文体排列,卷一张怀瓘《书断论》《六体书论》《评书药石论》《文字论》等论体文集中一处,卷十八《海安镇关壮缪侯庙碑记》《亳州贞女士王素贞记》《李女士二女子双节记》等记体文集中一处。在编选思想上,编者看重选本的教化功能,以之为选文的重要标准,《凡例》解释是集缘何偏爱张符骧文云:“国朝邑以古文名者,首推张海房太史,且其文多阐扬忠臣、孝子、烈妇、义夫之事,有功世道人心不浅,故所收极富。”

是书有光绪九年(1883)补刻本。

《吴郡文编》二百四十六卷,顾沅编

顾沅(1799—1851),字澧兰,号湘舟、沧浪渔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代藏书家,编刻有《吴郡明贤图像赞》《赐砚堂丛书》《娄东文略》等。

《吴郡文编》始创于道光四年(1824),录成于道光七年(1827),系在苏州前代文章总集基础上编成。书前《例言》指出,南宋郑虎臣《吴郡文粹》十卷“上溯汉唐,迄于宋代”,明代钱谷《吴郡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录自宋南渡暨有元一代,下逮明之中叶而止”,吴伟业《吴郡文献》三十卷则“汇两家之书,益以隆、万及末季之文”。顾沅在前代三书基础上,去其重复,增选遗文,又新增清代以来苏州文章,编成二百四十六卷苏州文章渊薮。

《吴郡文编》不以文章辞美为选录标准,实为地志类的“文征”之作。全书分志序十卷、堤防十卷、山水游记九卷、水利十卷、赋役十卷、桥梁坊巷四卷、公廨十卷、学校十七卷、坛庙二十卷、僧寺十五卷、道院二卷、宅第园林十九卷、列传十七卷、政绩四卷、记事四卷、赠送十卷、庆挽五卷、行状五卷、冢墓二卷、墓碑十二卷、墓志碣二十二卷、书序十卷、集序十四卷、书画金石四卷、杂文四卷、赋四卷。选文皆与苏州有关,如志序类主要收录历代苏州地区方志序跋,有《吴郡志序》《苏州府志序》《吴县志序》《昆新两县志序》《震泽县志序》等。堤防类收录苏州城建、地形、防御类文章,如《吴山

① 孙原湘:《陈君子准传》,《稽瑞楼文章》卷首,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1b页。

② 《稽瑞楼文章》第2a页。按:“五卷”非,《补集》实为六卷。

总记》《吴县城图说》《备倭事略》等。卷数最多的坛庙二十卷,除了收录如《重修城隍庙记》《灵姑庙碑记》等民间信仰类坛庙记文外,更多的是对苏州历代文化先哲祠庙记文的收录,如《重修泰伯庙记》《春秋二祀子胥祝文》《顾野王祠记》《文正范公祠记》等分别祭祀泰伯、伍子胥、顾野王、范仲淹等,凸显了苏州人文渊藪的地域特征。其他如宅第园林十九卷、学校十七卷,在全书所占比重也非常大,与苏州以园林闻名和文教兴盛的特征相符。

是书稿本现存苏州博物馆,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版,前有清人朱珪、石韞玉、梁章钜、董国华序,末有王同愈跋。

《唐市征献录续编》二卷,张璐编

张璐(1810—1858),字宝卿,又字子佩,亦作芝佩,室名白圭榭,江苏常熟人,著有《白圭榭古文稿》《渔石剩草》等。

嘉、道间常熟人倪赐编有《唐市征献录原编》二卷,辑录与唐市(常熟)有关之人物传记、序跋、碑志等文。张璐此书为其续编,分上、下二卷。卷上录《明史·许士柔传》、王峻《顾亭林先生传》、陶贞一《虞邑先民传略》、王材任《谭孝子传》、何忠孝《汤孝子传》、顾炎武《陈君鼎和墓志铭》等,以人物传记为主。卷下有顾镇《吟亭诗录序》、沈德潜《红桥诗文序》、屈轶《乡贤许公祠堂记》等,以诗文序跋、碑志为主。

是书有光绪刻本。

《松陵文录》二十四卷,凌淦编

凌淦(1833—1895),字砺生,号退庵,又号东海季连,江苏吴江人(今属苏州),咸丰九年(1859)举人。

书前有黎庶昌序,又有柳兆薰后序,柳序评此书有三善:“邑志修自果堂沈先生,历今百余年,《录》中传状可资重修采择,一善也;未刻诸集,亟亟登录,具阐幽之意,二善也;文以载道,明体尤贵达用。《录》中多有用之文,与陆朗夫中丞《切问斋文钞》之例相发,三善也。”

是集录文始于清初,迄于道咸,凡三百五十余篇,不录存者之文。参姚椿《国朝文录》文体分类,卷一至卷六为论辩,卷七至卷九为序跋,卷十至十三为书牋、赠序,卷十四、十五为杂记,卷十六至二十为碑铭、传状,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词赋,卷二十四为祭文、哀词。

是书有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国朝金陵文征》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陈作霖编

陈作霖(1837—1920),字雨生,号伯雨,晚号可园老人。江宁人(今江苏南京),光绪元年(1875)举人。著有《金陵通纪》《金陵通传》《可园备忘录》《可园诗存》《可园词存》等,参编《续纂江宁府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续金陵诗征》等。

是书卷首含“凡例”“目录”,卷末含“叙录”“后序”。受晚清“骈散合一”思想影响,编者认为“单行、俚语,殊途同归”,故集中骈文、散文兼收。是集主于阐幽发微,对于久行于世的别集,则选取有关于掌故者录之。入选者以人均一、二首作品为主,较多者有汪士铎四十首、端木埰二十二首、梅曾亮十七首、管同十五首、杨长年十四首、甘元煥十四首、刘岩十四首、何延庆十二首、程廷祚九首、徐鼐九首、朱绪曾八首、黄之纪六首、张怡五首、梅冲四首等。

是书按时代排次,卷一为顺治初、卷二顺治季、卷三康熙中、卷四雍正中、卷五乾隆中、卷六嘉庆中、卷七卷八道光初、卷九至十一道光季、卷十二至十四咸丰中、卷十五同治中、卷十六光绪中,可见编者对晚清文尤为重视。

是书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海虞文征》三十卷,邵松年编

邵松年(1849—1924),字伯英,号息盦,江苏常熟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河南学政。曾辑有《续中州名贤文表》《中州试牍》,又曾协助庞鸿文纂修《常昭合志》。

是书为修志的副产品,《例言》云:“是编因修志而辑。凡旧志所载诗文甚夥,不能尽行采入,遗之又将年远无征。随时抄录,汇为是书。”录文来源于《琴川志》《常熟县志》《常熟文献志》《昭文县志》《常昭合志》《古虞文录》《虞邑遗文录》等十九种文献。邵松年重在以文来记录一邑掌故、事迹,故“无论是否邑人,凡有关于邑中者,悉采入”,少数著作无存者之文,虽无关掌故亦选录,可见是编以事存文、以人存文的编纂原则并存。在编排次序上,仿《文选》例,按文体分类,记录地方事迹的谱牒序、方志序、学记、碑文等尤多。

是书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印本。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三十一卷,屠寄编

屠寄(1856—1921),字敬山,一字静山,号结一宦主人,晚号无闷居士,江苏武进(今属常州)

人,清末民初史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任广东舆图局总纂。民国时历任武进县民政长、国史馆总纂等。主修《广东舆地图》,另著有《蒙兀儿史记》《结一宦诗略》《结一宦骈体文》等。

清代骈文中兴,而江苏骈文的创作实绩尤为突出,遂在地方总集中出现了骈文总集。目前可知的三种清代地方骈文总集,皆出自江苏,即姜兆翀《松江骈体文见》、曹允源《吴郡骈体文征》和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姜、曹所选分别是清代江苏松江、苏州二地骈文,然二书皆未刊行流传,目前可见其书的,只有《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前三十卷按人排序,“略以诸先生辈行为后先”(《叙录》),选录常州八郡骈文家四十三人之骈文五百六十九篇,录文以洪亮吉、李兆洛、赵怀玉等人为多。第三十一卷为《叙录》,总结常州骈文创作成就,并对全书选录的四十三家逐一点评。书末附有屠寄自著《结一宦骈体文》。

《毗陵文录》八卷,赵震编

赵震,字少芬,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编有《毗陵诗录》《毗陵文录》等。

书前有周葆贻序、沈湛钧序、凡例、姓氏科第志略,末有黄绮跋语。明清两代常州地区文学繁荣、名家辈出,尤以清代为盛,袁枚有“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仿元遗山论诗》)之评,龚自珍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之赞。周葆贻序引袁、龚之说,又历数唐顺之以下的常州古文名家,为清代常州文家开出了一份名单。清代常州骈、散文皆盛,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对骈文已网络殆尽,“所遗无多”,故《毗陵文录》不复采录骈文,专收散文,有“聊存轨范”之意。清代常州散文中,又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文派为著,赵震在《凡例》中对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关系予以强调:“阳湖古文,源出桐城,无与桐城角立门户之见。然阳湖究不能强同于桐城者,则桐城守义法而阳湖尚气识。”在张之洞《书目答问》将阳湖文派与桐城派并立之后,“是编于《书目答问》所举五家外,复增广之,虽为例微宽,而大体不甚相远”,进一步以文选的方式突出阳湖派的独立特质。

是书自清初陈玉璠始,至民国史敬终,收录清代常州文家一百一拾伍人,邵长蘅、恽敬、张惠言、吴士谩、李兆洛等常州文章名家悉数入编。编者

在选择篇目时,除与常州有关之作外,还对与晚清时局相关的作品较为关心,收录有赵烈文《淮军平捻记序》、周腾虎《上江苏巡抚李少荃中丞书》、杨葆彝《东南纪略序》、屠寄《答尹丈仰衡论广东舆地图书》《游香港记》等。

是书编成于民国年间,现有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附:被误视为地方文总集的文集三种

《松陵文献》十五卷,潘恂章撰

潘恂章(1626—1663),字圣木,号力田,江苏吴江人,潘耒之兄。明末清初史学家,康熙二年(1663)因受庄廷鑑明史案牵连,被凌迟于杭州,著有《国史考异》等。

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十九《总集类》下设“地方文之属”小类,该类列出的第一部著述是潘恂章《松陵文献》。今按,此书并非地方文总集。据《松陵文献》潘耒序,可知潘恂章原计划编纂成“文集”与“献集”二编。“献以纪先贤至事迹,文以录邑人之诗文”。后“文集未成而遭浔溪之祸,献集得诸烬余。后三十年,耒乃克校而梓之”。因“文集”未成,康熙三十二年(1693)潘耒校刻的实际是《松陵文献》的“献集”,今所见传世本《松陵文献》也只有这半部而已。《松陵文献》“献集”分人物志、官师志二类,是潘氏为吴中历代人物撰写小传之合集,实为史部传记类著述。

《海州文献录》十六卷,许乔林编

许乔林(1775—1852),字仲贞,号石华,海州人(治所在今江苏灌云县),编有《胸海诗存》等,曾为李汝珍《镜花缘》作序。

《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收录此书。是集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前有麟庆序。与地方文总集或以文体、或以时代为次不同,《海州文献录》按方志类目分卷,卷一《方域录》、卷二《群山录》、卷三《水利录》、卷四《胜迹录》、卷五《票盐录》、卷六《仓储录》、卷七《学校录》、卷八《祀典录》、卷九《寺观录》、卷十《宦绩录》、卷十一《人物录》、卷十二《列女录》、卷十三《艺文录》、卷十四《金石录》、卷十五《杂缀录》、卷十六《考证录》。每卷以海州地方名胜、遗迹等为条目,先做阐释,再引相关作品。如卷二《群山录》中,有“鳌头山”条,先介绍此山得名缘由、地理位置,再引述陶澍《鳌头山诗》;“胸山”条,先介绍地理位置,再录金

代党怀英《胸山驿亭阻雨》《胸山吊石曼卿》。清代地方总集虽有方志化倾向,但作为作品总集的属性仍在。就《海州文献录》而言,完全以方志体例编成,所录作品成为地方人、事的佐证,与地方总集有别,应归入方志类为宜。许乔林另编有《胸海诗存》,则为海州文学总集。

《秣陵集》六卷,陈文述编

陈文述(1771—1843),初名文杰,字谱香,又字隼甫、云伯,后改名文述,别号元龙、退庵、云伯,又号碧城外史、颐道居士、莲可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时举人,官昭文、全椒等知县,著名诗人,著有《碧城诗馆诗钞》《颐道堂集》等。

《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收录此书。是集为光绪十年(1884)淮南书局重刻本,今按,此书应属方志性质,非地方文学总集。如序文后的《吴越楚地图考》《春秋秣陵县图考》《汉丹阳郡图考》《孙吴都建业图》《东晋都建康图考》等皆是一图一文考证金陵城建历史变迁。书中如“吴王剑池”“燕雀湖”“徐中山王旧宅”等以金陵名胜、旧迹为条目,考证位置、参以诗文。其体例,正如钱杜序云:“自春秋以逮胜国,莫不叙其缘起,加之考订,参以论断、题咏而赞叹之。”非地方文总集甚明。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13页)

- [8]张洁.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实习生职业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9):21-23.
- [9]王琰,朱静.职业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及其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5(6):119-121.
- [10]李亚真.大学生生涯发展的相关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5.
- [11]闫师欧.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对职业价值观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 [12]凌文铨,方俐洛,白利刚.我国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研究[J].心理学报,1999(3):3-5.
- [13]谭华玉.家庭环境、职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互关系——基于广东省5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6):59-62.
- [14]陈立,杨琼.特殊教育师范生专业认同与学习倦怠、学习效能感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8(1):39-45.
- [15]王姣艳,万谊,王颖.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认同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机制[J].中国特殊教育,2020(3):35-41.
- [16]赵斌,张燕.新中国七十年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成就、问题与走向[J].中国特殊教育,2019(11):3-9.
- [17]闫建璋,毛荟.师范生教育实践环节及保障机制探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19):34-37.
- [18]罗晓杰,牟金江.反馈促进新教师教学反思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16(1):96-102.
- [19]柴江,王军.特殊教育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4(11):8-14.
- [20]刘礼兰.特殊教育教师流失的现状、成因与对策研究[J].教师教育论坛,2017(3):32-37.
- [21]陈立,杨鹃.职业认同与特殊教育教师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7(2):25-30.
- [22]杨克瑞.改革开放40年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推进[J].中国教育学刊,2018(5):31-35.
- [23]欧阳忠明,黄慧,王燕子.高职毕业生生涯适应能力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8(11):48-54.
- [24]沈雪萍,顾雪英.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职业自我效能和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18(6):546-550.

(责任编辑 师语)

溪山风日好 莫教清音稀

——“非遗”视野下的阳羨曲会研究

段宝君^{1,2}

(1.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继一年一度苏州“虎丘曲会”后,发端于2014年清明时节的无锡宜兴“阳羨曲会”,一跃成为国内昆曲界的另一大盛会。同一个苏南文化区相继出现两个大规模的昆曲盛会,实属罕见。这场盛会与日常聚会不同在于,曲友们在固定的时间(清明时节)、固定地点(宜兴),从海内外自发地赴会,他们遵循着“清唱”的传统演唱方式,进行传统曲目的传承。从“非遗”视角出发,通过对第六届宜兴阳羨曲会的田野追踪,对民间曲会的盛况进行反思,其背后隐藏着宏观侧面——“国家在场”、中观侧面——表演艺术与理论研究的双趋势发展、微观侧面——民间曲社的活态传承。阳羨曲会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非遗”背景下昆曲生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非遗; 阳羨曲会; 昆曲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71-04

自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起,国家相继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昆曲扶持专项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计划”等。在“非遗”政策的推动下,昆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苏州,作为昆曲的发源地,每年中秋之夜,聚集虎丘、吟咏较艺。发端于“元末明初”^{[1]245},后于2000年正式恢复的苏州虎丘曲会,成为苏州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民间昆曲集会。然而距离苏州不足50公里的无锡地区,同样有着浓郁的昆曲沃土。无锡市下辖的县级市宜兴,自2014年清明节成功举办阳羨曲会起,成为继苏州虎丘曲会之后,同一个苏南文化区域出现的第二大昆曲盛会,国内实属罕见。这场盛会与日常聚会不同在于,曲友们在

固定的时间(清明时节)、固定地点(宜兴),从海内外自发地赴会,他们遵循着“清唱”的传统演唱方式,进行传统曲目的传承。从“非遗”视角,对阳羨曲会的关注与思考,乃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阳羨曲会的文化生态

阳羨曲会,作为无锡宜兴地域的一场昆曲盛会,其兴起与区域文化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昆曲发端于元明之际的昆山腔,而推动昆山腔最终形成、关键性的群体活动,便是元末昆山顾阿瑛主导组织的玉山雅集。然而在这场重要的群体活动中,早已出现了无锡人的身影——顾阿瑛的远亲、无锡元代著名文人画家倪云林。作为玉山雅集的主要成员,无锡人参与并见证了昆山腔的打磨和成熟。

自嘉靖年间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后,昆山腔压倒其他声腔,一跃成为江南乃至全国剧坛之首。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性研究——以个性化音乐治疗为例”(项目编号:2019SJB155)。

[收稿日期] 2020-07-10

[作者简介] 段宝君,女,安徽界首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金陵吴趋余杭之里，邸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2]10}。无锡作为盛唱昆曲的地区之一，从而形成了“无锡唱口”的重要流派。潘之恒在《亘史·曲派》中说：“无锡宗魏而艳新声”，“皆能少变自立”，号称“锡头昆尾”^{[3]267}。无锡历史上的昆曲家班诸多，仅万历年间，邹迪光就拥有两套家班，其家班规模与优伶质量堪称江南之最。同一时期，还有寄畅园园主秦家班等。在《寄畅园闻歌记》中，不仅记载了寄畅园曲叙的盛况、留存了魏良辅革新昆曲的原始情况，而且记录了无锡人陈梦萱、顾渭滨等参与昆曲改革的事迹。此外，无锡昆曲爱好者的行会组织“曲局”，起源于明末，其优良传统承续了三百余年，至1920年更名为“天韵社”。

无锡市下辖的县级市宜兴，濒临太湖，古称荆溪、阳羨。该地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自明代的“宜兴之潘”跟随曲圣魏良辅习唱昆曲，到民国元年宜兴曲友成立协和会，昆曲在宜兴已流传了约四百余年。其间，曲家、剧作家灿若群星，家班、曲社累代不绝，诞生了如邵璨、吴炳、陈氏的陈于鼎、陈贞胎、陈贞禧和陈维崧叔侄兄弟^{[4]174}等宜兴的曲家群体。有着良好昆曲生态的无锡宜兴，出现如虎丘曲会一样的阳羨曲会，不是偶然，则是在“非遗”背景下，昆曲生态发展的必然。

二、阳羨曲会的盛况

1. 缘起

自昆山腔成为江南乃至全国剧坛之首起，昆曲成了江南社会的生活方式。春暖花开，郊游汇友，赏春度曲，不仅是江南人社会生活的剪影，更是阳羨曲会发展的雏形。据无锡天韵社社长陈倩回忆：“最初宜兴昆曲社高社邀请我们几位好友来宜兴踏春唱曲，大家觉得都不错，第二年我们又相约聚在一起，由最初的几个人到十几人到现在的几百人，队伍越来越庞大。”^①陈社提及的高社，乃阳羨曲会的创办者高峰，现任宜兴昆曲研习社社长，多年来从事于昆曲艺术的研究与推广。他所创办的宜兴昆曲社与无锡天韵社，都推崇昆曲的演唱传统——清唱。

本是好友们之间的聚会，伴随着时间的积累，如同涟漪一样，将散落在各地的昆曲爱好者凝聚在一起。当笔者问及宜兴昆曲社社员，本次参

人数是否最多的时候，他们很自豪表达“年年都在创新高”。本次阳羨曲会参会人员约230人，来自海内外35个城市，包括香港、台北、洛杉矶、温哥华等，参会曲社42家，会唱3天，共演32折曲目。毋庸置疑，阳羨曲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是国内昆曲界公认的昆曲盛会。

2. 纪实

阳羨曲会作为江南地域的昆曲盛会，诸多细节足让人感受到江南文化的温婉和主办方的细腻。精美邀请函均使用毛笔，以小楷繁体手写而成。曲会签到台，更是以宣纸打底，檀木压面，附砚台、笔墨签到。会场设在宜兴市王子湾酒店内，可容纳约400多人，主席台两侧均设有播放曲谱的LED大屏。参会者从年龄上看，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到在读的大学生，形成以中青年曲友为主力，以老年曲友为后盾的有序梯队；从职业和范围上看，曲友们来自国内外各个城市的各行各业；从学历和性别而言，他们之中有近一半为研究生学历，且男性曲友占据多数。

阳羨曲会，依旧采用“同期”。“同期”是昆曲传统的演唱方式，即不化妆、不带身段，以坐唱的形式完成整首曲目。正是由于表演过程中只有念白和演唱，因此对表演者昆曲唱念的字韵、声腔、节奏等更为严格。这恰恰是目前各地民间曲社推崇的方式。

除了同期坐唱外，近几年曲会的主办方格外注重昆曲理论的研究，第六届曲会特设半天的昆曲研究研讨会，特邀国内外知名曲家和学者进行专场探讨。

台上表演精彩绝伦，台下准备紧张有序。此刻，台上演出的曲目《哭像》，由管皓扮演唐明皇，刘昂扮演高力士，陈红霞等人扮演内侍宫娥。描写的是安史之乱后，唐明皇为了表达对杨玉环的思念的故事，其主题是一个“哭”字。该曲目是高难度的大官生戏，其伴奏场面宏大，除了一般曲目的伴奏乐器外，还增设了琵琶两部和唢呐一支，通过宏大的音响效果以体现皇家的气派。高力士的演唱者乃北京昆研社社长刘昂，他的表演，气息行腔，虚实相济，轻重徐疾，一气呵成，将人物高力士刻画的惟妙惟肖。唐明皇的演唱者管皓，凭借着金属之声的嗓音，将唐明皇的深情、追悔、凄婉表

① 采访对象：天韵社社长陈倩，采访时间：2019年4月5日，采访地点：宜兴阳羨曲会会场。

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不失一个君王的雍容、大器。

3. 焦点

历史最悠久、声名最著的清唱团体——天韵社的参演,无疑是阳羨曲会的焦点。天韵社,前身为明代天启年间的无锡曲局,因社规严谨、教授得法,自道光之后,人才辈出,其中代表音乐家有吴晚卿、杨荫浏、曹安和、朱勤甫等。

天韵社的此次参演,无论是人员安排,还是曲目选择颇具代表性。由天韵社社长陈倩担任演唱,社员伍虎勇担任板鼓伴奏,特邀宜兴昆曲社的钱骁担任笛子伴奏。伍虎勇出生于道教世家,不仅是无锡道教音乐省级传承人,而且是民国时期无锡道乐“十不拆”成员伍鼎初的后人。在曲目选择上,则选用天韵社前辈曹安和传承的代表作《金锁记·斩窦》^①。

《金锁记》,“是明代叶宪祖根据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改编、由清代袁于令改定的一部传奇剧本”^②。杨荫浏根据清末天韵社传唱的实际腔调所作译谱。天韵社内历来相传:“‘斩窦’折‘正宫端正好’中曲牌、歌词和关汉卿《窦娥冤》几乎完全相同,这开始二曲与昆曲中现今所用其他唱段不同,应是传自元曲的古老曲调”^{[5]552}。该作品在音乐上,曲调质朴少雕琢,却分外真挚感人,音乐的表现和唱词互相补充,堪称戏剧音乐一段千古绝唱。

三、“非遗”背景下的民间曲会反思

1. 宏观侧面——国家在场

自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起,备受社会关注。2005年起,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精神,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对昆曲进行连续1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体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201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2年起,文化部启动“名家传戏——当代昆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建立昆曲艺术的人才传承创新机制。2015年,昆曲被文化部作为扶持专项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计划”。2016年3月,

“戏曲振兴工程”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标志着国家对昆曲艺术的保护扶持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国家宏观政策影响下、国家昆曲工程积极推动和资助下,昆曲呈现多势头的迅速发展。全国专业昆剧院团每年不少于20场的进校园演出,青年一代已经成为当今昆曲的受众主体。各地民间组织的昆曲社,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如雨后春笋般,以苏南文化区为核心,向全国及海内外华人进行辐射。各地昆曲的交流互动密集进行,阳羨曲会则是诸多昆曲交流活动中其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一个缩影。透过今日阳羨曲会的盛况,不难看出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国家在场的密切相关。

2. 中观侧面——昆曲表演与理论研究的 双趋势发展

当下的民间昆曲发展,呈现出注重表演艺术与理论研究的双趋势。阳羨曲会中来自四面八方的表演者,其背后都有着严谨的戏曲师承体系。如曲目《惊梦》杜丽娘的演唱者管怀明老师,乃著名戏曲史家和藏书家周明泰堂妹周铨庵的弟子;柳梦梅的演唱者赵卫老师,早年研习京剧言派,后跟随昆曲度曲家柳萱图等研习昆曲,实属师出名门。曲目《玉簪记·秋江》中扮演艄公的章彬,师承浙江的李公略(周传英的关门弟子)等。阳羨曲会中,这样的名门弟子比比皆是,其表演水平之高,齐聚阳羨曲会,在国内昆曲界罕见。

阳羨曲会除了呈现出高水平的昆曲表演外,昆曲理论研究专场讲座,则呈现出高水准的研究态势。如汪青山在《昆曲曲牌的属性特征与运用》的讲座中,从曲牌的属性特征之意义,衍生到曲牌的十五项属性特征,并对如何去认知曲牌进行详细阐述。迟凌云在《昆曲字音声调与唱念的关系》讲座中,通过若干个图示,详细讲解汉字字音阴阳四声的调值等。他认为:昆曲的“依字行腔”,承袭与汉文化的“以文化乐”。昆曲行腔实则依字行腔的乐式格律,它的声腔演唱是一门“吟字”的艺术。倘若字的四声声调念不准确,对四声调值不理解,很难窥探昆曲“依字声行腔”的声腔格律与传统文化音乐的理念与精髓。张丽真以《〈曲苑掇英〉唱

^① 该曲谱由曹安和的弟子孙玄龄老师学习并保留至今,他得知天韵社复社后,将珍藏几十年的学曲资料、曹安和先生生前使用的《天韵社曲谱》捐赠给天韵社。

^② https://mp.weixin.qq.com/s/n0ANynel6Rw2X1-K_LZZPQ

法讲解浅谈》为题,认为王正来的《曲苑掇英》是以“俞派唱法”为基础,其清曲、剧唱互融具有高度的审美性,其师承及理论具有深刻的规范性。她就曲谱中的干寒韵、闭口音等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对如何发声归纳为字音线条的轻重、长短、虚实变化;对王正来老师提到的“落腮口法”“三叠腔”在曲谱中的实践进行示范讲解。毋庸置疑,昆曲理论的研究对于昆曲表演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相得益彰。在“非遗”影响下,昆曲表演和理论研究的齐头并进,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文明绵延的重要体现。

3. 微观侧面——民间曲社的活态传承

透过参加阳羨曲会的42家民间曲社,不难发现昆曲在“非遗”影响下的发展轨迹和活态传承。

以宜兴昆研社和无锡天韵社为例,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两社各设有专门的活动场地,每周固定时间进行昆曲传承。天韵社每周日下午在无锡市滨湖区中南社区活动中心开展活动,宜兴昆研社则是每周六下午在宜兴市宜城街道东庙巷周王庙内进行活动。两社的日常传承活动分为拍曲和讲座两种类型。除此之外,两曲社之间定期举办雅集交流活动,如历史上1928年,在杨荫浏牵线下,宜兴协和社与无锡天韵社的会唱;2018年11月24日纪念“双清和韵”纪念1928年无锡天韵社与宜兴协和会会唱90周年的活动等。目前两社社员均为40—50人之间,以中青年曲友为主,呈现良性传承发展态势。

除了日常昆曲传承活动外,宜兴昆研社和无锡天韵社还注重昆曲史料的挖掘和口述史的搜集。宜兴昆研社社长高峰,挖掘整理了道光时期昆曲曲谱《祝英台近山房曲谱》、宜兴前辈曲友储森书手抄曲谱,采访了民国时期昆曲协和社社员的后人,采集记录了回忆资料。无锡天韵社社长陈倩,除了将“无锡唱口”重现于世外,挖掘史料,

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影印出版了一百年前的油印本《天韵社曲谱》,让“无锡唱口”有本可依,有谱可查。

四、结语

阳羨曲会,将四面八方的昆曲爱好者齐聚无锡宜兴城,水平之高、规模之大,可谓是昆曲盛世之缩影。如同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所讲:昆曲现在的形势,恐怕是近百年来少见的好形势^①。台上“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霄”^{[6]137},台下“心血为枯,不敢击节,唯有点头”^{[7]70}。透过阳羨曲会,不难发现,昆曲已成为当下的“中国好声音”。这场昆曲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宏观侧面国家“非遗”的政策扶持、中观侧面表演艺术与理论研究的双趋势发展、微观侧面民间曲社的活态传承。在国家在场的时代背景下,衣食足而知荣辱,昆曲才有了当下稳定的传播方式和可持续的传承群体。

[参考文献]

- [1] 杨瑞庆. 曲圣魏良辅[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2] 朱琳. 昆曲与近世江南生活——以昆曲为受众群体的考察[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6.
- [3] 吴新雷主编. 中国昆剧大辞典[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 杨惠玲. 明清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 [5]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中国艺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6] 熊礼汇选注. 袁中郎小品[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 [7] 魏崇武选注. 张宗子小品[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南山)

^① 采访对象:蔡正仁,采访时间:2018年7月19日晚上,采访地点:南京。

论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性

姚公涛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2)

[摘要] 格拉迪瓦形象具有多重面孔,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为了强化人物印象的不确定,文本设置了适合人物活动的虚拟背景,建造了适于不确定形象活动的迷宫;采用不同视角交替叙述,是构成格拉迪瓦形象不确定的又一手法;文本还巧妙地采用重要叙事功能反复的手法,增强女主人公形象的不确定性。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性,体现了格里耶对现实世界的不完整、不确定的基本认识;并借助形象的不确定性,扩大了叙事时空,增强了故事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 格拉迪瓦; 形象; 不确定性; 构成方式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75-05

格拉迪瓦是罗伯-格里耶2002年出版的电影小说《格拉迪瓦在叫您》的女主人公。在这部电影小说中,格里耶成功地借鉴实验小说的叙事技巧,在扑朔迷离的叙述中,使故事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故事的背景是不确定的,时间上有现代、一个多世纪前和古罗马时代的交错穿越,空间上则有伊斯兰教区、绘画作品中的场景和男主人公梦境(虚拟空间)的混合并呈。在如此混杂不确定的故事背景上,来回穿越的女主人公形象的不确定性及其意义,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一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研究东方学的欧洲学者约翰。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古典美女和现代女郎相混淆可能叫格拉迪瓦的形象,由于她在学者约翰的脑海中长期占据重要位置,在故事中也占据着事实上的C位。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约翰的脑海中,还是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格拉迪瓦形象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犹如川剧变脸似的具有多重面孔,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值得我们费点气力去解读。

读者视野中的“格拉迪瓦”,是古罗马时期著名雕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格拉迪瓦,或许是一个多世纪前与画家德拉克洛瓦有关联的女模特,还可能是出现在现代学者约翰幻觉中和生活中的女演员。这一形象首次出场就不够明朗,当时学者约翰在马拉喀什一座旧城堡,借助投影机看一个世纪前的一些速写和油画,他听到两个女人在窗下用阿拉伯语对话,于是走到窗边俯下身:“发现一个金发的女骑士,他看不见她的脸,她转了半圈沿小街走下去。她穿着梦幻般的服装,隐约的摩洛哥风格,明显是个欧洲女人。观众会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可能是蕾拉,随后想到格拉迪瓦。”(以下文本引用都出自阿兰·罗伯-格里耶著《格拉迪瓦在叫您》,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一般而言,叙述者可以让读者感受约翰视野中的女主人公的不确定,但这里的叙述却用“观众会想到”,将读者一开始就直接导入女主人公的不确定状态。接着出现了一组图像,“让人清楚地想起名叫格拉迪瓦的著名罗马浮雕的特殊姿态。还有一个年轻金发女子神秘的面孔。但接下来是些活着的女孩的照片,她们大多摆着死去的姿势。……最后一张照片

[收稿日期] 2020-03-16

[作者简介] 姚公涛,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片展示的是蕾拉的脸部特写,狡黠而轻蔑地微笑着”。格拉迪瓦形象从一个女骑士延伸到一个现代女孩,从一个100多年前坠入爱河的欧洲女孩形象,延伸为上联古罗马、下接现代生活的穿越女子。在约翰身边第一次直接提及“金发女郎”的,是那个为他带路去找古董商的盲人:“关于那个金发女郎,你看到她走进商店的,但我没有听到,应该有个解释。据说伊斯兰教区里隐藏着一个金发美人的幽灵,她在20世纪因为爱上一个路过的法国人而被砍头了。似乎这个女孩确实存在过……你刚才看到的可能就是她。”这就再次让读者陷入迷宫。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海滩的几个大浪之间发现:“平静的或几乎不动的海前面,格拉迪瓦一动不动地看着摄影机(直镜头还是不?)。她轻盈的纱裙随风在周身飘扬。通过变焦效果,她的形象快速在取景框里变大。”可惜,第四个同样类型的大浪打断了这个变大运动。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格拉迪瓦呢,如果有的话她又在哪呢?终于,穿着1830年代服装的约翰被带到一个海边墓地,在据说是格拉迪瓦墓地的一座坟前,有一块相当大的石板,上面用法文刻着碑文:“纪念一桩未被制裁的罪行。格拉迪瓦复苏1806-1832”。只是此时我们已经无法辨认形象的真伪了!

故事中的被称作蕾拉的女孩是一个与格拉迪瓦相混淆的形象。我们分辨不清谁是她,谁是格拉迪瓦。故事开始不久,她在投影机中以女骑士的身份出现在幽暗的小街上。只是这小街是在昏暗不明的路灯下,路灯又在市政府前,或者在约翰住的大型建筑物的大门口。这样的人物设置一下子混淆了当下与曾经的关系。下一组镜头中,约翰在教区街道直接追踪一个“我们叫她蕾拉”的金发女郎,“她标识性的脸和脚步(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脚步)曾出现在生成房间投影中的素描和投影图像里。”她在与约翰捉迷藏,每当快追上时,她就突然消失,好像钻进了明显没有开口的墙里。约翰很快被转晕:“在稍稍远离车流的一个小广场上,约翰突然看见他的格拉迪瓦走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由于蕾拉没有从商店出来,他决定进去。”当约翰研究格拉迪瓦的悲剧命运时,安那托利告诉他,激动人心的故事,当是“异常迷人的蕾拉的死刑,她因为爱上一个路过的欧洲人而受到

惩罚”。恍惚之中,约翰结结巴巴:“您认为我们的蕾拉-格拉迪瓦是被帕夏的剑子手……的斧头砍死的。”接下来,约翰带我们看到了一张铺着昂贵织物的豪华大床,“床上躺着一具被谋杀的年轻女子的尸体。无疑这是蕾拉,松散的姿势,只穿了件透明的薄纱,使身体的一部分和四肢都露了出来。”蕾拉告诉约翰:“他(德拉克洛瓦)叫我格拉迪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约翰从报纸上抬起眼睛时,他相信发现了蕾拉,在稍微远离人群的地方,穿着同样轻薄的衣服,同样纤细,还有那标志性的舞蹈脚步,从她第一次出现就这样”。这与轻盈的纱裙随风飘荡的格拉迪瓦已经混为一体。

约翰身边的摩洛哥女佣贝尔奇斯,是又一个与格拉迪瓦形象纠缠不清的人物。这也是一个漂亮女孩,有着美丽的黑眼睛。与当年爱上画家的不知是蕾拉还是格拉迪瓦的少女一样,她也疯狂地爱上一个路过摩洛哥的欧洲人,这个人就是研究艺术史的学者约翰。在她身上,演绎着约翰脑海中格拉迪瓦或蕾拉的爱情故事。在约翰沉浸于对格拉迪瓦的迷恋之中时,贝尔奇斯的形象与格拉迪瓦或蕾拉时常重叠于一体。“好像从外面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唱着古老的安达卢西亚歌曲,声调既带着乡愁又野性。一个近镜头表现女仆贝尔奇斯裸身仰躺着,胸的大部分毫无遮掩。……她的动作尽可能模仿德拉克洛瓦的《萨尔达尼拔》中躺在苏丹床上的女人。”她尽可能模仿德拉克洛瓦作品主人的女子,那其实是穿着与格拉迪瓦同样轻薄衣衫的蕾拉。在这里三者混成一体,究竟这个场景是谁的主场,究竟谁在模仿谁,读者难以确定。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只穿一件宽大的白色睡衣衬衫,轻薄透明”的贝尔奇斯,“她躺在大床上,姿势让人想起蕾拉死时的姿势”。

自叙为“梦的演员”的赫尔迈厄尼是与格拉迪瓦形象叠合的又一女子。约翰在金三角看了表现古罗马时代的四幕剧,他在演员中发现了蕾拉,但陪同的克洛蒂娜立即否定:“不!我们的演员不叫蕾拉,叫赫尔迈厄尼。她长得很像那个可能被释放了的年轻白人女奴,给德拉克洛瓦做模特的,我们有很多她的画像。”在金三角13号房间里,“赫尔迈厄尼虽然微笑着,却穿着蕾拉死时穿的轻盈

的睡裙,裙边飘动。”

谁才是真的格拉迪瓦,进一步看,是不是真的有格拉迪瓦这个女子。原来就对格里耶文本提心吊胆的读者,更加无所适从地面对着迷团重重的奇幻迷宫。然而,叙述者还是唯恐读者的脑海不乱,又随手将格拉迪瓦推入珠珠、尼娜和克洛蒂娜等少女群像中,使这位女一号一直陷入不确定之中。

二

从《弑君者》中的主人公开始,格里耶开始在他的故事中塑造许多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物。为了强化读者对不确定人物的印象,他设置了适合人物活动的虚拟背景,建造了与这类人物的活动相辅相成的迷宫。《格拉迪瓦在叫您》的故事也是在一座迷宫式的旧城堡拉开帷幕:“一个赤裸裸的大房间,几乎没有家具,阿特拉斯风格的原始围墙里的城堡,靠近马拉喀什。朝不同方向有狭小的开口,被木窗关上,可能是安德鲁斯风格的。”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反抗宙斯失败,被罚用双手支撑苍天。欧洲人常用他的画像装饰地图册。这里强调人物活动背景的古朴和原始。安德鲁斯古典风格的众多狭小的开口,使我们联想到格里耶早期小说《嫉妒》中的百叶窗,一个一个的狭小开口正对应一页页的百叶窗空隙。在原始背景下,从每一个微小的开口看去,观察对象由不完整带来不确定是极其自然的。蕾拉或是格拉迪瓦第一次正式出现的背景是伊斯兰教区的街道和小巷。她把约翰引导到偏僻的小路上,“每次当他认为已经追上她了,她就突然消失,有点不可思议,好像她钻进了明显没有开口的墙里。”由多个狭小开口为背景的男主人生存空间,到“明显没有开口的”女主人公的进退之地,不确定的主人公显然活动在《在迷宫中》的主人公相似的情景之中。作为故事重要背景的旅馆,尤其是充满血光之气的13号房间,显然也具有迷宫式的神秘色彩。约翰两次看到的同一房间竟然房号不同。无法确定究竟是在13号房间还是12号房间发生过那件血案。进一步推敲,究竟有没有约翰看到的13号房间,约翰真的在13号房间的大床上休息过,似乎也难以确定。那么房间中被害的那个蕾拉或者是珠珠或者是格拉迪瓦究竟是否存在,也是可疑的。更令

人存疑的是,当约翰推开左边房间的门时,这个房间尽然“和他刚才睡觉的房间完全一样:一样的装饰,一样的家具,等等。只是这里更亮,有几束橙黄色的光,非常集中,使得布景的大部分留下阴影。”终于,约翰开始在旅馆的迷宫式走廊中逃跑,想找一个出口。还算幸运,他“从小门走出建筑物,小门是碰巧看到的,这个门与他刚才进去的门很不相同。接着他在马拉喀什古老的小巷中奔跑。”尽管他挣扎中逃离了发生血案的旅馆房间,但跑进的却是有着古老历史的古老小巷。这是什么样的小巷呢?在反打镜头中,盲人费德里也来到古老的马拉喀什的一条小巷,“用白色的拐杖点着地面(跟我们在金三角的走廊上看到的完全一样,在约翰的上一个梦里,在13号房间,他变成了约翰)”。读者此时已经懵圈,实在无法找到北。在这种状态下,对恍惚不定的女主人公究竟是谁,也就不那么较真,认同吧,爱谁是谁吧!

采用不同视角交替叙述,也是构成格拉迪瓦形象不确定的重要手法。格拉迪瓦的故事中有全知叙事视角,叙述人为读者讲述一个欧洲学者在摩洛哥的离奇故事,学者约翰疯狂迷恋上在学术研究材料中发现的古典美女格拉迪瓦,接下来发生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情景。这一结构通过全知叙述缓缓道来:“约翰停下写作思考了一会。他按下一个操控盒的按钮同时熄灭了台灯点亮了银幕,银幕上以相当快的节奏掠过阿拉伯骑兵、马、摩洛哥风景等图像。……有一些画面似乎更吸引约翰的注意,他显然常看这种材料,这无疑是他正在起草的文章的主题。”如此的全知叙述,通常能够将读者带进一个逻辑清晰的爱情、悬疑或恐怖的故事。然而,随着情节的进展,慢慢出现了影响读者对故事认知的其他视角。女仆贝尔奇斯的视角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视角在作品中时隐时现,有些竟然就隐藏在全知叙述视角内部。如:“她所看到的场景在一定距离外快速地掠过,但接着视线就更近了。一辆巨大的黑色汽车停在一面盲墙前面。……这一组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贝尔奇斯回到约翰的房子里,小心地关上沉重的大门。她又回复了无动于衷捉摸不透的神情。”从回复到无动于衷捉摸不透的神情,我们会发现叙述视点“更近后”的叙述视角是贝尔奇斯的。格里耶在文本的

扉页告诉我们,他讲的是“一个东方学家疯狂爱上了一个年轻而美丽的的女奴的幽灵”的故事。而读者这会儿读到的故事片段中的叙述者,却是疯狂地爱上东方学家的年轻而美丽的的女奴贝尔奇斯!故事的真实性和人物的确定性当然会因出现如此视角而受到怀疑!文本中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视角:“这个男人,我们叫他约翰”,“我们听到,从外面传来孩子玩耍时的喊叫声”,“我们又回到床上来看近镜头中的约翰”,“我们来到屋外,天已经大亮”。是的,这个特殊视角是“我们”的。这一视角比起全知视角和贝尔奇斯的视角,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主观性强,“我们”叫他约翰,他才是约翰。当然我们叫她格拉迪瓦,她才是格拉迪瓦,我们叫她为蕾拉,那她就是蕾拉!多种不同的叙述视角交替使用,加之男主人公约翰是一个患有幻想狂病症的学者,故事呈现的面貌就越发模糊起来。女主人公格拉迪瓦的形象也就越发呈现不确定状态。

叙述者还巧妙地采用对重要叙事功能反复呈现的手法,增强女主人公形象的不确定性。故事中一再提及的安达卢西亚民歌,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单位。故事刚刚展开,当约翰的女仆贝尔奇斯出现在我们面前,叙述者就将安达卢西亚民歌播放到我们耳边:“一个女人的声音唱起安达卢西亚歌曲,声调既带着乡愁又野性。”再一次听到这一民歌,是约翰在可能是梦游的过程中发现了与以往梦中同样穿着白纱的蕾拉的时候。叙述者强调“这些画面要有更确定的‘真实度’。女郎正在为自己唱着野性而失落的歌曲”。最后一次从远处传来安达卢西亚民歌,是约翰面对垂死的贝尔奇斯,“在那野性而失落的旋律暂停的间隙,贝尔奇斯的画外音响起,非常近,私密,它来自记忆,轻柔的低语:‘先生,是死亡在叫您’。”然而,事实上女孩的嘴唇是闭着的,“这是鬼魂的声音。接着安达卢西亚歌曲飘远了,随后完全消失了”。与这里民歌旋律相匹配的,其实可能是从格拉迪瓦到珠珠等许多屈死女孩的鬼魂。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南部的一个自治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地区离非洲仅有十多公里,历史上被摩尔人统治过,与阿拉伯地区也有颇多的交集,安达卢西亚这一地名就源于阿拉伯语。因此这一地区的文化背景带

有融合、包容、汇集等特点。叙述者借用安达卢西亚民歌,作为故事中一个特别的叙事功能单位加以反复,并给不同时代的格拉迪瓦们作背景,从侧面强化了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性。

三

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性,体现了格里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格里耶一直认为现实世界是碎片式的,充满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他的一系列故事中的不确定性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从这一点看,以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作家,还是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只不过他对现实的认识与传统作家有明确的区别。《窥视者》中的推销员和那个或许存在的小岛,《在迷宫中》的士兵和那条若隐若现的街道,《嫉妒》中的“我”和时开时合的百叶窗,都向我们展示了格里耶式的现实世界。在《格拉迪瓦在叫您》的故事中,叙述者通过主人公格拉迪瓦形象及其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又一次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历史学者约翰的心目中,格拉迪瓦既是神圣的圣女,又是可以掌控的凡间女子。作为圣女,格拉迪瓦圣洁、神秘;作为凡间少女,她则温婉、驯服。约翰脑海中的格拉迪瓦,有古罗马雕像中的格拉迪瓦的影子,也是18世纪艺术家德拉克洛瓦身边的蕾拉的画像,还是他自己生活中的贝尔奇斯以及其他一些少女的形象。生活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是格拉迪瓦形象不确定的唯一根基。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格拉迪瓦在叫您》中,格里耶更为强调了梦在现实生活中的所起的作用。无论是格拉迪瓦,还是约翰,或是贝尔奇斯,故事中许多人物常常陷入交织在与臆想混杂在一起的梦之境。梦之境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或许是多年萦绕在格里耶脑海中的问题。因此当演员赫尔迈厄尼告诉约翰她是一个在人们梦中表演的演员时,约翰(或许也代表格里耶)很是惊奇和不理解。赫尔迈厄尼向约翰指出,不能怀疑梦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梦的世界跟醒着的世界同样真实”,“梦的世界跟另一个世界很相像。这是它的影子,它的双胞胎”。这一观点代表着格里耶对现实世界真实性又一维度的思考。

我们进一步探求格拉迪瓦形象不确定性的意义,可以发现格里耶借助与这一形象的不确定性,

扩大了叙事时空,增强了故事的悲剧意味。格拉迪瓦的故事,看上去是一件剧院谋杀案,“昨夜,在一个经常被欧洲客人光顾的私人演出大厅里,一个年轻女演员被一个性虐待狂用匕首杀死。……确认死亡之后不久,死者的尸体不可思议地失踪了。警方的怀疑首先指向一位艺术批评家,他经常出入这家成员严格的俱乐部。他是幻想症患者,但已经被医生鉴定为不具攻击性”。那个叫赫尔迈厄尼,或许是珠珠、蕾拉等名字的女孩,在一个演出大厅的房间被杀害。现场有蛛丝马迹表明欧洲客人约翰有嫌疑。于是警察局长采取了试探、派员跟踪等措施,但最终却查无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女孩被害事件,逐步与古罗马时期雕像格拉迪瓦的故事、以及一个多世纪前的蕾拉的故事纠结在一起,融合为一个穿越时空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格拉迪瓦形象。而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为文本构成了多维时空。叙事时间从古罗马一直延续到当代,其中至少有三个非常清晰的时点:格拉迪瓦塑像产生的古罗马时期、艺术家德拉克洛瓦活动的18世纪和学者约翰生活的当下。叙事空间则有欧洲城市、西班牙南方小镇、摩洛哥海边等。如此立体时空的交错叙述,增强了作品的厚度。格拉迪瓦的故事是一个悲剧故事,文本中任意一个“格拉迪瓦”的故事,无论是珠珠的被虐杀、还是蕾拉的惨死,无论是赫尔迈厄尼

的被谋杀,还是贝尔奇斯的自戕,一旦分别明确地叙来,那可真是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群穿越时空的少女,即所有的“格拉迪瓦”们,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都摆脱不了注定的厄运。叙述者通过格拉迪瓦形象的不确定,揭示了基于不同性别、种族、时代的一群女孩类似的命运,这种不确定前提下的“确定”,无疑增强了故事的悲剧性。由形象不确定所带来的浓郁的悲剧氛围,甚至影响到了“格拉迪瓦”周边的人物。如对格拉迪瓦产生迷恋之情的约翰先生,终日陷于幻想症之中。他在不确定的“格拉迪瓦”中困惑地穿梭,耳边不断回响着格拉迪瓦们痛苦的呻吟。他无法破解面对无数格拉迪瓦而不见本尊的谜团,最终是贝尔奇斯帮他找到了明确的答案,格拉迪瓦们借助贝尔奇斯形象集体发出了“先生,是死亡在叫您”的温柔邀约。大家都清楚,这种邀约其实是鬼魂的声音。只有到这一时刻,具有象征意义的“安达卢西亚歌曲飘远了,随后完全消失了”。一直萦绕于约翰脑海的格拉迪瓦是那么的确定,只有鬼魂的声音是清晰的。然而鬼魂更有可能是不确定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看,“约翰”们的悲剧宿命也是注定的,由此整个故事进一步陷入悲剧之中。

(责任编辑 南山)

试论《苍蝇》中现代主义元素

叶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苍蝇》通过刻意淡化情节,彰显出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新奇而又隐晦的象征的使用,生动地揭示出人类所具有的“悲剧英雄”特质;主人公最后的顿悟振聋发聩,令读者感慨在神秘命运面前,个体显得十分渺小而又不堪一击。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命运归属被赋予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 现代主义; 情节; 象征; 顿悟; 命运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80-04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20世纪初英国里程碑式的短篇小说家,她短暂的三十五年人生春秋,给世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短篇小说佳作。正如评论家伊恩·戈登所说:“就所起的指导性影响而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于短篇小说艺术,犹如乔伊斯之于长篇小说艺术。在乔伊斯和曼斯菲尔德之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再也不能保持原样了。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更高境界的道路,为其他人展示出更加广阔视野。”^{[1]431}与此同时,她还获得诸如“英国契诃夫”“英国短篇小说之王”“短篇小说大师”之类的美誉。1908年7月,她只身一人前往英国生活,从此踏上文学之路。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让她时常感到孤寂无助,现实生活也远非如她所幻想那样美好浪漫。1911年出版的《在德国公寓》里寄托了她理想破灭的无奈心境。

曼斯菲尔德所处的时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和兴盛发展之际,作为文学新时代“弄潮儿”,曼斯菲尔德也浸淫其中多年。在秉承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她也热情洋溢地尝试在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叙事手法上锐意革新。正因为突破了传统短篇小说的羁绊和束缚,同时揉入了很多现代主义元素,曼斯菲尔德才能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生动刻画出现代人内心世界的纠结与挣扎。

在曼斯菲尔德的所有短篇小说中,《苍蝇》是争议最大、解读最广的一篇。1922年冬天,曼斯菲尔德因患肺结核在巴黎接受X光治疗期间,有感而发地创作了该小说。自打作品问世以来,评论家们一直热衷对这部短小精悍佳作从不同维度展开诠释。本文将分析其在情节处理,象征手法的应用,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顿悟上所体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借此来探讨作品的主旨和象征意义。

一、淡化情节

曼斯菲尔德作品的现代性首当其冲体现在独特的“无情节”叙事手法。《苍蝇》摒弃了传统的叙事路线,刻意虚化了故事情节,其目的是为了借助主观意象来直达人物精神世界,因为“井然有序的现实主义作品既无法反映复杂的现代经验,也难以表达他们对社会本质的洞察力。”^{[2]98}《苍蝇》选取主人公“老板”一天中的三个时间段来叙述故事。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谋篇布局迥然不同,曼斯菲尔德抛弃生动感人的情节描写,煞费苦心地将一些貌似断裂的生活片段“随意”地呈现给读者。这些表面平淡无奇的生活情境之下,隐藏着人物焦虑不安,甚至是绝望无助的一颗凡心。现代主义小说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用人物内心的斗争去取代故事情节的冲突,与此同时,读者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文学作品消费者,他需要根据看似凌

[收稿日期] 2020-06-21

[作者简介] 叶青,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乱的故事片段,积极能动地去想象和重构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旨。

在第一部分,伍德菲尔德先生沿袭近年中风后的生活习惯,每周二都去拜访老朋友。小说通过两人之间一系列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将两位老人的身体健康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伊始,老伍德菲尔德风烛残年、喋喋不休,不愿离开老板的办公室——“虚弱老人伍德菲尔德陷在宽大的皮制扶手椅里,探头探脑的,就像小宝宝坐在摇篮车里一样”^{[3]262},寥寥数笔,作者将老伍德菲尔德孱弱无力、老态龙钟的可怜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来。相比之下,老板处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坐镇在办公室中央。他红光满面、身体矍铄、生意兴隆,运筹帷幄,似乎一直高居在人生的巅峰。他甚至洋洋自得地在办公椅上转啊转啊,一会儿炫耀新装修的房间,一会儿拿出珍藏的美酒,踌躇满志地享受着老朋友钦佩与羡慕,直到被告知伍德菲尔德的女儿们最近在比利时给她们兄弟雷吉扫墓时,无意间发现老板儿子的坟也在附近。

在第二部分,一听到伍德菲尔德带来的消息后,表面淡定的老板,立刻神思恍惚起来,内心的风暴再也无法平息下来。他再也没有心情去显摆人生的得意自满,只想急忙结束谈话,将伍德菲尔德送出门外,随即陷入痛苦回忆之中。儿子生前,一直是老板的骄傲:他不仅保持聪明好学,为人也随和谦虚,是家族企业最理想的接班人。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六年前,儿子突然战死疆场,意味着后继无人,自己一生的奋斗最终要付诸东流。接到噩耗,“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精神已垮了,他这一生都毁了。”^{[3]266}但有两个细节令人费解,值得仔细揣摩:一是儿子去世六年,老板从未前去扫墓;此外,当老伍德菲尔德走后,老板本打算独自一人痛哭一场,却发现自己没有一滴眼泪。这一切似乎说明老板在这六年中,刻意地让自己走出丧子之痛,重新振作起来,做生活的强者。小说的前两部分似乎也迎合这点,显示出老板无论在身体健康方面,还是自己的事业,都看不出生活的变故留下的阴影,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强者”形象。小说的第三部分才真正涉及标题——“苍蝇”。老板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被一只落入墨水瓶的苍蝇所打断。苍蝇在无助中不停拍打翅膀,挣扎着想爬出来。出于怜悯,老板把苍蝇挑出来放在吸墨纸上。正当苍蝇甩干身上的墨汁,准备振翅而飞时,老板突发奇想,把厚厚的一滴墨水滴在它的身上。

顽强不屈的苍蝇重新开始再一次的挣扎自救。当它最终好不容易甩干身上的墨水,想飞身而逃时,不知出于何故,老板又把一滴墨水撒在苍蝇身上。这一滴墨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苍蝇活活淹死。有些批评家认为老板为人残忍、毫无同情心,是典型的施虐狂。在这一部分,只有厘清苍蝇和老板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主题。其实苍蝇就是老板的镜像,它最终的死亡也预示老板悲剧性命运。不同的是,苍蝇面对的是生存环境的打击,而老板则是遭受精神上的重创。无论对于动物还是人类而言,其悲剧性毫无例外地源于生存困境,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通过一己之力摆脱命运的控制。“随着人和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会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即从一种生存困境走进另一种生存困境,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5]19}

二、象征主义手法

象征(Symbolism)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另外一个标杆,也是现代派文学使用最广泛的手法。“象征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不是一般修辞学中的象征,而是一种观念和创作方法。”^{[6]196}首先,现代主义作品充斥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象征,其数量和使用范围远远大于现实主义文学。另外,现实主义作家所使用的象征物和被象征物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寓意比较明确,而现代主义作家往往相对主观地把普通读者所不能理解的两个事物配对在一起,造成其寓意晦涩难懂,更有甚者,同一个象征物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指涉迥然不同的含义。曼斯菲尔德认为,文学主题不应通过描述性的分析来表达,而应通过具体的意象来唤起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她的短篇小说中总是充满了象征性的细节和比喻,通过日常生活里常见的意象来不断暗示深刻的人生哲理。

苍蝇无疑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象征,出自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中第四幕第一场格劳斯特的一句台词:“我们在天神掌里,等于是苍蝇在顽童手中,他们作为游戏就把我们杀了。”^{[7]173}苍蝇的象征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在第一层面上,它毫无疑问暗示着自然界生活着的弱小的生灵,在遭遇到劫难时虽竭力抗争却也难免一死。与之对应,所有评论家都认为老板代表着一种神秘莫测而又无法抗拒的破坏力量。其实这是一种误读。首先,真正使苍蝇毙命的是“浓浓的黑墨水”,只不

过假借老板之手而已。无论在人类无意识中,还是在文学里,“黑色”都象征着摧毁生命力的邪恶势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深入挖掘作品中三个人物关系可以看出他们无一不蕴涵在同一象征之中。伍德菲尔德身受中风的折磨,行将就木,“仿佛是奄奄一息的一棵老树,只剩下最后一片树叶。”^{[3]262}除了周二上午,其他时间被妻子和女儿强制待在家里,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正在快速走向死亡。麦吉作为仆人,终日在办公室为老板打杂。在老板心目中,他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像一只狗儿企望被主人带出去遛一遭”^{[3]264},而且还时不时地受到老板严厉的呵斥。总而言之,在生活和命运面前,麦吉就是一个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失败者形象,虽生犹死。故事开始时,和疾病缠身的伍德菲尔德形成鲜明对比,老板虽然要年长五岁,却脸色红润,精神矍铄;另一方面,猥琐的麦吉,反衬出老板事业的成功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然而苍蝇所遭遇到悲惨命运,不啻给之前自命不凡的老板当头一棒,预示他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受难的凡人,他的健康,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无法让他脱离丧子之痛,如同伍德菲尔德和麦吉,老板也正迅速走向精神毁灭。伍德菲尔德、麦吉和老板分别象征着现代社会里所有个体在不同方面的死亡,从而映射出在强大而神秘的命运面前,芸芸众生的抗争毫无意义,都难以幸免地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三、顿悟

顿悟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刹那间通过领悟发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来实现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它是一种突变的过程,通常某个强烈的外在偶然因素,仿佛暴风雨来临时一道电闪雷鸣,使人瞬间豁然开朗。顿悟也是现代派作家特别钟情的一种写作技巧——作品中人物因为生活中不起眼的一件琐事,对人生或精神世界某一个重要的命题眨眼间有着突然的而有意义觉悟,以此来展现人物心理变化。

乔伊斯、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作为现代主义旗手,都无一例外采用了一种以捕捉瞬间来揭示事物真相或者暗示人生真谛的写作技巧。“精神顿悟”是乔伊斯用来描述瞬间觉醒的术语,短篇集《都柏林人》中就比比皆是,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阿拉比”里小男孩对爱情乃至人生的顿悟。“精神顿悟”主要通过描述某个外部情景及其一系列的事件,来揭示主要人物对自己所处实际处境

的突然醒悟。这种顿悟是故事或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展是线性的。乔伊斯把它解释为“一种猝然的心领神会……仅仅一个片段,却包含全部的生活的意义”^{[4]8}。而伍尔夫在多部作品中都使用了“重要瞬间”这个技巧,目的是用来揭示生活中的某个场面像电光一样突然闪现出来的重大意义。萨特·桑德雷说:“曼斯菲尔德对‘闪现’或‘顿悟’的探究可能是现代主义作品中最复杂和完整的。”^{[8]72}像乔伊斯一样,曼斯菲尔德也非常善于在她的短篇小说里展现这一“内心突然闪现的火花”。

曼斯菲尔德在处理艺术和生活,现实生活和心理真实的关系时,总是强调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即心理的真实,而顿悟恰好可以凸现代派小说的主观性和内省性。曼斯菲尔德总是看似随意,其实匠心独运地选取生活的一个插曲,一个场景,或一个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片段,让置身其中的主人公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生微妙情感变化,随之产生内心巨变。现实主义文学通过聚焦于大事件和大人物的描写来倡导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现代主义却有意识地攫取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使人物在心灵深处突然间开始深入思考自我价值,人生意义和终极命运这些现代主义核心命题。

《苍蝇》的谋篇布局精心巧妙。第一部分通过伍德菲尔德的造访,使得老板有机会炫耀自己人生成就和优越感。他一开始吹嘘新装修的办公室,“那张大白圈图案的鲜红地毯”“电热丝正在幽幽发光,晶莹如珠”的电炉子和“从温莎宫酒窖弄来的”那瓶威士忌。最让老板自鸣得意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甚至连自己能够饮威士忌而且是一饮而尽”^{[3]265}。然而在炫耀过程中,老板不仅刻意忽略了他桌上所摆放的儿子照片,对伍德菲尔德特意提到儿子的话题也不置可否。不难看出,老板这六年一直在努力走出丧子之痛,重新振作起来,继续享受成功的人生。紧接着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老板回想刚接到儿子死讯的电报时那无法抚慰的悲伤,并痛苦难当地告诉过大家,也许别人可能,但时间并不会丝毫减轻他内心的痛苦,因为“如果不是为这孩子,那就什么意义也没有。做人也毫无什么意义了”^{[3]265}。然而,六年后,经过老板的不懈努力,其心灵巨大的伤口看似愈合了,他再也不会生活在丧子的阴影之中。在这个描写老板心语的段落中,反讽的意味跃然纸上,“他存心想,他准备好大哭一场”和“可是没有眼泪淌下

来”^{[3]265}这样的描写使得老板之前成功人生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保持身体健康和事业成功的同时,更令人赞叹的是老板凭着坚强的毅力,战胜自己的心魔,重拾信心,开启辉煌的人生。

到了第三部分,老板的思绪不经意间被一只掉进墨水壶的苍蝇所打断。把苍蝇从墨水壶中挑出来以后,老板被苍蝇顽强的求生愿望和坚韧不拔的努力所吸引,突发奇想对它进行“考验”。整个事件并不是像很多评论家认为那样,作品刻画出老板虐待狂的本性和施害者的形象,这种解读明显偏离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实际上,在考验苍蝇整个过程中,老板由开始的好奇逐步演变成对苍蝇不屈不挠拼搏精神的欣赏和佩服,认为它是个有胆量的小可爱,遇到挫折能永不言弃。

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到了传统小说的高潮部分,在第二部分老板因为想到死去的儿子内心一直很迷惘困惑,现在苍蝇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感染了他,心底原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他甚至试图帮助苍蝇吹干身上的墨汁。就在这时,作者采用了“突降法”(anticlimax),故事情节急转而下——生龙活虎的苍蝇突然被最后一滴墨水淹死了。瞬间,老板感到撕心裂肺般心痛和莫名其妙的惊恐。“他又纳闷起来,刚才他在想什么呢?是什么事来着?是……原来……他掏出手绢,在领子里擦擦脖子。他有生以来第一回记不得了。”^{[3]267}

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和评论家无限的想象空间:老板为什么会突然失忆?失忆预示着什么?伍德菲尔德由于糟糕的身体原因导致失忆,想不起那天拜访老板的重要目的——聊聊老板儿子的墓;老板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忆,则是因为突然顿悟人生命运而导致精神上受到致命的打击。其实我们可以把老板的顿悟理解为一种对人生终极命运的思考。这也正是现代主义作品重要母题: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尽管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坚持不懈的拼搏,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

结语

作为现代派小说家之一,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在结构上显示出多样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在西方现代文明面临重重危机之际,如果采用传统有序的情节去“镜像式”再现生活显然不合时宜,也不能触动读者的心灵。在现代主义思潮的语境下,曼斯菲尔德独树一帜地突破传统小说的窠臼,有意淡化作品的故事情节,使它们突然失去了原

有的叙事规则,从而成功地利用一个个貌似割裂的片段来深入挖掘主人公老板心路历程——由沉溺于物质和地位的沾沾自喜,甚至自鸣得意到极度的悲苦绝望,并将故事的结局留给读者去想象和重构。

曼斯菲尔德在其短篇小说中将传统象征和现代象征有机融合在一起。苍蝇的悲剧性命运使得读者意识到老板不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施虐者,而是一个深受丧子之痛所困扰的受害者。苍蝇赋予老板特殊的意象模式:“悲剧英雄”。

当现实主义小说难以表达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之时,曼斯菲尔德恰当地运用顿悟手法再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顿悟,不仅使表面看似平淡的小事产生强大的震撼力,又实现了人物在内心对人与社会的全新认识,继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和感情上的满足。老板顿悟出人类的脆弱和死亡的必然,这也是作家本人在去世不久前厌世的真实写照:“我的精神已经死亡。我生命的源泉已到了源流堵塞却还没有枯寂的时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可救药的废人。我的生命像什么?像一个寄生虫在苟且偷生。”^{[9]35}

[参考文献]

- [1]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9.
- [2]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3]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4]Celeste Turner Wright. Genesis of a Short Story [A]. Anja Barnard, ed., Short Story Criticism (Vol. 38) [C]. Gale Group, 2000.
- [5]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6]徐曙玉,边国恩.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33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 [8]Dominic Head.The Modernist Short Story:A Study in Theory and Practi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2012.
- [9]Sarah Sandley.The Middle of the Note, Katherine Mansfield's " Glimpses "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责任编辑 南山)

“我们”与“她”的南方往事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认知诗学解读

左佳 朱蕴轶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 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福克纳采用了以杰斐逊小镇居民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记录和解读了末代贵族艾米莉怪僻乖张的一生,叙述者“我们”和女主人公“她”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图形和背景的变化和形成。基于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探析“我们”与“她”变换组成的双重图形-背景关系,试图从新的角度深入挖掘小说的主旨内涵即内战后南方社会面临的时代变迁以及作家热爱南方故土的情感意蕴。

[关键词]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 美国南方; 我们; 她; 图形-背景理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84-06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一生几乎都在美国南方的偏僻小镇上度过,他以自己童年生活过的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为原型创作了一系列“约克纳帕他华县”(Yoknapatawpha saga)的南方小说,因此成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因为“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且这种贡献在艺术上无与伦比”^{[1]361},而打败加缪、海明威等著名作家,于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被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称赞为“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2]53}。其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以凝练简短的笔触描写了出生于古老高贵的格里尔森家族的艾米莉,自幼在蛮横专制的父亲的庇护和掌控之下成长,父亲离世后,与北方男人荷默·伯隆的感情也无疾而终,最后离群索居的艾米莉在家中黑奴的陪伴照料下度过了灰暗惨淡的一生。艾米莉顽固地活在过去,拒绝顺应时代的变迁,始终坚守着南方贵族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习俗,成为杰斐逊

小镇上唯一一座南方贵族的“纪念碑”,成为旧南方最后一份精神的象征以及传统的化身。福克纳以“第一人称复数,集体的,跨越多代人的叙事人”^[3]的叙述流露出全镇居民对这样一位没落贵族既崇敬又怜悯,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情感,折射出南北战争之后,面对南方神话已然破灭的现实和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处在社会历史转型期的南方人一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南方的重建之中,一边依然固执地停留在对昔日南方的荣耀和辉煌的回顾和缅怀中的矛盾处境。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主要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探讨艾米莉的性格悲剧和“恋父情结”,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下艾米莉与南方传统社会的关系,从叙事学角度对该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以及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指出受清教思想和父权思想双重影响的传统南方社会对女性的扭曲和客体化等多个方面阐释这部极富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本文从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入手,着重把握由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我们”和女主人公“她”

[收稿日期] 2020-05-11

[作者简介] 左佳,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蕴轶,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组成的双重图形-背景关系,从定向思维来看,小说围绕着艾米的悲剧命运展开,“她”显然处于小说的焦点和中心位置,作为图形被突显出来,而“我们”是镇上居民,作为背景旁观着艾米莉的一举一动。但是如果从逆向思维出发,转换原有的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将注意焦点由单个女主人公“她”转移至集体性主体“我们”,将“她”视为背景,将“我们”视为图形,便会发现“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是否全程置身事外,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些问题同样具有深入思考和挖掘的意义,为探索该小说主题提供新的视角。

一、图形-背景理论概述

认知诗学作为一门 20 世纪末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语言学的某些分支和学科哲学”^{[4]2}等多个领域,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鲁文·楚尔(Reuven Tsur)在其 1983 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认知诗学》(*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中首次正式提出“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概念,随后楚尔在代表作《走向认知诗学理论》(1992)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中率先使用认知理论来阐释文学,提出了一套比较连贯的认知诗学理论体系,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图形-背景”理论是认知诗学中的一个基本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它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派(Gestalt Psychology)的代表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于 1915 年提出的花瓶理论发展而成的。鲁宾花瓶(Rubin Vase)又称“人脸——花瓶图”,鲁宾发现在一张由白色和黑色共同组成的二维图像中,白色和黑色区域各自可以理解为图形和背景,也就是说不同的注意焦点使这幅图像的图形和背景可以相互转换,它既可以被视为以黑色区域为背景白色的花瓶,也可以被看作是白色背景下的两个彼此相对人脸的轮廓。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伦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将图形-背景理论引入认知语言学,用于认知语义学研究,他指出“图形是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中可移动的物体,其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视为一个可变量,其特殊值是相对值。”^{[5]315-316},而“背景是一个相对于一个参照框架的静止的参照物,图形的路径、位置、方向是相对于背景而言的。”^{[5]315-316},也就是说图形更具有移动性特征,而背景是相对固定的和稳定的。随后,英国诺丁汉

大学教授 Peter Stockwell 突破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局限性,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阐释文学话语,尤其是以图形-背景理论其中包括“前景”(foregrounding),“突显”(dominance)等重要概念,重新衡量文学风格或文学问题研究,赋予文学文本新的意义^{[6]2},为一系列文学现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图形-背景理论体现出一种认知观,即相同的认知对象,会因为注意焦点的差异而获得截然不同的知觉效果。但是在大多数视觉情景中,人们不能既看到图形又看到背景,当我们注意到某个图形时,一般很难同时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图形-背景分离现象”(figure-ground segregation)。图形-背景理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图形和背景可以分离,然后再利用他们可以重新组合,可以互动的特性,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图形-背景关系,即同一语境里的图形在另外一个语境里就会变成背景而背景也会变成图形的事实,因此“一个语篇在认知上就可能包含了由于图形和背景变换而组成的多种不同层次的时空关系。”^{[7]1}例如,在文学文本中,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角色因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命运和动态变化的心理发展过程等成为叙事的焦点,引起读者的注意,成为文本中的图形性人物(figurative character),而其他人物则成为背景性人物(grounding character)。但是某些时候,某些次要人物或者景物为了主题的突显也可以从背景中脱离出来成为图形,因此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不同的读者因为注意焦点的差异,会产生出不同的图形和背景关系。

二、“她”为图形,“我们”为背景

Peter Stockwell 在《认知诗学导论》中提出,如何区分图形与背景的判断方法,图形部分应该符合以下一个或者多个特点:(1)图形是具有自身完整且有着与背景明确分离,具体清晰棱角的物体;(2)与静态的背景相关联,图形具有运动性;(3)在时间空间上图形先于背景;(4)图形是脱离了背景的一部分,或者正逐渐形成图形;(5)图形比背景更详细、更受关注、更明亮与更具有吸引力;(6)图形在背景顶部、前面或者上面,或是比背景要大^{[8]15}。那么在《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这篇小说中,艾米莉作为图形性人物是否符合以上特征呢?

首先,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毫无疑问,艾米

莉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图形性人物。整篇小说首尾呼应,以艾米莉的死为开始,又以艾米莉的死为结尾,中间由叙述者“我们”无序地,碎片式地回忆了“她”的悲剧命运。小说随着叙述者的意识流动而展开,打破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例如由新一代政府议员上门征税却被扫地出门而联想到上一代人的相似经历,即深夜潜入艾米莉家中撒石灰却落荒而逃,还有由艾米莉面对众人流言蜚语时的高傲姿态联想到她购买砒霜时的冷酷神情,整个叙述时序颠倒,空间重叠却又使小说的五个部分在无形中相互联系,呈现出热奈特的嵌入式框架叙事。这样的叙事策略不仅使整篇小说弥漫了哥特式的神秘和诡异气息,同时让艾米莉的悲剧故事悬念丛生,更加吸引读者对艾米莉命运走向的关注。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小说的笔墨篇幅还是作者的叙事策略来说,都给予了艾米莉绝对的关注,让“她”作为图形性人物比背景性人物“我们”更详细、更受关注、更明亮与更具有吸引力。

其次,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们”发出的是集体性叙述声音,人称代词“我们”指代群体人数多,面积大,轮廓模糊,而“她”或者名字“艾米莉”仅仅指代单个女性人物,面积小,轮廓清晰,仅仅是人称代词的使用就已经明确地划清了“我们”作为背景与图形人物“她”的界限。另外,艾米莉作为南方没落贵族的末代后裔的特殊身份使她在杰斐逊小镇具有高度的辨识度,让她有别于小镇中的其他普通居民,使整个人物从背景中明确分离出来。南北战争后,南方种植园经济体系和黑人奴隶制日渐崩离析,旧日南方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也随内战的失败而随风逝去。大多数南方人无暇回望过去,雄心勃勃重建新南方,急切地想要洗刷内战失败的耻辱,而艾米莉以一己之力颠覆客观世界的时间秩序,仍然固执地活在内心里闲适富裕的旧南方之中。当整个小镇的南方气息已被代表工业文明的汽车间和轧棉机所侵蚀,只有艾米莉那座独具19世纪七十年代特色的木屋还岿然独存,房屋“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8]15},她拒绝工业化的普及包括免费邮递制度,对政府通知的回信则是其贵族淑女身份的外化表现“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再鲜艳”^{[8]15}。面对时代的更替,艾米莉与普通南方人迥然不同的态度以及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她作为图形性人物

脱离背景环境的束缚和同化。另外,对艾米莉的正面描写从少女时代“身段苗条,身着白衣”^[9]到花甲之年“腰圆体胖,一身黑服”^{[9]40-45},不仅说明了人物形象一直在小说的时间背景下移动,人物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温顺贞洁逐渐转为孤僻高傲,也体现了艾米莉作为图形性人物的运动性特征。

最后,福克纳浓墨重彩地将艾米莉描绘成小镇人们心中的瞻仰的偶像,一座旧南方的丰碑,如“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9]40-45}，“艾米莉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9]40-45}，“一见到她的身影,像是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9]40-45}。艾米莉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旧南方留在这世间的最后一缕青烟,她的存在提醒着人们南方往日的辉煌岁月,她在精神上远远的控制着这个南方小镇,位于背景人物之上。

三、“我们”为图形,“她”为背景

图形和背景不但可以分离,同时具有任意性和互动性。任意性是指图形与背景的实体处在动态变化中因此产生了互动性即对于不同的观察者而言,同一画面中被突显的部分可能不一样,所以在不同的认知视角下图形与背景是可以相互换位或转换的(figure-ground reversal),从而产生新的图形-背景关系。如果把《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这部小说比作花瓶/人脸图的话,乍一看,艾米莉是当之无愧的图形人物,而“我们”只是一群见证艾米莉命运悲剧的无名之辈,但转化认知视角后,将注意焦点转移至叙述者“我们”,便会发现“我们”并不是所谓的“天真旁观者”或者“社区代言人”,“我们”与艾米莉的悲剧命运息息相关。

1.“我们”是守护者

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时序重新排列小说文本,那么整个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艾米莉父亲尚且在世之时,“我们”的叙述也应该由此开始。此时,叙述者的心理活动是“我们一直都把这家人看作一幅画”,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心中格里尔森家族是遥不可及并且与世隔绝的,这幅画的内容更是传统南方父权制的剪影,身着白衣的艾米莉站在手执马鞭的父亲身后,在父权制的南方,白色象征着贞洁,温顺,并且白人女性是“云天上闪耀着眩目光辉的雅典娜”^{[10]89},是冰清玉洁的圣女,没有个人私欲,是沉默失声的客体,“她们应该像

《新约》中的道克丝(Dorcus)那样用针线来编织快乐保持自由,而不要像夏娃那样抵制不住诱惑”^{[11]79}。30岁之前的艾米莉从未享受过真正的自由与快乐,专横独裁的父亲用马鞭赶走了所有登门拜访的年轻求婚者,忽视艾米莉的主体性地位,完全掌控和独占艾米莉,残酷地剥夺了她的爱情与婚姻,将她塑造成一个无欲无求的圣女,让小镇人感到短发的艾米莉“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9]40-45}。畸形的父女关系让艾米莉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严重依赖父亲,父亲去世后,她甚至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父亲的遗体,试图以保留尸骨的方式阻止时间的流逝。

作为杰弗逊小镇上的居民,艾米莉却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在杰弗逊无税可交,这样的特权并不是贵族与生俱来的,而是善良的小镇居民赋予她的。父亲的离世让艾米莉同时失去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和经济保障,小镇居民纷纷为没有经济来源的艾米莉从今以后的生活而感到担忧。为了维护经济窘迫的艾米莉的尊严,沙托里斯上校编撰了一个能够被所有人接受的谣言,即政府为了偿还艾米莉父亲的贷款,而免去艾米莉的税收。现在的政府议员看待当初的谣言觉得难以置信,甚至嘲笑上一代人的蠢笨无知,殊不知上一代人并非不知晓谣言漏洞百出,这是他们心照不宣地给予无依无靠的艾米莉的一份善意,默契地选择相信谣言,不打破这份隐形的和谐。贵族出身且性情孤傲的艾米莉必定不愿低下高昂的头颅去接受他人的施舍,这样的谣言让不谙世事的艾米莉既减轻了一丝生活的困顿又仍然活在贵族的傲慢清高之中。为了让艾米莉有收入来源,他们甚至将自己家中的女孩送至艾米莉家学习瓷器彩绘,尽管人们知道这样的课程学来也并无实际用途可言,对孩子来说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但是人们对待这门课程却没有丝毫的懈怠,如供奉神明一般虔诚,认真地按时按刻的将孩子送去艾米莉家,因为这是接济艾米莉最为体面的方式。“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他们二角五分钱的硬币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9]40-45},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力量维护南方最后一份昔日的光辉骄傲,瞻仰南方的一座丰碑,供奉南方的一座神像,是对日渐衰落的南方文明的最后一丝挽留和眷恋。

当艾米莉已经从身段苗条,爱穿白衣的少女变成了一身黑服,腰圆体胖的老妇时,第二代政府议员对艾米莉的收税方式虽然相比于第一代较为直接,但是仍然充满了尊重和敬意,他们特意为此事召开临时会议,派出代表团登门拜访,起身迎接艾米莉的到来,即使艾米莉屡次拒绝缴纳税款,抗法不从,他们也从未强制执行,更没有残酷地揭穿沙多里斯上校已经过世十年的事实。这看似是七旬老妇凶猛强悍的结果,实际上是新一代南方人仍旧持有一颗对古老南方文明的景仰和敬畏之心。两代小镇居民从未揭穿没落贵族的窘境和不堪,而是以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守护了艾米莉远离尘嚣的南方古老意识形态世界。

2.“我们”是参与者

自视清高的贵族父亲因为固守着门第观念,让艾米莉错过女性婚配的黄金时期,“我们”没有冷眼观之,而是为艾米莉迟迟未婚感到焦虑“我们着实没有喜幸的心理”^{[9]40-45},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下,南方淑女承担着管理奴仆和打理家中事务的重要责任,家庭是女性赖以生存的唯一空间,她们无法外出独立谋生,必须依附于男性保持从属地位才可在夹缝中生存。在父权制的社会语境下,未婚的艾米莉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弦。父亲去世后,艾米莉从父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内心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唤醒,她毫无保留地爱上了一位与她极端对立的男性。荷默·伯隆是一位来自北方建筑公司修路工人的工头,性格开朗外向,象征着开放包容的北方工业文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听到广场上什么地方爆发出阵阵哄笑,荷默·伯隆准在人群中间”^{[9]40-45},在荷默的陪伴下她逐渐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霾,抛下贵族小姐的身份和礼仪,在星期日的午后,与荷默兴高采烈的驾车出游。这段爱情极具矛盾冲突,南方贵族小姐爱上了一穷二白的北方修路工头,两人不仅在社会阶层有着天壤之别,同时各自从属于不同的文明形态,呈现出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工业文明的对峙状态。在内战中,南方军队伤亡惨重,据调查显示,每三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献出生命,因此南方人对北方人充满了仇视和痛恨。而且荷默无意成家并且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更是让一直深受清教传统思想影响的南方社会无法容忍接纳的存在。因此镇上的妇女一致认为这段爱情是艾米莉堕落的表现,她们密切地监视着艾米莉的一

举一动,发出一声声叹息和怜悯的同时也对艾米莉的爱情横加干涉,先是由当地妇女派出了浸礼会的牧师以宗教的权威去阻止这场婚姻,然后写信告知她远在亚拉巴马的堂姐妹,好让她们以亲属的身份从中加以劝阻。艾米莉的婚姻已经不仅仅是她个人的选择,而是事关全镇人的荣辱,他们将艾米莉视为小镇的公有物,是昔日南方神话目前仅在的遗存,他们不愿承认繁荣的南方正在日益走向衰败和消亡,更不允许任何人将她随意地拉下神坛,沾染上一丝北方的气息,甚至在得知艾米莉购买砒霜时,认为殉情而死是艾米莉最好的结局,可以永保贵族高高在上的等级尊严,封存住旧日南方的传统与美好。

然而“我们”的议论和干涉并没有让艾米莉望而却步,反而适得其反进一步激化了她我行我素的态度,她似乎试图以这种忤逆众人的独特方式来确认自己贵族身份的存在感,“她把头抬得高高……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尔里森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与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影响的性格”^{[9]40-45}，“我们”虽无力阻止艾米莉的一意孤行,但是仍然寄希望于艾米莉堂姐妹的到来。面对更具有贵族风范,更加趾高气扬的艾米莉的堂姐妹出现在小镇时,“我们”却并没有因为获得强有力的外援而感到信心倍增,反而开始明白旧南方的神圣光环并不为每一位贵族所拥有,而是“我们”出于自身的精神需求强制附加在艾米莉身上,以此支撑着我们面对旧南方日益崩离析的现实。因此“我们”没有一味地执迷于对往日南方的怀念中,而是选择了当初的对立面,支持艾米莉与荷默的婚姻,比起维持艾米莉高高在上的贵族身份,更希望无依无靠的艾米莉能有正常稳定的婚姻生活,寻觅到普世中简单平淡的幸福,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9]40-45}。“我们”对艾米莉婚姻经历了从最初的横加干涉到最后的默默支持的明显变化过程,让读者将注意焦点由艾米莉调整为“我们”,不仅实现了由背景性人物向图形人物的转化,更折射出南方社会中人性的单纯和善良。

3.“我们”是缅怀者

小说中福克纳通过不断变化的叙述视角以及指代模糊的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让读者轻易地放松警惕,毫无芥蒂地跟随着“我们”的叙述去深入

了解艾米莉的命运发展,从而忽视了考虑“我们”的叙述真实可靠性。倘若重新审视文本,便可窥见隐含作者在不知不觉中介入作品,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在集体性叙述当中,同时“我们”关于艾米莉的叙述并非都是对客观事件的理性描述,其中夹杂着“我们”对艾米莉举动的主观猜测和情感态度的动态变化,以集体意识的再现获取读者更多的信任

美国著名的“非自然叙事学家”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指出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是表达集体意识的绝佳工具”^{[12]56},因此笔者推测福克纳选择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叙事形式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群体叙述者“我们”的叙述声音再现一种集体性意识,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内心思想和感情”。在小说中,除了直接引语中的“我们”除外,全文中以“我们”作为主语的地方共为36处,其中爆发式出现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艾米莉父亲之死,以及第四部分年届四十的艾米莉的独居生活这两处,“我们”(we)后常接看见(saw),说(said),知道(knew),相信(believed)等动词作谓语,这些动词表达的更多的是小镇人对艾米莉行为举动的见证和议论,以及关于内心关于艾米莉所形成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

关于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的指涉范围即“我们”是谁的问题,马乔林指出“从定义上来看,‘我们’的指称种类至少有两组个体组成,即‘我们’(we)='我'(I)+‘他人’(others)’”^[13],可以指代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也可以指团体中的部分或者单个成员,因此既可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内心思想感情和集体意识,也可假借“我们”的人称形式再现单个“我”的个人意识。根据马乔林的公式,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中“我”是出席艾米莉葬礼的其中一人,“他人”是第二代思想更为开明的政府参议员,第二部分,“我们”中“我”是与艾米莉同时代的小镇居民,“他人”包括抱怨艾米莉家气味难闻的隔壁邻居,包括处理此事的全体议员,包括前来吊唁和哀悼艾米莉父亲的妇女们以及埋葬她父亲的乡亲们,第三部分“我们”中“我”是目睹艾米莉与荷默高调出游的一员,“他人”是为艾米莉的堕落而叹息的老人们,第四部分“我们”中“我”是对艾米莉的感情走向胡猜乱想的一员,“他人”是将自己的女儿或孙女送去艾米莉课堂中的

人,第五部分未分化出“我”和“他人”的具体指涉对象,而是“我们”共同参观了艾米莉的屋子,共同发现了艾米莉杀人留尸的惊天秘密。总结起来可以发现,个体的“小我”并未实质性地参与艾米莉命运中任何一件事,而是伴随全体小镇居民的“大我”共同见证,猜想,议论艾米莉的命运发展,这个“大我”与其说是跨越两代人,不分男女老少的小镇居民,不如说是一群高度去个性化,理想化的旧南方缅怀者。

四、结语

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心理模式,图形与背景的多层次关系的转化不仅促进了积极动态的文本阅读过程的构建并且为文学作品的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揭示出文学文本中更丰富的内涵和情感。本文通过对《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的认知诗学解读,揭示艾米莉与小镇居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悄无声息的互动,二者相互成全,相互维系,实现了图形和背景的动态转换,有效生成了文本张力。“她”因为颠覆客观世界的时间秩序,固执地停留在旧南方的光辉岁月,支撑着“我们”走过新旧社会交替的艰难时期,“我们”因为“她”而有了精神寄托,一直默默守护着这座南方丰碑,让“她”免受外部世界的烦扰,安静祥和地度过余生,更强烈地突显出美国南方社会中珍贵的人性光辉,以及内战后南方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继续前行的南方精神。

[参 考 文 献]

- [1] 兰守亭.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概观[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 [2] 陶洁. 福克纳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 [3] Melcazarek, Nick. Narrative Motivation in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J]. The Explicator, 2009(67): 237-239.
- [4]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2.
- [5]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0.
- [6] 刘文, 赵增虎. 认知诗学研究[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 [7] Tsur, Reuven. 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 [M]. Tel Aviv: Katz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ebrew Literature, 1983.
- [8]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9] 威廉·福克纳.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 陶洁, 编.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0] W. 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M]. Vintage Books, 1969.
- [11] 黄虚锋. 美国南方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 [12]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Margolin, Uri. Telling Our Story: On "We" Literary Narratives[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2): 115-119.

(责任编辑 南山)

《跳蛙》的狂欢化特征及其意义*

徐 薇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跳蛙》讲述了一个宫廷小丑的复仇故事。在酒神精神的作用下,小丑跳蛙这个极具狂欢精神的小人物,以狂欢的形式完成了生平最后一场滑稽戏。国王的脱冕与加冕、“火”的焚烧与重塑、“笑”的埋葬与催生……这一切构成了狂欢化的双重意义——毁灭与重生。狂欢化的双重意义有助于人类走出思想的桎梏,用狂欢化的视角重新地审视世界,由此开启多元平等的新纪元。

[关键词] 爱伦·坡; 巴赫金; 狂欢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90-03

一、前言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一生完成了约70篇短篇小说,无论是死亡恐怖小说还是侦探推理小说都给爱伦·坡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而在坡的中晚期小说中所突显的狂欢化特征也逐渐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四不像》(1836年)里闹剧一般的庆典,《红死魔的面具》(1842年)中的死亡舞会,《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1845年)里癫狂的盛宴都被赋予了鲜明的狂欢化色彩,而坡在人生最后一年发表的《跳蛙》(1849年)更是将狂欢化推向了极致。

《跳蛙》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宫廷的底层小人物的复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丑,而“跳蛙”这个绰号正是当权者对这个可怜的矮子和瘸子的戏称。跳蛙和同伴屈丽佩泰作为俘虏被进献给皇帝,继而成为皇帝的弄臣,也就是供其逗乐消遣的对象。在备受羞辱和践踏之后,跳蛙策划了化装舞会上“八个带铁链的猩猩”的狂欢,借机烧死了当权者,并顺利地逃出皇宫,返回故乡。

二、狂欢式的复仇

故事中鲜明的狂欢化特征使跳蛙的复仇变成了一场滑稽戏。恰如《红死魔的面具》一样,坡再度利用了化装舞会来设置情节。化装舞会是带有明显的狂欢化色彩的重要场所,通过化妆、换装等方式,参与者进行了身份地位的改变,从而实现了对常规的颠覆。也只有在这种场景之下,低贱的小丑才能一跃成为舞会的导演,成功地诱骗皇帝和七位大臣裹上窄小的弹力衣裤,浸透柏油,粘上麻布,套上铁链,扮成猩猩去吓唬宾客。

化装舞会实现了人物身份的转换,尊贵的权贵被拉下了高高在上的神坛,变为了供人取乐的丑角。狂欢国王的加冕与脱冕往往是狂欢节中的重要仪式,坡在《四不像》《红死魔的面具》《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中频频使用了这种脱冕性结构。在《跳蛙》中,当扮成猩猩的皇帝和七位大臣磕磕绊绊闯进大殿的时候,来宾们立刻被“这些青面獠牙的畜生”吓得四散逃命,“大殿里乱得不可开交”,“好多女宾吓得当场昏死”^{[1]425}。

当小丑跳蛙把这八个“猩猩”绑在一起并吊在

* [基金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三五”科研规划第三期重点课题“狂欢理论视域下爱伦·坡生命哲学之探究”(项目编号:JSSNU18ZD03),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向死而生——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死亡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0615)。

[收稿日期] 2020-05-08

[作者简介] 徐薇,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了灯链下之后,来宾们就安下心来,哈哈大笑,戏耍着这八个原本企图戏弄他人的“大猩猩”。跳蛙趁机冲到了人前,“把他们交给小的。小的大概认识他们。只消好好看一下,就能马上说出是什么人来。”跳蛙拿出了火把,爬上了灯链,继续逗乐着众人,“小的马上就看出他们是什么人”。当大家笑破肚皮之际,灯链继续升高,直至众人开始惊恐起来,跳蛙举高了火把,故作仔细查看之状,“啊,哈!小的现在可看出是什么人了!”^{[1]426}说着,火把烧着了“猩猩”身上裹着的麻布,卷起了一片火焰。

看似坚不可摧的等级社会就在这嬉笑玩闹中土崩瓦解。故事的最后,愚蠢粗鄙的皇帝被烧成狰狞可怕的一团,身份低贱的跳蛙与恋人穿过了天窗销声匿迹。大火结束了这场可笑又可怖的狂欢,完成了对旧世界的颠覆;而小人物的逃生又给新世界的建立带来了希望。巴赫金在其研究中曾数次提到罗马的“火之节日”,特别强调了火的形象在狂欢节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狂欢节上的“火”具有深刻的双重性,焚烧代表着毁灭,过去的结束;火焰也带来光明,预示未来的开启。“火”的意义就在于毁灭世界的同时又更新了世界、重塑了世界。在《跳蛙》中,故事情节的脱冕性结构与火的文化原型一脉相承。“火”的焚烧与重塑不仅“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创造意义”,“它还说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势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2]178}。”

“笑”赋予了这场复仇独特的色彩。化装舞会、脱冕性结构、戏弄与反被戏弄、“火”的狂欢寓意……这一系列的狂欢化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冲淡了复仇本身的血腥残忍。

三、狂欢式的酒神精神

《跳蛙》中还洋溢着浓厚的酒神精神。酒是任何狂欢活动、节日庆典的必需品,它能够使人趋从本性,释放真我。故事中,酒成为跳蛙复仇的重要的诱导因素。作为一个聪明理智、谨慎隐忍的小丑,跳蛙不爱喝酒,“因为一喝酒,这苦命瘸子简直就要发酒疯”。可是皇帝偏偏要拿此取乐,跳蛙流着眼泪被迫饮酒,结果“一喝就醉,酒力顿时发作,实在厉害”。烈酒释放了跳蛙心底隐藏的所有的愤恨,他干了一杯又一杯,“还一口答应,要他喝多少酒就喝多少”^{[1]422-423}。而与此同时,在酒精的刺激下,一个冒险的复仇计划也在他心中酝酿而生。

如果说日神原则讲究的是理性和秩序,那么酒神精神则往往与狂热和过度联系在一起。尼采

认为,酒神精神意味着情绪的发泄,是“人们尽情放纵自己原始的本能”。^{[3]127}在酒神精神的影响之下,原本被跳蛙小心压抑着的情绪被全部激发了出来,逃回故乡的愿望也重新在他心头燃烧。跳蛙调整心绪,“从容不迫,好似生平从没喝过一口酒”,他向皇帝启奏,“奴才不知怎会联想出这念头”,“刚才陛下打了那奴婢,将酒泼在她脸上,——陛下这么干了,就在那以后,鸚鵡在窗外发了那怪声,奴才忽然心血来潮,想出了个绝妙主意——”^{[1]423-424}于是,他抖擞精神,设下了“八个带铁链的猩猩”的复仇计划。此刻的跳蛙已经与过去判若两人,酒神的力量助使他摆脱了等级戒律的束缚,抛开了道德规范的影响,他扬眉吐气,神采奕奕,步步为营,将皇帝和臣僚慢慢引入自己设下的陷阱。酒神精神给了这个卑贱的小丑机会和力量,使他能够站在皇宫的最高处,成为当权者命运的主宰。

四、狂欢式的人物

小丑往往是狂欢节中最重要的角色,也是极具狂欢精神的人物。无论是欧洲古老的狂欢节,还是现今的节庆活动都少不了小丑的助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也曾多次评述过小丑、疯子、傻瓜等一系列的狂欢形象。作为一群边缘人,他们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可以借助其独有的疯癫形式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哄得人们开怀大笑。在他们的带动下,狂欢的气氛更加高涨,等级被推翻,秩序被打乱,权威被否决,人们摆脱了束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跳蛙》中,坡描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小丑,一个在喜笑颜开的外表下伤心、愤怒的小人物。跳蛙被皇帝豢养,供皇帝取乐,他从不气恼,总是满脸堆笑。当权者拿他逗乐时,他嬉笑迎合;恋人被皇帝殴打时,他不动声色;皇帝强迫他喝酒时,他流着眼泪喝完,发出一阵狂笑……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哪怕有再大的伤痛,“笑”也是小丑唯一的妆容;而与此同时,笑的假面也帮助他隐藏自我、伺机而动。

故事的最后,跳蛙手持火把,悬在宫殿的灯链上俯瞰众生。历经了长久的悲哀和愤恨,卑贱的小丑再不需要阿谀逢迎。“小的现在可看清了”,“其中一位是皇帝陛下,其余七位是枢密顾问大臣,——万岁爷毫不留情地打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七位枢密大臣竟然为虎作倀。在下嘛,在下就

是小丑跳蛙——这也是在下演的最后一出滑稽戏啦。”^{[1]426-427}小丑终于逃脱了命运的束缚,得到了自由,他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场狂欢,完美谢幕。

跳蛙,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用反常规的方式张扬了个性,放纵了本能,表达了自我。这个狂欢式的人物形象强化了整部作品的狂欢化效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爱伦·坡对等级社会的嘲讽和批判。

五、狂欢式的人生观

跳蛙的命运影射了爱伦·坡的一生,跳蛙的挣扎也正是坡满腹辛酸的尽情宣泄。爱伦·坡一生的苦闷,一腔的幽恨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坡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他一生渴望关爱,却尽失所爱。年幼时父母双亡,继而养母离世,成年后又经历了妻子的病逝。命运的不断打击使他无家可归、无人可依、落魄潦倒,一生都在贫病交加、精神压抑中度过。

坡时运不济、屡受挫折。作为一位超越其时代的作家,坡的作品的前瞻性铸就了他的伟大,但也导致了其与19世纪美国文坛主流的格格不入,使得坡在生前不仅没有得到认可和重视,反而不断遭受批评和非议。他是爱默生口中的“叮当诗人”^{[4]105},惠特曼认为他只有“想象文学的电光,光华耀目但缺乏热力”^{[5]58},坡甚至还被洛厄尔斥为“三分天才,两分胡诌”^{[6]64}……在某种程度上,跳蛙狂欢式的报复也是坡对命运的一种文学式的反抗。

坡擅长用艺术上的“笑”来表现人生百态。皇帝爱笑,仿佛他“生来就是为了开开玩笑”,“要没个小丑陪着笑闹一场,要没个矮子拿来取笑一通,就觉得日子难过”^{[1]420-421};七位大臣也爱笑,他们全是出名的说笑专家,陪着皇帝寻欢作乐就是他们的主职;皇宫的贵宾们更是一早就期盼着在化妆舞会上尽情享乐,在经历了“八个带铁链的猩猩”带来的短暂震撼后,他们个个笑破了肚皮;跳蛙最是爱笑,低声下气的笑,讨好逗趣的笑,流着大颗辛酸泪的笑,露出一副偌大钢牙的可怕的笑……狂欢节的主角恰恰就是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笑。“无论是纵情欢悦的笑,还是尖刻讥讽的笑,或者自我解嘲的笑,都表现了人们摆脱现实重负的心理宣泄。”^{[7]312}

巴赫金认为,“笑”是“一种艺术的主导”,它“代表了狂欢节精神”^{[8]212}。“笑”可以针对一切

人、一切事,可以浸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史诗或是悲剧的严肃性。相对于哭的悲剧力量,笑的喜剧力量则更给人希望。《跳蛙》中的“笑”就具备着双重的属性,它“既充满欢乐与兴奋,又充满讥讽与嘲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催生”^{[9]119}。小丑的辛酸悲苦被一片笑声所掩盖,小丑的血腥复仇也在舞会的狂欢中完成……“笑”使这个本该带有悲剧色彩的复仇故事变成了一场热闹的滑稽戏。

六、狂欢的双重意义

国王的脱冕与加冕、“火”的焚烧与重塑、“笑”的埋葬与催生……这一切都构成了狂欢的双重意义:毁灭与重生。爱伦·坡借助了狂欢的形式,以“笑”为手段,在艺术的领域执着向前,实践着他的梦想。《跳蛙》的故事是坡对命运的嘲讽,对等级的蔑视,对权威的颠覆,对旧世界的毁灭,但又何尝不是新世界的重启,新希望的诞生?

毁灭与重生,这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意义最终都指向了人类自身,把人类的思想从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狂欢化的视角来重新地审视世界,破除对等级权威的迷信,开启多元平等的新纪元。历经了一生的坎坷,爱伦·坡在他人生最后一年发表的这部作品中仍坚持“笑”看人生,仍坚守着他不灭的理想与希望。

[参考文献]

- [1]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 [4]常耀信.美国文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 [5]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
- [6]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7]张杰.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8]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9]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南山)

北伐中国国民党军力量的投射与立足^{*}

——以扬州“京畿”重镇的初步经营为例(1927—1931)

朱季康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1927年至1931年,国民党军事、党务、行政力量三管齐下,在扬州地区实现了投射与立足,将扬州初步打造为合格的京畿重镇。

[关键词] 扬州; 中国国民党; 党政军力量; 京畿重镇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93-06

1927年至1931年,扬州经历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等重要历史事件,接受了国民党党政军力量的投射,从一个军阀割据中的江北大成成为中央政府首都的牢固的京畿重镇。

一、北伐中国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投射与立足

1927年上半年,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所率领的五省联军在扬州进行了反复拉锯,扬州城经历了数次兵燹。

扬州为江北要冲,民国初期,即常年驻有重兵。此时,因孙传芳与张宗昌达成协议,暂以直鲁军充当前卫对抗国民革命军,孙传芳指挥的五省联军则转入江北各地休养。扬州以其控扼江淮、邻近南京的地利,成为五省联军驻屯的重镇。在扬州城内,一度设有联军训练部、联军司令部、联军保安队、临时警备司令稽查处、联军全军营务执法处及联军第5师、第7师、第10师、各混成旅等部。这一时期,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五省联军在扬州一带调动频繁。此时的扬州城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棋局中的必挤之地。

早在1927年1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就开始谋划攻取包括扬州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久,国民革命军先后将浙江、安徽

等地收入囊中,兵锋直指苏中。迫于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压力,3月18日晚9时,孙传芳率其幕僚离开南京,经镇江前往扬州,将指挥部设于扬城长生寺内。23日起,扬州城内联军陆续离开扬州向北开拔,以张国威之第12混成旅(人数不足编)、卢香亭第2师一部共万余部队留驻扬城。27日,国民革命军强行渡江,直扑扬州城。次日,五省联军第12混成旅旅长张国威、16旅张中立等率部临阵倒戈,向国民革命军投诚。“孙传芳军被缴械者甚多”^[1],青天白日旗首进扬城。但北撤的五省联军主力未尽离扬州之境,仍盘踞于高邮、宝应等地,图谋再举。

虽然蒋介石决定肃清江北,也一再电令江北的国民革命军进击高邮、宝应等地的五省联军。但未逾廿日,在鲁军的策应下,五省联军即多路联动,反攻扬城。在仙女庙、万福桥、十二圩、城厢、蜀冈等处,国民革命军皆设置防御阵地,奋起应战,两军交战激烈,双方伤亡都较为惨重。4月8日拂晓,五省联军第3旅对扬州仙女庙、黄珏桥、观音山麓等地发起攻击。国民革命军第17军两师分头前往仙女庙、邵伯等地迎敌。时驻江南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独立第15师等部也兼程北渡增援。一番激战后,国民革命军退守扬州城垣,

^{*}[基金项目] 扬州市、扬州大学重点市校合作工程“扬州通史(民国卷)”。

[收稿日期] 2020-09-20

[作者简介] 朱季康,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虽“闭城坚守,复经炮火猛击”^{[2]799}。五省联军占领蜀岗高地后,依据地利,架设大炮,居高临下轰击扬州城厢。激战正酣,国民革命军中有两营北洋旧部阵前变节。国民革命军力有不逮,主动撤离。五省联军遂复夺扬州,扫荡城南一线,“进逼江岸”^[3]。国民革命军此次守城作战失利,因其在扬州立足未稳,战垒不固,且防卫偏重水道较多的东南区域,而疏忽了扬城西北丘地方向,以致联军由该处包抄进城。

扬州得而复失,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挫折。三日后,“四·一二”事件爆发,宁汉分裂。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与武汉国民政府博弈的大形势下,亦为在南京北面树立安全屏障,肃清津浦路南段及江北之敌,蒋介石迅速制定了收复扬州的军事部署。以何应钦为首,辖国民革命军第1、6、14、17军,于沪宁线一带向扬州、靖江、通州等地进攻。蒋介石严令参战各军:“肃清浦口,限期克复扬州。”^[4]5月初,战斗在扬州城外围地区打响。14日起,战局进入白热化状态。国民革命军第17军第2师一部占领世业洲、十二圩。22日,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20师58团占领泗源沟、仪征,向仪征溃退之敌追击前进。“孙逆第八师崔锦桂部向扬州方面退却,情形狼狈。”^[5]得悉战况后的孙传芳迫于形势,无心坚守,从扬州缺口城门仓促离城,乘轮船沿河北上,撤往清江浦。随后数日间,五省联军总部八大处、两淮缉私统领唐庆珊、第10师师长郑俊彦、宪兵司令王珍、扬州警察所所长纪清华等五省联军驻扬机构及主要军政长官纷纷由东关、便益门等地出城,向北撤退^[6]。国民革命军第14师随之占领六合等地。第17军则“进克扬州”^[7]。“死守江北之孙军,受津浦路张宗昌匪军败溃之影响,军心涣散,望风溃退,扬州已于二十三日为我第一军所克。”^[8]下午,国民革命军“大队入扬”^[6]。各部乘胜追击。28日,克复邵伯等地。6月2日、4日,分别占领高邮、宝应。“敌向北溃”^[7],扬州全境为国民革命军占领。

此度,国民革命军在扬州亦未能久持。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城内军政动荡。留驻江北的国民革命军各部军事长官无心戎务,纷纷撤回江南。“渡过江北的何、白、李三路大军都撤回了江南,在江岸对敌警戒。军以下的指挥官一般都不很明了当时的情况,这样就给了孙传芳卷土重来、偷渡长江的良机。”^[9]李宗仁、何应钦召集在宁各军队将领,会商军事仍应积极进行,

先后调陈调元等部开往前方设防。何应钦亦赴扬州,集合本部军队,会通各部开积极备战。已取消“五省联军”番号的孙传芳部乘宁汉对峙,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再夺扬州并觊觎南京。29日,双方为夺南京,精锐尽出,在南京城郊龙潭一带爆发激战。“是役战事之烈,为近时所仅见,据从战场归来者所云,子弹既竭,全用冲锋肉搏。真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战士生还者,遍身血污,盖卧地作战,地血沾衣。孙军被杀死者固极众,党军伤亡亦极可惊骇也。”^[10]31日,孙军惨败,溃不成军。孙传芳假扮成普通士兵,杂于乱军中,逃回扬州。

9月初,国民革命军乘龙潭大捷,乘势北上,“前锋已抵扬州”^[11]。5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14军占领扬州城后,即向高邮、邵伯北进。9月7日,克复扬州全境。此役,国民革命军徐海游击队将士三军用命,大寒敌胆,共俘虏五百余人,缴获武器辎重无数。孙传芳部自此远遁,扬州终获和平。

扬州夺城之战不仅是一城一池之得失,更是关系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关键之战。夺取扬州后,国民革命军在江北获得了立足点,由此北上,一路凯歌。国民革命军北伐,几进扬州城。他们倡导三民主义、宣传北伐意义,在城内与扬州民众互动紧密,呼吁民众起来参与国民革命,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情绪,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扬州的发展。

国民革命军首进扬州,逗留时间,也不过十天左右。这期间,除了找向导准备北上外,国民革命军还召开民众大会,宣传“三民主义”,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道理。他们还“散发传单书刊,内容主要是孙中山的著作。物色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到部队担任文职人员”^{[12]60}。这支军队与当时的其他军阀部队不一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部队中政治气氛很浓,有党代表、指导员等政工人员编制”^{[12]60}。总体上,国民革命军给扬州民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扬州第二次被国民革命军克复后,1927年5月27日,在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大操场,召开了由国民革命军第17军政治部、第17军第12师政治部等组织发起的军民联欢大会。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在扬各军军长、政治部主任等主要军事长官参会。何应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扬州民众拥护国民革命军,支持北伐。国民革命军第17军政治部主任袁冠新、妇女协会代表郭坚忍等先后演说。

为恢复扬州城市发展动力、推动扬州社会经济进步,军地双方还联合就扬州的未来发展进行了规划。5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与扬州地方各界团体进行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建设“新扬州计划”。该计划拟组织交通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布置委员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承担具体建设责任,这是国民革命军与扬州地方各界双方合作共建的美好创举。遗憾的是,这项工作由于战争形势的突变而夭折。

国民革命军二次收复扬州时,孙军江北部队投诚较多。为收复人心,并对驻扬高级军官密授机宜,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首度前往扬州。1927年6月1日下午3时^①,蒋介石偕随员乘金陵轮由瓜洲抵达扬州。2日上午10时,扬州市民欢迎蒋总司令大会于第五师范学校大操场举行,此次大会约有一百余社会团体参加。蒋介石即兴发表了长篇讲话。1928年6月14日8时,刚刚卸任的蒋介石由镇江启程过江来扬,至王伯龄家,祝其寿辰。随后再度游玩平山堂、小金山、徐园等地。回城后,蒋介石到中学校发表演讲,主旨大意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统一中国。傍晚离开扬州,返回镇江。蒋介石数度来扬,既有为军务操忙之戎行,也有在野赋闲之旅行。虽多行踪匆匆,未在扬州久待。但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或政府首脑,数度亲往巡察的城市,也不多见。由此可见,扬州城在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该年,国民革命军设立苏省卫戍区,五区方鼎英的第10师负责卫戍江都、高邮、仪征等地,担负扬州的防卫责任。

二、北伐中国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投射与立足

1927年3月,北伐军克复扬州。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随即派员赴扬,组织地方党组织。3月31日,国民党江都县临时支部正式成立。该支部顺利地接收了县参两会的文卷及器具,积极整顿党务。下设农工、组织、宣传、妇女、商民、青年等部,负责人为李诚、曹起潜、王寿荃、潘元弼、江一水、邱正钧、胡佩珠、马国良,其中李诚为常委。

国民党江都县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呼应北伐军事,举办了庆祝国民革命军克复扬州的系列

活动,其中最为轰动者是与国民革命军第2师联合发起军民联欢会,扬州城内的省县立各校、银行业、职工会、商团等78个团体机关,共数万人响应参与,盛况空前。但江都县临时党支部存续极短,孙传芳部重新占领扬州后,李诚等支部领导人遁逃而去,该支部活动遂趋于无形。扬州境内的其他各县国民党组织也纷纷停止在当地的公开活动,江都、仪征等部分县级国民党党部组织渡江南撤至镇江,接受了国民党镇江市党部的资助,并与同样南迁镇江的国民党兴化县党支部共建了联合办事处,继续开展组织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该联合办事处随即召开了“拥蒋迎汪排共联席会议”,发布联电拥蒋,表明其政治立场。4月22日,在润的国民党江都县党部还组织党员40余人前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洽确认政治身份及获得组织认可等事宜。

1927年5月,孙传芳部撤离扬州。24日,新任初中校长郎奎第等人自发成立了国民党江都县临时党部。次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特派员房坚来扬州筹备组建新的江都县党部,认定郎奎第等人所组织的县党部为非法组织而宣告将其取缔。5月26日,江都县清党委员会成立。5月29日上午12时,在贤良街耶稣堂旧址成立清党会,选出董光孚等9名委员。6月,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特别委员会成立,设秘书处及组织、宣传、工人、妇女青年等4部。同时撤销清党委员会。此后,江都县各地国民党基层党支部组织陆续成立。如该年7月30日,国民党仙女镇区党部成立仙女镇第三区党部。江都县党部逐渐发展至下辖7个区党部及37个区分部的规模,党员人数约500人。1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将包括江都在内的上海、松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7县原有县市党部一律取消,改设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1928年1月,撤销临时执监委,恢复特别委员会。6月,特别委员会停止了活动,成立国民党江都县党部指导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与组织、宣传、训练3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至该年3月,江都全县共有国民党区党部6个,区分部31个。12月,区分部增加至34个,党员447人。在此期间,高邮、宝应、仪征等地的国民党各级基层组织也纷纷建立,但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如国民党宝应县第一区党部成立时受战争环

^① 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党部编:《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第173页,称蒋介石扬州此行为5月1-2日,显为错误。

境的影响,其成员组成未经合法组织程序。1927年6月13日,遂重行选举,选出监察委员吉世隆,执行委员曹甲五等五人及候补委员朱诚鸞、王承露二人。这种情况在扬州境内的其他国民党基层组织初建时颇为常见,体现出当时国民党在扬州的基层建设工作较为匆忙紊乱,组织监管缺位,以致矛盾频发,常有反复。

扬州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成立后,在起初一两年内,围绕着反日爱国、北伐纪念、讨伐唐生智、清党反共等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927年5月,日本出兵我国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情绪也日益高涨。7月1日,为抗议日本“南阳丸”“瑞阳丸”等商船在下关、镇江等地的非法行径,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特委会致电全国各大报馆,呼吁“速起一致申讨、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申报》,1927年7月1日)。7月6日与10日,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特别委员会先后组织召开反对日本出兵大会筹备会及江都县市民大会,强烈抗议日军暴行。7月中旬,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组织了江都民众庆祝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一周年纪念提灯大会,参会者进行了演讲并提灯绕城,场面十分热烈。扬州地区的国民党组织所举办的其他一些较重大的纪念活动还有:1927年6月13日晚7时,国民党江都县党部在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内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各家商铺皆挂灯结彩,燃放爆竹,庆祝活动持续了两日。同时,该党部兼办了扬州民众反对日本增兵山东大会。时天不作美,细雨绵绵,“然民众鼓舞精神依然不减”(《申报》,1927年6月16日)。会后,复开游艺会,任民众参观。6月16日下午,在国民党江都县特别委员会内,举行了“总理蒙难五周年纪念会”“参加者甚众,后至几无立足地”(《申报》,1927年6月19日)。1928年8月1日,国民党宝应县党部召开追悼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大会,到会者万余人。1929年5月5日,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组织了“五五”八周年纪念会。8月,国民党江都县党部召集各机关团体,举行廖仲恺殉国四周年纪念会。1930年,国民党宝应县党部在县党部大礼堂组织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各局职员、各民众团体委员、学校代表等三百人以上参加了大会,午后,组织演讲队,“分赴各热闹场所演讲七十二烈士殉国史略,听者无不动容”^[13]。这

些活动的举办既是国民党政府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扬州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扬州人民,为长期沉闷、封闭的扬州城开了风气。

1927年10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唐生智。29日,扬州民众开第一次讨唐会议。11月4日晚,讨唐战况正酣之际,扬州再次召开讨唐大会。数万民众在公共体育场集结,通电表示江都人民讨唐立场,请国民政府派兵北伐西征,消灭唐生智。1928年,江都县政府还专门发布《讨唐宣言》,以示与南京政府步伐一致。

由于组织工作失当及派系斗争,1929年至1930年间,国民党江都、高邮等县党部皆发生了夺权闹剧。1929年1月,国民党江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部分党员向省党部呈控一些指导委员会委员暗箱操作,控制选举。后经国民党省党部调解,始平息纠纷。大会决定设立组织、宣传、训练3部及民众训练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1929年8月间,因对改组派的立场分歧,高邮县长与县党部发生纠纷,数名执监委员潜至南京,四处控诉,以县长摧残党部为名,要求撤职县长。而县长则称这些委员涉及改组派,应撤职查办。双方互相攻讦,一时舆论哗然。1930年1月,因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组织不健全及纠纷不断,国民党省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要求其停止活动,并派员保管。3月,国民党江都县党务整理委员会成立,设组织、宣传、训练3部及财务委员会。1932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江都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党务整理委员会随之停止工作。

在扬州各地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建立过程中,清党与反共作为其一项重点工作而长期存在。1928年,江都县党部在元旦通告中庆祝称:“红旗报捷,赤化潜消。”^[14]至少到了1929年,扬州地区国民党内部的清党运动才稍有缓解。事实上,清党工作也给国民党自身基层干部建设造成了困扰。该年4月19日,国民党省部执委会还专门发函要求宝应县党部安抚各执监委员,“前因举发共党,致该县各执监委员不能安心工作”^[15],以缓解清党运动给基层组织带来的压力。

1933年春,国民党江都县党部设立了江都县肃反室(又名特务室),强化反共工作,其主任(又称肃反专员)由县党部首领兼任,下设特务员(省

特务室委任)、文书、助理员、通讯员等。其任务主要是在江都县境内调查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与活动情况,该室一直活动至扬州沦陷前夕,才撤出扬州。

经十年的持续发展,至1937年1月,扬州地区国民党组织已有县级党部4个(江都、高邮、宝应、仪征),区分部(含直属区分部)57个,党员达到1152人^①。县均党员288人,略高于当时全省县均党员数^②。这股政治力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扬州的助手。但直至抗战前,这些基层组织的活动能量大多仅局限于县级层面,“县以下乡村社会几乎不见国民党的组织踪影。国民党的组织触角尚未深入到区、乡层级”^[16]。

三、北伐中国国民党行政力量的投射与立足

1927年4月26日,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在南京成立。5月2日,何应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会议,宣布江苏省政府正式成立。次日,发布《江苏省政府宣言》。江苏省政府成立后,下属各地各级政府机关的组建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

国民革命军占领扬州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形势的需要,在不涉及尖锐的政治立场冲突下,扬州的重要职官大部分由国民政府高层直接委任,如缉私统领(何应钦委任徐桎宇);运使(蒋介石委任丁乃扬);江都县县长、公安局局长等,其余多原职留用。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当时扬州政局的稳定,保证行政力量的执行力。一些下属的事务局也陆续成立,后略有变动,如1927年8月,考虑到江都路政局“按其实际,殊鲜成绩”^[17],经江都县政府训令而将其裁撤。

这一时期,江都县长一任变动频繁,仅在1927年4月至1932年11月间,县长一职即经历了11任,平均每任仅半年,无论是比照清末,还是民初,这种变动状况在扬州历史上“前此所未有也”。其中最短者首东甫任期仅6天,最长者为陈肇燊,任期接近4年。

在1927年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争夺中,对扬城基层行政机构及人员的影响并不显著,大多

数中下级职员得以保留岗位,继续供职。如1927年9月,孙部从扬城退却后,国民革命军第18军即委李寔接任江都县长一职。9月10日,李寔赴署接事后,立刻召见所部职员及县警备队、警察各部长官,宣布照旧供职,概不更动^[18]。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扬州城统治秩序的稳定,部分减少了军事行动对扬城社会的冲击。

在国民政府废除道级行政编制的大背景下,1928年1月,设立14年之久的淮扬道被废除,江都县被直属于江苏省,县政亦为之一新。同年,《江都县政治月刊》出版。江都县商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特在该刊发文祝贺:“唯我令尹,德政时闻。为民造福,为国建勋。凌云千仞,占月二分。彩笔生花,翰墨流芳。吸新吐旧,卓哉斯文。”省内各地同僚也纷纷撰文祝贺。这份刊物的创制表明江都县政府在近代行政制度建设上的进步,也为广大民众了解县政提供了直接渠道,成为扬州近代行政史上的一个亮点。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县组织法》,这是民国政府第一部规范县级行政组织的法规。该法确立了省以下设立县、区、村三级行政机关的设置规范。根据《县组织法》的规定,扬州各地所属县行政机关由县长、秘书、县政府总务科、县行政议会等组成。设有县长一人,由省政府任命。县长以县民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任期三年。负责综理全县行政事务;任命行政职员;可兼任军事法官。县政府下设公安、财务、建设与教育等局。县政会议负责议决预算、募债;议定县的单行规程;建议县兴废事项;审议县长交议事项。县行政会议组成人员为县长、各科科长、各局局长、各区区区长、地方团体首领以及县长聘请的地方士绅。主要负责县长交议的事项、各方议案等。但江都县于上述三科外,另设司法、统计与收发三处,“实因江都县政府系合前清江都甘泉两属政务于一县,非仅设三科所能兼筹并顾也”^[19]。而司法尚未独立,特设一处,寓司法独立之意。统计处之责任在整顿财政,精密统计;收发处实为政府之咽喉,亦为政府之耳目,皆有独设一处之必要。

^① 参考《民国24、25、26年扬州各县国民党组织情况表》,见《扬州市志(中册)》,第2009页。其中各县党部人数中仪征为直属区执监委员会,其余为县执监委员会。

^② 据王奇生的统计,当时江苏省县均国民党员270多人。见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第67页。

1929年7月16日,江都县行政会议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按照《县组织法》规定的参会者及来宾共40余名。县长主持会议并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县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同庆、商会主席王敬庭、报联合会代表张少斋先后演说。会议共收到议案90件,分为民政27件,财政19件,农工商13件,教育8件,建设20件,地方自治3件。

至1931年,江都县政府的设置为县长1人,秘书1人,分设两科,11股,各科各置科长1人。属有公安局^①、建设局^②、财政局、农场等机构,各局设局长一人,农场设主任一人。“江都县公安局由省政府委任专员为局长,受县政府监督。”(《江都新县志》,卷一,职官表)1932年左右,江都县公安局设置为三科及督察长、消防组、侦缉队,另有第一至第十分局^③。江都县建设局设置为技术科(下设市政工程股)、事务科、三桥事务所、人力车捐事务员等。江都财政局设置为总务课、经征课(下设田赋及杂税主任两职)、会计课、公款公产管理处^④等。江都县境内还设有江北运河工程处、两淮盐运署^⑤、扬州盐务稽核分所、绥靖督办公署^⑥、监狱署等官方机构。

其他属县的设置也大同小异。仪征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书1人,有两科,各设科长1人。属有公安、教育两局。不同于江都县,仪征县财政局已改局为科级编制。建设局业务则由江都县建设局兼管,仅于该县设一建设事务所。另设农场及警察队,任农学及剿匪事务。高邮县政府设秘书及第1、第2两科,科员编制8人,设公安、财政、教育、建设4局,分设局长1人。宝应县政府则依三等县组织,设秘书科长各1人,科员6人,属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各局,各设局长1人^{[20]411}。

从军事,到党务,再到行政,短短数年间,国民党党政军力量三管齐下,荡涤了扬州地区原有的北洋军阀政治、军事、行政体系,建构了听命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驻军系统、服从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系统、统一于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三位一体,打造出一个基本合格的“京畿”重镇。

[参考文献]

- [1]最后消息[N].大公报(天津版),1927-03-29(2).
- [2]镇威军司令部关于孙传芳攻占苏北扬州泰兴与瓜州等地通知[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
- [3]江北战事[J].兴华,1927(14):38-39.
- [4]中外大事记[J].泗华月刊,1927(3):54.
- [5]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4号)[R].1927-06-01.
- [6]国军克复扬州之经过[J].兴华,1927(20):33-34.
- [7]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关于第一次渡江攻克苏北仪征至海州等地电[G].第383页.
- [8]第一路军已克扬州[J].指导(南京),1927(1):11.
- [9]阮镇秋.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的见闻[M]//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5.
- [10]江战回顾,双方牺牲之巨,为从来所未有[N].大公报,1927-09-17(6).
- [11]一、七军进抵扬州[N].申报,1927-09-05(4).
- [12]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科.扬州史志资料:第一辑[G].1981.
- [13]党务消息:宝应县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纪念大会纪[J].江苏党务周刊,1930(14):112-113.
- [14]张士仁.庆祝十七年元旦之通告[J].江都县政治月刊,1928(1):96-97.
- [15]党务:令宝应县切实保护党部人员[J].江苏省政府公报,1929(126):14.
- [16]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J].民国档案,2006(1):66-77.
- [17]路政局之裁撤[N].申报,1927-08-07(10).
- [18]江都县长易人[N].申报,1927-09-13(10).
- [19]会议录:第一次至第七次府务会议情形(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十七日)[J].江都县政治月刊,1928(1):155-190.
- [20]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M].江苏省民政厅,1931.

(责任编辑 光 翟)

① 1927年改警察局为公安局。

② 1937年7月,江都保留建设局,其余各县一律改为建设科。各县原设置农业推广所,一律裁撤。

③ 各分局所在分别为:第一分局(丁家湾三元宫)、第二分局(瓜洲镇)、第三分局(李典镇)、第四分局(仙女庙镇)、第五分局(大桥镇)、第六分局(宜陵镇)、第七分局(桥墅镇)、第八分局(邵伯镇)、第九分局(大仪镇)、第十分局(黄珏桥镇)。

④ 时各县该机构归财政局监督管理。

⑤ 1931年,两淮盐运使署北迁,淮北运副移驻淮南。

⑥ 1930年12月18日,张之江到达扬州,绥靖督办公署开始办公。1931年1月10日,在扬州召开江苏绥靖会议,苏北各县县长皆赴扬出席。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前的《苏报》案*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

[摘要]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一生著述甚丰,国人大都认为他是“国学大师”,忘却了他还是一位革命家。章太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孕育,除源于其出生及成长的家庭及社会环境外,还有南洋公学学潮及爱国学社的创办,特别是《苏报》,为章太炎传播其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故意不逃,要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觉醒,被审讯时,才有了“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的呐喊声。可以说,《苏报》案发生前后,是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家最为辉煌的时期。五四运动后,不少学者以“民主”“科学”来界定“革命启蒙”,认为章太炎只讲“排满革命”,不能算是革命启蒙思想家。1936年,章太炎去世时,时人评其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政府令以国葬。可见,其先前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民国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依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

[关键词] 章太炎; 《苏报》案; 爱国学社; 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099-06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一生著述甚丰,有《章氏丛书》《章太炎年谱长编》。谈起章太炎现在国人大都认为他是“国学大师”,似乎忘却了他还是一位革命家。鲁迅是章太炎众多弟子里面,最有名的一位,在章太炎去世后,鲁迅曾为此感慨写道:“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1]878}对于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鲁迅解释说:“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生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1]878}紧接着鲁迅话锋一转,对章太炎的一生进行整体的概括,并特别强调:“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

大。”^{[1]878}而鲁迅“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邹容的《革命家》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1]878}。鲁迅笔下所写的就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有名的《苏报》案,2019年恰逢章太炎150周年诞辰,弄清楚章太炎与《苏报》案之间的来龙去脉,就能清楚还原章太炎革命的一面,梳理清楚他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

一、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被审讯时,因何有“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2]33}的呐喊声

弄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章太炎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开始说起。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在浙江余杭仓前镇一个地主家庭。可以说浙江这块土地是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明朝灭亡后,清军南下,到达浙江时,遭遇到的抵抗最为激烈,浙东人多为强项不屈的硬骨头。尽管浙东地区的反抗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了,但一股反

*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14)。

[收稿日期] 2020-08-18

[作者简介] 苗体君,男,河南鹿邑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抗的民族激情一直潜藏在浙东百姓的灵魂深处。清王朝统治时期,关于张煌言、黄宗羲等抗清的英雄事迹,在浙东地区世代相传,并在民众中影响深远。

可以说章太炎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加上家庭氛围,所以很早就萌发了民族主义思想。章太炎十一二岁的时候,跟从他的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外祖父曾给章太炎谈到了清初的一桩有名的文字狱案“曾静案”。雍正年间,一个叫曾静的人,因反清被人告发,清廷将他抓了起来。而据曾静交代,他是读了吕留良的书以后才开始反清的。而此时吕留良已经作古,吕也是浙江人,明亡后,拒绝到清廷做官,为此还削发为僧。于是清廷下令掘坟,将吕留良剖棺戮尸,对吕氏及其弟子严洪道、沈在宽满门抄斩,并株连了刻书藏书的人,后对曾静也处以极刑。讲完这个故事后,朱有虔说:“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3]70}章太炎问以前有人说过这话吗?朱有虔立即回答说,过去王船山、顾亭林都说过这样的话,尤其是王船山说得最透彻,王船山曾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唯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3]70}王船山这段话的意思是,南宋被蒙元灭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文化彻底沦亡的一场大灾难。言下之意,明被清灭亡,与南宋亡于蒙元是一样的。机灵的章太炎一点即通,他立即大胆的推论道:“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3]70}外祖父低声说:“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是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3]70}

随后,章太炎开始对这个敏感的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意识地翻看蒋良骐著的《东华录》,查寻庄廷龙、戴名世、查嗣庭等文字狱案的来龙去脉。庄廷龙本是浙江的一位财主,花钱买了一本明末朱国祯写的关于明朝的史书,后又花钱雇人帮忙补充进了崇祯朝的事,并为这本书更名《明史》,康熙年间即1663年,受《明史》牵连,杭州被处死人数达70人,其中凌迟处死者有18人。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戴名世案发,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述的明末清初事,还采用了南明朝年号“永历”,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方孝标被戮尸,戴名世被处死,家族五服内的男女老少数十人皆被处死或充军,受牵连人数达数百人之多。雍正四年即1726年,浙江人查嗣庭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因所出试题而获

罪,抄家时,发现他日记中“语多悖逆”,批评康熙朝的很多政策,虽然查在狱中自杀,但仍然遭戮尸枭首,其长子被判斩监候,兄弟子侄被流放者甚多,受牵连遭打击者不下四五十人。章太炎还阅读了《明季稗史》,这是清朝时秘密流行民间的一部野史,其中的《烈皇小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诸篇,详细地记载了明朝亡国、清军入关时,屠杀汉族民众的详情。可以说,章太炎读着这些文字,真是“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4]。20岁时,章太炎读了清代浙江史学家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全祖望是一位极有民族气节的学者,他的著作以“墓誌”“神道碑”等形式揭示明末抗清史实,以表彰抗清英雄。读着这些史料,章太炎“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心里第一恨事”^{[5]8-9},他“益奋然欲为浙东父老雪耻”^{[5]9}。

章太炎的祖辈、父辈都是民族观念极强的士人。1890年春,章太炎66岁的慈父离开人世,其父临死前一再叮嘱家人:“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6]52}文中的“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裳相连。章太炎的祖辈,入清朝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用清代的服饰,而是采取先前的“深衣敛”的办法。这段话用白话文通俗地说是,尽管章太炎家先人做过清朝的官,但不是吏部任命的。死了以后要遵照祖宗传下的规矩,穿汉族服装入土。活着的时候,因为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没有办法,死后做鬼,总归是大汉朝的。由此可见,章太炎的父亲临终前的话,对章太炎影响有多大。

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社会及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形成了坚如磐石的“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所以,1903年,36岁的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后,被审讯时,才会有了“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7]41}的呐喊声,这里的“满珠”就是满洲。

二、参与创办爱国学社并担任国文教员,其间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02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掀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封建专制斗争,200多名学生集体退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8]298}。当时报界称这次学潮为:“此中国学生社会一大劈头之大纪念也。”^[9]因集体退学是

由一只小小墨水瓶引起的,因此又被称之为“墨水瓶事件”。

事发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南洋公学内除师范院外,共有8个班:特班、政治班和6个普通班。郭镇瀛是第五班文科的教习,是个顽固的守旧派,长期以欺压学生为能事,严禁学生传阅《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1902年11月5日,郭上课时发现师座上有一只空墨水瓶,便认定是学生有意捉弄他,并当众严词诘问,五班的学生不约而同地回答不知道。于是,郭就恐吓靠近师座的贝绳伯、伍石卿两位同学,限他们3日之内告发,“迟则加罪”^{[10]45}。11月8日,郭又引诱贝绳伯,但贝一口认定不知道。11日,经郭镇瀛威吓,五班学生杨之福诬告墨水瓶系平时“屡与为难”的伍正钧所置。随后,学校应郭所请,开除了无辜的伍正钧,随即五班学生大哗。14日,五班学生找校方总理汪凤藻申辩力争,但无效果。当晚全班学生决定次日悉行退学,并到其他各班举行告别演说。15日晨,汪凤藻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11]43}为由,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从而引起全校学生公愤,当即罢课、集会,并由每班派出一名代表向汪凤藻请求收回成命。汪不同意,一定要“以此示儆”^{[11]43-44}。于是,全校学生决定集体退学,以示抗议。紧急时刻,在南洋公学担任特班班主任的蔡元培出面调解,在蔡的反复劝说下,学生们约定“明晨十点钟前,总办去则某等留,否则某等行已决”^{[10]46}。当晚,蔡元培去见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而盛却以“别有要事辞不见”^{[10]46}。16日上午10点钟,学生集体离开了南洋公学。具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同情学生遭遇,也愤然辞职。

“学生退学事件发生后,郭镇瀛自知难却罪责,惶惶逃回老家;色厉内荏的总办汪凤藻,自然也无法向上交差,只好以‘走为上’,当天即‘尽室偕行’。”^{[10]46}16日午后,当盛宣怀遣人拿着他的“手谕”来挽留学生时,南洋公学早已是人走院空。随后,苦心经营南洋公学的盛宣怀派人四处活动,劝说学生返校。虽然返回了一些学生,但退学者仍有145人。为了让退学的学生能继续求学,蔡元培就给远在浙江余杭修书的章太炎写信,请他出山。1903年初春,章太炎来到上海,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筹建爱国学社。爱国学社的校址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是一幢三层楼房,底层为中国教育会,二楼是教室,三楼是宿舍。教员除蔡元

培、章太炎外,还请来了吴稚晖、蒋维乔等人。随着南洋公学退学学生逐渐返校,到爱国学社开学时,学生人数有55人。

爱国学社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团体,平时学生在学校里可以毫无顾忌议论时局,每星期都有学生去张园演说,公开宣传革命。这样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非常适合章太炎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可以说,章太炎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自由宣泄的阵地。爱国学社有四个年级,章太炎担任三、四两个年级的国文课。课堂上,明清兴亡之事是章太炎经常讲授的内容,他给学生讲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故事。正是在他的诱导下,学生中自由、革命的思想异常浓烈。有一次,章太炎给学生出了一篇命题作文:《×××本纪》,让每个学生各写一篇自传。看到这个题目,学生们面面相觑,毕竟“本纪”是历代正史为帝王立传的专有名词。章太炎以此为题的目的,除蔑视封建名教外,意在启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在先生的鼓励下,最后同学们终于完成了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缀上了“本纪”的作文。

每周的张园演讲会,章太炎场场出席,而且每次都要慷慨激昂地演说一番,他那“革命,革命,只有革命”的呐喊,每次都把演讲会推向高潮,并引来雷鸣般的掌声。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中,真实记录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轻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演说,总是大声地疾呼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外,一到散会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待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5]92}

当时爱国学社的师生还大都留着辫子,穿着长袍,章太炎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留了五寸多长的头发,并分成左右两股。春天,章太炎通常穿着一件长袍,外罩着一件外褂,外褂上绣着一个“汉”字。夏天,穿一件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腰间勒着一根草绳,到朋友家做客时,往往不等主人允许,他会脱下上衣,袒胸露背,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一年四季,无论寒暑,章太炎手里总爱拿着一柄团扇,似戏台上诸葛亮手中的羽毛扇一样。可以说,章太炎在爱国学社的日子里,其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撰写,是这种变化的明确标志。玛志尼

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为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的卓越,在爱国学社读书的柳亚子,称当时的章太炎是中国的玛志尼,并盛赞道:“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5]96}

三、以《苏报》为阵地,发现并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也煞住了康有为保皇党的歪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苏报》曾一度是章太炎、邹容等革命者的精神家园。上海《苏报》创办于1896年,原本是一份以刊载一些市井琐事、社会新闻的普通小报,因创办人胡璋不善经营,创办不久,就亏本了。1898年,由陈范出资接办,并对《苏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爆发后,震撼了整个神州大地,《苏报》立即做出反应,率先开辟“学界风潮栏”,专门报道国内各地学生运动和留日学生爱国斗争的消息,“革命”“排满”等字眼也屡见报端。一时间,《苏报》在全国声名鹊起。陈范有一个女儿叫頔芬,20来岁,有一定的文学功底,而且思想进步,与爱国学社的学生有来往,她建议请爱国学社的师生为《苏报》写稿,随后,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汪文溥、吴稚晖等六人轮流为《苏报》的每日论说撰写稿件。由学社的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钊、汪文溥、吴稚晖等6人轮流撰写。1903年5月,章士钊任《苏报》主编,对《苏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苏报》的火药味更浓。当然,将《苏报》的影响推向高潮的是章太炎。

1903年5月,19岁的邹容拿着长达两万字的《革命军》书稿,请章太炎指正。章太炎带着浓厚的兴趣,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书中提出了一套建设“中华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书中“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返魂之宝方”^{[12]141}。在文章结尾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12]176}将人们仇满的情绪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章太炎也被书中所迸发出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于是,章太炎又提笔对《革命军》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润色,邹容对此非常满意。送走了邹容后,情绪激动不已的章太炎提笔写成了《革命军序》。序文中认为:“嗟乎!世皆器昧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

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即可知矣。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器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13]110}随后,在章太炎催促之下,5月底,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6月10日,《苏报》刊载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文,并把宣传邹容《革命军》的风潮推向极致。

戊戌变法前,章太炎曾为康有为的变法动过心,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却在海外续鼓吹保皇,这就使得章太炎越来越厌恶康有为。针对康有为的倒行逆施,章太炎忍无可忍,他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反驳康有为的荒谬论调。6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单行本形式印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康有为宣扬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皇上圣明”“满汉同化”“革命要流血”“革命会招致外国干涉”等错误论点,逐一进行反驳。文章严厉警告康有为(康有为号长素):“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议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瞶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袋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渐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惭溃散,长素恣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瞶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14]303}《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使民众认清了清王朝和保皇派的真面目,犹如一篇气势磅礴的革命檄文,继邹容的《革命军》之后,再次激起革命的浪潮,革命的火花又一次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闪烁。当时同盟会成员汪东曾记述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宣传效果:“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

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5]103}可以说,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煞住了康有为保皇党的歪风。

四、面对抓捕,故意不逃,要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告自己反清的革命决心,并以此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觉醒

因为《苏报》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政府,江苏巡抚恩铭通知上海道台袁树勋捕人,但章太炎等人所在的爱国学社在租界内,这就为清政府直接抓人设置了障碍。于是,他们便派出密探,对学社和苏报馆加以监视,同时还加紧与各国驻沪领事及工部局进行交涉,要求工部局出面查封《苏报》,并逮捕章太炎等人。工部局为了“维护治外法权”,拒绝了清政府的请求,并表示,只要学社不藏武器弹药,如官方来捕人,工部局将予保护。但章太炎等人被工部局先后传讯六次,而且每人都留下了自己的住址。

1903年6月29日,也就是《苏报》节录发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那一天,上海道与租界的工部局经过协商,双方商定,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租界定罪,在租界受刑。当天下午,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来到《苏报》馆。早在前几日,因风声紧,蔡元培去了青岛,章士钊、汪文溥也躲起来了,陈范逃亡到了日本,而巡捕来报馆时,恰好章太炎、邹容也不在,他们只将报社的账房抓走了。当晚,章太炎、邹容回到住处,立即就有几个学员跑来,告诉他们下午报馆发生的事。让他们赶快出去躲一躲。章太炎听后只是笑笑,便钻进被窝,呼呼大睡。6月30日早晨,章太炎与学生共进早餐后,刚回到住处,一个叫叶瀚的老朋友跑进他的房间,请他赶快离开这里,巡捕马上要来了。只见章太炎仍坐在那里,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并说:“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15]437}当巡捕冲进来时,章太炎高声说道:“章炳麟就是我。”^{[7]40}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7]40}的英雄气概。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震动全国“苏报案”,也是清末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章太炎、邹容被定为“主犯”,章太炎还被列为“首犯”。

当时章太炎完全可以逃走,为什么要自投罗

网?章太炎被关进巡捕房后,上海《新闻报》上有一篇文章写他被捕的事,说章太炎能逃走却故意不逃,太愚蠢了。当时,《苏报》还没有被查封,为此,章太炎写了一篇题为《狱中答新闻报》的文章,并刊登在最后一期《苏报》上。文章回答了世人疑问,章太炎说:“吾辈书生,未有寸刀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16]章太炎还嘲弄《新闻报》记者为“斥鹤并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5]109}由此可见,章太炎故意不逃,就是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向社会宣告自己反清革命的决心,并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觉醒。

章太炎被捕后,清政府绞尽脑汁,用尽一切办法想将章从租界转移出来,加以秘密杀害。他们与洋人交涉时,曾以沪宁铁路的修建权为诱饵,还答应出银10万两,另送给工部局巡捕房300两。因章太炎被捕之事世人皆知,迫于舆论的压力,租界当局也不敢轻举妄动。章太炎在巡捕房关押11个月后,1904年5月21日,清政府外务部和各国公使共同签署了判决书,“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做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借’”^{[7]42}。1905年4月3日,邹容备受狱卒折磨而死于狱中,1906年6月26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1]878}。此后,章太炎便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鲁迅称这一时期的章太炎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1]878}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宣传家。

纵观20世纪的中国,1903年以前的中国,“革命”与“革命者”都是不被当时的国人所理解与接受的,在当时的中国百姓心目中,“革命者”就是土匪强盗,乱臣贼子,是青面獠牙的绿林大盗。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国人也开始接受“革命”这一观念。回头看这段历史,起到启蒙作用的革命家包括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在这些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章太炎,“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17]63-64}。而且章太炎的文章言辞激烈,火药味最浓,其中的“载活小丑,未辨

菽麦”^{[14]295}两句最甚,载湉就是当时的光绪皇帝。所以鲁迅先生曾经盛赞章太炎“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1]879}。“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17]64}而邹容撰写的《革命军》被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章太炎,章太炎不仅为《革命军》进行了文字上的润色,而且还大力宣传《革命军》。可以说,章太炎对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

当然,章太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以孕育,除源于其出生及成长的家庭及社会环境外,还有南洋公学学潮及爱国学社的创办,特别是《苏报》,为章太炎传播其思想提供了一个“平台”。《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故意不逃,要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可谓是“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1]879}。刑满出狱后,章太炎到日本主持《民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一场论战,扩大了革命的宣传力度,使革命思想深入国民人心,这期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曾去听过章太炎的演讲。1936年10月9日,鲁迅曾在回忆中写道:“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879}足见其革命思想对鲁迅先生影响之大。但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1]879}。可以说,《苏报》案发生前后,是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家最为辉煌的时期。五四运动后,不少学者以“民主”“科学”来界定“革命启蒙”,并以此得出结论,章太炎只讲“排满革命”,讲民族革命,所以就不能算是革命启蒙思想家。但1936年,章太炎去世时,“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革命政府令以国葬”^{[7]178}。可见,其先前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民国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依然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家。

[参考文献]

- [1]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鲁迅杂文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2]许寿裳.章炳麟传[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 [3]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1933)[M]//章太炎.章太炎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 [4]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N].苏报,1903-07-06(1).
- [5]张兵.章太炎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 [6]沈廷国.记章太炎先生[M]//沈廷国.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 [7]许寿裳.章太炎传[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
- [8]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 1896—190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 [9]南洋公学学生出学始末汇记[N].新民丛报,1902-11-30(21).
- [10]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 [11]盛懿,孙萍,欧七斤.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 [12]殷夫,邹容,吕碧城.孩儿塔·革命军·晓珠词[M].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5.
- [13]章太炎.革命军序[M]//章太炎.章太炎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 [1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M]//章太炎.章太炎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 [15]章太炎.再复吴敬恒书[M]//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6]章太炎.章太炎狱中答新闻记者书[N].苏报,1903-07-06(1).
- [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光 翟)

晚清场域下徐寿的译者惯习和资本诠释*

张 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徐寿是近代中国知名的翻译家、科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对晚清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革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也对晚清翻译场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本文运用布迪厄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分析徐寿译者惯习和资本的形成过程,论述其在晚清翻译场域中的建构作用,并总结其参与翻译活动的特点和贡献。

[关键词] 晚清场域; 徐寿; 译者惯习; 资本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105-04

一、引言

徐寿(1818-188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翻译家。他崇尚科学与实证,勤于学习,一生译著繁富,其中很多译著是当时相关学科领域的首部译著。它们一方面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对晚清翻译场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而且对清末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借助于布迪厄的社会翻译学理论,本文首先分析了徐寿译者惯习和资本的形成条件,其次论述其在晚清翻译场域中的建构作用,最后总结其参与翻译活动的特点与贡献,希望对晚清翻译史学和苏籍翻译家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徐寿译者惯习和资本的形成条件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钱桥镇社岗里人。据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记载,徐寿祖父徐审法“耕读外兼理商务,勤俭持家,家日以裕”。其父徐文标“明理学,行坐不苟”。^{[1]350}但在徐寿五岁时其父亡故,由母亲抚养长大,徐寿对其母极尽孝道。《清史稿·徐寿传》记载“生于僻乡,幼孤,事母以孝闻”。^{[2]13929}

徐寿年少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研读经史,

涉猎百家。他不喜欢毫无经世实用的八股文章,喜欢钻研博物格致之学,于制器之学技艺精湛。《格致汇编·徐雪村先生序》记载“无锡徐雪村先生奇杰士也。……幼嫻贴括,习举业,忽以为无裨实用,弃之。遂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潜心经济,讨论经史,旁及诸子百家”^{[3]730}。

徐寿早年参加过科举考试,后“忽以为无裨实用”放弃科举入仕之道,“与金匱华衡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久之,于西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2]13929}咸丰初年,到上海墨海书馆向数学家李善兰请教问题,接触到西方传来的西学。后与华衡芳屡次造访此地,与李善兰、王韬等学者交往,见识了他们与西方传教士合作译述西书,并且购置一些西方科技书籍与仪器进行科学实验。同治元年(1862),因其通晓制造与格致,与华衡芳被江苏巡抚曾国藩保荐招致安庆军械分局从事机动船只的研制工作,这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治四年(1865),经过反复试制,徐寿、华衡芳等人成功制成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同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徐寿被“委总理事局”,不久后,便开启了人生极其重要的

*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苏籍翻译家译学活动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555),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三五”科研规划第一期项目(项目编号:JSNU2016ZD03)。

[收稿日期] 2020-07-23

[作者简介] 张 芳,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科学书籍翻译生涯。

徐寿等人懂得西书翻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翻译“系制造之根本”,通过翻译西书,不仅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还可以广泛向国人传播,从而整体上提高当时的科技水平。同治六年(1867),徐寿与华蘅芳等人奉调抵达江南制造总局,主持技术工作。随后,徐寿等人提议创办翻译馆。次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此后,徐寿主要精力投入在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上。

由此可见,徐寿自身勤奋努力、醉心科技、讲究实验科学,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较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此同时,他忧国爱民情怀,有着独特的译者惯习和涉猎百家、化学、数学、物理、机械制造等文化资本形成条件。

三、徐寿译者惯习和资本的成分分析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参与者感知世界、形成概念并采取行动的认知图式系统^{[4]34}是“一整套使行为者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倾向性特性。这些特性会促使行为者有规律地投身实践、形成感知和态度,而无须有意识的协调,也不受任何规则来约束……这些特性实实在在地塑造着身体,并成为其第二本性。另外,由此培养形成的倾向性特性的构建也会不可避免地反映行为者习得这些特性的社会条件”。^{[5]12}就其本质来说,惯习可以理解为“个体在自身成长过程中的家庭教育、学校学习、社会工作和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内化及强化了的社会规律”^{[6]54}。

据此,译者惯习(translatorial habitus)可以理解为:一整套使译者个体以某些方式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倾向性特性。这些特性会促使译者有规律地投身翻译实践,形成感知和态度,而无须有意识的协调,也无须任何规则来约束。^[7]个体译者是译者惯习的主体,译者惯习是译者个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译者惯习是“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和对外在环境的不断内化中习得而成”^[8],其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个体思想与环境的碰撞交融,展示了译者个体独特的翻译选择和翻译思想,同时也体现了译者成长过程所遭遇的一系列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因素。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9]189}资

本的形式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等。据此,译者资本可以理解为是译者积累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译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形式。徐寿在晚清场域中有其独特的惯习和资本。

根据布迪厄的惯习和资本的观点,徐寿的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徐寿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好专研博物格致之学。华蘅芳在向王韬等人介绍徐寿时,称赞徐寿“巧慧绝伦,所制新奇之物,可与泰西人相埒,善铸吕宋银钱,混入真者,几不能辨。自明钟表及指南针皆极精妙。尝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杼,即知其造法,可谓明敏者矣。”^{[10]134}徐寿知识广博,涉猎百家,有着扎实的文史基础。阅读《禹贡》《毛诗》时,他详细抄录下山川、田土、物产等实用资料。阅读《春秋》《汉书》《水经注》,他关注地域、地物、水道及变迁,还绘制了春秋、两汉的疆域地图。^{[11]536}他醉心西方科技,对科技之理孜孜以求。通过阅读科学译著并进行科学实验,逐渐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制器实验技能。进入江南制造局工作后,徐寿仍然结合西方译书,从事科学研究,并在《格致汇编》上先后发表多篇科学论文。这些丰厚的文化资本为徐寿的译书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同治四年(1865),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徐寿为首任襄办。他的志向不仅仅在制造炮船,他认为翻译西书也非常重要。同治六年(1867),根据他和华蘅芳等人的建议,曾国藩上奏清政府以筹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治七年(1868),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并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该馆由政府出面创办,设立机构、组织译员系统翻译西书。徐寿所译之书受到曾国藩的肯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高度的评价,他也以西书翻译和传播西学为使命,奠定了徐寿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为徐寿的翻译创设了雄厚的社会资本。

徐寿的符号资本体现在多个方面。徐寿为人“性质直无华”,不尚空谈,务实进取,淡泊名利,以布衣卒于科学翻译与科学教育的岗位。20岁时曾自书其座右铭“不二色,不诳语,接人以诚”。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内藏有一份纪念徐寿而编的未刊稿,封面题名《雪村先生遗像》,内存有好友程培芳的《雪村公传》与张文虎、王德均、张佳梅、江标、郑昌棫等12人的题词、题诗和纪念文字,其中徐钟敬

题词为“雪村先生博学多闻,吾吴奇士也。秉性恬淡,不趋时尚,隐居于锡山之麓,曾文正公闻其名征而出之。先生不愿作吏,惟请购求西书,广为翻译,以兴士林所不逮。及奉檄,终年不释铅槧,历十余寒暑,几如一日,故于泰西学尤为渊邃,声明布遐荒,不特海内所闻已也。先生与人讨论格致之理,反复开导,娓娓不倦”^{[12]419}。

徐寿对西方科技的专研和孜孜以求,对译介西方科技知识的笃信与投入,化成了徐寿的翻译惯习,因此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自身的渊博学识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得到了国人的肯定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因素进一步促成了他的译者惯习的形成,并使其结构化。

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行法则的社会空间”^{[13]162},该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惯习、资本和位置关系,以争取和形成新的资本配置。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工作,作为馆内的台柱,在此翻译场域下,徐寿的译者惯习和资本都会对其翻译职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徐寿在晚清翻译场域中的建构作用

晚清洋务时期,为救亡图存,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借以实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此期间的翻译实践活动“创设了外语与科学技术兼学的近代学堂和翻译机构,培养了一批科技翻译家,翻译了大批科学技术书籍,推动了清末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4]19}。徐寿一生著述繁复,很多译书是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首部译著。这些译著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心理状态,不仅对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科学知识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给中国知识分子输入了新的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而且丰富了中国原有的知识体系,对晚清翻译场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

沃夫(Michaela Wolf)认为译者惯习对翻译产品有“建构”作用^{[15]23},翻译产品出版后对社会也有“建构”作用^{[15]16}。下面从翻译特点和翻译贡献两个方面详述徐寿对晚清翻译场域的积极建构作用。

1. 徐寿的翻译特点

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译才,徐寿从事科学书籍翻译的时间长达17年(1867—1884),著述甚丰。他本人不懂西文,翻译西书的形式是与外国

传教士合作,由传教士口译、他笔述润饰的译述方式。徐寿的惯习和资本使得徐寿译介有以下的特点:译介新知识、译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专业性、传播广泛等。

据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统计徐寿译述31种^[16]。其中很多译书如《汽机发轫》《化学求数》《化学考质》等都是相关领域的第一部译作,不仅对国人了解西方科技新知识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些科技书籍的翻译方面,“化学通常被认为是成就最大的,选本精而系统,译笔畅达渊雅,这些都是与徐氏父子的贡献分不开的”^{[10]140}。徐寿精通化学,其相关译著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徐寿译书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专业性。

徐寿的很多译书传播广泛,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治十年(1871),翻译馆的第一批译著在制造局印行,《申报》称赞译书“精深微妙,无美不臻,而笔而述之者又复斟酌尽善……以之为工师之规矩,儒生之图籍,不将见其家喻户晓哉”^[17]。徐寿所译西书受到极高的肯定,不仅在国内传播很广,而且扬名海外。日本闻知徐寿等人系统地翻译了近代西方化学著作,便派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等人前往江南制造局“购取译本,归国仿行”^{[18]25}。

2. 徐寿的翻译贡献

关于译名翻译,徐寿等人提出的“译名七项要事”对翻译的规范和统一译名的贡献非常大。傅兰雅在《科技术语:当前的歧异与寻求统一的方法》一文中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尽可能意译,而不音译;第二,万一不能意译,则要用尽量适当的汉字音译……基本词素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第三,新术语应尽可能同汉语固有的形式建构相一致;第四,译名要简练;第五,译名要予以准确的定义;第六,译名要在各种场合都要符合原意,不致矛盾;第七,译名要有灵活性^{[19]22}。这些译述不仅对中文化学元素名称的确定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我国后来翻译化学书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清末、民国时期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化学工作者在翻译化学书籍时,基本上都遵循了上述原则。

除此以外,徐寿在译才的培养计划及科技人才的培养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徐寿不仅将自

己后半生的主要精力贡献给了科学翻译事业,而且意识到培养科学翻译人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于是提出设立翻译学馆。由于各种原因,翻译学馆石沉大海,徐寿关于人才培养翻译西书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后来,徐寿积极参与筹建格致书院,并亲自教学且负责院务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技翻译人才和科技人才,如赵元益、瞿昂来、钟天伟等。

五、结语

徐寿“研精覃思,技术之长,不懈于古”,其丰厚的资本和惯习来源于自身渊博的学识和远见卓识。反之,这些资本和惯习塑造了他的翻译活动,使得他参与译介活动呈现独有的特点。徐寿不仅是晚清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他积极参与翻译活动,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知识,虽以“布衣”卒于翻译和科学教育岗位,但清政府为表彰他在翻译西书和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破格入录《清史稿》,为后人所敬仰。

[参 考 文 献]

- [1] 杨根.徐寿和中国近代化学史[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
- [2]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程培芳.徐雪村先生序[A].格致汇编(李俨藏本)[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4] Bourdieu, Pierre. Habitus[A]. In Hillier, Jean & Emma Rooksby (eds.).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C].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5] Bourdieu, Pierre & John B. Thompson.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Bourdieu, Pierre.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刘晓峰,马会娟.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J].上海翻译,2016(5):55-61.
- [8] 徐敏慧.从翻译规范到译者惯习[J].中国翻译,2017(6):11-17.
- [9]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0] 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11] 黎难秋.徐建[A].方梦之,庄智象.中国翻译家研究·历代卷[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 [1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3]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14] 王秉钦.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5] Wolf, Michaela & Alexandr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 [16] 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J].中国科技史料,1988(3):65-74.
- [17] 《申报》同治壬申(1872)[N].六月廿七日.
- [18]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19] 王秉钦.近现代中国翻译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南山)

江苏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研究*

吕美晔 李丹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江苏作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实践较为领先的省份之一,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坚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打造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环境承载量逼近阈值;绿色技术经济可行性较差,技术应用率和普及率较低;高水平的环保企业不多,绿色技术和服务供给不足;静脉产业链各环节尚未打通,循环经济模式处于摸索阶段;区域间环境政策执行不一致,倒逼产业转型存在制度漏洞。为了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在政策层面,加快惩罚性政策向激励性政策方向转变;在技术层面,以大型企业为主体推动绿色技术转化和应用;在市场层面,加大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绿色服务供给;在循环发展层面,加快探索构建多层次、跨区域的发展模式;在低碳发展层面,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生产与消费领域绿色化。

[关键词] 江苏;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109-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江苏是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资源消耗大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生态与资源约束压力越来越大。近期江苏省政府印发的《省政府关于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意见》(苏政发〔2020〕28号)聚焦绿色产业发展主题,同时统筹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出了江苏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路径和新举措,明确了绿色产业发展的任务书、路线图。江苏作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实践较为领先的省份之一,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坚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打造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当前江苏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的发展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绿色

产业相比尚有差距,在具体实践工作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为此,本文针对当前江苏省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快打造我省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的主要对策与建议,以期对江苏省宏观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一、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历程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大致经历了:循环经济(20世纪60年代提出)—绿色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低碳经济(21世纪初提出)三大阶段。“循环经济”于20世纪60年代在阐述生态经济时予以提出,其侧重点在于改变传统经济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这一物质单向流动经济结构,转向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在治理工业污染物过程中采

* [基金项目] 2020年江苏省委书记、省长圈定课题“江苏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研究”(项目编号:YQ2020033), 2019年南京市江宁区改革发展研究中心重大课题“江宁美丽乡村绿色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03)。

[收稿日期] 2020-09-10

[作者简介] 吕美晔,男,安徽旌德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李丹,女,河北邯郸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取资源化方式废弃物处理之后,循环经济的 3R (资源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 处理原则基本形成。“绿色经济”于 1989 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等人撰写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黑色”发展而提出的。它是指在绿色创新驱动下,以资源高效率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式替代传统低效、冲突、不可持续的旧的增长方式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其侧重点在于构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

式。“低碳经济”最早见于 2003 年英国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之中,其主要是指通过低碳技术研发、能源高效利用以及低碳清洁能源开发(太阳能、风能、氢能源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变革。上述三者之间既有传承和发展,又有细微差别和侧重不同。但综合来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最终落脚点仍然在发展上,并非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停止发展,只不过给发展加上了环境约束,其目的是要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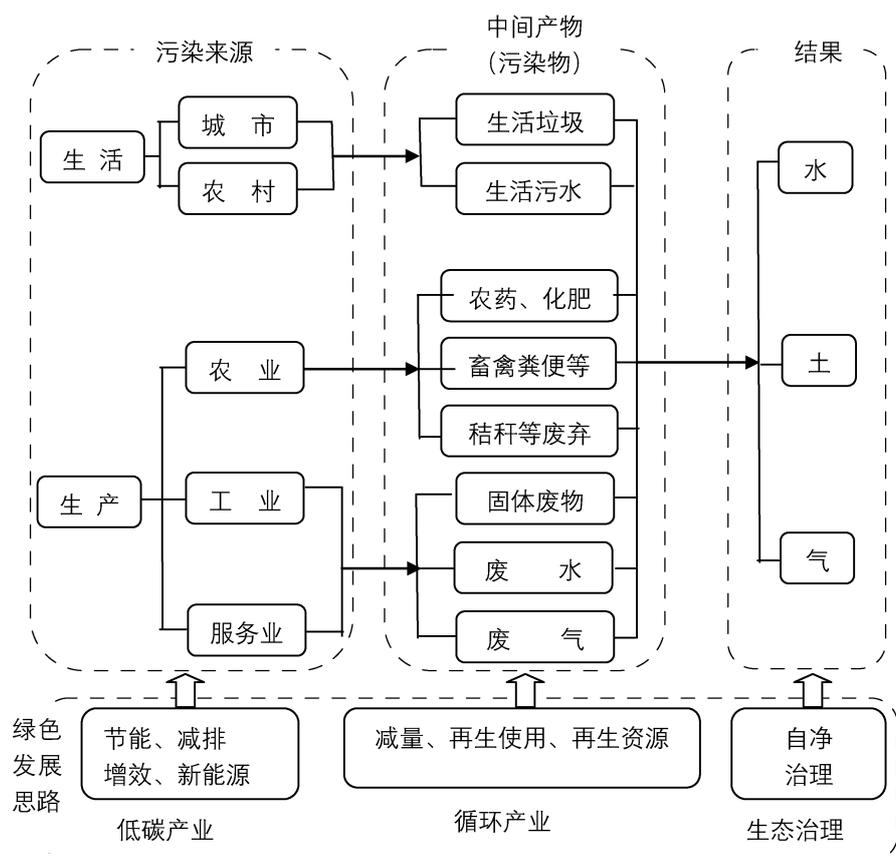


图 1 环境问题与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关联性

由图 1 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正是因为来自各个行业产生的各类废弃物,以及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废弃物没有经过妥善处理,被随意地排放,才导致了污染的产生和环境的破坏。相应地,环境保护与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的构建可以从三个方面同时入手,即控制源头、管理中间产物(污染物)和治理污染结果。其中,源头控制的主要思路在于通过各种绿色手段从源头开始就以节能、减排、增效以及寻求低碳新能源,减少污染物质的产出;管理中间产物的主要思路在于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将可能造成污染的中间产物进行再生和

利用;而对已经被污染的气、水、土等则一部分靠生态治理,一部分依靠环境的自我净化和修复。

二、江苏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江苏是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实践较为领先的省份之一,早在 1992 年,中国无锡(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成为我国唯一以发展环保产业为特色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9 年,苏州新区在国内首开先例,建立了区域性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将环境管理体系融入区域行政管理,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

实施、同步发展,政府调控与市场相结合,保护环境从源头抓起,招商引资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污染重、能耗高、技术水平低的企业一概拒之门外。随后,常州国家环保产业园和江苏盐城环保产业园先后成立并运营,截至目前,江苏已成为全国拥有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园最多的省份。同时,在农业和其他产业领域,江苏也坚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打造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 产业层面:三大产业比重显著调整,生产类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

21世纪以来,江苏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总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高。1989—2014年,全省产业结构为“二三一”。2015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8.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全省三大产业结构变化为“三二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三大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2019年,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3%、44.4%、51.3%。从三大产业内部来看,第一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中,农业占比在64.4%左右,是占比最高的行业。渔业和畜牧业占比分别为22.1%和11.6%,林业占比为1.9%,是产值占比最低的行业。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产值占比在83.6%,建筑业占比在12%左右,电力、热力、水供应占比在2.5%左右,采矿业占比不到1%。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中,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是产值规模最大的5个行业。综合来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是江苏省产值规模最大的5个行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行业地区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在40%以上,是江苏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之生产领域的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全省生产领域污染物(废水、废气和废弃物)排放总量呈现下降趋势,生活类污染物排放呈上升趋势。具体来看,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从2014年的20.49亿吨下降到2018年的14.36亿吨,下降30%。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从2014年的39.59亿吨上升到44.03亿吨,上升11.2%。全省废气排放中,2018年二氧化硫排放

量、氮氧化物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总量较2014年分别下降66.1%、36%和56.4%,这其中生产领域的废气下降是致使废气总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全省废弃物总量呈上升趋势,但工业生产领域的废弃物总量增幅显著小于农业和消费领域废弃物总量增幅。再从能源消耗视角来看,2017年全省能源消耗结构中,工业、生活消费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三大领域是能源消耗主要领域,三者能源消耗占比分别为74.21%、9.41%和7.36%。全省能源消耗量2017年达3.14亿吨标准煤,较2014年增加5.25%,但工业领域能源消耗量仅增长1.06%,而生活消费领域和农林牧渔领域则增长27.07%和18.06%,增幅远高于工业领域。综合来看,随着三大产业结构调整,我省生产领域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未来在抓住生产领域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同时,要逐步开展加大对生活消费领域的绿色发展。

2. 政府层面:绿色发展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产业发展方向日渐清晰

为保障江苏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江苏省在水、土、气等领域先后出台了《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为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城乡空间和产业发展空间总体规划。2013年以来,江苏省先后颁布了《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江苏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年)》《江苏省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等一系列基础性、强制性、约束性的规划。上述法律法规和战略规划的实施基本从空间布局、功能区划、产业发展三大领域构建了江苏城乡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总体框架,明确了江苏省绿色发展的底线,大体确定了各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此外,江苏省还出台实行了节能减排、脱煤、降耗、治水减污、大气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263专项整治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政策和行动方案。在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发展领域制定出台以产业准入、区域准入为核心的环境准入制度,推进排污许可证的管理和排污权交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的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环境污染强制险制度。通过绿色发展政策法规

的制定,江苏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引领战略得到基本确立。

3. 市场层面:绿色技术使用逐步上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日益加快

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融合发展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关键。21世纪以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被普遍接受,绿色技术在各产业发展中也被广泛采纳。目前在我省各产业技改项目中,超过70%的技改项目集中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域,这与之前技改项目侧重于提高产能有着明显的转变。在我省炼化、冶金、化工、造纸、供电供热等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工业产业领域,超过80%的规上企业均已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如在2009年江苏就已基本完成集中供热范围内小锅炉关停任务。2015年江苏颁布实施《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建筑领域的绿色发展开始全面推进,据测算,江苏省发展绿色建筑仅节能一项,“十二五”期间就可以节约1300万吨标准煤,占全省节能目标的五分之一强,目前,全省绿色建筑面积位居全国前三,“十三五”期间绿色建筑节能将进一步提高。在农业产业领域,随着绿色种养殖技术进一步推广,农药化肥双减任务实施,畜禽粪便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的应用,到“十三五”末,全省农药使用量将力争实现零增长,化肥使用量较“十二五”末削减5%,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将达到90%以上,农业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将基本形成。在第三产业领域,交通运输、仓储、餐饮服务业是能源消耗和三废排放的主要行业,随着新能源交通工具和国六排放政策的实施,以及餐厨垃圾集中化处理等绿色低碳循环技术的应用,上述领域的能源消耗和三废排放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4. 城乡层面:城市静脉产业初步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城市和乡村的绿色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统筹城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才能实现城乡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当前,我省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打造城市静脉产业。对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在加大绿色技改的基础上,通过设立静脉产业园、循环产业园、环保产业园等形式,实现生产和消费领域废弃物的储运、分类分解、资源化利用和最终处理

等一系列流程,达到产业相互匹配,防止环境二次污染。如苏州光大环保静脉产业园是全国首个集中处理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的现代化环保产业园,主要解决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市政污泥等城市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镇江新区静脉产业园,其园区内的江苏恒顺达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企业之一,其主要将地沟油、酸化油、非食用的各种动植物油脂回收作为生产原料,生产出高品质生物柴油、原料油、重油以及棕榈酸甲酯,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开发和循环利用。目前全省其他地市,如盐城、连云港等地静脉产业园也正在加快建设步伐。农村区域长期以来是我省绿色发展的薄弱地区,十八大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通过淘汰关停乡村落后企业,大力实施绿色种养殖技术,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等措施,我省乡村地区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以绿色生态农业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绿色底色。

三、江苏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江苏正处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型期,三大产业正逐步转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但江苏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的发展仍然处在探索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1. 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环境承载量逼近阈值

虽然江苏三大产业结构变化为“三二一”,但产值规模最大的5个行业中除金融业外,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依然是耗能和排放最高的部门。江苏是制造业大省,但依据制造业行业分类来看,化学原料、炼化制品、化学纤维制品、黑色金属冶炼等能耗较高,附加值一般的行业仍占据主导地位,高附加值的电气机械、通信设施、医药制品等行业仍有待提高^[1]。同时,在生产类领域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的情况下,在第三产业和生活消费领域的能耗和排放正在出现双高增长,从而致使污染排放总量依然呈现上升趋势,环境承载量正在逼近阈值。

2. 绿色技术经济可行性较差,技术应用率和普及率较低

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的发展以绿色技术为核

心,然而当前江苏相关产业的绿色环保节能技术尚未成熟,许多技术缺乏经济可行性。中小型企业考虑前期投入成本过大,不愿启用绿色生产设备和技术;大型企业则对政府资助依赖严重,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本颇高,示范和样板效应大于实用性。绿色技术的不经济就无法促进从企业到产业的大规模绿色化转型发展。即便在当前环保要求如此严格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仍选择顶风违规排放,就是因为违规被发现的罚款成本要低于环保改造升级的成本。同样,在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绿色种养技术正在大力推广,但大量的经营主体缺乏经济有效的绿色经营手段,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江苏个体农业经营者中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的仅占11.9%,使用过商品有机肥和农家肥的仅占2.8%^[2],究其原因被调查户普遍反映首先生产成本会显著升高,但市场存在高质不低价的逆向选择,所以最终并不会大面积采用绿色技术进行生产。诸如绿色防控、秸秆还田、畜禽粪便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理等绿色发展技术应用也都存在类似情况。因此,在缺乏政府有效补贴和产品市场尚未形成高质高价的情况下,绿色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存在逆向选择。

3. 高水平的环保企业不多,绿色技术和 服务供给不足

传统产业的绿色化转型离不开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和企业提供环保设备、技术和服务。目前虽然江苏涌现出了一批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和
服务供应企业,但总体来看,大多数企业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绿色技术的产学研结合不够“研发—转化—应用”明显脱节。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整个产业的集中度较低,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有待增强。环保类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提供的技术和
服务层次水平不高,大多数只提供加工、组装、制造的服务,提供定制化、成套化、系统化产品和服务的较少。特别是环境服务供给方面偏弱,行业整体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大部分节能环保企业现阶段的主要服务对象仍是政府,主要服务内容大多是基础设施建设、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建设和
服务,面向广大待改造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供给不充分,进一步造成了企业绿色化转型难。

4. 静脉产业链各环节尚未打通,循环 经济模式处于摸索阶段

打造静脉产业链条是大势所趋,但静脉产业包含企业内的、产业内的、产业间的和消费后的等多个层次,当前江苏已经出现的循环经济模式大部分仅限于单个企业或者经营主体内部,企业之外、更大范围的循环经济模式尚未建立。如在农业生产领域,最常见的循环经济模式是种养结合循环,但也仅限于单个经营主体内部。大量的农业生产废弃物,包括秸秆、畜禽粪便、农膜等,收集后也无法有效利用,或无企业接收,或运输成本过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废弃物面临同样的困境。从江苏省静脉产业链发展来看,一是产业发展缺少有效的盈利模式,致使发展缺乏动力。如2018年江苏省规上废弃资源利用企业仅128家,营业额仅为127亿元。相关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不挣钱”的困境中。二是产业链打造面临融资困境。静脉产业链正常运转,需要建立较多的回收网点予以支撑。虽然单个网点规模一般不大,资金需求量也较小,但整个网络的资金需求量却很大,而且这个长期过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回报率比较低,因此很少有大额社会资本愿意参与其中。三是缺乏区域层面的统筹规划和安排。目前江苏省各地的静脉产业园,除镇江(生物柴油)、兴化(塑料垃圾)等几个静脉产业园走专业化处理路线,大多仍以综合性处理为主,侧重处理,资源化再利用能力偏弱^[3]。再加上各地用地政策青睐于高产值高税收的企业,对于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高的静脉产业企业并无倾斜,静脉产业链的打造更是举步维艰。

5. 区域间环境政策执行不一致,倒逼 产业转型存在制度漏洞

通过严苛的环境政策倒逼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环境政策实施上存在松紧不一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政策的实施较早较严格,经济水平欠发达的地区对环境政策的实施则相对较为宽松。企业在面对局部收紧的环境政策时,更倾向于以转移代替投入研发和改造,即选择转移到环境政策较为宽松的地区,以规避环保压力和成本,而不是持续投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技术。欠发达地区出于经济目标的考量,也非常乐于接收此类产业转移。如此一来,即便是实施了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也无法倒逼企业往绿色发展方向转型。江苏之于全国中西部

地区,苏南之于苏北地区,环保政策都是实施得更早也更加严格的。近年来,苏南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往中西部转移的现象屡见不鲜。苏北地区在上一时期也承接了不少从苏南等发达地区转移的产能,其中包括重化工、材料、能源等企业,这些企业对地方经济、就业等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生产安全事故,经济和生态目标一时难以协调。正是环境政策执行制度上的不一致,致使大量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寻求制度漏洞,而迟迟不愿实现绿色化发展的突破和升级。

四、对策与建议

绿色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是一条需长期坚持和持续投入的荆棘之路。江苏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升级尚处在攻坚阶段,针对现阶段特征和问题,打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政策层面:加快惩罚性政策向激励性政策方向转变

近年来,江苏逐步完善了产业绿色发展的各项政策法规,通过实施各类禁止性法规条例,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资源滥用以及破坏式的发展行为得到了有效约束。但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的发展除了运用“禁、限、罚”等带有惩罚性质的政策之外,还需要更多激励性和促进性政策,引导和支持各类企业和产业向绿色化发展方向转型。未来的绿色发展政策应由“禁、限、罚”向“促、管、监”方向转型。一是要继续做好禁止性法规政策的执行,严格执行“环评一票”否决权制度,严守绿色发展底线。对于苏北等经济相对薄弱地区,要认知到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对产业绿色转型发展与经济增长放缓之间的矛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三高两低”企业要严格禁止其进入,对现存绿色发展程度不高的产业、企业要加大技改和治理。对苏南和苏中地区则应尝试由低标准的、确定边界的限制式发展,向高标准的增长式发展转型。要持续推进绿色技术取得突破,建立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模式,以技术和模式输出持续带动苏北和全国各地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绿色财富的积累。二是要积极出台财政、税收、信贷以及奖补等各类激励性政策。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探索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投资基金

等,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破解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资金短缺困境。三是加快突破相关政策和制度瓶颈,消除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顾虑。进一步加快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改革,着重规范排污权交易、出让,激活排污权要素市场。支持开展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环境公用事业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同时加强对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监督,推进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

2.技术层面:以大型企业为主体推动绿色技术转化和应用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各大高校和研发机构为保障,加大原创性绿色技术的转化和应用。一是要依托江苏高校众多,人才聚集的智力优势,持续加大对原创性绿色科技的研发投入,建立绿色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和领军人才的创新创业机制。二是要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和创新系统,将高校、科研院所理论可行的绿色技术,加快转化为企业所需的可操作、经济可行的绿色技术。三是鼓励和支持我省环保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吸收引进相结合,持续关注和择优引进借鉴国外环保方面核心与关键的技术,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四是鼓励国有企业、龙头企业等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进行自身的绿色化转型,并在生产实践中对绿色生产的技术和模式进行持续升级和完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手段,大力推进资源整合与共享,将绿色生产的技术和模式推广到全行业。

3.市场层面:加大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绿色服务供给

在绿色科技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持续积极推进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首先,重点支持和培育省内第三方绿色生产性服务商的发展。逐步扶植一批技术领先、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绿色生产性服务企业面向广大企业,提供绿色技术、绿色生产流程的设计改良、绿色设施设备建设安装等服务。鼓励主要面向政府提供环保设施建设和服务的现有企业,逐步兼容提供面向企业的环保科技服务。其次,要继续提升省内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集中度,支持产业链的并购整合,培育大型环保集团,促进产业优胜劣汰。第三,鼓励中小型绿色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在技术服务上以专、精、细

为主,在服务对象上以特有行业、区域内相关企业为主,与大型环保企业和环保集团形成差异化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四是充分发挥江苏省环保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的实力,探索将公共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技术方法,推广应用 to 产业绿色技改以及民用和商用领域中。

4. 循环发展层面:加快探索构建多层次、跨区域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现有的循环经济模式为基础,以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为主体,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链接,加大废弃物回收网点建设,着力打造循环复合型产业链。二是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途径组织企业内、企业间、产业间的生产,由点到面构建多层次的循环经济模式。三是按照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要求,优化循环产业园布局,科学规划园区产业结构,实现生产、绿色服务与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有机结合,打造以园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的循环经济典型。四是鼓励在市县范围内探索循环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打造城乡互联,共享可用的静脉产业链,实现区域层面的循环发展。

5. 低碳发展层面: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生产与消费领域绿色化

首先,要守住江苏省碳排放总量的底线。加快建立涵盖农、工、商贸等各产业的碳排放核算统

计体系,优化碳排放核算方法,做好全省碳排放年度检测、核算和管理工作。其次,要提高传统高碳能源的综合利用率,通过技术创新和循环利用等方式大幅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单位产出率。第三,要打破单一的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广使用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要重视对氢能源产业的前瞻性研究和布局,避免在长三角氢能源产业发展中掉队。最后,积极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建立低碳、节约、生态的生活观念和消费习惯,拒绝奢侈和浪费,建立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模式^[4]。

[参 考 文 献]

- [1] 王圆缘,彭本红.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J].群众,2018(13):17-18.
- [2] 江苏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业绿色生产体系研究课题组.构建农业绿色生产体系的江苏实践与思考[J].江苏农村经济,2018(7):34-36.
- [3] 周路菡.静脉产业园之困[J].新经济导刊,2013(5):68-73.
- [4] 张友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J].红旗文稿,2020(17):30-31.

(责任编辑 光 翟)

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因与路径*

金高峰¹ 张永军²

(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13;
2.中共江宁区委党校,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 美丽乡村涉及内容广泛,仅靠财政资金投入很难持续,社会资本介入为美丽乡村增添了更多新动能。基于江苏省的实践,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应重点关注:如何处理好政府公共目标与企业自身利益、企业自身发展与乡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如何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动力,增强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主动引入的灵动性空间;如何引导村民适度参与,改变村民无法参与、无力参与、不愿参与的困境;如何合理评估农村土地价值、村民集体股份及村集体的股权份额;如何防控企业不确定经营风险,缓解社会资本投资的不确定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的相应对策建议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加大对各利益主体的扶持,健全社会资本参与的管理机制,完善村民参与机制,提供持续制度保障。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美丽乡村建设; 利益共同体; 江苏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116-06

美丽乡村建设仅仅依靠空心化的乡村内生发展很不现实,而政府由于财力有限,必须努力激发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降低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才能有效弥补乡村振兴资源的不足,为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1]。2018年,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更好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见》,拓展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投融资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中,美丽乡村建设也在逐步由最初的财政投入变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共同投入,各地积极探索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方式与发展模式,典型的有江宁区以国有资本撬动民间资本参与,建设了黄龙岷、石塘人家、大塘金等一大批国家级美丽乡村典范,也有兴化市东罗村与万科集团合作建设特色田园乡村的成功实践。在未来发展中既需要考虑企业的利润与风险,也需要考虑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加强利益链接。针对这些焦点性问题,本文

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相关政策,为未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一、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领域是可行的,必要的,通过转变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变传统的财政主导建设为引导,既能够有效解决建设资金的供求矛盾,发挥财政经费“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缓解财政负担,以能够使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为美丽经济,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各自期望的利益,确保可持续发展^[2]。

1. 政策机遇降低交易成本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连续实施,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理念升级;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农村产权交易体系等改革,大大降低了交易成

* [基金项目] 2019 江宁区委党校委托项目“社会资本参与江宁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njjndx2019002)。

[收稿日期] 2020-10-08

[作者简介] 金高峰,男,江苏建湖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永军,男,江苏淮安人,中共江宁区委党校讲师,经济学博士。

本;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的未来更美好。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规定,合作期限不少于10年;《关于印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指出BOT、TOT、ROT模式运营周期在20-30年之间,这一时间跨度契合了美丽乡村建设运营周期,为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提供了政策支持^[3]。

2. 乡村功能向外部市场延伸

农业不再是温饱型产业,乡村的功能也逐步向三生(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延伸。这就对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统筹考虑乡村的三区划分,需要与当地的地貌、自然环境相协调,并且在建设过程中需着力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也要重视乡村的特色文化,承载着地方文化保护、传承和发扬,肩负着文化深度挖掘的使命。传统的政府包揽建设的服务方式,很难持续,很难与市场接轨,变美丽乡村为美丽经济。通过与社会资本加强合作,让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大大减少政府的资金压力,也可以借鉴资本市场的力量,助力打造每个乡村的独特IP,规避美丽乡村建设中运营效率不高的问题,使美丽乡村的经济效益得到完美发挥。

3. 企业的逐利需求与社会责任

经济发展高质量趋势,对环保要求约束,推动企业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推进,资源要素流动便利化,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后,能够获得相配套的人力等资源;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企业、乡村精英资本富裕后,回馈社会的责任心增强,加上浓厚的乡土情结,有投资的信念。企业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有了参与国有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大机会,在这种融资模式下,采用了市场化运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且在政府的扶持下,项目的经济强度增加,风险降低,维护了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

二、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的探索与经验总结

1. 江苏省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

近年来,不少地区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采取多元化方式,积极鼓励国有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市场化机制积极开发乡村周边的生态资源,创新采取PPP、BOT、直接投资等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中,国有投资为主体占比48.4%,其他投资占比33.7%,社会投资相对较少占比17.9%。

从投资领域看,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领域不断拓宽,有参与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观光休闲旅游、乡村民宿等农业产业化领域;有参与农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投资增减挂钩项目,获得建设用地指标或分享指标收益;有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也有的参与田园综合体建设,集循环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从合作方式看,各方资金责任明确。县区以上财政资金中专项配套资金用于村庄的物质环境改建,例如环境整治、农村道路改造等;街道层面支持乡村建设水、电、气、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参与重点营建项目详见表1。

表1 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合作方式与内容

合作方式	典型案例	建设(合作)内容
社会资本+政府	溧水石山下村	由溧水商旅与南京青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通过与村民双向选择,收购并改造闲置老宅作高端民宿
国有资本主导	江宁黄龙岷茶文化村	由江宁区交建集团和江宁街道共同开发的,集团投资占92.2%。将农村道路建设纳入美丽乡村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项目统一规划、建设,收储并有效利用村庄内的有效资源与资产
民营企业带动社区参与	马场山村	以“三国村”打造为开端,企业负责运营,农民就业培训;街道统筹村庄及周边景区策划建设;社区负责落实村庄相关工程和建设与日常维护

合作方式	典型案例	建设(合作)内容
民营企业+政府+村集体	兴化东罗村	依托千垛景区,共建特色田园乡村,兴化市政府负责资源保障,万科负责规划设计、运营管理,东罗村负责村民协调并从中获得固定收益
村民自主开发后民企独立运营	汤家家村	社区整合交通水利环境等资金,改造自营餐饮民宿房屋,于2015年由独立企业打包市场化运营

从经济社会效果看,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短缺问题,促进了社会资本自身持续发展,为“三农”注入了新技术、新理念,逐步呈现农村环境美、集体经济强、村民收入高、社会效益好的多赢局面。

2. 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

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初期,常常会面临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如景观要素丰富多样而旅游配套相对缺乏、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而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基本满足而公共管理与服务有待提升、村落空间格局独特而房屋利用率较低等。需要化解长期积累下来的制度性困境,包括财政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低、乡村文化认同感下降、基层组织涣散、村庄发展趋同化等。从各地多样化的实践看,形成了一些很好的运营思路:

(1) 全域打造乡村建设规划

在美丽乡村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主要对旅游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对外营销,对社会资金投资采取“不干涉、不指挥、不影响”的原则。结合城乡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做到“城乡一套图、整体一盘棋”。如江宁区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美丽乡村”规划与建设工作,全域统筹,科学规划。以点带面、整体开发美丽乡村,从根本上改善了江宁的农村面貌和社会结构,使凋敝的乡村重现活力,成为都市人的向往之地。

(2) 以社会资本带动民营投资

首先,以国有资本引领撬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美丽乡村财政包揽的局面,政府主要承担环境整治、农村道路改造、农村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项目。如江宁交通建设集团等区属国有企业先后以合资、合作等方式与农村街道共同建立了若干美丽乡村开发经营机构。2017年3月,由国资办牵头,旅游、交通等部门和单位共同组建起专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南京江宁旅游产业集团,使

“下乡国企”的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国企发挥自己接近市场,在人脉资源丰富、产业规划专业等的优势,引进知名民宿进驻乡村。政府在搭建好平台的基础上,运用资金奖补、政策支持等手段撬动社会(民营)资本投入美丽乡村建设。其次,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过程中,率先出台意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如在兴化市东罗村创建过程中,由万科集团与兴化市政府签订协议,万科公司在兴化专门成立项目公司(兴化市万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东罗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建设和运营,在总8520股本金中,万科股本金4500万元,占总股本金的52.82%;文旅公司股本金3480万元(政府的1100万元拆迁补偿款未计入股本金),占总股本金的40.85%;东罗村集体股本金540万元,占6.34%。

(3) 注重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永续发展

首先,做强产业基础。通过发展配套产业,让社会资本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中切实取得收益。开展高标准农田连片整治,推动农业高效规模集约发展,主导产业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农业、休闲农业、智能农业、加工农业,加快人才、科技、资金要素向现代农业园区集聚,打造一批集生产加工、科技示范、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加大农业清洁生产示范,推广节肥、节药、节水、节能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实现秸秆综合利用。其次,推进融合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导致不同产业的相互渗透、交叉、重组,农业资源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市场营销等成为新型产业链条上有机联系的产业环节;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新型产业链的初步形成,导致在相互需求基础上的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提升了农村产业的产出效率。如黄龙岷的种加服融合发展、世凹桃源农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等,无锡田园东方文旅融合发展。数据显示,与美丽乡村推进之初相比,全省乡村一二三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农业总产值和销售额均有了明显提升。

(4) 建设过程中提升村民文化认同感

首先,注重村民意见表达。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一开始,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盈利模式、未来收入分配等不了解,不少持怀疑态度,有的抱有不合作、观望甚至排斥态度。为此,各地在前期规划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了解他们对产业发展、污水整治、景观亮化、停车场所、公共配套等多方面建议,并适时将这些意见吸引进规划中;在乡村农房改造中,改变传统的大拆大建式思维,采用针灸式改造和装修老旧房屋,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如黄龙岷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少拆多修”理念,对全村49栋民房进行立面改造出新;东罗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让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劳务用工基本上都是由东罗村委会派遣,用村干部自己的话说:“政府拆迁,万科建设,我们出劳务”。其次,重建社会资本与农民利益共同体。美丽乡村建设不同于漂亮民居,不是将原住民迁出的城市化改造,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切实得到实惠。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充分体现村民为最大受益的前提,注意社会资本与村民的行为边界,对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和单体投资较大的项目,采取社会资本主导、街道(村镇)配合的建设路径,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增强幸福感;对适合“创业富民”的项目则积极引导农民自主建设。如黄龙岷村有4/5多农户搞起了茶楼、餐厅、客栈、茶乡土特产等特色经营项目,东罗村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将原住民分享到成科拓展有机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成果。

(5) 创新资本合作开发经营新模式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资源,积极探索建设经营机制,找准社会资本、村集体、农户的利益平衡点,为农户、社会资本进入美丽乡村建设“量体裁衣”,设计好制度与路径。一方面,分类指导社会资本参与示范点开发。优先在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或房屋空置率较高的其他村落发展民宿示范点或民宿集群,盘活散落于乡间的农村闲置房屋。针对体量较大适宜于打造示范点的乡村,通过置换、搬迁、租赁、合作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及专业团队开发建设;对体量不大的,一方面鼓励村民自主经营,另一方面进行资源重新整合,打包引入社会资本及专业团队开发建设;对在景区节点周边建成区内发展民宿的,采取合作开发、

土地挂牌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探索多样化的经营合作模式。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借鉴莫干山等地的先进经验,通过资产入股、委托管理、加盟经营等方式,组建公司、协会、联盟等利益共同体,整体推介,提升发展质量。

三、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点

各地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加强政府统一规划引导,为农户、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量体裁衣”;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社会资本在合作营建中能对接市场需求。根据笔者调查,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仍然存在不敢投、投入效益不好等一系列问题,建设过程中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各方冲突与博弈也在所难免,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如何构建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美丽乡村建设,涉及农产品的产供销、乡村旅游产业的吃住行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不是由单一的个体完成,涉及普通农户、实际经营户、村集体、企业、上级政府部门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群体都能从中获得相同的利益。如果忽略任一相关群体之间的合作、协调,都可能造成主体权利的失衡和矛盾冲突。在实践中,既要考虑风险的大小和发生概率及项目复杂程度,又要考虑投资主体的投资标的,很难选取一个合适的收益分配模式,保证合作各方的利益。为此,如何协调好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突破产权不明晰、信息不透明等制度性障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是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持续发展的前提。

2. 如何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动力

尽管省里出台了专项指导意见,但仍然存在企业不敢投、投资后效益不明显的问题。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哪些项目、哪些领域、哪些工作向社会资本放权,各地仍在探索中,既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更不能管得过死限制社会资本的自主性。目前美丽乡村建设比较依赖政府的规划被动引入,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主动引入的灵动性空间相对较少。

3. 如何引导村民适度参与

引导村民参与,振兴自己的家园,是美丽乡村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毋庸置疑,美丽乡

村工作开展以来,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更多的是低层次的被动的参与,很难主动深入合作。究其原因:一是无法参与。村干部和村民话语权少。“美丽乡村建设就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里擦皮鞋,很多工程项目动工时也不跟我们提前沟通,项目部对当地的民俗、文化还不是太了解,往往等出现问题了才找村干部帮助解决,很难协调。”二是无力参与。实践中,村民更多的参与方式是从事服务员、清洁工、临时工等低层工作,整体上文化水平不高,也限制了他们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三是不愿参与。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目前仍处于观望状态,对美丽乡村未来的前景缺乏信心,缺乏投入自己家乡建设的激情。因此,如何引导村民适度参与,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需要突破的问题。

4. 如何确保村民享有个体利益份额

当前确保村民的利益份额存在三大难点:一是如何评估农村土地的价值?企业、政府主要是资金投入入股,是比较明确的,唯有村集体是以土地资源入股,当前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精确计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折价模式或标准;二是集体入股的份额如何分红?如果真正按照公司法,只有在公司有盈利时才能分红,美丽乡村建设投资量大、时间长且收益慢,可持续发展压力也大,实践中的难点是如何在征用农民土地后给予基本稳定的生活保障来源;三是如何确定村民的股权份额?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应该如何确定集体与农民各自的份额?如何确定不同农户家庭的份额?都是合作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5. 如何防控企业不确定经营风险

在制度供给上,农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总体上滞后,对于一些宅基地和农房长期闲置空置,缺乏更为合理的盘活与支持方法,使社会资本未来发展空间受到约束。一是融资风险。美丽乡村建设正处于初期阶段,投资大、耗时长,大多数项目都是秉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建管企业不仅没有房屋产权,也没有土地产权,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押资产。二是经营风险。当前不少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来自政府的补助性经费,乡村的发展定位不明确、产业活力释放有限、形成稳定的持续的现金流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二是其他诸多不确定风险。如缺乏建设用地指标投资受

限、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的违约风险、合作各方职责不明的合作风险、乡村高素质人才短缺等。

四、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本着村企共赢的原则,站在有利于发挥乡村资源优势,有利于优化乡村发展环境、搭建发展平台,有利于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自我提升战略,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战略高点,推进社会资本与农村产业、村庄资源、农民诉求的深度融合,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要让社会资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能投得下,发展好,需要做到:第一,进一步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转变自我定位,强化由主导转变为引导的思想,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运作机制;同时定期、及时、详尽披露相关农业信息,降低企业信息费用,为企业选择适合领域、发展模式、投资规模等提供参考。第二,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突出自然人信用建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依托国家人口信息资源,建立完善自然人诚信信息系统及奖惩体系^[4]。

2. 加大对各利益主体的扶持

一是统筹宣传引导。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注重整体包装与宣传,塑造鲜明的旅游形象,提升旅游目的地知名度,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给予企业全方位支持。建立政企沟通长效机制,定期会议及时了解企业政策诉求,进一步发挥美丽乡村财政资金投入的导向与管理作用,为项目提供直接投资、财政补贴与无处贷款;三是创新对村民参与的扶持激励。发挥美丽乡村专项发展基金的引导作用,扶持本地有意愿参与建设的专业户发展。鼓励村集体根据村民个人信誉提供担保,允许经营户以互助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

3. 健全社会资本参与的管理机制

首先,强化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监管作用。在美丽乡村的实际运作中,可以交由市场,但为了保证各利益主体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政府和人大应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其次,完善利益沟通机制。建立由各核心利益主体参加的利益表达机构,收集和整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信息传递,保证各方对资源使用权和分配权的需求;再次,探索村企交叉任职。随着美丽乡村的深入

推进,合作平台管理成员应包括政府、企业、村集体代表,企业的负责人也可以兼职村干部,参与村级一些公共事务管理,让每一方核心利益相关者都加入管理机构中,共同参与管理;最后,探索社会资本多元化低成本的融资方式。遵循多元化、低成本融资原则,积极谋求政府信用背书。要了解各个融资模式可满足的融资期限,调研融资市场环境,并充分为项目财务风险、政府信用风险、企业信用风险预留充分的空间或解决措施,构建完善的融资方案。提高资产流动性,在严格控制财务风险的前提下,尝试探索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将收益权打包为基础资产^[5]。

4. 完善村民参与机制

一是打通参与通道。对于政府、企业等信息要及时公开,确保村民对相关政策的知晓权;二是提升参与能力。加强对农民开展民宿、餐饮、手工艺品等经营技能的培训,提升村民自身文化水平与参与能力,使其不仅能参与到低层次工作中,未来更能有经营和决策的能力。三是培养参与意识。培养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教育培训、法律宣传等各种手段培养公众参与意识,提高乡村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社区内部凝聚力。

5. 为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持续制度保障

一是完善土地股份合作社功能。鼓励村民以土地经营权、个人资产、劳动力折价等作为股份参与进来,使村民作为资本的所有者获得一定的股

息收入,并有权对合作社财务与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二是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加快推动集体经营性资产量化固化,完善村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户政策,加快“三权分置”探索,把握好宅基地指标置换和留村用的关系,通过村庄整治的“增减挂钩”来探索形成合理的宅基地自愿退出机制、承包地流转机制、集体资产产权保障机制等,盘活农村资源。三是完善产权交易等配套政策。健全完善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业生产设施等各类产权的信息发布、价值评估、抵押登记、交易流转和风险处置机制,有效盘活农村现有资源。

[参 考 文 献]

- [1] 陈利希.应用 PPP 模式建设美丽乡村探讨[J].科技经济导刊,2016(2):127-128.
- [2] 魏晓晶.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5):45-48.
- [3] 吴先满,宋义武.PPP 模式在江苏的成功实践[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7.
- [4] 杨世朋.工商资本下乡路径及对策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7.
- [5] 陈义媛.资本下乡的社会困境与化解策略——资本对村庄社会资源的动员[J].中国农村经济,2019(8):128-144.

(责任编辑 光 翟)

党务公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信

——孔川著《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视野下党务公开研究》简评

潘 超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孔川副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视野下党务公开研究》一书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该书的亮点是:第一,着重从理论层面展开对党务公开的研究,在理论阐释中提高人们对党务公开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基础上,阐明了党务公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公开透明;第三,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的重大关系;第四,从多维度阐释了党务公开的时代价值和意义;第五,着重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党务公开完善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党务公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视野下党务公开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1)01-0122-02

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推进党务公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党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历史运动的庄严政治承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的具体展现,更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自信。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等,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这是首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标志着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的正式确立,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以更加开放、更加开明、更加自信

的姿态展示给世界,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务公开实践探索中的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颁布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的思想和理论来源、内涵解读、实践探索、制度体系建设等问题做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近期,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川副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视野下党务公开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就是其中之一。本书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之作,在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研究方面体现了五大亮点:

第一,《研究》着重从理论层面展开对党务公开的研究,在理论阐释中提高人们对党务公开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作者较为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务公开思想,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史实,充分挖掘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务公开思想。《研究》认为党务

[收稿日期] 2020-12-10

[作者简介] 潘超,男,山东泰安人,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公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属性,是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政策和使命,表达无产阶级政党目的和意图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营造良好的政治风气、稳定的政治结构、民主的政治气氛的本质要求。在思想基础方面,《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务公开思想的历史资源,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党建质量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研究》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基础上,阐明了党务公开的实质,是权力的公开透明。对党务公开的理解,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谈,也没有停留在表层研究,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为理论指导,全面阐述了权力的来源、本质和归宿,深刻分析了权力公开透明的原因、内容和意义,明确指出了党务公开的科学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公开透明。从权力的视角和维度理解党务公开,才能够真正抓住党务公开的要害,推动党务公开深入发展。

第三,《研究》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的重大关系。《研究》围绕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的关系、党务公开与依法保密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强调党务公开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党务公开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办事公开。与政务公开相比,党务公开提出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党务公开与政务公开的辩证关系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实现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双向促进、双向带动。与依法保密相比,党务公开是依法公开,要正确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依照法律法规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开和最严格的保密相统一。

第四,《研究》从多维度阐释了党务公开的时代价值和意义。《研究》认为,党务公开是建设法治型党组织的内在要求,公开是法治的体现和要

求,共识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党务公开就谈不上法治型党组织。党务公开是法治型党组织建设的推动力,通过党务活动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有助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增强党组织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党务公开有利于提高党务效能。党务效能是衡量党组织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党组织不仅要落实党内民主,更要提升党内民主的质量,实现高质量的党内民主建设。党务效能主要体现在党员群众了解参与党内事务的便捷程度,促进党内事务的透明,促进党务信息的流动和畅通,有利于党员群众参与党务活动、表达党内意见、监督党内事务,真正体现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这是提升党务公开效能的根本价值旨归。

第五,《研究》着重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党务公开完善的可行路径。党务公开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具体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务公开的进一步完善要从制度建设上发力,推动党务公开制度体系建设。关于强化党务公开的制度意识建设,《研究》提出只有社会公众具有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意识,才能够成为推动制度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才能够成为推动制度建设的动力源和支撑面。此外,《研究》还从制度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阐释,指出党务公开的工作机制、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风险化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是构建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的党务公开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

综上,《研究》较为科学全面地阐述了党务公开的思想来源、价值遵循与实践探索,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党务公开存在的问题、难题与困境,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理论的一部力作,值得党建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基层党务工作者深入阅读。

(责任编辑 光 翟)

Investigation into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Sensitive Period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Development

ZHANG Fei¹ ZHAO Qian¹ WEI Jie²

(1.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200, China;*
2. *Jiangsu Teacher Training Center, Nanjing, Jiangsu, 211200, China*)

Abstract: A survey of more than 400 core teachers shows that the sensitive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general ability, professional ideas, professional emotion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lies in the pre-service stage, while that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is in the post-service stage. There indeed exists a bottleneck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ost-service teachers, but for excellent teachers it is a breakthrough period. Therefore, teachers' training can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ensitive period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rvice stag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as, professional emotion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eneral ability as the carri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reer, the training of basic professional abilities such as teaching management ability,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bility and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t the career maturity stage, especially in the post-service breakthrough stag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level abilities like stimula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emotion,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idea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eaching research ability.

Key wor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sensitive period of development; teacher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GUO Wenbin^{1,2} LV Rui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Xinjiang, 835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a total of 240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filled in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score of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were respectively 3.01 and 2.51,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 < 0.01$), and that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expectation of results all entere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those students. It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is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their professional values are below the average; that the higher the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is, the higher their professional values will be; that professional values of normal students 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are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confidence,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

Key words: normal student smajoring in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elf-efficacy; professional values

Returning to Teacher Quality: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WANG Xiaofa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Xinjiang, 8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l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an issue that education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pay constant attention to.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lemented the following three edu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Equality Prior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Comprehensive Excellence", and has proposed the demands for "High-quality", "STEM" and "Excellent" teachers accordingly. "Triangular Four-Block Model" formed by American intermediary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and market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s such problems as the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the excessive pressur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university's 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training teachers, but also guarantees the training and supply of various types of teachers. These experiences deserve the attention and sh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selective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eacher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teacher quality; education strategy; Triangular Four-Block Model

Current Situation of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ldren's Museum-bas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ZHAO Yan LU Jia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Museum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soci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Children's education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museums to carry out venue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hildren so as to promote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of "Dunhuang Mural Art College Public Welfare Tour", uses th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ldren's museum-bas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t is found that children's museum-bas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sele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ingle mode and greater randomness of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museum-based education activities should accor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s and children's needs, enrich the form of activitie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enlightenment and inquiry, and clarify the activity goals and carry out the rat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Key words: venue education; children develop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gral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U Sume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2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et up outsta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foster the new generation with ideal, 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new era,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promote the reform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hance their pertinence and practicality.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teaching mode can help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classroom practice, campus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ompatibility of multiple practices and students' perfunctoriness, thu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actical teaching;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